【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Post-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周　凡 主编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股新的颇有争议的国外社会、政治思潮，尤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面世以来，引起了持续的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本书全面展示了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反思、探讨与争鸣，以期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域及其争论点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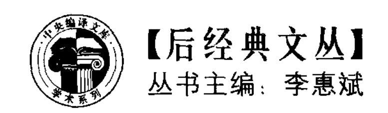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Post-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股新的颇有争议的国外社会、政治思潮，尤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面世以来，引起了持续的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本书全面展示了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反思、探讨与争鸣，以期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域及其争论点提供参考。


ISBN 978-7-80211-492-0
9 787802 114920 >
定价：46.00元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Post-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周　凡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7
（后经典文丛）
ISBN 978-7-80211-492-0

Ⅰ．后…
Ⅱ．周…
Ⅲ．马克思主义—文集
Ⅳ．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053 号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130345（编辑部）
（010）6656963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h t t p：//www. cctpbook. com
E-mail：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80×980 毫米　1/16
字　　数：400 千字
印　　张：23.5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后经典文丛》序言

中文中的“经典”指的是传统的和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比如：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把《本草纲目》视作中医经典；儒学学者把孔子的《论语》（当然也包括一些后人的研究著作）视为儒学经典；《古兰经》和《圣经》分别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视为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则被马克思主义者或其研究者视为经典。经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去一定时期内具有权威性，后来渐渐失去了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一种是始终都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这就出现了中文中“古典”与“经典”的区分。前者被称为经典中的古典。古典的不一定是古代的，同样的，经典的也不一定就是现代的。意义全在今人的态度而确定。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它是古代的，而是因为它是过去了的经典。中国的《论语》出自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古代的，但是，它对于儒学研究者而言，则依然是经典。

不过，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经典的，在时间上都是指过去发生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英文中对这两者不加区分也是有道理的。英文中的“classic”不仅有“古典”的含义，而且有“经典”的涵义。更重要地，这个词在英文解释中还有“有名的、著名的；传统的和典范的”等等涵义。经典的这一层涵义虽然在中文词典中尚没有来得及添加，但是，中文的日常语言中却已经非常普遍地流行起来了。比如人们常说的“经典歌曲”，“经典评语”，“经典手势”，“经典对白”，“经典语句”，“经典案例”，“经典笑话”，“经典短信”，“经典假唱”，等等。经典概念的这些用法，或许有的是在调侃的意义上，而有的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但是，它们取得都是“传统”和“典范”的含义。经典概念一旦突破了典籍和著作的范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对象的形容词，其表达的空间便被无限地扩大了。

我们这里使用的经典概念显然不是指具有权威性的典籍和著作，而是特指某些经典理论和对于这些经典理论的经典理解。在这样的经典的意义上，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理论形态。

将近100年来，尤其是近50多年来，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战以后，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由于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使得这些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

本丛书就是在大量的此类文献中选取的一小部分，它们虽然不能与经典理论相提并论，但是毕竟涉及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变化，代表了一些新的思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阅读经典之余，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许会增长一些知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阅读这些文献，则或许对于其研究工作会有所帮助。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自从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希望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能够有所贡献。

李惠斌

2006年9月26日

CONTENTS 目录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

——兼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代序论）

周 凡

按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的说法，最极端的政治变革就是革命。“一个集团在同一宪法体系的框架内、并按宪法规定的和被广泛接受的程序，从另一个集团手里取得权力时，不是革命。当宪法和政府都被重建时，革命就发生了，除宪政的革命以外，社会也经历自上而下的变革，革命本身的特性也变得更加彻底，通常会出现巨大的动荡和无序。”①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政治，这表现在它不仅把政治国家理解为暴力统治的机器，并且执意要以血腥的暴力彻底摧毁这种政治暴力的最后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激进革命的最终目标确定为一种无对抗的透明社会——这种激进政治的终极目的恰恰在于取消政治本身。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② 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作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来全面修改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的观念，之所以是全面修改，是因为它既要改其方式，又要改其目的；之所以说它是“修改”，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愿望与激进政治决绝，它要以重构的形式将“激进精神”保留下来，但是这种延续下来的激进种子已非原来的激进面目，它是被阉割的激进，被驯化的激进，也许是保守的激进，抑或像齐泽克所说的，是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展示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哲学改造来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概念的性质与特征。

①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4。

一、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

马克思向来以普罗米修斯自喻，他想盗来天火将资本世界烧个精光。我们通常说卢卡奇早年曾经过救世乌托邦主义阶段，其实，马克思的革命弥赛亚主义情结比卢卡奇更浓重。每次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都不由自由地想起小时背的一句诗："我渴望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天火当然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只能借助于"地下的烈火"。大抵是1843年，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地下的烈火"——无产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决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且有能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由一个普遍的阶级来实现人类彻底的、全面的解放，这无疑是颠倒乾坤、气吞山河、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恢宏之举。斯特龙伯格指出，青年马克思所以有这样涤荡寰宇、气天万里如虎的大气度，是由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除了他年轻气盛、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之外，还由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结构表现为他的造反观念、普罗米修斯不惧天神的精神、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商人市侩的敌意"。①

斯特龙伯格的解释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太偏重于从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来说明马克思的宏大革命政治的根源。马克思之所以对"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地下的烈火"受到压迫不是部分的压迫，而是全面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某种特殊的苦难，而是普遍的苦难；"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一般的不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不是对人性的某种疏离，而是人自身的"完全丧失"。既然无产阶级身上不止一条锁链，而是无数条锁链层层封锁而形成的"彻底的锁链"，那么，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就不能只打开一把锁链或一些锁链，而是必须将所有的锁链彻底砸碎。人的全面异化的观点导致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部分看作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总体，总体的异化只能通过对异化的总体扬弃才能达到，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它来自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异化学说。正因为无产阶级经受了普遍的苦难，所以它才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显然把资本主义加之于无产阶级身上的种种痛苦看作是黑格尔式的"理念"走向绝对"大

① 罗兰·斯特龙伯格：《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全”的异化环节。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内部的丰富的多样性不过是同一精神本原在异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这意味着具体的局部性要素并没有声称实在性的资格，只有当特殊性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它才成为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的理论的影响既深刻又长久，它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失去作用。

浸润于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和全面解放的总体性话语之中的是马克思的启蒙主义信念。在对理性、科学、社会进步、历史的线性演进、人性的统一性的信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孔德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他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可以把握的连续进步的上升过程——它由低级的、简单的阶段向高级的、复杂的阶段演化——他才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理性完全展开、欲望与道德秩序完全和谐的人间天堂，他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会有任何具有支配和宰制性质的政治权力。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再接受马克思所抱有的这种现代性观念，即便是像哈贝马斯这样极力捍卫现代性遗产的人，也不满于马克思基于劳动及劳动阶级概念之上的那种狭隘的现代性。就像阿伦特通过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来“肢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行为概念来拓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隐含的共同意义无非是认为劳动（或生产）概念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些对现代性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波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等）则径直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观念斥责为一种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资本逻辑所蕴含及其伴生的现代性，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仍然没有超出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马克思的政治观念内在地包含着现代性政治的固有局限性——一元的权力概念（自由主义认为权力发源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阶级结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这一观念的现实结果便是对趋向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的关注与倡导。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身体政治、族群认同政治、性政治、边缘政治、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①

---

① 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仅仅局限于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之中，而是使一度神秘而庄严的政治以日常化的面目混迹于人类普通生活的各个角落。权力不仅异质化了，而且也“去中心化”了。反叛在学校、家庭、文化机构、医院、消费和娱乐场所、疯人院以及监狱等多种层面展开，政治反抗的主体也不再锚定在某种特选的“普遍主体”身上，学生、妇女、少数族群成员、同性恋者、文职人员、病人、囚犯、教师、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工人、失业者等等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史蒂文·塞德曼对微观政治的性质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写道：“如果权力在社会领域中四处弥散，如果权力已经被编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那么，社会冲突和反抗就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处。政治反抗运动就不可能被归于诸如反政府主义、反资本主义或反父权制的旗帜之下。社会反抗也必然是复杂多样的；反抗的实践也一定是局部（地域性的）、分散的，并遵循其特定的社会领域（如监狱、学校、性）所特有的社会逻辑。”①

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以及对微观政治的诉求上，拉克劳和莫菲同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即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是一致的。拉克劳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就有意避免从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政治理解为去总体化的多元要素的连接与凝聚过程，这与赖希关于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心理领域的征服、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法西斯看作是对主体欲望的控制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克劳和莫菲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他们认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一样，普适性的宏大政治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后基础”。② 一方面，经典的左派政治分析形式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及性征上少数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

① 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2.

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①] 这些"新的积极现象"的不断涌现催迫着新左派理论家在一种新的理论构架内重建激进政治的话语空间。所以，我们看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这部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明显表现出"双层结构"：对传统激进政治的理论基础的解构和对后现代语境下新型激进政治的重新建构。

二、由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在一定意义上，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仅仅是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一种粗略的视觉化的表象性描述。导致此一政治空间外观"变形"的根本性东西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正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坚信当代政治对抗运动已不再围绕阶级来组织和展开，所以他们才致力于把政治斗争的关注点从"生产场所"转移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似乎可以说，所有类型的微观政治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一种强劲消解。

像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拉克劳与莫菲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界定为阶级政治。对于他们的这种界定，我们目前还难以提出过硬的反对意见。因为，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心力使马克思表现出一种温和的面貌，却总是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信奉阶级斗争的学说。《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马克思坚定的阶级斗争观念："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52年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谦逊地承认了他自己对于阶级斗争学说所添加的三项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而马克思最宏大的著作《资本论》的最后一章也以"阶级"为论题。当然，在这尚未写完的简短一章里，晚年马克思似乎变得没有年轻时那样坚决。他承认："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

---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47页。

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1] 然而，当马克思提出"是什么形成了阶级"这个问题并试图回答的时候，文稿却中断了。

马克思的这一中断引起了几十年的争论，并激发了无数的政治想像！从这一中断处，似乎可以演绎出种种不同的"下文"。比较正统的想法是，如果马克思继续写下去，他也不会提出一个与事实上他已使用了几十年的阶级概念相抵牾的阶级定义。但这不过是众多想法的一种而已！丹尼尔·贝尔对着"这一中断"发呆良久，从马克思所说的"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这句话中，他受益多多。他感觉出马克思晚年可能想修改他原先的一想过于激进的观点，因为，《资本论》第三卷在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已表现出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差异，基于此，贝尔提出了所谓马克思的"两大图式"说。贝尔本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的兴起与壮大之上的。当然，还会有更为偏激的推想：马克思意识到他对阶级概念的使用存在着太多太多的问题，必须要来一个根本性的重构！但马克思的性格和脾气又阻止他在基本观点上尖锐而明确地反对自己，于是马克思就故意来了一个欲言又止的"中断"：马克思刚刚开启他的思索，却又突然打住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把马克思本人理解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始作俑者。比如，陈乐民和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就认为：

> 其实马克思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激烈的行动，赞成暴力革命，这个方面得到恩格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具有非凡的分析能力，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增长，在他那里越来越明显。而正是由于这个能力，使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恩格斯有些分歧，这些分歧不是挑明了的。他越来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越来越深入地分析，而不是直接与之进行斗争。比如，1857 年至 1858 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恩格斯在准备以军事武装战胜普鲁士，他甚至开始以身作则，进行体育锻炼，重新开始练剑等等，而马克思却完全沉浸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分析中。由此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还是朋友。恩格斯还不断向马克思提供信息资料，可是他自己在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46 卷第 1001 页。

习骑马和击剑，准备与普鲁士军队骑马打仗。①

无论如何，《资本论》末尾的中断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中断、一个发人深思的中断！在马克思以后，大凡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或阶级问题的思想家无不面对这一中断而“浮想联翩”。马克斯·韦伯说，在这个中断处，马克思“显然想探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性问题，尽管无产阶级在质的方面是不同的”。② 韦伯正是从马克思这一“中断处”开始构想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他的《阶级、地位和政党》一文就是试图填补马克思的这一“中断”所造成的这个“空场”。在对阶级的理解上，韦伯明显受惠于马克思，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人们的市场处境（market situation）是社会分层的基本维度，人们在经济秩序中的位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的有无、多少）是客观的阶级归属的轴心。但是，韦伯不同意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唯一原则，他不仅在阶级、地位与政党概念之间做出了仔细的区分，而且彰显了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性（比如，一个破落的贵族，尽管他客观上丧失对财产权的控制，但他通常并不与穷人认同，而是同富人结伙）。强调“认同感”对于阶级规定的重要性，是韦伯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不过是韦伯的主观认同感的一个不适当的变体，因为，韦伯认为“阶级”与“政党”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秩序”而产生的分层结果，它们是互相关联的，有时是一致的，但并非必然一致。而卢卡奇却把韦伯的这一著名区分给取消掉了，他虽然强烈地意识到了阶级意识的不稳定性和“外源性”，但他却把这种外源性直接等同于政党的灌输和赋予。卢卡奇对韦伯的这一区分的背离，是导致卢卡奇赞同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源所在。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卡奇抓住了主观认同感，旋即又将它放逐了。在卢卡奇那里，相对于强大的物化意识，阶级意识显得既纯洁又高贵，可悲的是，它无比的脆弱、同时又出奇地稀少！

正如卢卡奇没有听从韦伯的忠告，超越作为职业的学术与作为工作的政治之间的界线而投身革命一样，卢卡奇也没有按照韦伯的范式认真对待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非对应性。韦伯像康德一样处处都力图划一条界线；而卢卡奇则像黑格尔那样，极力把种种界线模糊化或

① 陈乐民、史傅德：《市民社会·启蒙精神》，载《万象》2006年第8卷第3期第2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7页。

取消掉。两人思想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不同处理方式：韦伯通过区分财产阶级、获利阶级和社会阶级表现出一种关于阶级的多元主义宽松观念；卢卡奇则由于把阶级归属完全等同于阶级意识从而走上了一种严格的阶级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莫菲对卢卡奇的思想的评价一点都不高，他们更加偏爱将阶级认同复杂化的葛兰西。

20 世纪下半叶孕育而生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韦伯的问题。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表现得更加明显，影响阶级认同的因素远远超出了韦伯当年的"三元"（即经济、社会、法律）互动的狭隘想像。在客观层面上，由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过程缩短，大量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带来了更多的个体化工作机遇，从而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而风险社会的到来更是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和社会身份的变动性；在主观层面上，人们关注的政治问题转向了过去被认为不重要甚至被忽略的一些问题，比如生态环境、女性权利、同性恋、生活格调等各种不同的新型社会问题，这导致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碎化、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个体主义化，这一切都拉大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的逻辑连接变得更加困难。

像韦伯一样，拉克劳和莫菲在 1970 年代后期试图对阶级认同问题进行某种超出经济限制的理论"解严"。但他们比韦伯更加激进化。一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韦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还不够激进"，[①] 韦伯之所以还不够激进，是因为他"没有牺牲掉作为阶级这个概念之基础的经济学涵义"。[②] 拉克劳和莫菲在思考"什么形成了阶级"这一问题时候，并不像韦伯那样引入其他因素来限制经济因素的独占性，而是企图将经济悬置起来（即将之虚化）。如果说韦伯（以及后韦伯主义者）的理论努力旨在提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所缺少的东西，即对阶级概念的一个清晰明确的讨论"，[③] 那么拉克劳和莫菲则企图通过疏离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基础从而将客观的阶级归属化为乌有，如此一来，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这是拉克劳和莫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

①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3 页。
②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3 页。
③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1 页。

书所达成的主要结论。

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拉克劳和莫菲思想的康德主义影子。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关于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存在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形式的二元区分上。也许正是由于拉克劳和莫菲与韦伯共同的康德主义根源，使得他们都否认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意识层面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之处在于，拉克劳和莫菲在对阶级认同对于阶级归属的影响上更加强调康德的"形式"原则：在康德那里，"现象"不是由"物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在"物本身"的作用下，通过直观形式和思维的范畴形式建构而生成的；同样，在拉克劳和莫菲这里，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正是拉克劳和莫菲对"形式"原则的建构性的过度信誓才导致他们在1970年代末已超越了韦伯主义的视界，因为韦伯总是在一种修正过的阶级框架内思考问题，而拉克劳和莫菲的一只脚已经踏出了阶级分析的领地：他们宣布，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拉克劳和莫菲不再谈论"意识形态的接合"（ideological articulation），而是直接言及"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何以如此呢？其根本性的原由是：在前一部著作中，拉克劳和莫菲虽然断言了中立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以及这种非阶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把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主导力量，此时他们依旧坚守葛兰西的信条——只有"基本阶级"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就此而论，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扩大了，但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性，即是说，拉克劳和莫菲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相对自主的界域之内带着链子"跳舞"——这个链子就是与意识形态异质但却宰制着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话语。后一部著作的实质性跃进即在于，拉克劳和莫菲义无反顾地砸碎了这条"锁链"：他们坚决地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区别，这种取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福柯的话话理论的修改，在其关键意含上，它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就像艾伦·伍德所指证的那样，在此，"独立的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是话话）已经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已经不再仅仅是把意识形态从任何社会基础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现在，社会本身是由

意识形态或‘话语’所构成”。[①] 既然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既然一切都是意识形态，那么核心问题就不再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自身的主导权与非主导权的关系。这就好比，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再称之为“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要面对一个与之并不完全同质的世界（在认识论里物本身是理性无法最终把握的对象），这就有一个防止理性的僭越问题；而到了实践理性的范围，不再是怕理性过于“纯粹”，而是怕理性不“纯粹”，因此，也就不存在批判理性的“纯粹”问题，这样一来，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也就不很合适了。同样，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意识形态的“纯粹性”问题已经解决了，因而再谈意识形态的接合反而会造成某种误解，好像还有非意识形态的接合似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和莫菲还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将一只脚缓缓地挪出阶级分析之外；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他们异常坚决地把另一只脚也跨了出去。因此，在对阶级概念的消解上，从前者到后者是一种扩展关系，后者将前者的“理论与政治逻辑发挥到极致”[②]：前者只是留出一个非阶级意识形态的空隙，而后者则彻底解除了阶级的“武装”；前者仅仅是反对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告别阶级政治。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和莫菲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内在“颠覆”：他们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固有秩序倒置过来，不是阶级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而是意识形态形塑了“阶级”——当然，这种由意识形态所形构的政治群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它只是一种由主导话语所暂时缝合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认同体而已！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拉克劳和莫菲也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后一章的那一中断处开始的——马克思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阶级？拉克劳和莫菲的回答是：什么也形成不了阶级，因为通过认同而达成的政治统一性根本就不能冠以“阶级”之名：阶级在当代已不再是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范畴。由此，我们才可以真正体认到吉登斯所说的“韦伯还不够激进”并不是虚言一句。韦伯试图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拉克劳和莫菲则解构并抛弃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当然，后者比前者要“激进”得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格伦斯基把那些尝试着修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理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

论家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者”[①]，他的这种归类与当前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规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严格来说，这些人只能称作“准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半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它至少表明了后马克思主义是发轫于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质疑！这一点，我们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巴里·辛达思（Barry Hindess）、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那里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

如果说告别阶级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倾向和特征，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像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所说的仅仅“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②] 它的值域可能会超出目前中国学界对它的谨小慎微式的局限。我们注意到，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借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尔帕娜·米斯拉（Kalpana Misra），她在《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1998）一书中把从毛主义到后毛时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转变指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米斯拉的如此认定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观念是阶级及阶级斗争，因此，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疏离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东西。依米斯拉之见，毛泽东虽然在实践上做得过了头，但在主观上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邓小平时代尽管“实际业绩超出了期望值并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极大提高了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但是统治的合法性（政权的正统性）却下降了”，米斯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悖论式的政治发展”。[③]

米斯拉竟把中国当代政治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内，中国学者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胆量接受！或者在心里暗自琢磨一番，纵使觉着有几分道理，也决不愿意从口中说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据说，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学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讨生活、过日子，所以，即使有话，也不好说了。而米斯拉却全然没有中国学者所特有的顾忌。然而，出人意料地是，米斯拉并没有拿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诋毁我们中国，更没有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她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诺曼·莱文近乎一

①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②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 Kalpana Misra: *From Post - Maoism to Post - Marxism*, Routledge, 1998, p. 4.

致。诺曼·莱文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而重新定义自己。"①

我们看到，米斯拉在《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只是借用拉克劳和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实际存在的。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及"后邓"时代，中国人实际上经历了两种不同取向的政治体验，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一种是以"淡化"甚至"去阶级化"为倾向的政治。任何一位既亲历"文革"之劫而又躬逢"改革开放"之盛的中国人，对此恐怕不仅心有所"感"，而且身有所"受"！上海一位时下颇有名的美男作家最近写了一本名为《身体政治》的书，他所谓的"身体政治"不过是描述政治的变化在人们身体上（尤其是外表、着装上）产生的"效应"，虽然此书缺乏理论探讨的起码形式，更谈不上具有什么理论的深度，但是，这种"政治现象学"式的刻划却有助于让人省悟并反思中国当代政治业已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此明显的政治变化之所以在文学化的描写中才让人触目惊心，其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这种变化归属在同一种"政治理论"名下，从而平息了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对这种变化加以概念化的冲动和念头。早在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政治实践已昭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定性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理论错误。但是，时过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对"阶级政治"本身进行认真的考量，以致于在实践上我们已远离了阶级政治，但在理论上，我们却抱着阶级政治不释怀。阶级逻辑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被悬置起来，但它在名义上仍然被作为唯一合法的解释原则。实际起作用的东西没有被理论化，而不起作用的东西却不退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危险的现象：一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宣传，一边是大力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而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去建构一种真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理论的努力则付之阙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理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米斯拉借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肯定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如何能断定毛泽东的阶

①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致中国读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级斗争概念等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将拉克劳和莫菲基于西方世界的新社会运动而建构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意“中国化”又有多少合法性?）但是，米斯拉有一点是值得特别称道的，即她不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背离，更不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她甚至说：

> 苏绍智、王若水、胡绩伟、李宏林、李泽厚以及其他一些人所代表的思想主流在不同程度上依然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和目标的信奉，甚至那些肆意公然针贬时政的批评家也坦言他们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那些更自觉地谴责从前的主导思想框架的人并没有同样远离作为他们批判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对这些新的改变信仰的人们来说，西方所提供的现代性模式是“deceptively simple”（杜维明语）。多元主义的资本主义目的被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所代替，并且，他们对必然达到那种理想未来的信念是基于同样的历史决定论。从这方面看，出现在邓时代的思想话语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毛时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十分明显，它俨然是后毛主义的和后马克思主义的。①

显而易见，米斯拉在此引入了一种甚至比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后马克思主义，因为，拉克劳和莫菲毫无保留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米氏之所以如此“变通”，或许是为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或许是认为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值域过于狭窄，但无论如何，这种宽松化之所以能够进行，乃是源于她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一个鉴别性标识的认定，即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阶级”（non - class）的政治理论。

三、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阶级是马克思构想政治的轴心概念，因为马克思总是把政治理解为一种阶级统治。在《哲学的贫困》的末尾，马克思以近乎福音书般的语调宣

① Kalpana Misra: *From Post - Maoism to Post - Marxism*, Routledge, 1998, p. 4.

告："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①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异化、没有了剥削、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国家，当然也就没有了"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政治权力。阐述政治是为了消灭政治，就像研究疾病是为根除疾病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社会的病痛！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之内，抽掉了阶级也就等于毁弃了政治。而拉克劳和莫菲抛弃了"阶级"，却留下了"政治"，这正是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阶级与政治的分离，倒不如说他们要在阶级的消失之处重建政治的威严。著名左翼学者艾伦·伍德将自己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取名"退出阶级（The Retreat from Class）"可谓画龙点睛，十二分准确地点住了后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穴位"！艾伦·伍德原意概指拉克劳和莫菲等人退出了阶级分析范式，而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从"阶级"那里退出的"政治"。"政治"从阶级那里退下来之后，并没有死去，它以另种一方式继续"活着"。

其实，拉克劳和莫菲这里的"政治"不过是改了装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阿尔都塞断言，人是意识形态动物，只要人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因为人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双向互构关系：没有人，当然没有意识形态；但人作为主体，又是意识形态"召询"的结果。阿尔都塞的困局在于，他一边声称意识形态是永存的想像之镜，同时又毫不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的透明社会的命题。按照前者，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还应该存在，也必须存在，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还存在。可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阶级性，阿尔都塞从来没有怀疑这一点，而这恰恰与后者相矛盾：在无阶级的社会却存在着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疯了；普兰查斯也想不开这一点，所以他绝望地自杀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阶级结构本身并不在结构主义的结构之内，它成了结构主义之结构本身的框架。拉克劳和莫菲在 1970 年代中期就已洞察到此一问题，于是他们从阿尔都塞主义转向了葛兰西主义。他们之所以转向葛兰西，就是为了把这个不是作为结构的可分立元素而是作为结构之整体性的框架打破。这相当于德里达对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基础主义的解构。

作为阿尔都塞的门徒，拉克劳和莫菲还是保留了老师的很多东西：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 卷第 198 页。

们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永不消失的“形态”。变动之处在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属性，更不是永远具有阶级属性。这可谓是“意识形态常有，而阶级不常有”。我们不可以想像没有意识形态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想像没有阶级的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说：“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它实质上是拉克劳和莫菲政治哲学的一句宣言，因为它的潜台词是：政治既是“构造的（constitutive）”，又是“想像的（imaginary）”。由于是“构造的”，所以政治获得了自主性和建构性；由于是“想像的”，所以政治永远不会终结、不会彻底“缝合”（suture）。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人们或许认为它主要是一种“解构的政治学”，如果以此来概括那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波德里亚等）当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之归结拉克劳和莫菲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失之偏颇！因为，拉克劳和莫菲的理论着力点并不是解构，而是建构；他们只是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为重建新型的政治统一性服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强调过这一点：

>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Barrett）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

意义上完成它”。①

拉克劳和莫菲激进地弃绝了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护一种极端的反政治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他们走向了政治虚无主义的道路，更不意味着他们把政治空间构想为一种没有冲突与斗争的和谐世界。相反，他们阐明的“新政治观念”就是要为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形式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分析范式。② 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了阶级与阶级斗争，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日益繁密增生的各种社会冲突？换言之，社会冲突与政治斗争要在怎样一种概念框架和分析策略之下得到诠释？如果你认为阶级冲突的模式不能充分说明当代群体冲突的状况，那么你必须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模式来描述和阐发已经改变了条件和发生形式的群体冲突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满意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并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它的理论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任务”。拉克劳和莫菲当然也不能例外，即便他们声称要消解掉构成政治之基础的一切基础，从而使政治获得真正的优先地位和独立性，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一个支撑性的概念来为一种自主性的政治提供立论的依据。

拉克劳和莫菲用来说明他们的新政治观念的核心概念是“对抗”（antagonism）。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对立的政治”，而他们的非阶级政治则是一种“对抗的政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对抗这一概念，并提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③ 但是，马克思倾向于把一切对抗都简约为阶级对抗，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是在阶级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对抗概念的。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政治观念的批评之要点即在于反对马克思将多种多样的异质性的对抗关系统统还原为阶级对立，从而压制并排斥了一些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变得重要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一如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把社会生活中个别的层面当作理论上不可分别的层面

---

① 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76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04页。

来对待的倾向也表现在他把统治、剥削和阶级这些术语简缩为单一的用法，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多数形式各异的统治——帝国主义、对妇女的暴力、国家专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不宽容、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统治——或者落入晦暗，或者落入阶级分析的模型。马克思话语之中术语的这种简缩使我们或者无视以诸如战争掠夺、对于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家长制控制、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强制纳税之类的机制为基础的各种剥削形式看作阶级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关系的结果，或者也许视为这些关系的长久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官僚和家长制同样得以免遭批判。”①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是以对抗为起始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人道学派“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作出了批评，他自己对“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也表明阶级的“对立意识”是由最初的对抗形式发展而来的，“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②马克思把两个阶级之间的整体对立理解为对抗的典型形式，或者说“纯粹形式”。即是说，局部性对抗有待于发展为整体的对立，也只有达到对立状态，“自在阶级”才能变为“自为阶级”。由于“对立”是经过主体自觉意识“中介”过了的对抗，所以它是一种臻于“成熟”状态的对抗，或者说是一种“完成”了的对抗，既然这种对抗是定型的、到了极致程度的对抗，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便是这一对抗形式本身的“终结”，对抗的终结之结果便是一个无对抗的透明社会的诞生。拉克劳和莫菲认为，马克思这一“政治逻辑”的根本性不当即在于把对抗视为是一种封闭的、可以最终凝固的实体性，既然对抗可以“完成”，那么它当然也就可以“终结”。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的政治概念的重构恰恰就体现在这个要害之处——对抗的完成永远处于“延迟”状态，因此，对抗不可能被根除，以为对抗“终究可以被消除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③ 拉克劳和莫菲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就是围绕着这全新的对抗观念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将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称为

---

① 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Basic Books Inc. 1986, p. 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4 卷第 155 页。

③ 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 页。

“对抗的政治”是恰如其分的。

齐泽克在《超越话语分析》一文中曾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基本命题是“社会并不存在”——它使人想起拉康的命题“妇女并不存在”，而“社会并不存在”这一命题又体现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真正成就凝结在‘社会对抗’这一概念中：远远不是把所有的实现都还原为话语游戏，社会象征的领域被构想为围绕着某种创伤性的不可能性而构成，围绕着不能被符号化的某种断裂而构成，简言之，拉克劳和莫菲再造了一个拉康式的作为不可能的真实界的观念，他们使社会对抗这一概念成为分析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有用工具，这听起来很简单，然而这一新颖性的突破，在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大多数回应中，通常没有被领悟到”。①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莫菲自己也承认，社会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②

既然对抗构成了拉克劳和莫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中心内容”，拉克劳和莫菲必须为这一中心内容提供足够理论化的阐释。既然拉克劳和莫菲在根本上修正了对抗这一概念，那么仅仅拒绝把对立视为对抗的纯粹形式已经远远不够，他们的抱负似乎要大得多，他们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在对抗与对立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立与对抗的界线模糊化和取消之上的，而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却是奠基于对立与对抗之间的区分之上的。为了真正把握拉克劳和莫菲政治建构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更为详细地了解他们对对抗的概念规定。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一提到对抗，就会想到对立（opposition）、对立性（contrariety）、矛盾（contradiction）等概念，拉克劳和莫菲指出，对抗（antagonism）与这些概念不能相混同，对抗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清楚地揭示这种特殊关系，他们首先引入了卢西奥·科莱蒂关于“现实的对立（real opposition）”与“逻辑矛盾（logic contradiction）”之间的区别的分析。

---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New York, p. 249.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xiv*, Verso, 2001.

科莱蒂是从分析康德的矛盾观开始的。我们知道，康德只把矛盾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矛盾既不存于对象之中，也不存在于先验范畴之内，只有当我们的企图以知性范畴去把握物自体的时候，矛盾才会产生，也说是说，矛盾仅仅属于理念本身，是主观思维不正当活动的结果，它是理性的幻相。而现实世界大量的对立现象，康德并不把它们称为矛盾。科莱蒂认为，在康德那里，“现实的对立”的公式是A—B；而“逻辑矛盾”的公式是A—非A。在现实的对立这一类型中，对立关系中的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确实性，而不依赖于另外一项的关系，而在逻辑矛盾这一类型中，每一项与另外一项的关系都详细地说明了它们两者的真实性。

康德有一个明确的划界：对立出现于现实对象之间，而矛盾出现于命题层面，而且康德一直把矛盾当作是一种应该加以排除的消极性的东西。黑格尔则取消康德式的划界，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即现实对象之间的对立也被理解为矛盾。在黑格尔那里，对立与矛盾的区分被消解了。但是，黑格尔这样做有一个前提：主体就是客体，现实本身也是概念，一切都是绝对理念的展开或外化，因此，完全可以说，黑格尔的矛盾仍然处于“理念”内部，既然“思外无物”，一切都在思维之内，那么矛盾当然也就在“思想”之内。在科莱蒂看来，由于预设了现实的精神性，黑格尔把矛盾引入现实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马克思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承认现实的精神性——即不承认思维与存在统一于思维——却坚持现实世界存在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不承认现实世界与概念世界的一致性的前提下，将矛盾扩大到一切领域。

拉克劳和莫菲指出，科莱蒂的分析建立在一个二难选择基础上：不是对立，就是矛盾，不是矛盾，就是对立。而这种分析模式隐含着：如果存在对抗，它要么被归于对立，要么被归于矛盾。拉克劳和莫菲认为，对抗既不能归之为对立，也不能简单化约为矛盾，对抗表示的关系与对立、矛盾所表示的关系并不相同。对抗不是现实的对立，而矛盾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

既然对抗与对立、与矛盾都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它忽而被归于对立，又忽而被归于矛盾？这是否说明对立关系与矛盾关系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拉莫认为，对立关系和矛盾关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个在现实对象层面有效，一个在命题层面有效，但是，这两种关系还是“共享”一个东西：它们都表示一种客观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里，是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是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已经确定所是的东西，才使这一关系可以理

解。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涉及到的是完全的同一性。"[①] 拉克劳和莫菲的意思是说，在对立关系中，即 A—B 关系中，A 已完全是 A，A 本身获得了完全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个确定的身份的前提下，它才构成与 B 的关系；同样，在矛盾关系中，即在 A—非 A 关系中，A 也完全是 A，正是因为它完全是 A，它才构成与非 A 的矛盾关系。由此可见，拉克劳和莫菲所说的"客观关系"是稳定的、确定的，可定义的，换言之，处于关系中的对象是已经构成了的。

那么，对抗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说是说关系描述道："'他者'的存在使我无法完全成为我自己，我与'他者'的这种关系并不是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出来，而是从它们构成的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他者'的存在并不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它存在着，所以它不是一个矛盾。但是，它也不可归类为在因果链条中的一种实证性的差别性环节，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关系将由每一力量已经成为的东西所决定，因而也就不会有对这一存在的否定。"[②] 显而易见，这一描述的关键点是：处于对抗关系的两项都是非完成的，"我"不是完全的自我，"他者"亦非完全的他者，"我"与"他者"都不是因果链中的"实证性环节"，正因如此，总体也不是完全的总体，一切都是不完全固定的，一切都处于生成之中。这种关系当然与"现实的对立"不同，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两项在发生作用之前都已获得了完全的规定性，并且它们各自的规定是不相干的，比如，两辆交通工具的相撞，两个石头的相碰。这种关系也与矛盾关系不同，处于矛盾关系中的两项处于纯粹否定状态，一方的客观存在是另一方非存在的象征。

我们也许会说，拉克劳和莫菲的分析仍然以对立与矛盾的区分的前提，并且他们也与科莱蒂一样仅仅把矛盾理解为"逻辑矛盾"，而没有考虑到黑格尔的矛盾是"辩证矛盾"。这一质疑当然可以构成对拉克劳和莫菲的批判的一个角度，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对"矛盾"概念进行详细的考察，也没有就矛盾概念与对抗概念的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就把这一问题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区分开来，也无法把拉

---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4.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125.

克劳和莫菲的“对抗”概念与“辩证矛盾”等同视之。为了理解他们的对抗概念，必须就此作一些补充性说明。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解上，拉克劳和莫菲是不同于阿尔都塞的，阿尔都塞为了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差别，而刻意贬低黑格尔，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简单的还原过程：“大家可以看到，黑格尔模式的这个严格的逻辑推理势必把简单性、本质、同一、统一、否定、分裂、异化、对立面、抽象、否定之否定、扬弃、总体等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就和盘托出了。换句话说，这个辩证法完全取决于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即简单的原始统一体通过否定的作用在自身内部不断发展，而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它每次变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时，它所恢复的无非还是那个原始的统一性和简单性。”① 正是基于这种指控，阿尔都塞才提出“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企图以“结构因果性”置换黑格尔的“表现因果性”。

拉克劳和莫菲对黑格尔的认识没有阿尔都塞那么简单、武断，他们充分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性，并肯定了黑格尔的当代性恰恰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绝对不是肯定的和封闭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作为转变、关系和差异被构造的。“黑格尔的反思开始于不透明的社会对立难以捉摸的理性形式，而且只有参照使分裂返回统一的狡黠的理性才能看透可理解性，黑格尔因而处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② 拉克劳和莫菲并不否定黑格尔对差异性、流动性、可变性的强调，他们提出的非议是，黑格尔总是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把握这些偶然性，他虽然从不透明性开始，但最终狡黠的理性能看透一切，而拉克劳和莫菲坚持认为：并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狡黠的理性”，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使对抗服从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

拉克劳在 90 年代的一个文本（《同 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学构造中的作用》）中，更加清楚地描述了他们的霸权接合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绝对精神没有自身的客观内容，它仅仅是全部辩证转化的连续，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决定性重叠的不可能性的连续，但问题是，这些辩证转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黑格尔的全部规划的泛逻辑主义特点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69 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95.

畴的辩证运动排除了全部的偶然性，很难逃避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至高点。这向我们表明，霸权关系为什么不能吸收进辩证的转化：因为尽管在概念上掌握霸权联系的先决条件之一——普遍和特殊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由辩证逻辑来把握的，但另一个——两者之间联系的偶然特点——不可能被把握。"[①]在拉克劳看来，黑格尔辩证转化展示出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永久性差距"：每一个特殊的形式永远不会与它的普遍观念同一，特殊对普遍的连接"填充"为理解霸权接合提供了部分充分的本体论工具，但是，黑格尔对拉克劳的"启示"仅限于此，因为辩证转化进程中的一切断裂、差别、不连贯都被理性所吞没，甚至含糊性、不严密性也完全由逻辑的运动所构造，正因如此，拉克劳说，黑格尔的辩证转化是一种精确的修辞学，一种泛逻辑主义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控制着辩证转化的过程。

尽管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没有论述"辩证矛盾"与他们的对抗概念的关系，但是，从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抗不同于"辩证矛盾"，因为在辩证矛盾之中，关系项仍处于逻辑主义的严格规定之下，这一规定哪怕是虚假的，它也依然借逻辑的名义来表现自身。而拉克劳和莫菲所谓的"对抗"则根本脱离了逻辑总体的必然性控制，处于对抗关系的一种力量不能完全规定另一方，"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那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对抗关系就被多重意义所充溢——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②] 由此，拉克劳和莫菲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说：对抗构成了每一客观性（objectivity）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中，客观性只展现为部分性的、不稳定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

这正是对抗概念的特别之处：现实的对立和矛盾关系描述的都是客观关系，而对抗揭示的则是客观关系的限度，"对抗，远非是一种客观关系，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此一关系中每一客观性的限度都被显现出来。"[③]

---

①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③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抗并非完全不相容于客观性，而是说，在对抗中，客观性表现了一种不自足和短缺，它不能完全实现“客观化”。既然没有完全的客观化（对象化），因而也就没有“客观关系”，对抗是一种展现并且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展现，但这一展现永远不可能构造一个完全客观化的实证空间。

因为对抗是一种展现，所以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它处于语言之中；但是，由于这种展现本身是一种逃逸、一种缺失、一种残破、一种填写的失败，所以它又是对语言的颠覆，“对抗逃避了通过语言而被理解的可能性，因为语言只作为企图固定对抗所颠覆的东西的努力而存在”，[①]语言在描述意义，而对抗总是对这种描述的破坏，语言在捕捉某种东西，而对抗是对这种捕捉的滑出，语言企图表现一种连续性，而对抗却是对连续性的打断，在此意义上，对抗相当于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种对抗概念之要义在于：对抗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它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而是存在之本身，它不是“在者”，而是“在”，这种“在”栖居于语言之中，但这种栖居是一种奇异的栖居：它通过语言的无能来表达自己，通过语言的困境来展示自己，它存在于语言的断裂之中，因此，它是语言的征候学！

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现所有客观性限度的一种特定关系，这样一来，把社会关系当作是由必然性支配和决定的实证性空间的这一观点就完全瓦解了，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固定，所以社会根本就不会最终缝合，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来说就是：对抗是社会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

不过，对抗概念的理论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证明社会最后缝合的不可能，它有更多的政治蕴含：

其一，既然对抗具有本体论维度，而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那么对抗就是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没有对抗，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了对抗的透明的、和谐的社会。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社会，这种完全和谐的达成要以取消国家、取消政治为代价。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代价还远远不止这些。按照他们的“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完全“和谐”了，不仅没有了“政治”，也没有了“社会”本身。

---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25.

由此看来，在把政治社会化的取向上，拉克劳和莫菲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尽管马克思把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来分析，可他实际上认为政治问题不能通过政治本身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他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社会形态，他企图通过“社会革命”达到“政治革命”；而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借“社会”这个路径而达到政治的目的，他们直接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作是政治关系。其实“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泛政治主义”的表达，只不过这种“泛政治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基础逻辑”之上的绝对同一的政治，而是对分散、破碎的主体立场的一种艰难的“连接”、一种费力的“接合”：纵使偶然获得了一个连缀的组合图，在它的上面也依稀可以看到一条条裂缝。《重读拉克劳与莫菲》的作者兰德利和麦克里安打了一漂亮的比喻：“‘缝合’标志着先在同一性的缺席，正如当刀口愈合时却留下伤疤标明差异一样。”①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是阶级社会躯体上的“病痛”；而在拉克劳和莫菲这里，政治的“身体”上也布满了道道伤痕，两者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想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而拉克劳和莫菲则说，有些伤痛是“内在的原痛”——它注定寄生在我们人类的根脉之中！我们不要指望彻底根除它，这不是我们人类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说，它根本就不能被完全消除：当我们执意要完全删除它并且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消除了它的时候，它只不过转换了形态而已，它在以另一种方式顽强地生存着！更危险的还在于，当人们以彻底革命的名义铲除某些病痛的时候，却陷入了更大的不幸之中！正因如此，莫菲才说，“认定冲突有可能获得最终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波兰尼才说，“那些要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不公废除掉的人只会建立更大的不公”。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齐泽克说，拉克劳和莫菲的“激进民主”恰好不是“激进的”的——面对激进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必“激进”，就“激进民主”对“极端方案”的激进拒斥而言，它甚至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

其二，由于对抗不可根除，因此作为控制对抗、调整对抗的政治也就不仅仅是“上层建筑”，拉克劳和莫菲以一种最宽泛对抗的观念取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最大程度地赋予政治以真正的自主地位。由于对抗点的增殖，政治冲突可能在每一个层上激发出来，也可能由每一种主体立场来“执行”：政治的限制被打破了，它不是少数统治者的事务，它不是所谓政治精英的专利，每一种政治群体在政

---

①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no. 4 (Winter1991), p. 46.

治参与权和建构“主导权”方面都具有“等同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克劳和莫菲说，政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等同链条”；一是要有“一条不稳定的边界”。必须认识到，拉克劳和莫菲所谓的“激进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根本化”和“民主的彻底性”。“政治的根本化”在于它是人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拉克劳和莫菲以另一方式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古老命题。一如莫菲所言：“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①]“民主的彻底性”在于民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像”，社会主义如果想优越于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丰富自己的民主想像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扩大、深化到每一领域之中，即便真正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状态的民主，民主政治仍然不可能“终结”。就像“政治（the political）”永远是处于“形容词”状态一样，民主也不可能固定为一个有固定所指的“名词”：民主本身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它是一个空位，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莫菲对这种激进民主的描绘永远使人对民主怀着一份难以言表的激动：她说，应该把激进的民主想像设想为一种圆善：“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如此的民主将始终是‘将至’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②]

① 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英国的新修正主义

[英] 拉尔夫·密里班德 著　　李世书 译

自从7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自从1979年5月撒切尔政府上台以来，大量左派的著作已经发表，它们描述了整体遭受困扰的工党和劳工运动的问题。自保守党在1983年6月取得第二次选举胜利以来，寻求解释——并且寻找解决的办法——已经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当保守党非常引人瞩目地上台执政的时候，人们毫不奇怪地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保守的政府——无视群众的失业，无视公用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减少，并且明显无力阻止更不用说扭转英国的经济衰退了。显然，对于整个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并且很自然——然而是很值得的——这样的时代将产生认真的思考和反思：是什么错了以及能做些什么？然而，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在左派著作中占据特别支配地位的倾向并没有对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提供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他们借用约翰·韦斯特加阿德（John Westergaard）的用语建立了一种“新修正主义”理论；[①] 并且这种新修正主义标志着从一些基本的社会主义立场的一种非常显著的倒退。这非但不能提供一条走出危机的出路，反而成了这种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且对近年来已经严重影响左派力量的不安、混乱、迷失自信甚至失望都没有任何帮助。当然，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英国，并且显然在其他国家也已经出现了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的形式，最为显著的是在法国，他们不仅提出了一种“新修正主义”理论，而且是一种大规模地倒退到反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蒙昧主义、宗教信仰主义和世俗主义。这种极具危害的形式在英国没有发生过，因此人们一定会感到庆幸：至少，它没有发生在我在这里所关注的著作的作者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在《思想的领域》这本著作中，我打算去发现由属于不同世代、传统、党派和运动的人们提出并强调的各种不同的重要立场和观点，他们在许多重要议题上的观点不一定相互一致；当然，这种掩盖了人们关心程度

① John Westergaard, ‘Class of 84’, *New Socialist*, No. 15, January – February 1984.

的分歧只是在可以确认的思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如同我所理解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鲍勃·罗戊森（Bob Rowthorn）、比尔崔克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格瑞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尚塔尔·莫菲（Chantal Mouffe）、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等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者》和《新政治家》等刊物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观点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也发现了他们在研究的方法、倾向和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在所做的某些仍然重要的流行的批判上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第二次复兴

这种新修正主义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运动在英国第二次发生。第一次出现在50年代，并由于胡·盖特斯克尔（Hugh Gaitskell）的重建工党的右倾方向的努力而达到高潮，它从工党在1951年、1955年和1959年的选举失败中吸取力量，而这些失败并不是由于他们造成的。真正的原因是工党（和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决心摆脱他们的社会主义承诺，他们对右派政策的支持超过左派，从而使右派的政策占据主导地位。选举的失败反而增强了工党领导人的某种信心，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承诺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选举的术语障碍。

当代修正主义在它的起源、人员构成及其宗旨上具有与过去非常不同的内容。大多数人认为，工党的新的选举失败应该是痛苦地探讨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下降的原因的一次重要机会；而且这种探讨又部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方案和实践的非常大的怀疑。在这方面，英国的新修正主义和一些受到各种不同因素影响的国际现象连接起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问题，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和越南战争胜利后的痛苦后果，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凋萎，源于对传统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党团的局限性的不满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对在激烈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的能力的逐渐怀疑，以及随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等。对于英国则更为特别，这里同时有许多"撒切尔主义"留下的创伤，并且甚至更为不幸的是其赢得选举的能力。

构成新修正主义主要成分的这些人并不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其

中的有些人，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鲍勃·罗戊森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已有多年的党龄。其他的人，像斯图亚特·霍尔和拉斐尔·萨缪尔等人都是50年代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并且始终坚定地从事着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另外的一些人则属于工党的不同派别、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组织，或者三者都属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一个或多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中没有人正式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通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所表达的疑问、他们所提出的批评和他们所指出的方向推进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对社会主义立场的倒退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依次选取四个紧密相关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对工人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同时是我正在考察的思想领域的中心问题："阶级政治"的意义和重要性；国家问题；社会主义策略和工党；一些与国防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我打算进行一些评论，而在我开始评论新修正主义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反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78年9月发表了纪念马克思的演讲《劳工的进军停顿了吗?》，这一文章首先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并在这份杂志的以后几期上引发了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的很多批评性评论。其后，反对新修正主义的作品主要来自于像《劳工先驱》和《伦敦劳工简报》这样的劳工左派杂志，来自于像托尼·贝恩(Tony Benn)和埃里克·海弗(Eric Heffer)这样的劳工左派人物，以及来自于托洛茨基分子主办的杂志，例如《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行动》。但是主要的反对还是来自于共产党内，尤其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传统主义的杂志《晨星》，以及一些独立的党团成员。本文相当大地受益于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发表的有关新修正主义的文章；然而，我将在这里进一步推进对新修正主义的评论，这与迄今为止所有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已经成了被新修正主义最强烈地加以拒绝的整合，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不再支持坚持工会工人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中应具有"优先原则"的主张和创造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拒绝接受"优先原则"这一观点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反对理由：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拒绝担当被马克思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设定的革命的角色，而且他们也没有给出希望工人阶级担当的那个角色的任

何具体指示；相反，工会工人的目的（那些工人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少数）一直是并永远是极为有限的："经济主义的"、地方性的、社团的，而且由此而来的、声称代表它们的工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行业工会和党团——不能真正去完全满足社会上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人群的需要和渴望，而且工人阶级因此也不是那种"普遍的阶级"，不是自己的解放必定意味着所有这类人群的解放的那种人；作为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技发展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相结合的结果，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迅速消失；基于民族、种族、性别、性偏好、经济关系与和平斗争，"新社会运动"至少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激烈的挑战，事实上是一种更巨大和更激烈的挑战——对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工会工人相比较而言。不是所有属于思想领域的这些人，包括新修正主义，一定会赞成所有的这些主张，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这些主张的某些部分。根据新修正主义的观点，的确到了适合提出告别工人阶级的"优先原则"的时候了，因为这一概念是陈旧的、令人费解的和危险的，应该用一个基于利益、（利害）关系和"话语"的多样性，源自于一种社会阶层、集团和运动的多重性，以及没有等级的专横和自负并在不断改变着同盟的模式的斗争性等类型的概念来置换它。

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有关这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以及有关传统的和自满的社会主义概念作非常必要的修正和批判，并且否认任何一个关心社会主义进步的人都必须极为认真地对待新修正主义提出的许多问题，那将是很愚蠢的。但是，这既不能掩盖新修正主义所表达的所有根本错误的东西，也并不意味着工会工人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中担当了什么角色。

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部门工人数量的下降和白领阶层、配送、服务以及技术部门工人数量在相当程度上的进一步增长，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一个加速重新组合的过程。这一现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通过作为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工人真正戏剧性的消失，这一重新组合过程一直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进行着，最为显著的是在20世纪。但是，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与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处于生产过程从属地位的工薪阶层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由于他们的从属地位，他们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并由于他们的巨大人口数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

这一工人阶级与一百年前或者50年前甚至25年前的工人阶级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有限的或者不存在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完全依赖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换取生活费用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等这些情况来看，他们作为“工人阶级”仍然与他们的前辈一样。由失业工人组成的那部分人以及另外一些不在生产过程中的完全或者主要依靠社会福利救济金而生活的人，也属于这种工人阶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从那种场景中消失还要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宣称告别工人阶级是非常草率的（行为）。

也没有任何一种合适的理由让人们相信，这种重新组合的工人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一直追求的所谓的承诺和“阶级意识”。当代工人阶级已经最终与资本主义一体化，或者说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不可挽回地顺从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不可改变地分裂为对立的和冲突的原子，这些永远循环的概念在今天如同在昨天一样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新社会运动

这也与下面的理解相关，即工人阶级包括很大数量的同时也是“新社会运动”成员的人，或者是这一运动设法影响到的一部分选民；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资格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这将不会陷入“阶级还原论”，而修正主义很可能把它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似乎是一个有关为什么应该称作“阶级关系论”的具体例子，或者是坚持关于阶级是“社会存在”中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的主张。

这一观点必须进一步展开。对于女工、黑人工人或者同性恋工人来说，可能他（她）们的内心会感觉到他们就是妇女或者黑人或者同性恋者，他们给了他们自己以规定，并且那就是他（她）们所体验过的被剥削、被歧视和被压迫。即使他们的这种感觉是真的，即使这是一个最为重大的事情，但是这一事实也不能拿来意指它就因此是现实的一个准确表现。以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作为剥削、歧视和压迫对象的这种现实，也是由于他们是工人并被固定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位置的事实而形成的。上流社会的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或许也经历着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白人女工正经受着过分的剥削和双重的压迫；然而黑人女工经受的剥削和压迫是她们的三倍——作为黑人、作为妇女和作为工人，而且这些多重压迫显然是复合的。使社会形成性别和阶级对抗，制定有关同性恋者或者种族或者无论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的同一的规定标准，并且

不考虑甚至轻视阶级存在的实际状况，（以上这些）都会使目前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分裂进一步加深。

地方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严重地存在着。然而，这不会妨碍人们重新记起它们在斗争中已经许多次或者至少部分地被克服；不同职业场所的工人，男人和妇女，黑人和白人，他们有时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那数百万的工人，通过他们共同支持的政党，他们强调的不是部分的和不一致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团结与共同的宗旨，他们的所有分裂和分歧也都被联结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结）是脆弱的；并没有一种内在的冲突一定会把工人与工人永远地分开。

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消除工人们所经历的日常歧视和压迫。但是，这一点仍然是重要的，就是说社会主义者不要自己把它建造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能够期望的最好情况是在两个天然地对抗着的合作者之间锻造（一个）暂时的和相互怀疑的联盟。强调共同的需要，调和分歧，这不仅是很值得做的，而且也是非常合理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些是前面的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采访韦格安·皮埃尔（Wigan Pier)》中，比尔崔克斯·坎贝尔告诉我们，她开始了她“作为那种认为‘那不是男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的女权主义者”的旅行，她的旅行使她确信，“男人和男性，在他们的每一天中，通过他们个体的表现，组成一个系统地反抗他们自己共同体和阶级内的女性的集团。不但个体的男人而且政治运动中的男人在工人阶级内所做的事情都是应受到责备的”。[①] 无疑“体制”不能解释，更不用说辩解等其他事情了。但是至少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也不会得出那种反对“男人”的集体性别犯罪的笼统的和绝对的结论。

比尔崔克斯·坎贝尔写道，“存在于工作、游戏和政治中的男性崇拜”，“仅仅在男人的那种具有隐秘规则的排外结构中兴盛起来，这使妇女成为他们共同体内的外来物”。[②] 然而，当她出版这部著作的时候，那些被假定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的外来物正在组织他们宏大的支持团体，并与在生产一线的矿工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并且，这里似乎没有来自矿工针对妇女们正在从事的事情的“反抗的体制障碍”，而是正好相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甘愿冒着招致更多嘲笑、过多辱骂和蔑视的工会运动，不会完全地不注意这种通过逐渐缩小而发生的形式变化。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歧视和地方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确实广泛存在，但是它们被普遍（不总是）

---

① B. Campbell, *Wigan Pier Revisited*, London 1984, p. 5.

② Ibid., p. 98.

公认为发生了形式的畸变，并看作是违反了他们所声称的运动的价值和主旨。当然，正确的应该是，确认和声明都还不够，有意义的是真实的实践。在这一点上，（这一运动）还将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相信一种运动会传统地被白人男性工人阶级所支配，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在一个拥有很长的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里，遵从产生于那种环境和历史的强制力与形式的畸变，力争从已经被消除的困扰他们的所有缺陷中跃进到理论的和实践的王国，这将是对“劳动形而上学”的真正放纵。这种观点不是回避这些缺陷，而是通过确信它们是可以补救的，通过确信对于实现更接近于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而与它们作斗争。

斗争的历史

然而，这些或许正是争论的问题所在，对于认为工人阶级一贯地拒绝担当由马克思所设定的革命角色的言论，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毕竟，清楚明白的历史证据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然而根据最近的调查，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对于那种简单粗暴的主张，工人们从来都没有遵从过，并且从来都没有打算遵从。革命角色论忽视了下面的事实，即在20世纪的整个欧洲，数量庞大的工人已经多次展示了一种具有清楚的革命目的或者至少具有较强的革命内涵的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在1917年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几年的东欧、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也有不同的情况，英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工人阶级就缺乏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同样，那种粗暴的主张也忽视了下面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纳粹分子对整个欧洲的占领——最为显著地是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主要地是一场工人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是由民族解放的愿望所推动的，而且也是由一种彻底的、革命的社会复兴愿望所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百万工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支持着向他们保证实现这一社会复兴的政党，这也应是整个历史叙述相应的一部分。并且，在战后年代里，也曾经有这样一些时刻——在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希腊和英国——那个时候大批的工人表现出了和较早时期工人们所表现出的相同的那种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革命“模式”是正确的：这仅仅是把一种必需的矫正器介绍给一种系统地强调工人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强度和范围的历史叙述。

不管怎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理由使他们声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比通常所公认的担当着更为重要的“革命”角色。这是极端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是由成就了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性进步的改良运动的劳工担当的，然而人们却从来没有给予它应有的重视。“生产关系”，并且就生活关系方面而论，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要比一百年前、甚至比50年前的人们遭受到的压迫少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阶级斗争和来自下面的对雇主与政府的压力，以及工人阶级经过它的代理机构而施加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包括“冬宫风暴”，这当然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但是它的作用和结果要比诸如标榜为“经济主义的”和“社团的”之类的口号所传达的东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已经取得的进步并没有结束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对于妇女和占少数的种族或者民族来说。这一点是需要指出来的，但是它不应掩盖这些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不应掩盖他们为提升期望和促进更进一步的需要与进步而努力的程度。抛弃作为一种“普遍的”阶级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事实上仍然是，工会工人在他们提出的多种需要和他们所进行的多种斗争中，并不简单地是在为自己的直接的、“经济主义的”和“社团的”目标而战斗，而是在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许多远不及工人阶级的人而战斗；他们的斗争包括了许多“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并且能够更全面和更有效地实现那些目标。

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工人阶级的情绪化的理想或者对于归属于一种由聪明的经理人虚构出来并被工人阶级自己所拒绝接受的专横的特权的角色，我们并不能做些什么。尤其是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就业者和失业者，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最为深切地（即使是不平衡的）经受着资本主义的对立、强制和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夸大“社会存在”必定在工人阶级中产生阶级和社会主义觉悟的程度。然而，许多新修正主义著作却转向右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谴责经济的或者机械的决定论的坏毛病的同时，它却屈从于另一种不确定的坏毛病。这就导致了一种主观主义，在这里，阶级、组织以及社会本身的观念不再被认为是适当的分析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意识形态变成了超级市场，在那里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或者论述都可以自由地得到，工人阶级（假定有这样一个东西）选择其中的一个（或者一些）。实际上，在这种观点看来，“社会存在”事实上是被它自己宣布开除出现实存在的。与上面的这些相反，必须强调的决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机械论的”、“经济主义

的”和“阶级还原论的”——或者任何其他由于“犯罪”而被新修正主义“谴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相信，由于资本主义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多重异化必定产生压力、挑战、斗争、冲突，即必定会产生彻底的变革与复兴的思想，甚至很可能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

毕竟，这是发生在自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内的事情，向前追溯时间也并不算很长。不是革命，不是一种流行的“主权在民”（*levee en masse*），而是一种稠密的网状社会机构的创造物——政党、工会、合作社、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出版社、协会以及各种类型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劳工的世界，并且他们的目的是压力、挑战、斗争和复兴。这一劳工世界的建立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它的成功的历史充满着更多的失败、挫折和背叛；它的缺点，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一年又一年和十年又十年；并且只要资本主义自己存在下去，它也将一直进行下去。的确，在以后它还需要进行一个很长的时间。它可能被分散、分割，甚至暂时地被阻止和被摧毁。虽然如此，它会再一次开始，并且努力向前，原因很简单，压力与挑战在暹罗语中是剥削与压迫的孪生儿。

所有这些论述说明，斗争中的工会工人的“优先原则”产生于下面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其他的集团、运动或者力量会有哪怕是很小的能力，能够如同工会工人一样向现存的权力与特权的组织发起有效的和强大的挑战。这决不是说，妇女、黑人、和平行动主义分子、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人的运动不重要，或者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或者他们应该屈从于分裂的身份。一点也不是。这仅仅是说，主要的（不是仅有的）资本主义“掘墓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必然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变化的力量”。并且，正如人们不停地被告知的那样，如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拒绝去做那项工作，那么那项工作就不会有人去做；资本主义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一代又一代，作为一个受冲突支配的、不断增长的专制的和残酷的社会制度，由于不能人道的和理性的运用资本主义自己建立的巨大资源而受到阻碍——当然，除非这个世界被带入核战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在劳工世界什么也未发生，这证明了这一关于未来的见解是恰当的。

国　家

在新修正主义的著作中被提及的最突出的一个主题是国家，在 1984 年

11 月，斯图亚特·霍尔断言这一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复兴工程的中心战略”，他发现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者中相当混乱”。[①] 这一混乱看来似乎存在于以下的事实中，即社会主义者在一种层面上声称厌恶国家，在另一种层面上对它又寄予极大的信赖。然而，这对我来说似乎并不是混乱的问题，而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必然的张力，与这一事实相关，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从属于社会，还要求国家在资本主义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斗争，并且将同时要求国家（即使它处于不同的状态）捍卫和维持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斯图亚特·霍尔发现，为了社会改良的目的而利用国家，已经意味着它的性质的一种变化：“我们仍在谈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我们已不再认为好像它有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阶级特征。左派，尽管它有许多浮夸的语言，它的理解也部分地描述了国家的涵义：按需求分配救济金的福利国家；服务社会的需要；重新分配资源给欠富裕地区；提供娱乐——并且全都根据一个普遍的基础，而不是根据‘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术语。”[②] 这是对国家采取的福利措施的意义的极大误解。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遭受到的剥削和统治的方式，但是这将不会毁坏或者威胁到以剥削和统治为精髓的那种制度。国家在这个领域所做的是施加一种激励与强制，它被单独授权行动，并且它进行行动是依据已经确信它的这种施加激励与强制的行为是加强而不是破坏了国家设法保护的制度。实现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会丝毫改变它的阶级本质。

并不值得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设法延伸了国家的这种福利功能：这种延伸对它自己是有益处的，在马克思的精确表述中，这是一种“劳动政治经济学”反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胜利，是一种提高和加强反对资本与国家的需要与期望的方法，是一种增强和扩大市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的手段：总之，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在的部分。

新修正主义公开指责“国家主义”和“国家集权的社会主义”；在它反对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高层的权力和底层的被动性等的责难中有很多客观和理性的东西。但是，对于拒绝看到国家对于他们所设法实现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不幸地）决定性的重要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仍然是危险的。斯图亚特·霍尔显然是正确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国家的理念控制

---

① S. Hall, ‘The State——Socialism's Old Caretaker’, *Marnism Today*, November 1984, p. 24.

② Ibid., p. 26.

一切，它同化了所有社会生命、所有民众能量、所有民主主动性，以及那种以统治社会代替统治人民”的观点。[1] 在承认那种角色必须由国家代理时，并且在谈到一种基于“矛盾的现实”以及包含在“在国家内反对国家”的口号中的“困境”时，他同样是正确的。这种观点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进步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所希望能够有效地征服和摧毁资本主义的力量是通过国家行为的方式（尽管决不仅仅通过国家行为）实现的，这种国家是作为一种在组织和人员上发生巨大改变的国家。

新修正主义一贯地低估甚至忽视下述事实，即那种包含在社会主义观念中的变革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它之所以艰难）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它，而且也是因为统治阶级反对它，并且即使工人阶级热诚地对待它，它也是艰难的。“统治阶级”不是一个语言形象，它指代一个非常真实和强有力的力量集合，一个紧密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一个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力量联合，它拥有巨大的资源，并坚定而全面地使用它们，联合它的国外同盟者，阻止对它的现有权力的一切挑战。我认为新修正主义似乎并没有足够认真地看待这种力量：许多相关的著作特别缺少关于它的本质与意义的实际认识和分析，以及它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意义。

双重力量

统治阶级和它的同盟的力量能够被战胜：但是战胜它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这里说的不是国家主义的、精英主义的、非民主的、大男子主义的（“国家是男性的”）国家，或者认识不到这种标榜所包藏的危险。然而消除这些危险的方式不是去贬低和否定国家的作用，而是设法自下而上地把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结合起来，以一种“双重权力”体制开始担当一系列民众力量的角色——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妇女团体、黑人利益集团以及各类行动分子，在生产过程中和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一种民主行使权力，以最大限度的自我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但是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必须起到重要作用。斯图亚特·霍尔得出下述结论：“我们会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社会的重建，因为国家是不合时宜的管理者。”[2] 她的这一结论是极为肤浅的。因为今天的国家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管理者”：从上文

---

① Ibid. , p. 27.

② Ibid. , p. 29.

可以看出，国家已极为严重地被卷入阶级斗争。对于我们必须面对的任何将来，它也不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管理者。它将肯定不会只是如此，不仅要遏制和征服反动分子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抵制，而且要履行多种不同的职责，包括调停归于“人民权力”题目下的不同的并且可能是冲突的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根据对这一事情的冷静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人民权力进行自我调整将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这是一个（发生了根本转变的）国家，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具有代表性的和负责任的国家，这将是制度调整所必须达到的目标。为政治的、公民的和社会的权利提供基本的保护的任务将落在国家和它的各个地方与区域机构身上；并且国家将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权力歧视与滥用的基本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以后，人们也仍将认识到国家的这种重要作用。

工党与社会主义进步

我现在很直接地转向政治问题的讨论。英国新修正主义的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有关在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人中工党的支持率下降而“撒切尔主义”却吸引了公众支持的问题。像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这一问题是指在1978年9月那个“不愉快的冬天”以及1979年保守党的选举胜利之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正在探询的“劳工的前进”是否已经停了下来并进行了肯定的回答的问题。同样，这一问题也是1979年1月斯图亚特·霍尔所警告的“独裁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出现的问题，他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形式——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它适当地保留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形式上的代议制机构，并且同时能够构成围绕它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广泛的一致”①。

其后，这些预先的警告与担心，鉴于保守党在1979年与1983年两次赢得选举胜利，以及工党（和工会）持续无力地提出一种有效的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明与再一次应验。自1951年起，参加选举投票的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已经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是无可怀疑的。但是那种下降的重要性，它的原因、后果与补救等，都是需要由新修正主义来处理的重要事情，现在看来这还是很成问题的。

---

① S. Hall,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79, p. 15.

“撒切尔主义”

首先，不管怎样，存在着“撒切尔主义”及其对民众的吸引力。从以上情况来看，“撒切尔主义”是一种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守主义左右摇摆的政策更加有力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一种更强的反工会的偏见和一种更大的重申管理权威的决心以及削减工资、减少生活福利费的缓冲作用，对卫生、教育、运输以及其他集体的和福利的公共事业“重新商品化”，增强国家的权威与权力（尽管所有“自由主义者”抗议），并且通过一种对民族主义狂热的吸引力（尽管英国没有停止对美国的屈服）使它的政策和政纲合法化，同时也不会忘记反对共产主义。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计划，而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十分有雄心的、果断的、然而心胸狭窄的政治家，如果允许的话，由她本人来推动这项计划将会有一段比她已经走过的路更加遥远的路。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是首位向人们传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的英国首相，即她能够在相对令人忧虑的环境里非常舒适地担当起皮诺切特（Pinochit）的角色，或者至少是在臭名昭著的“紧急状态令”的日子里担当起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i）的角色，当然这都是在民主、自由和法律的秩序下，在与颠覆作斗争和保护宪法的名义下。

这使得准确地评价“撒切尔主义”的民众吸引力变得更为重要。在这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这种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既是广泛的又是深刻的，同时她也是这种观点的许多支持者中观点最为明确和最有说服力的一位。因为，“撒切尔夫人能清楚地控制把这种［一种自由市场社会］远见转化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所产生的后果，她在这方面要超过她的导师［凯斯·约瑟夫先生（Sir Keith Joseph）］。她具有一种平民主义感……它深深刺中劳工运动真正要害的是在那里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理解……矛盾的是，她经常会因为设想将来会是卑鄙的、腐败的和丑陋的而感到提心吊胆，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① 并且近来：“新右派兼有新老右派的成分。它吸收系统的和爱国的保守党主义的旧有词汇，但是它把这种旧词汇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恶性的分支以及市场经济的一种极富侵略性的宗教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新奇的结合建立了一种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发动进攻

① S. Hall, ‘Faith, Hope or Clarity’, *Marnism Today*, January 1985, p. 16.

的民众桥头堡。"①

最近几年中许多左派的著作都是以同样的措辞形式来写的，并且很强烈地向人们暗示了"撒切尔主义"已经赢得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全心全意的拥护——换句话说，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向撒切尔保守主义巨大的与灾难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转向。关于这一点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转好的迹象。下面这种描述是恰当的——尽管听起来不舒服：我们注意到保守党在投票选举中总是依靠数量极为庞大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并且常常都是顺利地赢得胜利。由于这种缘故，保守党在鲍德温（Baldwing）的领导下在 1931 年和 1935 年的两次选举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那时候他们赢得了 50% 以上的选票，超过了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 1979 年和 1983 年的选举。事实上，保守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选举中以及在 1970 年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下的竞选中都取得了较好的选举成绩。在 1979 年和 1983 年，保守党获得的选票刚刚超过 40%；而他们在那时只能设法吸引到几乎不能超过整个选民人数的 30%。同样，在 1983 年选择保守党的选票的百分比要比在 1979 年要少些。

这些统计数字不是关于显示任何伟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撒切尔主义"转向的数字计算。也没有民意调查显示任何这样的转向。这也不是自满的理由：它只是简单地表明左派所面临的不是一股保守主义与反动力量的巨浪，而是一种非常显著的工人同工党的异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这种观点很清楚地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 1983 年大选中脱离工党的大多数人是投向了社会民主党或者自由联盟，而不是投向保守党：这些离开工党而选择自由联盟的选票明显地表达了对于公开宣称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政党的一种偏爱。

民众的反应

一些更深入的观察是为了了解近年来民众的态度。首先是 850 万张选票，它们中大多数来自于工人阶级，在 1983 年是投给工党的：根据那个时候工党的情况和它的那种摇摆不定的选举方案，那是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事实，与那些曾经产生的失败相比更加如此，并且这是对一种恢复了活力的民众支持的非凡力量的证明。

① S. Hall, 'Whistling in the Void', *New Socialist*, May - June 1983, pp. 11, 12.

其次，工会的会员人数有所增长，对于这一点，《阶级政治》的作者的观点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指出："从1969年到1979年，工会会员数从1050万增长到将近1350万，在经过前20年的停滞之后……无论任何民意调查的结果，都展示出作为由会员人数来衡量的工会的声望在70年代通过人口的跨区流动而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上升。"[①] 他们同时指出，其后由于失业工人的大量增加，那种上升的趋势已经有些下降。工会会员人数并不预示着对左派的一种政治承诺，更不用说为"撒切尔主义"给出一种承诺了。归根结底，这种教条式观点的其中一项主题是敌视工会主义。

第三，在评价"撒切尔主义"的吸引力时，必须坚持这样的事实，即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这是一种凄凉的、可怕的失败。在一个公认的由阿谀奉承之人组成的圈子之外，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那个撒切尔夫人，以及她所有虚张声势的恫吓和傲慢，她为救治英国的经济病症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她的政府会认真地打算去医治它们。唯一能让保守党政权维持下去的东西是北海的石油：没有这个，它可能已经处在令人绝望的困境中了。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处在一种凌乱不堪的状态，并且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属于工人阶级——比新修正主义表面上思考的要多得多。他们认为"撒切尔主义"执政的六年时间内所做的一切使这种凌乱状况变得更糟糕。

那么，工党的支持率下降意味着什么？人们或许期望着，民众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关心将会导致对于那种下降原因进行彻底的探察：事实上，新修正主义已经做的一切表达了对它（工党的支持率下降）的原因的看法——和它的救治方法——不是真正具有启发性作用的。

工党支持率的下降是在一个几乎专门由属于党的右派与中间派的人组成的工党领导阶层领导下发生的，并且很自然地，他们在国内外推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相一致的政策。不知为什么，这似乎没有完全超出常情地使人联想到这些政策可能会与不断增加的民众同工党关系的疏远有些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表明，工人阶级大声地要求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并厌恶工党，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没有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导者所推行的那些政策看来似乎是提供给工人选举工党越来越少的理由。令人惊奇的是，让我们再强调一次，如此多的工人仍然信任工党。不过，支持率下降和选举失败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诸如威尔逊（Wilson）和卡拉汗（Callaghan）等人，尽管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责任肯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整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社会

---

① *Class Politics*, op. cit., p. 25.

民主制及其实现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愿望，这种愿望是未曾经过实践尝试的，并将会导致它的一些基本性质的根本转变。

认为这一系列糟糕的记录在新修正主义的著作中没有受到谴责，而且是严厉地谴责，这将是错误的。相反，这些年来在这些著作中对于工党的种种的失败和失职进行了大量的谴责与批判；尽管他们决不能具体地证明（那些）对于工党支持下降所负的责任的正当性，那些（责任）必定被归咎于作为理论和实践的社会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这种新修正主义倾向来说，更有意义和更具启发性的是它所采取的关于“传统”左派在工党党内和党外的斗争的立场。

这种斗争当然是与工党自身一样古老：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里让他们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恰恰是威尔逊和卡拉汗年代的凄凉经历，工党中左派的果敢推动它趋向更加激进的立场，而无能的工党领导人却镇压和压制他们的批评。毫无疑问，25年以前，坚持这些斗争的新修正主义者之中的那些人，那时已经是参与政治的年龄了，他们明确地站在工党左派一边，并且仅仅由于他们（真正合法地）相信那个时期工党左派的政策远非足够的左倾才与之脱离。我们不能根据现在工党内的斗争情况去评论他们那个时候的立场。现在人们发现的是一种明显地既独立于工党内的左派又独立于在它之外的左派的超然状态，甚至是极大的厌烦和敌意。较为流行的看法是，那种“传统的”左派尤其是左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保守的，是“原教旨主义者”，不愿意面对艰难的现实，同时也是独裁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当然还包括性别歧视主义者；并且许多新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都暗示或者意味着这些扭曲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补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一直从事修正主义思想领域具有个性化特点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他可能被许多人尊为“传统”左派的杰出代表。或许可以说，他丝毫没有隐藏他对于托尼·贝恩之类的人（Bennites）及其他人的恼火，这些人在1979年以后为争取实行工党内的左派政策而进行竞选。所以，为争取许多在1983年大选以前站在左派立场的人，他在1983年论证道，“一个撒切尔政府比一个改良主义工党政府更可取”，并且他因此觉得“选举变得失去了方向，长期以来，工党领导人和激进主义分子在党外公众面前就一些难以辩清观点的问题相互攻击对方的要害部分，就这一点来说，潜在的工党选票变得令人感到困惑和沮丧就不难理解了。”①

在后来出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埃里克·海弗（Eric heffer）有

① E. Hobsbawm, ‘*Falklads Falloa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p. 19.

力地批驳了由许多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人士提出的宁愿要一个撒切尔政府而不愿要一个改良主义工党政府的观点；并且我认为他否定这一观点的立场是正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霍布斯鲍姆急切否定工党内的分歧，这不仅是有害的，而且看来是几乎无意义的。与这相一致，在 1983 年 3 月他写道，决不允许有“无论来自任何一边的、在工党内重新开始的自杀式的内部斗争”。①

左派与“联合”

“自杀式的内部斗争”勿庸置疑是应该避免的，而这种吁请实际上等同于坚决要求一种必需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的观点却忽视了“联合”总是在领导阶层关系上的联合这一事实，并且没有艰难的压力与斗争，即使在野的时候也不能期望工党的领导者能够很快地改变政策的方向，更不用说当政的时候了。霍布斯鲍姆说道：“未来一定属于政策转向左倾的工党。”实际上，他正在专心致志于一项庞大的计划，那就是：“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社会主义的未来是通过工党来实现的。”②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要说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需要比他看起来愿意接受的更多的来自左派的压力。这里有一种没有解决的对立：这种论据的主要内容明显地与他称作为“目光短浅的和宗派的激进主义”是不一致的。

不幸的是，所有被推崇的选择都被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永久地加以拒绝。霍布斯鲍姆说道：“当然，工党必须重新获得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它也必须“再一次变成所有人的党，所有的人包括要求民主和要求一个比较好和比较公平的社会的人，包括不考虑阶级分类而把他们归于民意测验员和市场调查员的人：总之，用过去的工党的话说就是，‘所有有手和有脑的工人’——不仅仅包括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③ 但是工党从来没有得到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不曾是“所有有手和有脑的工人”组成的党。假如它是那样的话，它在大选时的历史记录就会大不相同了。然而，霍布斯鲍姆要求工党更进一步地超出这种“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而且要吸引（估计可能）一

① E. Hobsbawm, ‘Labour Rumpor Rebirth?’, *Marxism Today*, March 1984, p. 12.

② Ibid., p. 8.

③ ‘Labour’s Lost Millions’, p. 9.

大部分可靠的中产阶级。

这种吸引中产阶级的方案的困难在于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对激进承诺明显的削弱，以及对于左派的一种同等强烈的对抗，这种左派又自然地反对那种消解作用。在他针对与社会党或者自由联盟的选举约定的可能性而提出的著名观点中，或许一定考虑到了下一次选举的情况，霍布斯鲍姆说道："必须发现一些把反对保守主义的大多数英国人联合起来的方法。"① 但是那种争论所指向的那些政策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目标的。因为他们要求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探索能够把由于基本观点不同而被深深分裂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的"原则"——一个对于在野时的软弱与优柔寡断和在当政时的无能与失败的完美的处方。同样，在这里必须提到由马丁·杰奎斯（Martin Jacques）和斯图亚特·霍尔在他们的《撒切尔政治选集》的序言中提出的观念，那就是，劳工运动要求的是"构建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最广泛的同盟，首先包括可能十分适度的目标"。② 无论对于"最广泛的同盟"可能说了些什么，起码在这里对于"十分适度的目标"是没有什么打算要说的。因为没有什么更可以保证使劳工运动丧失战斗力和解除武装，并且取消劳工运动，确切地说，它的能力是一组包括那种"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的联盟的组织力量。只有一个激进的行动方案才能成为这一个联盟的粘合剂，而这一方案在目标上并非适度的，然而提出这种观点的人都极度地信任和明确地拥护它，甚至可以带来那种霍布斯鲍姆所希望得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左派坚定分子已经有50年了。他不仅是左派中最有天才和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正直和正派的人，他对那一次由他发起的论战的回答已经成为一种严肃和适度的模式。他提出整个论战的理由是出于他完全诚实的担忧。在一篇于1983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他写道："一个平民主义的激进右派走向极右翼化的危险是明显的。这种危险特别严重，这是因为今天的左派被分裂、士气被削弱，并且首先是因为英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对政治进程和政治家失去了希望与信赖：包括任何的政治家。"③ 那种危险确实是够现实的了。但是他提出的对付那种危险的方法在我看来很可能反而是使这种危险更加恶化了。

① Ibid.

②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op. cit., p. 16.

③ E. Hobsbawm, 'Falklands Fallout', *Marnism Today*, January 1983, p. 19.

一个反左派的领域

我现在要讨论在思想领域中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具有更加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对左派所进行的斗争的敌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拉斐尔·塞缪尔在1984年工党年会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贝恩的过去与贝恩的现在》的文章，文章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在贝恩先生富有想像力的世界里……每年的讨论会都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有感觉的存在特征，一个具有它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集体主体……对于工党支持者的极为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出了差错?'——贝恩主义（Bennism）作出了令人迷惑的简单回答：'会议的决议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对民众过分的溢美之词，或许对于工会也是这样，对于那些离开的人，这些事情既是他们的特权又是他们的义务……这很难不使人想起这些屈尊的典型声调，这是贵族们在宣布他们对百姓的爱时曾经习惯采用的。"他还写道："这是贝恩先生的悲剧，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现在所呈现的，在英国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东方同西方一样），它不再是劳动阶级的信念。拒绝承认这一新奇的现象确实是他的浮夸语言作风的根源。"① 想从阅读拉斐尔·塞缪尔的文章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将是不可能的，在工党里曾经担任过内阁职务的人中，没有人能像贝恩那样明晰地、具体地和彻底地谴责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这几乎使他超越了批判主义。但是诋毁是另外一回事，并且最好把它留给社会主义的敌人。

斯图亚特·霍尔写于1983年春天的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情况，在矿工们反对罢工行动的表决通过之后，他在文章中写道："可以想像的是，人们将要牺牲他们的生计，由于他们的领导阶层所作的毫无根据的保证是对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错判以及对工人阶级行动的合理性的误解……为了投票表决是否举行一次罢工，矿工们被提供了三个理由：纪念建立了工会的那些人；为了他们的家庭；为了成为男人，他们拥有一份挺胸站立并努力奋斗的责任。多么热烈的情感！可是，在他们往后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的家庭的和大男子主义的设想中，这些话语作为一种花言巧语还不时地落到我的耳中。这种动机是正确的。然而这里的语言表达却是一种死板的方

① R. Samuel, 'Benn Past and Benn Present', *New Statesman*, 28 September 1984.

式。"① 在这一著作发表以后不到一年，矿工们举行了罢工，并且罢工持续了一年，而斯图亚特·霍尔也因此写道："无疑，矿工的罢工使左派失去了巨大的信心和活力。"②

有关比尔崔克斯·坎贝尔的那部分内容，在书中我已经引用过，他把1982年矿工们的拒绝罢工行动看作是一种对"怀疑那种罢工行动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陈旧方式"的证明。这不仅是矿工们自己有怀疑，当然撒切尔政府也有怀疑。

在1984年末，比尔崔克斯·坎贝尔也对特里克·阿里（Tariq Ali）竟敢提出建议感到愤怒，在一本书中她发现"令人厌烦的"是，用特里克·阿里的话说就是："在英国，一个重大的社会主义方案需要一种具有广泛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上的延伸和把握的联合［他的意思是指像他自己一样，她在这一点上插入这句话是很有益处的］……由于领导者的实际的技能、本领和勇气能够联系数百万像贝恩、斯卡基尔（Scargill）和利文斯通这样的人。"③她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论："'三剑客'。这就是一种俗气的极左的精英论，在政治上装扮成一种新的民众干预……特里克的训诫的确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组织准则的恢复……当然这是一种金字塔现象，先锋队总是处在顶部，并且这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特里克·阿里很有可能把这种（以及许多其他同一风格的）情况描述为一种对他提出的论点的具有煽动性的夸张的摹仿："这种向原教旨主义的精英论的进攻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即使最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也不得不尝试变得比大多数国民更开明、更积极和更有组织。避免这一指责的唯一方法将是陷入到完全的消极性和不可知论。"④

比尔崔克斯·坎贝尔在她的文章中同样写道："这种先锋队的观念变得……反对那种正在引起大伦敦市议会关心的事情，那就是它把资源给予已经从事于改变人们的生存物质条件的极少数民众政治。"⑤这种有代表性的概括表明，那是一个组织，包括领导者，他们强迫性地组成一个"先锋

① 'Whistling in the Void', op. cit., p. 12.

② 'Faith, Hope or Clarity', op. cit., p. 18.

③ B. Campbell, 'Politics, Pyramids——and People', *Marxism Today*, December 1984, p. 25. See T. Ali and K. Livingstone, *Who's Afraid of Margaret Thatcher?*, Verso, London 1984.

④ T. Ali, 'Politics and Pyramids', *Maxism Today*, January 1985, p. 40

⑤ Campbell, p. 25.

队”，这就能够把资源给予上述那些人。重要的是要理解在这里被注意到的那种思想产生的基础。它产生于一种消极的身份认同：阶级政纲被等同于对多样性的“还原主义的”分解，等同于一种狭隘的“经济主义”，并常常等同于一种男性沙文主义。组织被等同于官僚结构、具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领导阶层和具有“原教旨主义者”的缺乏远见的基本承诺。换句话说，真正的缺陷和形式的畸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常常却被当作好像它们就是事情的整体一样来对待，并且（这种看法）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消极的身份认同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政纲的完全抛弃。就新修正主义而论，它导致了另外一些事情——例如一种狭隘的草根地方主义，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谓的“好战的宗派主义”，以及对除它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情的强烈怀疑。这是时常影响左派的中央集权主义偏见的更为引人注意的一面。但是草根地方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畸变，比中央集权主义更具吸引力，然而没有能力向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提出一种有效的挑战。近年来，在市政和社区层面上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和进步；而这些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和支持的。但是“地方的社会主义”是不能代替社会主义者被激发热情并参入其中的国家政治的。

国际维度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非常狭隘的，而事实是，我们讨论所涉及的那些著作实际上根本没有涉及英国的现实问题。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接近于沉寂的区域。这是所有这些方面最为显著的，这些问题对许多政治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这确实使人们全神贯注于被思考的思想领域。

人们或许会假定，这种人的确想要了解关于英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某些问题的基本的重新定位，包括英国单方面的核裁军和关闭美国在英国领土上的核基地。他们要求——这也可能是假定的——一种关于英国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阻止革命的计划的结果，也即是美国自 1945 年以来一直从事的被称作反共产主义的行动；而他们当然反对美国干涉中美洲。许多人——或许绝大多数人——也将支持英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退出。

至于对待苏联的态度，绝大多数相关人士不加怀疑地采用一种尖锐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苏联在国内外的许多政策和行动，并且认为在许多方面，苏联和其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能够真正地从某种被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消灭掉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些新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他们认为这

是对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完全令人憎恨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背离。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新修正主义批评家，并不持这种包括上面的观点在内的相类似看法，然而同样很值得庆幸的是，像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指明的，在英国的左派中还从来没有任何像恶毒的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支持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这样的东西，在前毛主义者、前斯大林主义者和在法国以及在另外一些地方的其他前左翼人士之中，这种情况的存在已经是非常值得注意了。

然而，新修正主义对于国防与外交政策所持的立场和承诺有着重大的含义，对于这些含义，新修正主义还从来没有认真地正视过——的确，它根本就没有正视过。有两种含义尤其需要在这里被提及。首先，事实上工党领袖也有他们的承诺和立场。他们反对美国干涉主义的某些项目，例如在尼加拉瓜；并且他们正式地反对——但是谁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坚定地呢？——在英国的核基地、巡航和潘兴式导弹、北极星飞弹、三叉戟飞机和星球大战。但是他们也仍然是非常坚定地忠实于——这根本没有任何疑问——与美国的联盟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承诺。这种联合是解决组织和政策上的松散与摇摆的一种完美方法，就像在1983年的大选战中被如此好的证明了一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如果问题按照有利于左派的方向解决，那就是说新修正主义必须被假定为他们想要这么做，这将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与推动，并且这其中的多数人将必定是来自工党内外的传统左派。在这一点上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新修正主义应该把“传统”左派看作是对于它自己的目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而不应看作是一种异己的和怀疑的力量；并且同样地，虽然这么说可能是不受欢迎的，直到工会工人阶级认为它应该这样做，他们才愿意真正地采取行动。这不是贬低和平运动积极分子的作用：这仅仅是说，如果有真正的运动，工会工人将必须参加。

第二点与第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的某些重要的重新定位——而单方面的裁军当然是属于其中的——将很明确地被国内外庞大的保守势力看作是“革命的”。事实上，任何由一个假定的工党政府所做的类似于关闭美国在英国的核基地和放弃英国的核武器库这样的政策的认真尝试，都肯定会激起来自于英国各方面、来自于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疯狂反对。

由此就使问题集中在某些相同的因素之上，即在较早时期提出来的有关被设计用来破坏并摧毁现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政策。反对由一个左派政府对现存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所作的激进的重新定位，这只有通过大量的动员来自于不同方面的各种力量才能成功地实现：他们的核心将一定是工

会工人的力量，包括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等。并且那种动员将同样需要把国家力量同阶级力量结合起来，把组织机关与领导阶层同地方主动性与基层自发性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和为和平而斗争，两者都要求一种民众联盟的体制：只有工会工人阶级才能形成这一体制的基础。

近来我们听到的关于左派的最普通的口号是："智力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一直是葛兰西的贡献，而这也确实是由他从属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传统的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那里借用来的。这很容易造成左派把只有智慧才适合于当今时代奉为神圣的局面：实际上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原因让我们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指示出它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建立一种不受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这是一个"高贵的"口号，源于浪漫的激情，但是却没有任何更值得信赖的功绩：因为如果理智告诉我们，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自负的、没有希望的和注定要失败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会作更多的努力。然而，这是一种新修正主义的许多思考投射于其中的精神状态。

25 年前，当这样的回顾开始展开的时候，在那些最早开始这种思考的人中，并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站在一种历史的升降机上，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带到了一个较易于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乐土。但是，无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建设一个合作的、民主的与平等的社会方案，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一种虚幻而已。同样，对于发生在最近 25 年里由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所有重大影响，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它。

作者：Ralph Miliband

文章原标题：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150，March/April 1985，p5 - 26

（编译者：李世书，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后马克思主义？

［英］诺曼·杰拉斯　著　付　琼　译

时代在变化，人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发展、进步、抑或倒退。或者是在一个多少具有稳定性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渐变，也可能是更加剧烈的断裂，即一种视界的突变：其中一种事物遭到弃绝，而另一种事物则受到追捧。每一个人不得不按照与其身份相适配的方式作出取舍（或者离开或者和解）。我们可以援引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为例对此加以说明。任何熟悉其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他所犯下的错误——其实并不是修正，而是抛弃。这一论断的依据不是任何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的或派性的界定，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所作的最为宽泛也是最具包容性的界定。实际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一个重大原则都提出了挑战，也可以说取消了这些原则。然而，他把这种实质上的取消仅仅表现为一种修正；个中原因，不难看出。因为他处在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政治语境之中，其听众也是该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谱系和传统，在该党内部，伯恩施坦本人还是一个年高德劭、深孚众望的人物。他是该组织的资深成员、党报的编辑、恩格斯的朋友及其遗稿的整理者，因而不单是其众所周知的资历，就连其个人的经历也会对他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形下，他居然声称只是在按照当代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思想加以更新而不是加以全盘抛弃，就不难理解了，虽然其实他正干着加以全盘抛弃的勾当。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主张，一个人与其思想的关系纯粹或者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也即为了好处而刻意盘算的关系。一般说来，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要装出一副诚实的面孔。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除了思想作用的那些急迫的内在要求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昨天与今天

上述评论与今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发达

资本主义世界，一代知识分子接受了激进化改造并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其中许多人对他们所构建的希望感到失望——一些人一度悲痛欲绝，但后来也不以为意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见证并且正在见证着的昔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了一大串，他们在探索“出路”的事业中一起创造了当代思潮十分可观的一个部分。自然，这种“出路”总是披着知识进步的外衣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无法对此表示信服，不得不提醒那些支持者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别忘了那个曾经知道却很快又忘记的道理：也即思想的演进总有其社会的和物质的语境。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自己无疑更愿意视而不见的一系列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新近奉行的路线？年龄以及职业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我们已经历并正在经历着至少在西方与革命思想的坚持颇不相宜的政治时代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接下来就是知识时髦的诱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人看不起的考虑。

左派知识分子的生活受到许多不同力量的牵制。一方面是某种道义的承诺，不论这些承诺的表述方式如何：社会主义、消灭剥削、人类解放以及最终人人获得相当不错的生存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某种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左派知识分子会产生得到认同并进而有所创造的欲望，然后还会希望或者感到自己处于先锋的地位，不仅能与最新的理论发展保持同步，而且还是实际的参与者与发起人之一。前者的力量，也即道义承诺的牵制力，是一种变化的力量，理解马克思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对此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当这一承诺在一个社会运动——既遭受剥削又遭受压迫的人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处于殊死搏斗状态的运动中得到了物质性的证明，以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受到该运动的支持时，它对知识分子的牵制力就会更大；当这一条件缺席，或者当运动处于失败或退却状态时，道义承诺的牵制力就小得多。空洞的承诺和终极的历史目标在这里便逐渐显得格外抽象和遥远，遥远得简直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命运毫无关系。以此时知识界兜售的货色来看，在一个多世纪的跨度上最为牢固地体现了这一承诺和目标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也许已开始显得陈腐老套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调和和保守必然会与年龄同步的问题。在恩赐般的成年智慧面前，处于青年或者壮年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往往被告知，他们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完全与其时代相适应；但是直到后来，他们自己才逐渐认识到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被误导了，不曾有上述经历的社会主义者是很少的。当时我们都会感觉出此类忠告的虚假，而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终于知道那些忠告原本就是虚假的了。关于此点，并没有

什么必然性可言。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还能从抱着这一虚假观念不放的人那里吸取教训。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无法不承认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忠告中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了，虽然这个成分已非原来的设想，而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因为偶然和背离总是存在的。老实说，一旦远离了早年的热情以及与此相伴的荒唐，并同时具备了精力充沛、客观冷静地参与联盟的能力，一些人就会把握不住自己，转而更加关注其他的声音了：所谓的现实主义、逆来顺受或者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说，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之后的几十年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正事（the thing），即使算不得正事，也肯定是当一回事（something）来办的。但是，它又的确肩负着承诺，随着时代的推移，实现这一承诺已经变得更加艰难。在这一情形下，自然总是存在着公开背叛——如果我可以斗胆使用这个措辞的话——的可能。人们可以为某种旧有的、权威的选择而抛弃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自由主义或者他们知道的什么主张。但是，一些人采取了更加隐蔽的路径，也是有其原因的。一个原因是保护自己免于给人留下变卦的印象，因为人们通常是不喜欢承认自己改弦易辙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已与一定的听众或环境建立了一种约定并且不愿意完全履行这个约定。更具体地说，就是他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虽然有很多敌人和批评者，但是在知识界和精神界继续享有崇高的权威。第三个原因在上文业已提到，就是希望成为先锋思想家的考虑。这些原因与欺骗的意向毫无关系。它们与获得尊敬和保持自尊的来源有关，与一个人拥有什么和他想得到什么有关。需要再次指出，每个人清算其与他人的问题都一定会按照与其自信和自尊相适配的方式。

远离马克思主义

我要以这些观察为背景讨论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该书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论著。[①] 这倒并非因为我认为该书在任何实质性方面具有理论价值。我真的并不这样认为。从我即将予以解释的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是学术滥用达到高度严重阶段的产物；从我也将力图证明的诸多方面来看，这本书

① Ernesto Lac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以下称 HSS），Verso，London 1985，p. 4. 除非另外注明，引文着重号皆为拉克劳和莫菲原文所有。

对理论恣意滥用，毫不检点，无论什么观念，只要允许，便或多或少地加以揉合或者予以割裂，对逻辑、证据以及适当比例方面的问题全然不予考虑。然而，至少由于两个原因，这本书毕竟还是有趣的。诚如艾伦·麦克森斯·伍德所云，第一个就是“例证精美”：它实际上是把欧洲左派中具有右倾倾向的那一个小派别的核心立场一股脑地摞在了一起。[1] 第二个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声明本身了。

请注意，坦率和准确地讲，这至少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颇为相似。拉克劳和莫菲声称其与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断裂，而现在他们却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关于此点，还有几句话要说，因为他们确也坚持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理论之源。当他们承认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外在于社会主义传统”的途径到达其目前的结论——对此人们只能说：确实如此！——时，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念念不忘，因而选择了从内在于其过去的“若干直觉和话语形式”出发展开其理论。[2] 那么，他们对其目前情愿保留的这些联系也念念不忘吗？不管怎样，我要说的是，新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中与拉克劳和莫菲的新近观点关系最密切的那种倾向不过是成于其缔造者之手的两面之中糟糕的那一面罢了。然后他们所谓的“远离”马克思主义才有了确切的含义。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他们业已取得的思想和政治成果，也即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无疑比“非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更让拉克劳和莫菲依依不舍。它使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而不是要改变颜色，使人觉得它旨在提高和进步，而且所有这些都用话语理论的绚丽外表装饰了起来。我的论点是，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学术真空，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选用的一个词语：既是一个理论的真空，也是一个标准的真空，围绕着它的不过是一些十分陈旧的观点、偏见和漫画式的歪曲。

这样说来，我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发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了。但也只能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因为要说无论什么人，只是由于看了我在这儿不得已说的这番话，便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心服口服地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是大可怀疑的。但是我的目的其实更有限，那就是要表明：如果有好的理由不当或者不再当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其中一个理由。

那么，我们就言归正传吧。下面是为拉克劳和莫菲的著作所抛弃的马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London 1986, p. 47.

② HSS, pp. 3 - 4.

克思主义的若干权威立场。首先是：客观的或者说结构的阶级立场是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结盟得以发生的首要的历史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结构）在解释权方面享有首要的地位，与此相应，政治和意识形态则等而下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①] 接下来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具有一种客观利益；就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发表言论是有效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瓦解和分化工人阶级的因素，但是工人阶级走向联合的结构倾向仍然存在；与其他潜在的社会激进力量相比，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斗争有着一种特殊——这两位作者的用法值得注意，他们喜欢称之为“特权”——的关联。[②] 被否定的立场还有：社会主义自身，也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为解放而进行的社会变革（并不像拉克劳和莫菲所理解的那样，这只是“激进民主”或者“民主革命”的一个维度）事业之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从而也规定了这个划时代变革过程的根本转折点，也即革命决裂发生的那个决定性时刻。[③] 更有甚者，最后还有：借助某种或某些总体性原则，或者在解释和知识的统一框架之内，我们可以对社会和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此处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有些方面仅仅被部分地抛弃了，作者对学术连贯性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下力气加以解决，因为任何相对主义的断言都与此相似，其鼓吹者一旦大胆涉入其所自创的解释性范畴，便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

我想，现在来说上述被否定内容的目录之中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让人吃惊，该是公平的吧。它们全都是些烂熟的货色，唯一有可能例外的要算最后那一条，而对此加以轻信的恐怕也只有那些平庸的、老掉牙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了在这儿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说。

表现的总体性

至少我们要找到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说，它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学派那里被提取了出来，然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挥。贯穿于拉克劳和莫菲几个特定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之间的那个论点，是围绕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结构性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个原则就是简单与复合或者说封闭与开放之

① See, e. g. , HSS, pp. 30 - 1, 58, 67 - 8, 109, 174.

② HSS, pp. 82 - 7.

③ HSS, pp. 156, 176 - 8, 192.

间的区分。一方面是单一性，也即理论锁合的愿望；另一方面是承认复合性和开放性。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学术领域的划分方法。

在试图理解社会和历史过程方面，有些人——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体性方面自有其传统，但是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会运用这一方法——将所有的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异类性、多元性和模糊性都简化为简单的、单一的、统一的和清晰的存在，由此他们创立了一种锁合理论。社会由一个基点或本原决定而来并且由此具有了可理解性，这样社会便成了一个锁合的总体，用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术语来说，这个社会便认为被“缝合”了。由于这个原因，又由于“确信社会是在某一点被缝合的，通过这一点才有可能确定任何事件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便存在着缺陷。[①]《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充满了描述这一缺陷的语言：什么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有“还原主义嫌疑”；由于这一独一无二的基本观念，它是“一元论者”和“根深蒂固的一元论者”；由于这个基本点是社会的本质，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话语”（……“本质主义内核”、“本质主义视界”、“本质主义观念”、“正统的本质主义”……）；由于这个基本点是经济，它是一种“经济主义范式”；由于其首要的作用与作为其构成部分的阶级相一致，它是一种“阶级主义”；由于其演化必然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它是一种“阶段论的范式（stagist paradigm）”；由于马克思主义对清晰了解社会总体所秉持的信念，同时更由于那个锁合的、固定的或者说先验的理论基点，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范式”。然后又有五花八门的揉合：像什么“本质主义一元论”、“阶级的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阶段论（economist stagism）”，还有什么“本质主义先验论”、“本质主义固定性（fixity）”、“封闭范式的内在合理性和可知性”、“纯粹阶级主义的封闭世界观”、“理性主义范式的缝合空间”等等。

但另一方面，有的人，特别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坚持直面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其他特性，说到底是要坚持“社会开放的、也即非缝合的特性”[②]，而社会并没有本质，只有两位作者所作的否定性表白：“我们必须首先抛弃把社会当作其部分过程的建构整体这一观念，因而必须将社会的开放性看作现存事物的构成性基础，或者说‘否定性本质’。”[③] 换句

① HSS, p. 177.

② HSS, p. 138.

③ HSS, p. 95.

话说就是："社会具有一个中心这一观念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1] 因而，总体与锁合也就成为不可能："'最后的'缝合阶段永远不会到来。"[2]

虽然这一说法也从其他源头汲取了滋养，但是熟悉阿尔都塞著作的人还是能够很容易地在这一两极的对比之中发现那一位熟悉的朋友和敌人，它的名字就是"精神的"或者说"表现的"整体。阿尔都塞使用这一概念，是要努力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从黑格尔的笼罩中摆脱出来。阿尔都塞认为，在黑格尔看来，社会整体的表面复杂性仅仅是表面的，因为社会整体的诸多方面总是有迹可循，因而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种原初的普遍本质，这个本质本身就是世界精神发展的一个因素或阶段。黑格尔整体概念中这些千差万别的各种表象都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精神本质的表达，而这一本质在所有这些表象中都是在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知的。这样，表面的复杂性也就让位于本质的单纯性。阿尔都塞本人对每种此类倾向都加以反对，对"多元决定"的真实性则加以强调。现在，拉克劳和莫菲继阿尔都塞之后又抛出了开放之类的要求——正如他们所云，是要将这个最后的观念加以"激进化"了。[3] 但是重大的转变正发生在这里。阿尔都塞展开这些相关的概念，只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在他认为真正的形式和歪曲的形式之间，划一道界线；而拉克劳和莫菲则在包括其先哲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现在所支持的理论观点之间重划这条界线，结果所有这些都被伤害到无可补救的地步。

理论错误之洲

然而，仅仅挑出"本质主义"一词及其同源词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连续性加以注意是不合适的，因为其间也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而不当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这个使用过程决不仅仅是对这些范畴作空洞展开的过程。冒昧地说，阿尔都塞的精神性整体或者说表现的总体性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坏的一面。好的一面，也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诸多讨论中尚有价值的那一面，在于它为作为唯物主义史学家、经济和政治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解读点，使得他从颇有民族倾向的、投机的或空想的哲学家这一模糊形象中走出来，重新以另一种形象

① HSS，p. 139.

② HSS，p. 86.

③ HSS，pp. 87 -97.

引起新一代人的注目。它对于世界注定会和谐、世界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实现进步的说法所带来的诱惑提出了警告，哪怕这些说法仅就人类种群的演进而言；它强调了马克思事业的科学雄心，同时也强调了矛盾性、“阶层”和细部的具体性以及不得不接受理论同化并按照理论来理解的那些领域和物质的复杂性。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阿尔都塞本人还存在着若干严重模糊的认识，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毕竟可以引导阿尔都塞的读者建立起以经验为基础的品质以及对事业所持有的理性精神：事业的艰辛和艰难、事业本身固有的变化过程以及修正和改正的必要因素。然而，这个概念的坏的一面则在于作者似乎加以推扬的将整个知识界都还原为某种摩尼教式的对立物的意向。在严密划定的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真理范围之外，表现的总体性的过失无所不在，这些过失有时是依赖于单一的概念和论点，有时则不过依赖于指控这一手段自身而已。它将表面看起来极为多样的知识现象统统联合在一起，使其不知不觉地互相串通一气。什么黑格尔和经验主义，经济主义和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什么主义都与还原主义错误大规模地联系起来。除了少数几个，如成熟期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外，所有那些人一概都不能脱此干系，几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思想家不被极端沉重地抹上本质主义的污点：从恩格斯、卢森堡到科尔施、卢卡奇，再到葛兰西、萨特、德拉·沃尔佩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不在我这一方面给人以过分简单化的印象，这里对一定的多样性当然也是予以承认的；甚至可以说，阿尔都塞方面也有时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局部的或者说轻度的优点。但是实际上，明明白白地说出也罢，轻描淡写地隐瞒也罢，处于纷繁的差异背后以及基础性的核心思想结构之中的，到头来总还是那一个老毛病：关于原初本质的还原主义假定。不错，此中所包含的深刻讽刺意味正在于，关于表现的总体性所可能找到的最佳例证之一——不妨可以说——恰恰就是源于阿尔都塞的理论错误之洲（the Continent of Theoretical Error According to Althusser）。它是这样一个空间：种类繁多的思想、术语、哲学谱系和文化谱系差不多都被还原成了一个单一的普遍本质，因此都在此被视作同源于这个单一的普遍本质，也即同源于拉克劳和莫菲今天随意称作“本质主义”的那类错误。阿尔都塞使用了表现的总体性这一概念，轻率地对它加以怀疑并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甄别，我在前文讲到学术滥用时想起的就是其不够健康的那一面。这是阿尔都塞遗产中危害颇大的一个部分，其他理论家很快就屏弃了其整体目的的严肃性

和理性承诺；这个整体目的就是出于理论上被逐出马克思主义的考虑而大做文章，即使与所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即使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抵触，也在所不惜。

不管怎么说，现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不过该书的伎俩要比阿尔都塞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不在于理论推进的方式，而在于理论滥用的花样翻新。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已经逐渐归入错误的一方，然而这里仍然作了摩尼教式的划分，与这一划分相伴而来的表现则是慷慨地编造出种种罪名，大约也是作为其绝对多样性的明证吧。什么一元论或经济主义、阶级主义或锁合、透明或缝合的整体：理论滥用的名目竟然如此繁多。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这么多名称不过是由一次理论滥用衍生出来，因为所有那些加起来也无非就是“本质主义”。于是我们又再次感受了前面提到的那种讽刺意味，这个范畴反过来回击了它的使用者：支撑着使用者整个思想之洲的竟然正是这个错误范畴，这个由错误思想构成的名副其实的缝合整体。然而，从批判的角度来讲，问题的严重程度还远不止此。这是因为，拉克劳和莫菲对所有这些都加以反对的新追求，就其推扬复杂性、多样性等等而言，就其反对单一性和本质信仰而言，与阿尔都塞的新追求在总体上是相似的；但是其差别在于，这样一来，事实上任何历史性解释框架，任何社会学的可知性原则，都可以以“社会开放性和非决定性”[1] 的名义加以谴责。那些讨论“任何先验的统一框架”的段落，那些提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把历史和社会说成是由围绕着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说明的规律构成的可知整体”的段落，以及“可以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从知识方面把握作为一个可理解框架的社会”，于是要对这一社会的基本条件加以“消解”的段落，都是这个意思。[2] 尽管阿尔都塞的表现的总体性理论也属于滥用，然而原其本意，至少还有一种启蒙精神：一般认为，它对于科学理性和研究事业还不失为一个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解释起步很早，因而其功亦足称道。拉克劳和莫菲则热烈地拥抱蒙昧主义，竟至于对所有的解释性方案都一笔勾销，因为这些解释性方案所可能提出的解释性原则或者别的什么原则中总可以找到某种“本质”。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其坏的一面部分地为好的一面所补偿；而对于拉克劳和莫菲而言，其糟糕的一面则无可救药，所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丑恶。嗣后我还要回头讨论在此被我验明正身的这个讽刺，并让人们看

① HSS, pp. 144 - 5.

② HSS, pp. 36, 3, 2.

一看它又是如何反过来打了我们的两位作者的嘴巴的，从而揭发他们打造这本书所使用的这套把戏的无聊本质。

是解释一切，还是无所解释

为了最后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的复杂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对此拉克劳和莫菲则认为，大致相似的东西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堕落到毫无希望的地步。这些说法的来龙去脉如何呢？初步回答是，拉克劳和莫菲对何谓马克思主义作了歪曲的、贫乏的描述。也可以绝对直截了当地说，拉克劳和莫菲在阐释过程中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所有那些具有理论价值的有力论点、深刻洞见和理论贡献一概加以否定。不错，他们也会留心而且赞扬基本方面存在瑕疵的整个著作体系所包含的补偿性品质。不管也不因为作者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也不管是否违背了他或她个人信条的真正基础，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所取得的贡献都是积极的；但是这些有价值的因素都被规定为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素的东西。简言之，拉克劳和莫菲用最坚决的必然论措辞或者说决定论措辞，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措辞，还用——如果必须这样——最直来直去的“本质主义”措辞，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界定，然后又以决定论、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由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排斥。我将提供两种证据对此论断加以说明：一种是其例证采取了重复使用论点的技术；另一种是对若干较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论述逐一列举并加以概括的处理方法。首先且看下面一例，这无疑只是具有证明效力的一个不起眼的标志，但是在咄咄逼人地论述话语及其所派生的一切纷繁概念的重要性的文本中，对这类小玩意儿却不能等闲视之。那就是拉克劳和莫菲运用大写字母所创造的颇有恩赐意味的方式。例如，他们写道：“取决于……革命角色（‘革命’一词的‘r’字母大写）的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在观念上围绕着历史（History）独一无二地建立起来”；“推行‘党’（the Party）、‘阶级’（the Class）或者‘革命’（the Revolution）这类绝对概念的传统左派的本质主义”；“推动历史变革——革命（the Revolution）、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的关于特权的话语”。[①] 这是一种戏拟的形式，它将马克思主义贬低为其自身的一个碎片，而这一戏拟中最贫乏的一面则将整个传统贬低为几个教条的绝对

① HSS, pp. 2, 190, 192.

概念。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概念的绝对性也会走进这两位旁观者的视线——以及脑海——之中。

第一个例子与最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相对自主性”这一概念的讨论有关。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个“相对自主性”乃是一个“死胡同”：“一般说来，这种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努力是在一个接受缝合社会这一假设的框架中展开的——例如通过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这样一个框架——因而，无论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还是任何其他实体的相对自主性，相对自主性这个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这是因为，要么由社会的基本规定建构起来的结构框架既解释着自主的界线，也解释着自主实体的性质——而在这种情况下，实体就是该体系的另外一种结构规定，‘自主’的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了；要么自主实体不由该体系所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解释这个自主实体从何建构而来，这样一来缝合社会的前提也就不得不加以抛弃了。这一前提与自主的观念本不一致，恰恰是将二者结合的愿望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大部分辩论给搞砸了。……然而，如果我们抛弃社会的最后锁合这一假设，就有必要从多元的政治和社会空间着手，而这些空间又并不涉及任何终极的统一性基础。”①

这仍然不过是关于“不可还原的社会多元性”那个论点。② 但是请看，摆在我们面前用来支持这一论点的却是那种刻板而僵硬的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要么基本规定解释着被认为是相对自主性的那些东西的性质，也解释着它的界线，这样一来，相对自主便全然不是真正的自主了；要么相对自主性干脆不由基本决定所决定，结果基本决定也就不成其为基本决定了。换句话说，这里所声称的基本决定不是解释一切，就是无所决定（这个逻辑使用范围相当广泛：“……相对自主性，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任何其他实体的相对自主性……”）。这些基本决定或者解释一切，或者无所解释，这自然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别扭的选择。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保持其本色，不说基本决定“无所解释”，而是说基本决定“解释一切”的话，他们就会以还原主义的罪名遭到批评；如果认识到自己不能当还原主义者，不能说基本决定“解释一切”，他们就得将存在基本决定的假设（也即“缝合社会的前提”）以及与这一假设相始终的马克思主义一起加以抛弃。我们再换个说法，拉克劳和莫菲在这里就是不让马克思主义选择相对自主性这样一个概念，难怪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那种最粗劣的经济

① HSS, pp. 139 - 40, Emphasis added.

② 同上。

主义了。

然而，我们凭什么要受制于他们所界定的这个死板的两难选择？我们决不受其迫制。它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游谈无根的口头指令，压根儿也没打算产生具有说服力的论辩效应。譬如，一根锁链拴住我的脚踝，将我锁定在一根牢不可破的柱子上。这既对我能做的事构成了限制，又给我留下了一定的自由。我能站起来，也能坐下去，能阅读，也能唱歌。然而我却无法打一场像样的网球，也根本无法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会议。这根锁链不仅对我构成了负面限制，也迫使我必须做一些动作。我要根据我的腿被它拴住的情形不断调整它平放的方式，否则它便会把我弄伤。我还得定期给脚踝周围感染的伤口敷药。凡此皆不一而足。我对我的境况多少有些了解，因而我说我享有相对自主：锁链和柱子是我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它们的确仍然给我留下了独立决定的余地。这时，如果有两个姑称其为尚塔尔和欧内斯托的过路人，听了我的这番描述后宣称："这个概念是一个死胡同。因为，要么锁链和柱子既解释了你的自主性的性质，也解释了你的自主性的界线，因而'自主性'这一概念是多余的；要么你的状况不为锁链和柱子所决定。"那么，我该如何评价这两个过路人？应该注意，无论这根锁链被认为是这个基本的决定因素，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这两个过路人的推理都是昏庸的。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相关的是这些论断中细节上经过修改的那个较有力量的论断。但是一种工具只需要与其手头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相适应也就可以了。与拉克劳和莫菲逻辑的苛严——这是他们强加在而且仅仅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重负，我们将会看到，一涉及他们津津乐道的"话语"领域，情况就随意得多了——相反，我仅用此例便足以证明，在解释一切和无所决定之间确实存在着恰恰可以解释许多现象的决定因素。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便不必在最夸张的经济还原主义与他们在这里向我们兜售的区区多元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例如，她或者他可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类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中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一定限度内又总是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政治结果。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他们所界定的阶级结构在解释此类政治现象方面具有首要的作用。当然，其他人也可能并不这样认为。就让他们那样认为好了，因为那些观点根本不足为据，不过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规约罢了。

阶级联合与阶级利益

请看第二个例子。这次它来自关于卢森堡《群众罢工》这个小册子及其问题的讨论，卢森堡在这个小册子中提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来自许多异质因素的革命力量如何联合的问题。这个异质性或者说分化归因于不同类别的工人及其不同组织程度在工人中的存在，归因于其先前经历与地域传统的特殊性，也归因于驱动其革命的要求不同，其所卷入的斗争所属的系列也不同——所有这些都达到了被拉克劳和莫菲称为“主体立场”的那些东西的多样程度。于是后者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此事中所面对的“著名选择”的特色，而这也就是这个特色的由来了：“不是资本主义经由其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就是这些必然规律不按照其预想的功能发挥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为产物’，而变成永远的现实了。”[①] 又是一个十足的二分法论调：不是纯粹的经济必然性结出联合工人阶级的累累硕果，就是我们直接遭遇分裂。显然，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已经没有了举足轻重的地盘；另一方面，阶级主体不再成为中心，而且政治，无论是否社会主义政治，都被真正地控制起来，因为当今缔造联盟的整个过程正是在政治领域开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在那个进退维谷的选择之间还存在着另外的东西呢？这些东西诚然千差万别，譬如一个普遍存在的具有剥削性质的结构状况以及某些普遍的特征，如工作时缺乏自由或兴趣，更不用说还有工作时的不愉快和辛苦乏味了。还有普遍存在的经济倾向，其中一些倾向能够产生无产阶级化的效应，而诸如此类的倾向也能产生广泛的职业危机感。难道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都——不多同样也不少地——为一种具有联合功能的社会主义政治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客观的基础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么说呢？那只是因为这两位作者说了“不是……就是”这样的话，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们不能不再次说，难怪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僵化的经济主义呢。

第三个例子不能不涉及客观利益的归属问题。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最后这个概念“无论如何都缺少任何理论基础”，“与分析家所搞的武断的拉郎配相差无几”，只有在“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中才能稍有意义。当再次提及工人阶级地位的异质性时，他们就此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在这里，

① HSS, p. 13.

另外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要么一个人有关于历史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当无产阶级的千福国到来的那一时刻，这一矛盾的多元性将会被消除，而且绝对统一的工人阶级自身会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便被决定了；要么一个人抛弃那种关于历史的理论，与此同时，也抛弃社会行为者‘客观利益’的整体决定方面存在的将一些主体立场的特权凌驾于其他主体场之上的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后一个观念则变得毫无意义。”[①] 此段的比例失衡是非常惊人的。它的冗词芜句的确也在应对此负责的那些人心头的某个地方唤起了一种朦胧的自觉不自觉的忧虑。他们站在他们所选择的两派中的其中一派利益上所拿出的东西是单薄的，人们将会发现，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把另一派弄得看起来很糟糕，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程度——总之，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这是一种将整个议论文体都暴露在复述之中的思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相信，工人阶级不仅可以成为“绝对统一”的阶级，而且他们甚至还会变得“自身清晰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是带着“无产阶级的千福国时刻”这一美景坚持这一信念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去利用客观利益这一概念，否则便不利用。但是，我们实际可以信仰的自然是相对联合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联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能够充分地联合起来。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不是要“自身清晰起来”，而是要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错误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坚信存在一种可以替代这个秩序的现实选择。我们还可以认为，那种社会秩序的革命转型，尽管需要付出艰难困苦才能取得成功，但并不是宗教式的最终完成或喜从天降，而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这一判断——它将提高人们的健康和福利，提高人们获得自我实现和幸福的可能性；它是一个人们逐渐认同并乐于为之奋斗的新秩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是有资格讲客观利益的。

这样看来，这里专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绝对判断内含于这些霸悍的二分法所构成的绝对主义本质之中。这是读者可能乐于记住的论证程序。“非此即彼!”但这只是为我们设计的：通过鲜明的对比，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拉克劳和莫菲和颜悦色地宽容他们自己究竟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

① HSS, pp. 83 - 84.

不可还原的二元论

将马克思主义加以贫困化的观点包含于这些典型的二分法的论断之中，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加系统地出现在他们以著作者为序逐一展示给我们的对于传统的描述之中。我将简明地概括这一描述的几个主要线索。然而，它的秘密在一开头，也就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引言部分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这个引言宣称，霸权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无法兼容也、不能起补充作用的一种关系。霸权这个概念是两位作者一厢情愿地抛出的那个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他们既想在某个运动中采用这个概念，又想使其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中摆脱出来。正如他们所论，为此他们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必然性逻辑相对立的社会偶然性逻辑引入到这一概念中来。[①] 这一变化了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另一个主题。如果霸权及其与之相似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范畴无法兼容，那么，此类观念在任何个别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出现都必然是一种断裂的标志。看起来观念也许还在，然而这些观念已经不是具有完全的理论正统性质的观念了。然而，这些观念也许可以证明那位思想家的知识、洞见、敏锐或者创新能力，但它们却并不能给马克思主义自身带来任何光荣。其实，它们证明了这个范式的危机，而不是其创造力。这个主题、这个断裂以及这个危机的名字就是二元论。下面就让我们从拉克劳和莫菲开始的这个地方，也即卢森堡开始，试着对此加以估量吧。

卢森堡是用“群众罢工”这个表达总结由众多群体行动构成的大规模运动的，在这个运动中，她看到了革命联合的可能性。这些群体运动带有若干自发性的摇摆的发展进程表现出超越该斗争中存在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壁垒的倾向，表现出将部分要求泛化为更加深远的、更加广泛的要求的倾向，并表现出将上述工人阶级的分裂加以克服的倾向。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们看来，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方面可资其用。该书不仅将无产阶级的多样性和分散性这些显而易见的现实当作其分途点，而且还构想了一个象征类型的统一过程，其原因则是不得不处理斗争与斗争之间各种意义的流动和溢出问题。据说这就是卢森堡的分析中“最高明的论点”，据说就是这一论点使卢森堡的思想与第二国际的正统拉开了“最大的距离”，并使其沿着通向承认社会偶然性的范围和性质的道路阔步

① HSS, pp. 3, 7.

前进了。但是她未能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如果她坚持到底，她就没有理由把联合过程的结果假定为一种阶级联合了。“恰恰相反，自发性的逻辑本身似乎意味着单一主体的最终类型应该大致上保持非决定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个单一主体不可能是一个“大众的或民主的”主体呢？对她产生了阻碍从而限制了其自发性逻辑的“创新效果”的，是她相信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其客观规律。于是这两个东西，也即那种自发性逻辑和这些客观规律，构成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二元论”。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那个业已讨论过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命题：不是纯粹的经济必然，就是永远的分裂。①

细节会有不同，但那种二分法的模式却总是千篇一律。从考茨基到葛兰西，从麦克斯·阿德勒到阿尔都塞，对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不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那些思想都造成了席卷之势的，正是二元论（当然还有“本质主义”）。卢森堡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分裂的倾向和分裂的利益，像卢森堡一样，卡尔·考茨基把党改造成一种“整体化实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点由此将一种中介性的功能赋予了知识分子，从而构成了一种“接合关系，这一关系对于按一元论思维方式所构想的必然性这一锁链完全不必去理会”。这里就为“政治首创精神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空间。然而，对于考茨基而言，这个空间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是社会理论与工人阶级之间那个最初的外在关系。这是因为，理论自身是最终展开的必然性的保障者，而且理论自身以还原的固定的方式将政治认同理解为受生产关系支配的东西。② 另一方面，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提出，历史的客观规律具有形态学的意义，只对于那些广泛的根本性的倾向才具有解释的效力，此外则不具备其他效力，因而为了把握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可以利用“其他的解释性范畴”。但是由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不可能辩证地从形态学的范畴中得出这些结论，由于这样一来便会将“必然性的效力”重新“扩展”到包含整体的老路上去，因而这类范畴便——请注意——“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那么，拉布里奥拉的提议也“只能引入一个二元论”。③ 反过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限制历史必然性的范围方面，在扩大“自主的政治干预”方面，以及在“将严格的话语因素引入社会客观性的构成”方面，都搞得相当深入。阿德勒之于康德，鲍威尔之于民族性，伦纳之于规律，都有所贡献，然而他们都依然未能

① HSS，pp. 8 – 14.

② HSS，pp. 19 – 21，25.

③ HSS，pp. 25 – 7.

"到达与二元论决裂的程度，也没有到达将'形态学的'必然性这一因素加以彻底清除的程度"。[①]

就是那些达到了这一程度，至少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一程度并以其在其中所表现的机敏而受到他们热烈推荐的人，也未能逃脱这一判断的强大威力的震慑。他们这样搞与我们所得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描述并不直接相关，但正是在向人们显示摆脱这一恶名有多么艰难方面，它却与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描述发生着间接的关系。因此，我不想对它们视而不见，免得打乱了学术史的演进序列。伯恩施坦实际上与一直阻碍着政治自主观念的那种僵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划清了界线，并且实现了"与正统决定论的决裂"。然而，在他看来，"政治接合的因素"不可能被还原为基层运动，而考茨基则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唉呀！这种观点也无法为伯恩施坦开脱多少并使其从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的罪名中摆脱出来。除了为这个道德主体留出了空间之外，伯恩施坦接下来还将若干剩余的空间和真理性赋予了正统的因果关系。更糟糕的是，他还用自己的"本质主义前提"这一概念替换了正统派的"本质主义联系"这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的倾向就是进步的前提。"联合的倾向提供了新的"总体化语境，这个语境为每个事件赋予了一种优先的意义"。[②]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索雷尔就并不赞同对于进步所持的进化论信念，而是承认分裂和腐朽的可能性。他最初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为无产阶级这一新兴的社会行为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在接受了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之后，索雷尔逐渐用客观总体（objective totality）的观念替换了社会人群（social melange）这个观念，而且不再把阶级当作结构定位，而是当作通过意愿、行动以及与对手的公开辩论而建构起来的集团（blocs）。他还把总罢工当作构成性神话，同时把情感、捏造、暴力这些成分看作加强团结的要素，可以说在这些想法中，其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总之，索雷尔不仅像其他人一样为偶然性开辟了一个地盘，而且还试图"思考偶然性逻辑的特殊性"。那么，索雷尔应该合格了吧？他逃脱了那个无处不在的二元论罪名没有呢？他没有。那是因为其"用政治手段或虚构手段重构的主体"是一个阶级的主体。[③]

---

① HSS, pp. 27 - 29.

② HSS, pp. 29 - 36.

③ HSS, pp. 36 - 41.

考茨基、列宁、葛兰西

一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事情上来，我们便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起遇到了霸权这个问题本身，这在当初是一个极其犹豫的跨越阶级界限的冒险行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的问题也即俄国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革命发生前的杂多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的问题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也由于出现了与正统的阶段计划相异的情况，这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向无产阶级转移的问题。当时辩论的理论成果就是称作霸权的新型关系（无产阶级的行为者与资产阶级任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从孟什维克开始在范围上扩大开来，经过列宁，至考茨基而达到极点。然而，尽管发现并命名了这个关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想方设法地再次使它成为“看不见的”关系，其概念的再生产被限制在霸权理论的范围之内。现在我们了解到第二国际的这个“虚假的二元论”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那个特殊的俄国“叙事”在观念上继续从属于正统的叙事——就是在考茨基那里，永久革命的理论也要从属于阶段计划——是后一个叙事为“本质”提供了一种水准和秩序，而正是它提供的本质为前一个叙事赋予了意义。与霸权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仍然外在于霸权关系，而且不受它的影响。资产阶级的任务虽然在无产阶级的行为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然而资产阶级的任务在性质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个行为者的任务尽管有了新的拓展，然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依然被视为其结构地位，而且其阶级的身份认同一般也被认为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①] 事实上，后来证明，这一点的确对整个列宁主义造成了损害。老实讲，列宁主义传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使霸权关系成为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种关系的确是十分强调的，其手段就是将纯粹阶级对抗的对应关系加以复杂化。于是，列宁主义传统坚持只在阶级联盟内部，也即在一个跨越被限定的结构性区域的具有绝对政治性的联合体内部，发挥领导权的作用。但是这种关系依然被看作一种外在的关系，结果构成这一联盟的阶级认同依然没有得到修正。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形成，只是在那里体现出来罢了。因而政治根本谈不上“在构建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政治层面的效能”，而不过是一个“光秃秃的舞台”，上面的演员不过是从舞台以外的其他地

① HSS，pp. 48 –54.

方编造出来的罢了。①

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真正“激进地颠覆了”这一首长长的二元论史诗并远远地甩开了外在的阶级联盟这一观念的，只有葛兰西。借助于从政治到知识再到道德水准的宽广视角——也即意识形态领域的视角——葛兰西能够在打造历史集团方面加以思考，这个历史集团乃是“一种更高级的综合”，是一种拥有一整套跨越了不同阶级地位的共同思想和价值的“集体意志”。在这里，霸权联系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被“可视化和理论化”了，同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已被超越，历史规律的保证已被屏弃。严格地说，社会行为者不再是阶级，而是这样的“集体意志”。两位作者告诉我们，在葛兰西的分析中，“历史偶然性领域比先前的任何话语领域都更能透彻地解析社会关系：是一些本质的联系使各个阶段成其为分属于不同阶段范式的各自阶段，而社会阶段论没有抓住这些本质联系”；而“在经济主义的计划内部，在众多的团体之间”，又存在着“一系列阻碍着其结构定位的新型关系”。但是，葛兰西也许同样不能过关。因为葛兰西的概念“最终是不连贯的”，而且在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道路上也还没有走得太远，因而在本质上毕竟仍然属于“本质主义”。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答曰：“是其整体原则的单一性及其整体原则所包含的必然论的阶级性质。”也即在葛兰西看来，“在每一种霸权形式中总必须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只能是一个基本的阶级”。这也就再次重申了经济决定论。②

那么最后，阿尔都塞如何呢？他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说，靠其多元决定的概念，他已经潜在地通向了对一类具体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理解，事实上这是一个包含“多元意义”的象征性类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可以没有本质，因为确定社会最终的“精确性”或者说“意义”是不存在可能的。但可惜的是，“一个日益膨胀的锁合观念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新变种的确立”。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这个理论实际上与多元决定论无法兼容，因而应该对本质主义新变种的确立负责。这样，两位作者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所下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二元论”。③

① HSS, pp. 55 - 62, 65.

② HSS, pp. 65 - 9.

③ HSS, pp. 97 - 9.

故事的本质

这样看来，对拉克劳和莫菲给我们讲述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故事加以审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第一，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简单的学术游戏。称其为简单，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既明了又易学。你可以拿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任何一个都可以的，然后开始证明她或他如何根据复杂的历史现实与一种僵化的、极端决定论的经济主义发生了偏离。这将是不难证明的，因为哪怕是其中最具经济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承认其所列举的政治或/和其他非经济实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无论这个有效性有多么微乎其微。但是无论如何，她或他向那个方向游移的距离都检验了其理论洞见，都检验了其对于偶然性或非决定性的承认，也都检验了其在探索充分的霸权思想等方面所取得的相对成功。然后你就可以把“本质主义”硬栽到这个相关的思想家身上。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你只需抓住他们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范畴这个把柄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范畴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阶级或阶级利益，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以及它在这个著作者思想中的作用及其分量如何，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它明摆在那里就顶用。最后，抓住某一点，你就如法炮制地向二元论这个结论靠上去。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游戏的一些特征并不是如此直截了当，而是确乎颇为奇特。不过，要说玩这一套把戏，任何人都是能够学会的。你不妨拿过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来——比如马尔库塞或者伊萨克·多伊奇（Isaac Deutscher）——并心怀感激地借用拉克劳和莫菲分让给我们的这一模式对其试作分析。

第二个视角直接来源于第一个视角。抓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方面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对构成了她或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面加以纠缠也是如此。因而，此处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著作者发起的“本质主义”的责难不过是责难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如此而已。例如，向人们表明尽管卢森堡有自发性思想，尽管列宁强调政治联盟的重要性，甚至尽管葛兰西将自己囿于霸权理论之中，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展开了一种结构性的阶级观念。这不过告诉了那些感兴趣的人们早已熟知的东西，而并没有证明卢森堡、列宁或者葛兰西把这个概念当成了解释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东西；要是指控“本质主义”上了谁的当，作这样的表明也许是需要的，同时就他们而言也没有证明阶级已经在观念上膨胀为一切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创造性源头。恰恰相反，构成了拉克劳和莫菲

自己的观点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部分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范畴并不是作为解释一切的充分的范畴而使用的。那么，对于这些范畴的使用者而言，这些范畴并不是无所不指。但是它们确有所指，不独如此，他们所指的内容还极其重要。然而，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就称其为“本质主义”，那就等于在任何存在具有组织效力的解释性概念的地方、在存在任何类型的范畴优先性的地方恣意地吹毛求疵。这是向黑暗大踏步迈出的顽固一步。

遇到每一个可以想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遇到有关“本质”或“缝合”的各种措辞中的任何一个措辞，便要在文本中借助翻来复去的触发物再一次加以证实，相较而言，难道更需要进一步证实的不该是这种极端怀疑论吗？如果这样搞，那么他们所选定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肯定要操纵在拉克劳和莫菲的手里了。伯恩施坦甚至走到从根本上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然而，我们要留心，他相信进步，这就为他的其他信念赋予了一定的整体意义。那么，索雷尔如何呢？他既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放弃进步的信念，然而他仍然抱着阶级主体的观念不放。但是，为了两位作者论述的方便，这也几乎不再是一种结构性的阶级观念了。哎呀……这究竟还是阶级观念呀！我们知道，阶级这个词是可以用大写字母“C”开头的，而且还得写在定冠词的后面。如果拉克劳和莫菲不过是要说，阶级不重要，或者至少没有索雷尔以自己的方式认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那样重要，或者伯恩施坦所持的此类进步信念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他们自然完全有权利按照他们认为能够提供充分理由加以证明的那种情况，对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加以改造。然而，他们却不断地呵斥着“本质主义”，这就唤起了人们对于他们所犯的某种更加深重的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联系着概念的整体性，也可以说联系着他们对于自我的优先性。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对于“本质主义”的呵斥就连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骂街都不如。

第三，按照拉克劳和莫菲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史，我们更便于判断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开头所作的关于他们“已经试着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话语性的若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声明。[①] 过一会儿，我就回头讨论丰富性这个问题。至于多样性，当然是有一些的：列宁不是考茨基，考茨基和卢森堡与葛兰西也不一样，这一点已经在两位作者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的情况中反映了出来。但是人们有权追问，这个多样性是否最终证

① HSS，p. 4.

明是那种有些表面化的多样性呢？所有这些著作者都自始至终地处于完全相同的窘境之中，反复而徒然地做着努力，要去摆脱整体性和必然性，从而奔向多元性和偶然性。谁还能想像出比这更简单的故事呢？人们不仅仅有权去追问，而且在一定的知识语境中还必定要追问，这是否就不是一种还原——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包容性、全景性和连续性的还原呢？拉克劳和莫菲也许曾经有一回遇到过一种真正的"本质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一回他们却不高明也不情愿地遇到了他们自己的这一本质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揭发"正统派"的几个罪恶之一——也即将具体转化为抽象（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了"抽象"这一点）的还原论——时，必须依据"一种根本的现实，每一个具体存在的最终意义都必须而且都必然要借助于这个根本现实，不管复杂性的层次在仲裁体系中究竟如何"。[①] 要例证他们谈论的话题，难道没有一个比他们所详述的这个故事以及他们所玩的这个游戏，也即马克思主义，更合适的实例了吗？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想出这样的一个实例其实很难。拉克劳和莫菲用"本质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作为其意义，而在他们所责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像他们一样如此不留余地地用阶级解释人类生存状况的人，即使有，也少之又少。

在这里，糟糕的阿尔都塞搬起了石头，却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脚上。他花费了很大的心力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一些方面对他自身所属的那个传统，也就是对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和思想，没有表现出学术上的或者仅仅是人道上的足够尊重。他又把他们的特殊性和细节以及他们与困难作斗争的努力划归到一种简单的二分法的知识分类法名下，并进而将他们划分到错误的一边。这只能对受其影响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产生负面的影响，并在一个政治上处于不利状况的时代将这类轻率的耍小聪明的轻慢态度传染给当时和现在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如此之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果如此之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脱离了学术救赎的路线，那必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吗？他们即使不同意阿尔都塞的这一结论，也会从阿尔都塞那里继承若干对独享的确定性的热情。但是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对于其他人思想中的确定性认识却喜欢提出责难，他的追随者至今仍然乐此不疲。不同的只有一点，当年阿尔都塞只是努力要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识别出一个单一的反还原主义的事实，而在这个方面，他现在的追随者们则将与那个反还原主义的事实判然有别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识别了出来。

① HSS, p. 22.

贫乏的丰富性

第四点，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以考察拉克劳和莫菲是怎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贫乏的描述的。可是，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这个谜语的谜面。这两位作者既指控马克思主义为一元论，同时又指控马克思主义为二元论，对逻辑技巧丝毫也不予考虑。也许我们已经想见了其严厉的“不是……就是”的逻辑，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那个连词：既是一元论，又是二元论。其实，这个连词的力量比这要厉害得多。它不只是一个连词，还是一种必要条件。他们的观点的确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二元论，而且已经是二元论了。我们把这个话头稍稍敞开一点说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志向”上或者在“深层”中①——就让我们直接说在本质上好了——是一元论，而世界本身却并不是一元的，所以试图向世界让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只好运用他们所赞成的理论之外——的确如此——的范畴，于是就变成了二元论者。这再次描述了为马克思主义者安排的那种困境，关于这一二难困境的可笑模样，我们在前文中早已有幸领略过了。如果一个人运用了任何其他的概念，那么，不是这些概念“辩证地”联系着阶级、生产关系等概念，结果一元论仍然完整无损；就是这些概念并没有这样的联系，结果便“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② 不是考茨基就是拉布里奥拉。只是为了达成葛兰西式的断裂这一结果，普列汉诺夫式的经济僵化论便可能加以避免。③情况也许就是这样，既然所有更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倾向于选择后者（二元论），从而将一种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偶然性逻辑或象征性思想带进了他们的话语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哪里的还原主义者越正统，哪里的折衷主义者就越有创造性。甚至可以说，折衷主义者就是还原主义者，因为其折衷主义的中心仍然潜伏着还原主义：用应用于葛兰西的那个措辞来说，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内核”④，一种二元论中的一元论。在这一点上，似乎除了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以外，真的再也没有救赎的道路了。

---

① HSS, p. 4, 18.

② HSS, pp. 25 – 7.

③ 关于普列汉诺夫，参见 HSS, pp. 23 – 24.

④ HSS, p. 69.

但是，所有这些所产生的影响将如何严重地削弱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围和内容，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财富，无论如何还应该是清楚的：这个被削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不是拉克劳和莫菲拿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那个干巴巴的东西，而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所拿出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完全被改变了性质，全部的观点、主题、概念和理论都被搞得面目全非，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并不像有些人以前可能认为的那样，它们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化、拓展或者内部分歧的一个部分——确切地说，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丰富性的一个部分。正如它已渐为人知的情况一样，它们抛出的这些东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和还原主义内核是无法兼容的。如果丰富性仅仅笼统地指碰巧当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所写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也许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性”的丰富性。但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如此之多外在的、多少有些特别的补充，因而严格地说，它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象征着贫乏，而不是丰富，也象征着最终的危机、二元论和断裂。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藉此我们可以辨明其中的若干有限真实性。这就是，一旦拉克劳和莫菲不再利用霸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就完全不再与任何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相兼容。可是这个概念已经成为长长的反唯物主义史观系列中一个更有力的代表性观点。不仅如此，从对这个新唯心主义有利的视角来看，人们显然会回想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选择”，无论是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思想，还是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抑或多元决定的概念（被解释为“在象征领域被建构起来的概念”）①，其知识特征都与其个人当前的信仰有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拿取或摆脱业已完整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对真正的分途点加以定位。它是一种回读。尽管这种回读有可能满足一些残余的忠诚，或许也可以缓和一点对于现在已遭到极端鄙视的那个学术历史的内疚心理，但它不过是那些目的论的干预程序的一个样本罢了。阿尔都塞在其《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此作了有效的批判。② 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它是对当前理论因素的特权化。由于或者缺乏历史分寸感，或者缺乏温和的历史意识，自从为拉克劳和莫菲的出世而准备的那个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特权化一直导致了

① HSS, p. 97.

② See *For Marx*, pp. 55 - 63.

一种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在进步的看法。然而，借助一个当前时髦的思想阅读所有这些具有所谓丰富话语性的原理，看到这些原理没有达到对这一时髦思想的要求，便煞有介事地以代表着一个更加明澈未来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人物自居，然后就说这些原理与其作者的马克思主义不一致，这是一回事。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学术方式论证，这些原理在其自身以及没有被掺杂异物的形式方面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存在着断裂，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罗莎·卢森堡

我们现在就稍微详细一点地仅仅讨论一个个案，也就是卢森堡这个个案。诚然，卢森堡在其关于群众罢工的思考中提出了普及过程和统一过程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部分的冲突、有限的要求以及局部的利益将倾向于在斗争中日益扩大开来，并聚合为一个全球性的革命攻势。[①] 然而，这一普及倾向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背后还存在着一整套复杂的要素，卢森堡在其分析中所列出的这些要素既有因果关系方面的，也有经验方面的。其中的一部分至少有下面几种。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在政治上具有教育作用，因为有一些东西，人们只有从其亲身经历中才能学到。第二，当无产阶级在实际上“作为一个阶级被集合起来”的时候，这个阶级的集体分量才具有最大的政治效应。第三，蓬勃发展的斗争浪潮至今仍吸引着工人阶级中未参加工会组织的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那一部分，如果这部分人不卷入到斗争中来，革命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第四，就斗争的结果而言，此类斗争不会像许多工会官员所担心的那样威胁或者削弱现存的劳工运动的组织，相反，它们扩大和加强了这些组织。第五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整个冲突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交叉，齐头并进。

反过来说，第五点就其本身而言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是对一系列不同观点的总结。那么，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如何相互作用，又为什么相互作用呢？首先，出于经济方面的怨气而采取的示威行动或其他行动导致了与警察或军队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逮捕和死亡，结果也就引发了关于国家性质的疑问，并进一步引发了直接与政治相关的蓄意的行动。第二，在

① See my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LB/Verso, London 1976, pp. 111 - 31. especially pp. 20 - 121, 126 - 127.

关于经济问题的群众动员中，工人在实际上所获得并施行的关于集会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政治权利要比他们此前已经享有的政治权利更加广泛。第三，激烈的经济斗争的现实和氛围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和政治指导发挥其影响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形势。第四，工人从这些经济冲突中获得了斗争性或者说“斗争活力”，而这些斗争活力又被传授到政治斗争的领域。第五，从相反的方向来说，作为此前斗争的结果，工人从国家那里正式获得了政治权力和自由，这些政治权力和自由又可以用来加强工会组织，而且实际上已经用来加强工会组织了。第六，全国性的或其他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特别是那些成功的政治动员所带来的刺激效应又传播到较为局部的和较为零星的经济冲突之中。这是因为，刚刚为此类成功所鼓舞的工人会更不愿意容忍其社会状况中无法负担的那些特征，于是便“拿起了身边的武器”。第七，作为上一点的结果，普遍的政治斗争有时似乎显得分裂开来，分散成为较少的经济冲突。第八，无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生活状况会发生全方位的提高：工资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其知识和文化的“成长”提供了基础；资本家的专制受到了车间组织的消蚀；如果工人赢得的让步到头来又被收回，那么就引发了可能导致斗争再次发生的期待——所有这些效果都会源源不断地在政治斗争的不断推进中产生出来。

对于上面搜集的这些论点，不同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有些读者也许想就其各自的说服力作出区分。无论这些区分究竟如何，重要的一点是，卢森堡在这里做了一系列基于经验的判断，而且在这些判断中抽象出了大量的具有解释力的因果联系。一种事件会引发另一种事件，这个经济原因会产生那个政治效果，一定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成果会反过来对加强某一形式的经济组织产生推动作用，某一特殊的经历又会强化责任，或者加深理解。那么，拉克劳和莫菲又对所有这些作了什么样的解释呢？他们的解释是：“在革命形势中，每一次动员的意义，可以说，就像是分裂的：除了其具体的字面要求之外，每一次动员都在整体上代表了这个革命的过程；而且这些整体化效果以可见的方式呈现在另外的若干斗争的多元决定中。不过这无非是这一象征的界定性特征，即能指的溢出由所指来决定。因此，阶级这个统一体是一个象征的统一体。”[①] 这话说得实在利落。在一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一些东西既具有象征的力量，又具有象征因素的力量，对此，卢森堡无疑是理解的。卢森堡认为，在群众罢工以及这个观念所包含的诸多关于事实和因果的假设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化的力量。但是，拉克

① HSS, pp. 10 - 11.

劳和莫菲只是抓取了这一个概念并将诸多因素归结为一个其能指的溢出由所指来决定的概念，这对卢森堡自己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变形。这是按照他们也即这两位作者今天相信的东西，将象征加以夸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减弱了经济、政治和知识之间因果关系的那种复杂性，将其简单等同为意义间的相互影响，而这样的结论是她不可能相信其实也没有相信过的东西。如果这种操作使得拉克劳和莫菲可以说什么，在卢森堡看来，阶级这个整体也像“整体化机制”一样，是一个象征性整体的话，那么那仅仅是因为他们任凭自己在卢森堡那里“发现了”他们自己罢了。①

当然，卢森堡在学术上所作的展望，也有其可以称道的一面。但是这种展望仅仅成就了其受人诟病的二元论先驱的地位，因而不作也罢。她的“自发性逻辑”被人比作“象征的逻辑”、“任何可读意义的瓦解”等等，就是现在也与带有意义“固结”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格格不入。在拉克劳—莫菲式话语的一个特色话语之中，这两种逻辑据说构成了“双重空白”(由“两种肯定的不同的解释原则汇合”而来，结果被弄得“不可见了”，但又与“被填充起来”不是一回事)。② 然而，无论这个特殊论断的兴趣何在，它都是言不及义的：这个论断对于证明卢森堡关于大众罢工的真正思想（而不是象征的逻辑）如何在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法兼容，可以说毫不相干。而这一点正是拉克劳和莫菲需要证明而又未加证明的，他们怎样才能对此加以证明，也是不清楚的。卢森堡从工人普遍的结构状况或经济状况着手——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要论证，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起来，而且可以得到调解，比如许多组织可以在一个时段蓬勃发展的斗争中得以形成或得到加强；工人自己在政治上将受到教育，通过群体活动，他们作为工人所拥有的一般能力将得到提高，其武器也将得到改进。由此，卢森堡将一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赋予了政治实践和文化实践。但是，为什么不能认为她关于上述诸点的这些假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基本原理的一种补充呢？对此仍然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理由，一点也没有，除非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理论记录，但是马克思主义范式只是经济主义中一个“前定的”最狭隘的经济主义——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已经证明，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

① 阿尔都塞：“这一老是评头论足的方法无法不像它自身一样对任何整体性都不能做出丝毫的判断。难道就不能更坦率一些地承认它只能判断自己，只能认出隐藏于它所评论的事物背后的那个自己吗？”

② HSS，pp. 12 –3.

情况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论点无论如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己成分。一般说来，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同龄。①

游戏的伎俩

限于篇幅，无法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其他注解详细作答，但是发表一两句评论以便对上述内容作些补充，也还是可以的。他们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具有毫无差别的多元性和意义的多样性，因而与将任何种类的解释性或因果性优先权赋予一个客观经济结构的操作显然都不能兼容。同样，如果列宁主义对政治联盟极端重要性的强调被看作拉克劳和莫菲将来某一天打算用霸权这个概念指称的那个东西的先兆，那么这也同样与将任何种类的优先性赋予阶级的操作无法兼容。一方面是经济的最后决定论，另一方面是列宁的确将优先性赋予了阶级这一事实，都可以用来指代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尽管这个决定只是“最后的”决定，尽管列宁也强调政治联盟（还有组织及其他）的重要性。于是便说你在搞二元论。这样一来，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操纵概念，使这些概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代表那两个对立本质。但是，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既不是那个单一的万能的原因，也不仅仅是那个意义的多样性。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种类型的结构在因果关系具有不同分量等级的一组结构中具有第一重要性。

---

① 这里作一个“详细的”尾注。这两位作者写道：“最近，一些研究讨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的宿命论特征或非宿命特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过分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诸如机械性的崩溃和阶级的有意识干预之间的选择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将机械性地崩溃这一宣言是如此的荒谬，就我们所知，已经没有人支持它了。”由于他们从这“几个研究”中间实际引用的唯一的那个研究就是我的研究，所以允许我发表几句评论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所参考的那一节对原典旁征博引，论述清晰，根本没有留下误解的余地，它力图证明的正是罗莎·卢森堡支持……“资本主义将机械性地崩溃”这个宣言。但是，既然那样，她为什么还相信“阶级的有意识干预”是必要的呢？那是因为如若不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就会导致野蛮。当然，我的观点以及对卢森堡文本的解读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拉克劳和莫菲不是不辞辛苦地去证明那些观点是否是这样或者如何是这样，而只会抱定否定这些观点的态度去作声明，说什么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述不只是向当代花言巧语的让步，也不只是心理需要的结果……而是赋予了其整个理论结构和策略框架以意义的关节点”。HSS，pp. 42 - 3，注释8。

无论阿尔都塞的核心范畴存在着什么问题，都需要对这个概念——也即由不同层级构成的具有不同的因果重要性的概念——为什么是断裂的和二元论的概念这一点作出解释。为达此目的，就需要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用以讨论相对自由的这个逻辑。这个逻辑简直就等同于这样一个声明："不是一个是一切，就是一切是一个。"没有其他的逻辑会作这样的指令说，如果你同意列宁的观点，认为政治联盟（因而也包括政治）很重要，那么你就不能同时完全一致地认为阶级（因而也包括经济结构）在根本上更重要；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竟然那样认为，那么实际上你就把政治仅仅还原成了一个"光秃秃的舞台"，那么你还有什么呢?

总之，"是一元论因而也是二元论"这个不当的限制完全是无法合并的，无论你想从哪头开始都不行。在两位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当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不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这个明摆着的充分证据时，他们却根据这个限定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二元论也即断裂的结论。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对这个证据加以中立化。但是整个操作所依据的是一个不可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可以加以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元论和还原主义。有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元论的倾向，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则没有。相反，它们还尽力去避免这一倾向。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由这个前提出发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假如转换一个角度，从另一端着手，我们也可以达成一种自我的换位。如果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其前提必然也是错误的：以一种连贯的——或者说在这些层级或层面的本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连贯的特征——方式将若干解释的层级和层面整合起来的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的，有鉴于此，我们便可以断言，这些马克思主义不是二元论，因此也不是隐蔽的一元论。

就让我们仅仅关注几个稀奇古怪的细节，也即能够进一步证明理性约束意识在这里完全缺席的若干辅助的游戏伎俩，从而结束对拉克劳和莫菲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问题上的考察吧。此类伎俩中的一个伎俩可以叫做"推门柱（moving the goalposts)"。考茨基因其关于前革命时期的俄国社会国家的特殊角色方面的观点而受到责难，因为在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的"经济主义的"批评面前，考茨基"未能对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相对的国家自由作出理论分析，从而回答这个批评，而是站在反对理论灰色的立场上诉诸生活的绿色这个概念作了回答"。[①] 这个指控以及那些连篇累

① HSS, pp. 52 -3.

牍的引用，从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扯过来的几行文字，还有对考茨基的几个批评家之一所作的简短回答，都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甚至在构成了这个回答主要基础的那些摩肩接踵（cheek by jowl）的文字里面，还有相当一大摞关于俄国国家相对自由的颇为直率的表述——“相对自由就是为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限制的与统治阶级的独裁政治相脱离的那种独立性”——还有拿此事与西欧国家所作的对比。[①] 永久革命理论是有关此点的一个严肃意见的唯一基础，考茨基对这一理论的全面揭示包含于《结果和展望》以及1905年版本的开篇一章之中，这正是对促成了著名的俄国国家自由这一理论的那些因素所作的理论分析，其手段则是将俄国与欧洲的对等国家进行比较和对比。[②] 现在倒是不必去理会这些东西，干脆把它们扔到一边好了。这是因为，考茨基因为没有采取这个途径而受到了责难，而这个途径在这本书的其他版本中，也即在涉及他们批准的把相对自由当作“死胡同”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时作了描述；关于此点，考茨基是不可能知道了，而我们是知道的，那两位作者自己也肯定会知道的。诚然，这是后来在此书中才有的内容。但是无论在一个人所说的话语中出现得多么晚，死胡同就是死胡同。为什么要按照一个被定性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失误的标准对考茨基作出评估，至今尚不完全清楚，除非我们认为仅仅是随便挑一个任何能够顶用的旧毛病吧。

然后是一种以奇怪的方式对不同的“本质主义”加以任意裁定的伎俩——因而相当难以把握。这个伎俩体现在两个很短的对伯恩施坦、索雷尔和葛兰西的相对优点和缺陷加以评估的段落之中。对这些事情完全持天真态度的人或许会认为，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既然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决裂，应该拥有这一优点吧。但是拉克劳和莫菲毕竟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中第一个的“真正创新性”就是承认了“政治摆脱经济基础的自主性”；第二个（“第二国际中最深刻、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的力量就是看到了“社会真实本身是非决定性的”——对于这些理论成就，就连拉克劳和莫菲也觉得很难以任何直来直去的方式将它硬贴到葛兰西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① See “On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Russi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Leon Trotsky, in 1905, London 1972, pp. 333, 338, 343 -4. 读者们也许乐于查一查我这里使用“摩肩接踵”一语所表达的意思。

② See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1962, pp. 169 -77. and 1905, pp. 3 -11.

身上，而且这些理论成就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当前观点的核心成分。[1] 可是，每一个还能知道自己目前实际上在哪里的人就都会知道，葛兰西是非得赢这场游戏的这一局不可的：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远远胜过了另外两个，而是因为在一定的相关的左派环境中，他能提供一种他们不能提供的精神的和学术的正统性。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在两段中的第一段，伯恩施坦由于其“普遍的进步规律”思想而被打发掉了，而对葛兰西所患的“本质主义”这一毛病则暂时绝口不提，而只说他的优点。在第二段，也即像下一段一样仅隔一行之后，提到了葛兰西这方面的弱点，因而索雷尔便占了上风，因为他“比葛兰西更激进地与关于存在着一个根本历史形态的本质主义视界划清了界线”。[2] 伯恩施坦受到了冷落，可以说似乎已被忘记了。总之，索雷尔仅在一个方面有其优长，那是因为，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包含了一种民主的多元性，……而在这方面索雷尔的神话则完全注定要再创一个阶级的整体”。[3] 尽管从前文的整整五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也存在着贬损葛兰西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有意忽略的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一比较中，作者对“统一原则的单一性及其必然性的阶级特征”只字不提。发现了那个“非决定性的空间”，于是便在这个空间里或多或少地什么话都说，摆脱这样的情绪其实也难。然而，整个论证步骤所使用的逻辑也不恰当。葛兰西这个外衣对于这一对非马克思主义者（ex - Marxists）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即使在歌颂着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创新性”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后马克思主义者了。

话　语

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作的描述方面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虽然这个描述在体系上逐渐萎缩，然而它却为阿尔都塞价值的倒置扫清了障碍，而这一点正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希望实现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反对而不是支持对社会复杂性的必然把握，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被描绘成小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更容易在事实上被搞成一幅可怜的被画歪了面孔的漫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概览结束了，

① HSS, pp. 30, 41.

② HSS, p. 71.

③ 同上。

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同样的价值倒置所由发生的一个更深的源头——不是为那种解释性的漫画辩护，而是解释，或者只解释那个漫画背后的一种心理冲动——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之遭到屏弃的那种思想的组合。在黑夜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同样，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马克思主义似乎都是还原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其中处于最高层，说得更广泛一些，那个“象征”已经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发展得如此完善，其结果则是以某种方式（不管这个方式多么恰如其分）将适当的分量赋予了历史的客观物质基础，因此即使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决裂，这个决裂也一定看起来像经济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再次与其自身发生了冲突：为什么这个视角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视角，而不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只是某些相当陈旧和熟悉的东西的复制呢？答案是：它有一个更加时髦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话语”这个黑夜。

我已经描述了被拉克劳和莫菲辩护为唯心主义的那个理论视角。然而，资格还是蛮不错的。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个描述。在他们对于一些核心论点的表述中，确有一团纠缠不清的思想和语言，这表明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那些立场的简单结论也承认得很勉强。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羞答答的唯心主义。就让我们仔细瞧一瞧他们的两个关键论点吧。

论点一：“我们的分析不支持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它断言……在没有哪个客体是在话语出现的每个条件之外被给定的这一范围内，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一个话语客体。”论点二：“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毫无关系。发生地震或掉下一块砖头，就其发生在此时此地而言，都是一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实存在的事件。但是，它们作为客体的特殊性是按照‘自然的现象’还是按照‘天谴的表达’被建构起来，则取决于话语领域的建构。被否定的方面不是这样的客体存在于思想之外，而是这个相当不同的断言：它们可以将自己建构为外在于任何话语出现条件的客体。”①

关于论点一，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范围内”这句话是一个赘句，是戴着对其所附属的那个断言进行澄清和详述这一面具的一次重复；造成这一语言怪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相关断言的自身荒诞性，如不对其加以揭示，它自身就不具备真正的说明能力。每一个客体都被建构为话语客体意味着，所有客体的性质，或者说客体之为客体的那个东西，

① HSS, pp. 107, 108.

都是依靠话语给定的。这也就是说（不是吗?），不存在前话语的客体性和真实性，也不存在未经说出、未经写出或未经想到的客体。在论点二中，两位作者似乎又从那种荒诞中走了出来，一开始就说，而且还强调地说这不是他们所说的真正意思。地震的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话听起来不错，很表现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客观意识。但是这不过是在其毫不讲理的一大串东西中，在其实在可以理解的智力困窘的情绪表达中，随便可以找到的那种“翻云覆雨”的论辩风格的一部分罢了。严厉的否定之后，紧跟着的又是明确的警示符号：地震作为一个客体的“特殊性”并不立即与话语结构发生关系。紧接着又用一个套语将这个客体的“建构”说成自然现象和上帝的行为，用对等的术语换言之就是，是实际存在之物和一种迷信。除非我们假设拉克劳和莫菲想与他们的读者一起分享这样一个平庸的发现：看待地震，有不同的方法（或者通过与不同话语领域或象征领域的接合，我们可以赋予地震不同的意义），否则它就似乎再次证明，地震所属的这类客体是由话语决定的，因而它不只是一种观念，还是这个观念的实存形态。第②部分的结句则把整个“依违两可”的论点弥合得天衣无缝。于是两位作者再次从荒诞中走出来：被否定的方面不是这样的客体存在于思想之外，而是这个“相当不同”的断言。这个断言的确相当不同，但是它靠的主要是——其实也只是——巧妙的模糊伎俩。地震能够“将自己建构为一个外在于任何话语出现条件的客体”吗？这个表达里有“构建自己的地震”这样的说法，它有多么奇怪姑且勿论，且看这个问题唯一明确的答案：能够——例如，要是有人认为地震会不停地发生，那么人类不就完蛋了吗？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却说不。这一点正是他们作为其否定的真正内容而小心加以详述的。

在其文本的几行之后，所有的混乱便都得到了解决，我从上面的两段引文中所分析的那些意思方面的任何疑问也都一扫而光了。我们最后在这里还了解到，“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而建构的客观领域与由纯粹的思想表述构成的话语之间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划分”，已经在“几个当代思潮”之中被超越了。[1] 人们不必为了坚持这个区分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原则就去接受第二部分的那种意味深长的表达方式——因为没有哪个话语是纯粹想出来的——不管这两位作者是否仍然认为他们的话语很“时髦”。无论前话语的真实性和超理论的客观性有可能多么经常地受到否定，也无论这样的否定是以高深的论辩方式，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声明方式，它

① HSS, pp. 107, 108.

们都构成了一切理性探询不可替代的基础，也构成了在不同的观点之间以及跨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有意义交流的条件。这个基础一旦被拆除，人们便会滑入无底的相对论的黑暗之中，对立的话语或范式就会在这一黑暗中失去共同的参照点，徒劳无益地相互攻击。没有或多或少的精密的理论思辨的帮助，现存最基本的事实都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前人类世界不是一个“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而建构起来的客观领域”吗？或者说它非要等到人类出现了去“建构”它吗？就算是今天，尽管有了“几个当代思潮”，难道就没有自然的种种真实吗？这些真实既是外在的，又是人类的，它们并不仅仅是在任何话语之外被“外定的”（论点一），而是所有这些的物质前提。无论如何，谁要愿意抛弃，就抛弃它好了。正如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主义者”很久以前说过的：“一旦你抛弃了客观真实性……你就丧失了与信仰主义作斗争的一切武器。”①

拉克劳和莫菲用了略有差异的表述接着重复了上面提到的那个二分法论点。他们论述道：“背离这种话语与外话语二分法的主要后果就是放弃了思想与现实的对立。”关于所有这些都与是否存在一个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毫无关系”的断言（参见第二点），就讨论到这里，这是因为，一个真正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显然在思想与现实的对立之外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否则声称已经远离了这种对立，恰恰就是唯心主义最典型的形式之一。在目前这个被认为远离了这种对立的情况下，这个断言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决定当作自己的信仰加以信奉的那个信仰——也即整个世界都是话语的信仰——所产生的最为荒谬的结果打掩护。这些结果的尊容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这一点正是拉克劳和莫菲很痛心、也很害怕看到的。②

霸权接合

然而，既然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这个信仰所支持的那种社会和政治理论，

---

① Lenin 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 - Criticism’,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0 - 1970, Vol. 14, p. 344.

② HSS, p. 110. 同时参读同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主义者”所发表的富有个性的直率观点；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是“那种自称‘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过时的’对立面的愚蠢声明”。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Vol. 14, p. 341.

我们就不再考虑地震这个问题了。我们必须考察霸权接合这个观念，这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必须拿出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它是指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主体立场、社会部门、运动和斗争的话语实践，并以一定的普遍形式或整体形式加以整合的一个观念。我们可以首先列举一些基本的定义和命题。两位作者“将接合称为任何在因素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从而使这些因素的身份认同因这一接合的实践而得到改变的实践”。在这一语境中，也提出了两类实体的区别：一方面是“环节”（moments），其身份认同由其在“结构整体”——或话语——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而这个“结构整体”是“接合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素”（elements），它是独立于话语之外而建构起来的。[①] 过一会儿，我将回头讨论这一区别。就霸权这个概念来说，它“假定了一个由接合所支配的理论领域”。[②] 也就是说，它假定了一个因其差异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标志性特征而可以向接合实践敞开的领域，而这些特征既是接合实践的原材料，也为接合实践提供了可能。业已围绕某一核心本质被统一起来的领域，也就是说一个锁合的或者缝合的整体，则没有给这样的实践留出余地。因此，这里必不可少的“开放性”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品格，也即“社会非锁合的开放特征”。这个“社会的开放性是……每一个接合实践的前提”。[③]

讲“霸权主体”和“任何接合实践的主体”是可以接受的[④]，但是不能从构成性或基础性行为者的意义上讲这个主体。拉克劳和莫菲写道，“每当我们使用该文本中的‘主体’这一范畴时，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中的‘主体立场’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因此，主体不可能是社会关系的源泉——即使从主体被赋予了使一种经验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因为一切‘经验’都取决于精确的可能性的话语条件。”[⑤] 关于其他重要的范畴也大致可以作同样的论述。这样，“每一个社会认同”都是“各种各样的接合实践的交汇点”。[⑥] 而且任何“社会斗争”、任何“运动”的方向或意义都取决于“其在一定霸权语境中的接合形式”，或者

---

① HSS, p. 105.

② HSS, p. 93；参读 p. 134.

③ HSS, pp. 134, 142.

④ HSS, p. 135.

⑤ HSS, p. 115.

⑥ HSS, p. 138.

再一次说，取决于“与其他斗争和其他要求的霸权接合”。[①] 当然，我们并不只是关注一种没完没了的摸不着头脑的关键点，也就是那个平平常常的接合实践的多元性。霸权这个观念还有其他的内涵。“任何话语都是作为一种支配话语领域的企图，作为捕捉差异流的企图以及作为构建一个中心的企图而建构起来的。”作为此类企图结果的那些“特权的话语点”就叫做“关节点”；在任何“社会形式”中都可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霸权关节点”。[②]

霸权实践“运作于为各种对抗所交叉的政治领域”。的确，“霸权接合的两个条件是对抗力量及其将它们分开的那些边界的不稳定性的出现。构成了使我们可以把一个实践称为霸权实践的东西，只是大面积漂浮因素及其向相反阵营接合的可能性的出现——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对边界进行重新界定”。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两个阵营”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结果，而不是霸权接合发生的条件。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核心特征”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被分开的政治空间”，而是相当“繁多的……政治空间”。自从“文明时代之初，也即自从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在诸多永恒变化着的状况下发生的时代，就一直是这样一种情况了”。[③]

即使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些内容为基础，也已经有很多可以评论的了。例如，人们可能会再次注意到，一切事物——主体、经验、身份认同、斗争、运动——多么绝对地拥有话语的“可能性条件”，尽管关于话语的可能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曾烦劳两位作者作出哪怕是片刻的思考。这些条件以插入语的形式被轻轻带过，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于是便说，由于一切经验都取决于“精确的”话语条件，因此主体决不是一种社会的“源头”，“即使从主体被赋予了使一种经验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此中所运用的这一突如其来的逻辑，至少对于那些对错误观点的修辞学感兴趣的人来说，颇有可以仔细研究之处。它不过等于说：因为 d 是 e 的条件，人们就得否认 p 也是 e 的条件，即使 p

① HSS, pp. 86 - 7.

② HSS, pp. 112, 139；同时参读 p. 142.

③ HSS, pp. 140, 136 - 8.

也是e的条件。[1] 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也是两位作者向我们提供的颇在意料之中的那种方式，正是他们借助一个自身无条件、无限制、也无疑问的自以为是的社会本体对本不复杂的——自然的——地震加以高谈阔论时所使用的那种方式。至少从这些方面来看，话语这一概念与阿尔都塞概念中的宇宙这一从头到脚都以指令的方式被塞满了“实践”的概念没有什么两样。正如阿尔都塞的一个早期批评家正确指出的那样，“真碰巧，一切都是产物……那就是它的由来”。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恰恰出现了这样的“碰巧”事，不过这一回，“碰巧”的不是“产物”，而是话语罢了。[2]

在因素与环节之间

然而，我想把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两个问题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努力揭露拉克劳和莫菲所提出的理论中的学术空白。我将借用他们用以支持卢森堡的那个表达论证，在他们那本书的中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双重空白”：称其双重，是因为其理论实质是空洞的，其任何真正的实践标准的具体性，或者说方向，也是空洞的；当然我也会证明这个表达用在这里具有一种用于卢森堡的情况时所缺乏的力量。

我们对该空白的理论“侧面”的切入点是在因素与环节之间作出区分。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区分能对这个观念作出怎样的阐释。当考虑霸权接合的任何特定实践所联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主体立场、社会认同以及斗争等等方面时，我们涉及了何种类型的实体？这些实体共同组成的那个整体的性质又如何呢？如果这个整体仅仅被当作因素的结合体，那么通过所提供的辨析可以知道，这些因素的身份在独立于接合实践自身之外的情况下就被给定了。因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关系，也是纯粹偶然的关系。换过来说，如果这个整体被看作由环节组成的结构或整体，那么这些环节的身份或意义将由它们在这个被接合的整体之内的地位所决定，从

---

① 这里引述的这个论点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马不可能是马奔驰的源泉——即使从马被赋予了使其奔驰成为可能的力量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因为所有的‘奔驰’都取决于精确的可能的地理条件。”我批评过这种一概而论式的观点，这种观点以一种变戏法式的手段将“主体”及其力量的作用大打折扣并加以最小化。In Chapter IV of *Marx and Human Nature*: *Refutation of a legend*, Verso, London 1983 - - see, especially, pp. 106 - 8, 111 - 6.

② See Andre Glucksmann “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eds.), *Western Marxism - A critical Reader*, NLB/Verso, London 1977, p. 285.

而也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那么这类关系既是内在的关系，也是必然的关系。如果这样界定，这个选择就提出了一个拉克劳和莫菲心知肚明的难题：其实，两个选择中的哪一个选择也不中用。

这是因为，选择第一种就等于使自己背上“本质主义固定性”这个黑锅。[①] 这个罪名经常披着数以千计的不同外衣向人们发起突然的袭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不仅有一种“整体的本质主义”，还有一种“因素的本质主义”；就算用以此易彼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即使是一个“对任何用于社会关系的本质主义方法都加以否定的概念，也必须说明每个认同的不稳定性以及以任何不可更改的精确性对‘因素’的意思加以固定的不可能性”。[②] 务必记住，给马克思主义传统罗致的一条重罪就是，它虽然承认了阶级联盟的重要性，而在这方面又把这些阶级联盟仅仅当作具有确定身份认同的独立的行为者之间所发生的一种外在关系。但是，“阶级的认同为阶级自身所承担的霸权使命所改变；……‘阶级联盟’这个观念……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假定了社会行为者认同建构的是霸权，而不仅仅是前建构时期行为者之间‘利益’的理性一致”。[③] 我们已经看到，以此解释一切运动和斗争，也是同样适用的。至于“霸权使命”，则认为“其认同的获得仅仅是通过霸权形式之内的接合实现的”。这样看来，第一个选择是不中用了，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新的固定性形式，也即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去中心化的主体立场所形成的固定性形式”。[④] 第一个选择似乎有可能依靠其种种缺陷将我们引向第二个选择：霸权整体是由环节组成的结构或整体。

但是，第二个选择也一样不中用。它将是一种锁合形式，简直就是一种更加缝合的整体，同时霸权形式本身现在也已经被概念化为“其部分过程的建构整体”了。如果社会是一个整体这样的缝合思想被屏弃——附带地提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下列翻来覆去的简述所表达的意思：“‘社会’这个客体的不可能性”、“‘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社会’是不可能的”、“‘社会’的不可能性”[⑤] ——那么它是因为社会的普遍性而被屏弃的，由此又涉及到或大或小的每个社会整体。如果不推翻反“本质

① HSS, p. 177.

② HSS, pp. 116, 96.

③ HSS, p. 58.

④ HSS, pp. 86 -7.

⑤ HSS, pp. 99, 111, 114, 122 (and 130 and 136).

主义”这个被挖空的原则，锁合这个概念就无法重新获准进入哪怕是一个更加萎缩的社会空间，接合这个范畴将由此被置于解除的境地。“如果话语整体的关系逻辑和差异逻辑毫无限制地流行开来”，那么什么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面对着纯粹的必然关系，而且……假如每个‘因素’都是‘环节’的外定义（ex-definition），那么，任何接合都不可能发生”。作者还作了这样的表达：“如果接合是一种实践……它必须意味着为实践所接合或改组的那些因素以某种形式分开出现。”[①] 反过来，这第二个选择似乎又可以将我们重新引向第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已经到过那里了，是第一个选择领我们到这里的。如果有的话，我们想找个出口，逃离这个无休止地循环着的圆圈。

出口倒是有一个。第一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极为简明的典型。构成霸权形式的各种要素既不是因素，也不是环节，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按照拉克劳和莫菲的说法，“它们的地位在因素和环节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建构起来”。在某一点上，这个地带也被称作“无人区”（no - man's land）[②]，在这里，从“因素”到“环节”的过渡从来都不会完全得到实现。其实它是一片沼泽。一经对比，霸权整体的那种一致特征便与因素结合体和环节总体的特征判然分别开来，而这一特征是由“分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这一概念指定的。这一概念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使你想说什么便可以说什么。它将不多不少的足量的内在性赋予了那个被接合的形式。可以这么说吧，当你去诅咒一切固定性以及相互之间社会认同的外在性时，这个概念便可以在这方面为你所用；当你要断言社会认同的若干固定性和分离性时，这个概念又没有那么多会全面缝合那种形式并阻挠你去那样做的内在性，因而又可以在那个方面为你所用。“分散中的规则性”是为八面玲珑地同时应对一切之用而量身定做的一个概念。[③] 下面就其运作的方式举几个例子。

先拿“固定性”来说吧。这一直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所批判的一个关键目标，而且在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发起的责难中，他们对这一点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他们说，“固定性已经成为每一个社会认同发生的条件”。与“正统的本质主义”决裂必然要求“通过

---

① HSS，pp. 110，93.

② HSS，pp. 107，110 - 1；同时参读 pp. 106 - 7，113，134.

③ 关于“分散中的规则性”这一概念的已有解释及其出现的情况，参见 HSS，pp. 150 - 6，135，136，142。

声明每个认同不完全的、开放的以及政治上可以协商的品格这一途径向每一种类型的固定性发起批判”。[①] 但是，如果确实不存在固定性，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非决定性，那么那些好推论的社会理论家们就再也没有什么结论可以推断了。关于这个事实，拉克劳和莫菲只好以让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认可：“不能产生任何意义固定性的话语是精神病者的话语。”然而，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事业中所包含的那种好辩的因素及其建设性因素一旦展开，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有些意外：“绝对的固定性和绝对的非固定性都不可能存在。”这样说来，若干固定性的存在毕竟还是没问题的。[②] 其他相关的概念，情况亦然。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分散的社会行为者或斗争之间的外在关系一直受到严厉批判；他们也反复声明霸权接合的构成性的、赋予意义的权力与这些关系格格不入。这样一来，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些权力实际上并不是“依赖任何外在的力量毫无限制地”流行开来。绝对不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紧张”，也因为“全部的内在性和全部的外在性都不可能得到实现”。[③]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拉克劳和莫菲手中挥舞的一根双截棍，被他们怀疑玩弄了必然性逻辑的每一个著作者都难免要尝一点此棍的苦头。他们对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更为精通，于是向我们透露说：“必然性只是作为偶然性领域的部分限制而存在的”，还说这一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壁垒森严的、相互外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因为偶然性仅仅存在于必然性之中”。[④] 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东西无疑就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二元论”。正如他们多次告诉我们的，作为客体的社会最终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话语实践又通过其各自接合的那些业已建构的整体将矛头指向了这一不可能性。这一努力也没有完全归于徒劳，因为若干固定性就意味着若干锁合性，而若干锁合性显然又成为更加强调“开放性”的条件，这样说来，“如果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⑤]

此时提醒读者别忘了他们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那个严苛的选择，似乎是适宜的了。而在这里却无所不可。在某个地方论及霸权这个概念时，

---

① HSS, pp. 85, 104. Emphasis added.

② HSS, pp. 111 -2.

③ HSS, pp. 110 -1. 同时参见第 133、142 页。

④ HSS, pp. 111, 114 (和 142).

⑤ HSS, pp. 112, 129.

两位作者曾亲口说过，它是“一种永远无法与自己相等的关系”，在结束其书的华美措辞中，他们又说，它是一场“躲避这个概念”的“游戏”。从总体上来看，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它表达了一个关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深刻的真实，尽管也许是一个无意的真实。①

理论的空白

我们要提防一种可能产生的对于此事的误解：我们反过来坚持主张，任何霸权政治所接合的认同等等肯定不是因素就是环节，这不是一个想通过这种手段将拉克劳和莫菲肆意强加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死板的选择再强加到他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他们更愿意在其间有所折衷，那就请其自便好了。那么它们是修正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特征和意义在霸权政治计划自身之外独立地并部分地建构起来，同时也经由这个计划对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部分地建构起来。那也许还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毕竟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然而，我们所做的三种观察已经准备就绪了。第一，在术语运用上需要一定的一致性和精确性。作为因素与环节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因而你也不能直接地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根据方便的需要，一会儿讲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环节，一会儿又似乎是简单的独立的因素。但是，拉克劳和莫菲正是那样做的，而且不只在向我们介绍那个所有的自相矛盾都在其中得到重新协商的“无人地带”之前那样做，之后也那样做。这样，他们在最后一章想强调多元主义的优点而反对盛气凌人的马克思主义雄心时，便告诉我们说：“这个多元认同的每个术语都在其自身寻找其各自的有效性原则，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多元主义才是激进的”，而且还相应地谈到了“多元主义术语中每一个术语的自构性”——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自构性有一点固定，也有一点分离。紧接下来很快就发生的情况是，当需要再次突出霸权接合的权利时，他们又告诉我们说：“霸权实践是存在的，因为这一剧烈的非决定性”——尽管经过了重新协商，仍然毫发未损——“使得我们不可能将政治斗争看作一个敌对势力的认同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其中建构起来的游戏。……如果每个斗争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被给定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这场斗争溢出了其自身并……在结构上将其自身与其他斗争联系起来的范围内，它的意义才是——部分地——固定的”。真可谓黑白相踵，反手而更，而且每一种方

① HSS，pp. 86，193.

式都“只在那个范围内”。这个怪圈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那个地方。[①]

第二，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十足空洞性现在已经从其文字的外壳下面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把社会认同理解为外在于那个——霸权的——政治计划自身之外的、业已建构起来的认同，或者说“固定的”认同，为此它多次受到指责，并被要求让位于一个更加可信、更加霸权、更加激进的政治；结果我们却发现，这种政治作为一种接合实践，也在本质上为认同预设了一定的固定性和外在性，是“因素”在接合实践的状况中“分开出现的一种形式”。他们将会告诉我们，其差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性和外在性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但那不过又是一个怪圈罢了。固定性和“外在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罪状，已经遭到了否定，不能被当作那个被提出的话语理论的明显优点了。外在于任何霸权政治的“固结物”都被这个话语理论理解为话语的固结物，如果就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这个理论看起来就有些异样。这再一次将我们投向了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他们为此而告诉我们的那种情况多么缺少说服力。也许他们会说，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或“阶级主义的”等等）固结物是绝对的，而我们的仅仅是部分的和相对的。但是，如果这一区分不只是重复那个刚刚被否定的论点，那么它所依据的就是我们前面批评过的那幅马克思主义的漫画了：它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确很不看重的一种还原主义。

第三，位于因素和环节中间地带的整个霸权接合观念，其实到底说明了多少问题？我们从这个概念可以知道，存在着多元的、多种多样的主体立场，它们都在话语中被建构起来；其中一些主体立场能够成为霸权实践的源泉——虽然在这个方面，哪个主体立场在结构上也不处于“特权的”地位，此事取决于其政治的首创性；[②] 这些实践又反过来改变了其构成因素，因而也改变了主体立场，这些主体立场既接合着其他主体立场，也为其他主体立场所接合，其中的一些实践成功地建立了霸权关节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理解或解释具体的现象吗？例如，一些霸权实践比另一些霸权实践更有可能流行起来，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可能流行起来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其原因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条件下才更有可能流行呢？这仅仅是因为，或者说主要是因为那些竞争中的话语的内在“吸引力”吗？如果是，假如话语之间的相互裁定自身就是另一种

① HSS，pp. 167，170 - 1.

② HSS，p. 65.

话语，假如不再以话语自身以外的不可能存在的客观性为支点，那么判断那种吸引力的标准可能是什么呢？它与不同主体立场之中的物质源泉、或其他源泉、或者各不相同的政治能力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吗（这些联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依赖于现存的政治结构或其他结构吗？如果是，这一依赖性的性质和范围是什么呢？多少结果都总是存在着出现的可能，结果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任何特殊的结果和任何具体性；难道我们必须仅仅假定社会的开放性和非决定性在这里意味着接合实践和话语会发生这样的自由竞争吗？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把它归人对多元的具有若干关节点的大千世界的描述（或再描述）之中。很难理解，还有什么手段可以使我们比这更近地触及到这个完全的理论真空。

由对上面这类问题所作的可能的回答可以看出，拉克劳和莫菲几乎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我之所以说“几乎”没有东西，是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其中还有一种姿态和一些奇谈怪论与东西相关。前者由一个在一大串地方发表过的干巴巴的宣言构成：并非--切都有可能，话语实践的竞争和流动不是完全自由的（仅仅自由地摆脱了——当然啦！——“斗争或要求的任何先验的阶级特征”），而是存在着一些“限制”。[①] 然而，作为完全非确定性的一个限制，这仍然只是一种姿态，这是因为它没有得到详细的阐述，因而实际上没有为解释的具体性这个急迫要求提供任何东西，只是作出了这样的一些许诺罢了。至于那些奇谈怪论，则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每当两位作者想把历史内容稍稍多一点的东西放进他们自己的霸权观的空壳之中的时候，这些奇谈怪论便突如其来地涌发出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什么“高级资本主义”、“高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作为一种经验指涉的社会形态”（原文如此）；“资本主义的边界”、“帝国主义剥削”；“深入的积累体系”、“商品化”等等。[②] 是否有必要说这些概念属于另一种理论呢？既然在这里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客体，客观利益没有理论基础，经济主义，甚至经济主义的“内核”应该不惜代价地加以屏弃，那么把这些概念用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一点也同样不清楚。如此说来，这是野性“生存”的一种情况呢？还是每当现实闯入了这个游戏时，便需要为被“话语”放逐的那些东西寻找概念的一种情况呢？抑或正如《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言》所明确提示的那样，它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也许仍然

---

① HSS, pp. 86, 190.

② HSS, pp. 133, 137, 136, 66, 131, 160, 161.

拥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的那种情况呢?[1] 可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可怜的伯恩施坦都又一次被抛在脑后了。为了将某些东西加进那些范畴之中，伯恩施坦可是顶了二元论的罪名的。而现在，我们的两位作者却可以放手挪用该页上面可资利用的任何东西了。

无根的进步性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另一个问题，也即该书所包含的双重空白中的实践标准这个“侧面”问题。在整体问题中，我们要考察的正是，任何特定的政治方向或指向的基础究竟存在于哪里，并以此对这个问题加以定位。拉克劳和莫菲不时地运用一个类似于“进步”的术语，似乎要用它来贯串他们的立场，一如他们使用“左派”或者起码使用“新左派”这个方案一样。[2] 但是，在他们看来，“进步”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对于这个词语的意思，我们的认识都有些粗浅和轻率，但那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些业已被确立的话语——社会主义话语、自由主义话语、人文主义话语、理性主义话语等等——的部分内涵，在这个语境中，人们稍加思考或分析便能确认它的某种或多种具体意义。但是，如果你已经抛弃了支撑这些意义的那些假定自身，那么你就没有资格仅仅指望这些被你抛弃的话语，并对寄生在它们上面的那些意义加以推演。而两位作者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本书为所有象征性价值的体系及其波动所困扰，我们要求它对于其乐于继承的那些“单一指向的”标准术语的内容加以质询和反思，似乎并不为过。

公认的“进步”（或称左派）指向所应具备的三个可能的标准基础，皆不为拉克劳和莫菲所有。一个就是客观利益的观念，对这些利益的满足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表征。将此归因于社会行为者的做法已经被栽上“武断”的绰号，客观利益本身也已经被贬斥为“末世论”的观念。第二点“与具有末世论性质——也即‘对人类本质的末世论假定’——的任何普遍原则或实体有关”，因而又含蓄地推演到任何关于本质性的人类品质和人类需要的观念。正如可以预料的，在后结构主义领域，关于进步性意义的此类基础是不值一提的，于是便有声明说，“‘人’是一个在话语中被建构的主体立场”，其可能发生的接合所达到的范围是“无限的”。如果可以称为论点的话，那么支持这个被宣称的无限性的唯一论点就是，人类的一个

① HSS，p. 4.

② HSS，pp. 86，87，168，以及 pp. 5，169，174.

“本质”“大概是上天赐予的礼物”，然而，两位作者小心地避开了这个更为接近人类本质基础的可选性来源。① 第三，关于剥削或与之相似的一种概念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这个概念中，超历史的正义原则或公平原则或者是明确的，或者是预设的。诚然，拉克劳和莫菲表示支持对标准的分析以及关于其他方面“正义”问题的讨论。但是很显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对当前政治的考虑在他们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也即在他们与所谓“阶级主义”之间拉开一个很大的距离这样一种考虑。② “普遍话语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这个声明所采用的理论视角无法给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正义观留下任何空间，也无法给普遍人性观留下任何空间——总是付出某种最小限度的努力以保持学术的一致性。③ 那么，我们可以称为进步方向的那个方向的基础或者意义在哪里？说到底，无论何种方向，其作为一个具体方向的那个基础究竟又在哪里？

两位作者在给从属和压迫所下的定义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纯粹表面的基础。“通过从属关系这个概念，我们将会了解到，在这种关系中，一个行为者受制于另一个行为者的决定——例如，雇员之于雇主；或者在某些形式的家庭组织中，女人之于男人等等。与此相对照，我们将把那些将自己转变为对抗场所的从属关系称为压迫关系。”如此说来，如果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成为一种对抗关系，而且当这种关系成为对抗关系时，那么奴隶的从属就变成了一种压迫。当作为一个反对妇女从属关系运动的女权主义具有同样的“对抗”效应时，妇女的从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④ 尽管这些定义第一眼看起来似乎是常识性的，也是明摆着的，但事实上它们却全都毫无用处，只是加强了他们从附属于定义的那些例子中所博得的善辩的外表而已。因为人们会“受制于”各种各样的人们的“决定”，这是一个极

① HSS, pp. 152 - 3, 116 - 7 (and 181, 188). 关于此点，参见 *Marx and Human Nature*, pp. 96 - 7。

② HSS, pp. 28, 174 - 5。“阶级主义”是一个意在加入种族歧视主义和女性歧视主义从而形成一个恶毒的三位一体的特殊“主义”吗？如果是，人们应该注意其外延方面的不对称性。种族主义者声称他们的“种族”拥有优越性，女性歧视主义者声称或者在生活中实践男性支配的理念。在拉克劳和莫菲的用法中，“阶级主义者”不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权力和特权的人，与此相反，他们却是那些站在为统治阶级所剥削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统治阶级的人——从而显而易见地将“阶级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特权的主体”。

③ HSS, p. 3；同时参读第 184 页关于自然权利的论述。

④ HSS, pp. 153 - 4.

其平常的认识基础：例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之于其在车上的动作；邻居之于室外各种各样的景物以及你不得不看到的花园、小车；再如——这似乎应该是微不足道的情况——雇员，如果你掌握着他们，而他们又属于一个强大的工会；又如民主多数派，比方说吧，如果你是某个激进右翼少数派的成员，而这个少数派又不信仰民主。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观察与“对抗”这一观念放到一起来看，因为是“对抗”把从属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压迫。拉克劳和莫菲自己早先曾经论述过，至少曾做出过论述的样子来，认为“对抗”这个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定义，“逃避通过语言加以把握的可能性”。[1] 我将把他曾经这样论述过的事实放在一边，因为他的论述归根到底不过是说，当从属关系藉以构建的那个（或那些）话语受到其他话语的挑战时，当存在一个“从属的话语由此可以被解读的话语的‘外景’”时，从属关系就会变成对抗，进而又变成压迫。只有按照话语的形式，一个奴隶的地位才会变成一种对抗性的地位。人权的情况亦然，在那种情况下，从属可以被“建构为一种压迫”。[2] 人们也许能注意到，这完全将被称为压迫的东西相对化了。比如说，一个小孩被隔绝了所有的社会联系，挨打、受折磨、很困惑，而她与折磨她的那些人都没有任何“合法”的观念；以此而论，就不能说这个小孩受到了压迫。这里还有一个同样切中要害的关于被压迫者的例子：一个房主提倡这样一个话语：谁也无权把乱糟糟的花园让他周围的人们看见，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如此；再如坚信工会应该被定为非法的资本家等等。奴隶制、种族隔离、集中营都是压迫的例子（当它们是压迫时），类似的例子也是如此。

从这些定义中所得出的推论如此稀奇古怪，结果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不可能是拉克劳和莫菲的真实意思。对这一印象的可能的回答有两种。他们的意思应由他们自己来说，这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连同由此而来的若干直言不讳的、并不牵强的推演。第二个较为宽容的回答是：正是如此——这也许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但是，这样说来，他们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私权和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野蛮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无法接受的。[3] 其实，他们关于从属和压迫的定义及实例盗用了这些关于私权和不平等的假定而又并未明言。然而，两位作者又是凭什么标

① HSS，p. 125.

② HSS，p. 154.

③ HSS，p. 131.

准判断违禁、不公、野蛮或者不可接受呢？原来是在如此众多的纯粹对抗性的话语中对压迫的定义加以定位，于是随后又将这个定义抛开，使其化为乌有了。这样他们便将自己在这里所需要的那个客观的、普遍的或者仅仅是具有一般限定功能的标准剥夺殆尽了。因此，无论哪种方式，也无论哪种回答更受欢迎，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个标准的真空。如果我们拿他们的话当真，他们的从属和压迫概念又不能为进步提供任何有用的指标，因为从属这个概念的宽泛与压迫这个概念的晦涩的流动性结合了起来，将真正的人性压迫的丑恶真实与鸡毛蒜皮之类的烦心事，与提出特殊的要求甚至抵制剥削和特权这样的情况混在了一起。如果我们不拿他们的话当真，我们就只得回到其他的而非他们自己的那些理论的原则上去，也即已被他们毛手毛脚地抛弃的那些理论的原则上去。拉克劳和莫菲并不因为意识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问题而苦恼，有时讲起“整套从属关系的任意性品质已经‘明摆在那里’”时，也许还会很高兴呢。[1] 但是，能为这一判断赋予意义和具体内容的那种标准的基础正是他们已经发誓抛弃的。

任意性

因此，真正的任意性是由《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话语自身建立起来的，它简直就是无所不在的“非决定性”的另一副面孔。结果它便推出了一种能够支持任何政治的理论建构，这是不足为怪的。两位作者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谈论着激进民主。我不久就会回头讨论此点。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普遍“进步”的政治，而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进步加以剥夺的某种东西呢？为什么认为某某话语实践或霸权实践，而不是另一种话语实践或霸权实践，值得托付呢？这些都未经验证，用他们自己的理论范畴来说，就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拉克劳和莫菲话语的情况：它只是多种多样的不同话语中的一种选择——还是一种跨跃？拉克劳和莫菲对索雷尔思想的政治重要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段落，具有这个方面的表征。他们承认，索雷尔对于反经济主义以及“神话”的强调将他的一些追随者引向了民族主义，并进而引向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们又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方向。索雷尔对葛兰西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社会的非决定性概念是索雷尔的理论优势，对于这一理论的理解虽然也可能将一些人引向法西斯主义，但是也可以引向其他的方向，比如索雷尔自己热情欢迎的布尔什

① HSS, p. 158.

维克这个方向。这一方向的“非决定性”显然是以一种确信无疑的形式向我们提出来的。尤为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非决定性被视作能够使信奉一定思想的人所向披靡的保证呢？①

我将借助对任意性的另一种观察，对我在这里所力图阐明的双重空白这一问题作一个总结。拉克劳和莫菲运用某种阿尔都塞的（恶劣）伎俩，转而向其先辈发起进攻，我们不难预测，他们自己将如何为深受其论辩伎俩影响的某个人所超越。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伎俩无非就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套路：将任何一个（或多个）统一的解释性原则批评并贬斥为“本质主义”。一个人硬要推行或努力发现某种秩序，这是写作的本质所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即使这两位作者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平淡无奇的表达在某些地方晦涩得令人难以卒读，尽管他们喜欢粗制滥造、自相矛盾，尽管他们最终拿出的货色空洞无物。他们自始至终的一个观点无非就是差异，也即多元，正如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一个框架、一定程度的秩序和若干固定性，而且他们都得到了：一切都是话语，话语语境无所不在，还有那些由此而来的各种决定。然后又怎么样呢？“他们未能认识到，在这里，为了那个非缝合的社会空间而悍然冒险地投入偶然性逻辑的怀抱，这种折衷恰恰也是一个本质；在差异的背后，是话语：也即千差万别的具体之中那个还原的抽象；即使在其对开放性的声明中，也存在着一个新形式的一元论锁合”——等等。这个把戏易玩也易变。“话语（Discourse）”的首字母也可以大写成“D”。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由因素和类型构成的绝对的一团乱麻——是的，这就是话语。但是，接踵而来的恐怕又有无穷无尽的、无可名状的、五花八门的其他玩意。然而，人们也许希望这最后的解构性一步还是不来的好。无论以任何可能的理论形式，它在实际上都是政治术语，毫无意义的政治术语。拉克劳—莫菲式的非决定性虽然有一点缺乏那种“圆满”，然而它已经提供了一个无根的——任意的——选择，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多少都可以从中有所选择。

“民主想像”

接下来，尚需仅就拉克劳和莫菲自己赞不绝口的那种政治发表一点评论。这种政治是远离“阶级主义”的多元民主政治，不仅十分抢眼，而且

① HSS, p. 41.

还带着一点新出道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那些极其常见的特征。关于民主，我将只讨论两个要点，仅仅以另外一种方式引导读者了解艾伦·麦克森斯·伍德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主题处理所作的精彩批判。[①]我在为他们作序时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这一点不证自明，两点中的哪一点也不能表明与此发生了任何偏离。当然，关于此点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在这里重申这一不证自明性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尽管人们从拉克劳和莫菲的书中可能无法推断出这一点，然而近20年来，在他们两位现在已经如此卑鄙地告别了的那个广泛的（而且多元的）学术思潮中，它一直是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信念。而且，这一点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可以以前代马克思主义者和著名思想家的经验为基础，也同样可以以普通行动主义者的经验为基础。我们懂得并寻求加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原则和资源——很明显，这是两位作者已经忘记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形式和各种做派格格不入，它坚持讲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克思那里，从其最早的哲学著作到巴黎公社；在考茨基那里，从《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多元主义论点到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在卢森堡那里——到达了白热化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说无处不在；还有就是在列宁那里以及另外其他方面。不管是学术的黑暗，还是当代政治的黑暗，黑暗的笼罩决不是一个必要的借口。

总之，拉克劳和莫菲的文本充斥着大量的与第一点相关的这类措辞："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激进民主计划"、"一种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一种多元主义和民主的概念"、"一种激进和多元的民主"。[②] 假如他们也参考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的负面记录，以至于认为民主至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异物，那么人们也许会希望他们对其自创的"激进"民主的概念作出详述：其制度形式和程序、代表的结构和层次、构成形式等等方面的某些情况。其实，在这个标题之下只有一个简单的句子。"就其必须适应相关的社会空间而言，民主的形式因而也应该是多元的——直接的民主不可能是唯一的组织形式，因为这种民主只能适用于缩小的社会空间。"[③] 就只有这些内容。至于其他，制度方面的具体描述其实也是缺席的，这就为每一个右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满足了一个

① See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London , pp. 64 – 70.

② HSS, pp. 1, 3, 4, 166, 176 (and 152, 167, 189, 191) .

③ HSS, p. 185.

必须满足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在肯定地强调现存的民主与计划的民主之间形式和程序的连续性的同时，如果不用直来直去的效忠方式，就需要对于必然的不连续性保持一种批评性的沉默，从而增进对现在的政府所宣称的那种合法性的信任。

第二个要点是，尽管两位作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简单化，而他们自己对现代史所作的描述却简单得让人吃惊。这个描述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民主思想（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民主想像”）的扩大。① 民主思想产生于法国革命，最初引发了民权和政治平等的思想，然后被扩大到关于经济关系的斗争与要求上来——这就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因素”的原因②——再到后来又通过女权主义进入性别关系领域等等。无论堆案盈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材料是否需要担心这样一种历史解读，我都要甘冒抓住一点不放的罪名再次说，这个民主想像看起来的确非常像一种“本质主义”的本源或中心——而且还像那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the Idea）的渐次展开。③

至于“从阶级的退却”，则无疑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潜在魅力所在；无论这本书最终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反响，也都将归因于这个“退却”。它自许为当代的，也可以说是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的一种哲学，因此公开地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关切，无论这些关切是性别，还是种族、生态、核武，抑或是战争与和平。④ 即使上述批判还有些效力的话，可能也没有必要为等待它产生明显的结果而消磨时光：也即对于那些相当正确地将这些关切看作严肃问题的人来说，到别的地方寻求哲学宪章或理论基础才是明智的——不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优势、劣势及其理论潜力有着什么样的判断。为这些运动和斗争提供一种理论或者提供一种这些运动和斗争的理论，要有几分学术的严密性和实质性，它与仅仅依靠这些运动和斗争，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有气无力的姿势以换取支持的做法，是有区别的。站在马克思主义利益上，我们需要再次重申其关于这个问题的当代看法，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和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包括那些性别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以及经济的压迫。

① See, e. g. , HSS, pp. 159.

② HSS, p. 156.

③ HSS, pp. 152 - 66.

④ HSS, pp. 1 - 2, 87.

从那个意义上说，在那些最具远见卓识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身上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自豪并自觉地保持着这些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倾向性和世界眼光的话语。① 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方面的实际记录，都往往极为缺少那种宏大的志向，尽管这一志向甚至也可能沦为反动的谎言；马克思主义总是可以、而且至今仍然可以向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锁合的或最终的真理，而且懂得如何与一个政治的和学术的多元主义共处，那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执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性的激进话语都将很快走到它的限度，也即不断地为资本主义和阶级所重新设定的那些限度。如果此后它又转向一种轻率而时髦的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情况就更加糟糕。

对于今天的拉克劳和莫菲来说，是再也不可能认为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斗争有着一种特殊的或者说“特权的”联系了。诚然，他们也承认这里不存在不可兼容性。但是他们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无法从任何经济立场上推导出来：“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生产者的心理状态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而且在这个方面，其他的“民主对抗”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对抗“站一个相等的立足点上”；“政治实践构建了它所代表的利益”。② 如果这个论点仅仅是说，只是因为工人是工人，所以工人自然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两位作者本应该免去提出这个论点的麻烦。然而，他们的意见是，在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存在有力的联系，在社会主义与任何其他人之间也不存在有力的联系，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唯心论——也可以说非决定性，如果你更喜欢这样称呼的话。这种唯心论以话语的名义所表现的对于物质真实、关系和需要方面骑士般的蔑视可以通过考察同一个与“主体立场”相关的论点加以考量，而这一点是拉克劳和莫菲为了方便起见没有去做的。能令人信服地假定女权主义话语和斗争与一种社会行为者和任何其他的社会行为者都没有特定的联系吗？或者更精确地说，这些女权主义话语和斗争作为其基本的存在之源和力量之源不特别地关系着妇女并将她们卷入其中吗？这些难道不是由于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客观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吗？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物质结构和决定因素形成并限制了政治实践所“建构”的成果。不管社会主义是否是民主

① See my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pp. 42 - 3 - or *New Left Review* 150, pp. 17 - 6.

② HSS, pp. 84 - 85, 87, 120.

革命的内在因素，如果它在今日仍然可以憧憬，那么决定着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特定的剥削关系仍然必须加以废除；认为受这种社会关系支配的社会行为者决不可能成为废除这个剥削关系的事业中的中心力量，这样的想法只是一个十足的幻想。

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

我将把该书中公开自称为激进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所提出的一些令人惋惜的主题，也即那些使人有理由深思“后马克思主义”离直来直去的“反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远的主题，简单地登记下来，并以此结束全篇。第一，“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从通常的冷战意义上展开的，其意义则被理解为同时适用于“‘左派’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某种东西。第二，在涉及“极权主义”与左派的关系时，不是将其根源定位于本世纪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复杂（而且险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而是——更为简单地——如此这般地将其根源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也即定位于“建立一个决定性缝合的努力”之中，这个缝合是“社会由此可以完全把握和了解的分途点”。[①] 第三，列宁主义向独裁主义，也即斯大林主义结局的演变也照样地被记到了理论来源的账上。那种演变应该作何解释呢？“相当简单，通过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的本体论特权从社会基础被转移到了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权之中。”[②]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旧有的著名形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他们抛弃了这一点，只对看起来怪怪的、与普普通通的反共产主义相似的东西作了一点解释。第四，拉克劳和莫菲有时写起东西来，似乎民主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从而竟至于将整个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斯大林形式或者说独裁形式混为一谈。例如他们在某个地方写道：“有必要与这样一种观点决裂：民主的任务只与资本主义阶段相连结——只有到那时，阻碍着社会主义与民主永久接合的障碍才能被消除。”[③] 这个陈述在“民主的任务”这个表达中利用了一种批评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且不去理它。好像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总是不曾抛弃作者现在认为有必要与之决裂的那个观点和连结似的。不过这的的确确是在这些叛逆者身上新发现的又一大美德。

---

① HSS，pp. 187 – 8. Emphasis added.

② HSS，p. 56；同时参读 p. 59.

③ HSS，p. 58.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通过将这些偏见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对比，拉克劳和莫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我们表达了对自由主义最温和的看法。他们断言："应该受到质疑的不是自由主义本身，因为作为一种捍卫个人自由以实现他或她的人类能力的伦理原则，它在今天比以往更具有正当性。"我们就把这个"人类能力"的突然出现当作意料之中的事情加以接受吧。我甚至还将对此处所表达的情感正面地表示一点部分的赞同，因为如果不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其中一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就会存在一条彻底的鸿沟，而且它们之间也根本不会存在连续的共同价值。但是从整个语境来看，上述的称赞却是一个耻辱。自由主义不是实际上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受罪、肮脏和悲惨的一面，而是人类能力的实现。这是其中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说的。他不是还就个人的人类能力的实现说过一些话吗？

如果这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学派那里拿走的东西，那么人们只想知道，他们旅程中的下一站可能是什么呢？

作者：Norman Geras

文章原标题：Post－Marxism？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163，May/June 1987，p40－82

（编译者：付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　尚塔尔·莫菲　著　　周　凡　译

今天，我们何以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规划呢？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我们道出了其中一些缘由。作为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如果我们要实际承担起干预的职责而又不盲目胡来，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从我们所参与的斗争中、从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探寻新的线索。如此一来，重新锻炼“批判的武器”也就再度成为必要。如今，赖以设计社会主义方案的历史性的现实已远远不同于几十年前了，因此，除非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变化并坚持不懈地竭力从这些变化中引申出理论上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尽到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莱昂纳多（Leonardo）所提出的作为智识工作之准则的“毫不迁就的严格要求”也应该成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唯一准绳；理论研究应精密严谨，不允许给蓄意捍卫已过时的正统的种种高超手法留下任何空间。

既然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已经谈到了这些最重要的历史转变，所以我们在此毋需多论，仅限于点到为止。这些最重要的历史转变就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正是这种改变导致了后工业国家中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这种渗透的紊乱效应（与之并存的是从福利国家特有的种种官僚化形式中衍生出的结果）引发了各种新式的社会抗议；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并不符合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的群众动员形式；所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社会模式的危机以及人们对社会模式的怀疑——这包括人们对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新型统治方式的揭露。

尽管如此，仍勿庸失望。当今，对社会主义的任何重构必须起始于比50年前（更遑论1914年、1871年或1848年）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的、更加矛盾的经验；这一事实对想像力和政治创新恰恰是一个挑战。在此一事项上（指“社会主义的重构”——编译者注）的绝望与无能仅仅专属于这样一些人——用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的话来说，这些人长年生活

在虚无缥缈的乐境之中，后来又突然跌入了自己创设的虚无缥缈的苦境之中。相反，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一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

在我们看来，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迫使我们必须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带着对它们的完全新奇感来接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即是说，既不忽视这些变化也不歪曲这些变化，因为，对这些变化的忽视与歪曲，其实质无非是把这些变化与过时的图式兼容起来，从而使我们可以继续依存于那些重复老式套话的思想方式。第二步是，以我们对现在（现在的斗争、挑战和危险）的充分介入为开端来质疑过去：在过去的内部寻找现时状况的谱系；在过去的内部辨识我们自己的当前问题所在（一开始是边缘化和模糊的）；接下来，是确立与过去的对话——这种对话围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同一与断裂来组织。正是以这种方式，正是通过使过去成为暂时的、偶然的现实而不是绝对的起源，传统才被赋予了形态。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试图为这一工作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其实，当今，这一工作正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思想传统出发被人们推进着。在几乎所有的这些推进当中，我们从我们的评论者那里获得了富有价值的思想激励。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对抗理论，他指出了我们的社会对抗理论与拉康理论的各个方面都很切合。[①]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在与美国学者解决类似问题的若干尝试的比较中表明了我们的论证线路所具有的特别之处，他把我们的论证定位于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的一般框架之内。[②] 阿拉斯塔亚尔·戴维森（Alastair Davidson）描绘了我们的著作所具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氛围的典型特征。[③] 斯坦利·阿隆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从美国左翼学术传统的立场出发对我们作出了令人关注的善意批评。[④] 菲利普·德比肖（Philip Derbyshire）非常

---

① Slavoj Zizek，‘La société n’existe pas’，L’Ane，Paris，October - December 1985.

② Andrew Ross，in m/f 11/12，1986.

③ Alastair Davidson，in Thesis Eleven，No. 16，Melbourne，1987.

④ Stanley Aronowitz，‘Theory and Socialist Strategy’，Social Text，Winter 1986/87.

正确地强调了我们的文本在消解哲学上的本质主义与政治上的本质主义方面所占据的理论地位。[1] 戴维·福格奇（David Forgacs）就我们著作的政治意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对于他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在将来的著述中给予解答。[2]

然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诸多没落追随者的攻击。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复这些没落的追随者中的一位——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对我们的种种责难。[3] 之所以要作出这样选择，是因为：在此类文献中，杰拉斯以极不寻常的姿态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全面而认真地研读了我们的文本并提出了极为详细的反驳。不过，他的优点也就这么多。杰拉斯的文章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文章体裁：咒骂式的派性文章。对于我们的著作，他的观点毫不含糊：他说我们的著作“恣肆无度”、“放荡不羁”、“昏话连篇”，“对于逻辑、对于证据、对于适当的比例全然没有规范的考虑”；他说，我们的著作是“羞羞答答的唯心主义”和“学术真空”，是一种“蒙昧主义”，“完全缺少合理的限制”，“更无适当的分寸感和节制”；他指责我们的著作沉溺于“精心炮制的理论诡辩”，“玩弄概念”，“带着倾向去引证”。总之，他花了40页的篇幅（占1987年5—6月号的《新左派评论》总页码的三分之一）对如此一部毫无价值的著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且，尽管杰拉斯并不直接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写作此书的心理动机却了如指掌——“年龄与专业地位……的压力”，“至少在西方世界，与维护革命观念格格不入的……政治时势的压力”，“学术时尚的诱惑”，“所谓的现实主义、顺从或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如此等等。不过，他毕竟承认：如此这般的不良动机或许并不是“为了好处而刻意盘算”（谢谢你，杰拉斯）。当然，对杰拉斯运用这样的语言、运用如此大量的带有浓厚个人偏好的论战方式作何等的评价，还是交由读者去决定。至于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不准备加入到辱骂与反辱骂的游戏中；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宣布：我们不知道驱使杰拉斯写出这么一类漫骂式文章的心理动机何在；鉴于我们不是精神分析师，所以我们对这些心理动机也丝毫不感兴趣。但无论如何，杰拉斯还是对我们的著作做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substantive）批判，尽管他的这种批判并没有什么分量（substanial），而我们要论及的恰恰就是他这篇论战文章中的这些方面。我们将首先考察一下他对我们的理论

---

① Philip Derbyshire, in City Limits, 26 April 1985.

② David Forgacs, ‘Dethroning the Working Class?’, *Marxism Today*, May 1985.

③ Norman Geras, ‘Post -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63, May - June 1987.

方法的批评；然后，转入到他对我们的著作所探讨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就让我们从我们的理论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话语概念——开始吧。

话　语

在话语概念这个关键点上，杰拉斯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和混乱不堪，以至于完全不可能使用他的批判表述来作为我们的回答的基本构架。因此，我们将扼要地概述一下我们作为话语的社会空间概念，然后，拿这些陈述来与杰拉斯的批评相对证。

我们假设：我与另外一位砖匠正在垒一面墙。在某个时刻，我要一同垒墙的伙伴递块砖，继而把砖砌在墙上。第一个行为是语言的；第二个行为是语言外的（extralinguistic）。[①] 按照语言的与语言外的对立把这两个行为划分开来，我是否就穷尽了这两个行为的真实性呢？显然没有，因为，虽然从那种意义上把二者作了区分，但这两个行为还是共享着某个东西（正是这个东西使二者可以拿来相互比较），这个共享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垒墙这一整体活动的一部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来刻划要砖和以砖砌墙这一整体的特征呢，是以这二者呢，还是以部分的要素呢？显而易见，如果这一整体既包括语言的成分又包括语言外的成分，那么这一整体本身则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语言外的；此一整体必须先于这种区分。这种在其自身之内既包括语言成分又包括语言外成分的整体就是我们指称的话语（discourse）。稍后，我们将对这一命名进行说明。不过，一开始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把话语解释为说（speech）与写（writing）的结合，准确地说，说与写本身只不过是话语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

现在，让我转到话语这一术语本身上来，我们使用它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每一社会构形（configuration）都是有意义的。当我在街上踢一个球体，或者当我在足球赛中踢足球，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它们的物理事实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意义却不相同。只有当这个球体建立了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体系，并且这些关系不是由相关对象的纯粹物质性给定的，而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这一球体才是足球。这样一套关系体系就是我们指称的话语。按照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揭示，读者会明确无疑地领会到：一个对象的话语特性决不意味着质疑对象的客观存在。当

---

① 正如读者将会意识到的那样，这个例子部分地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

且仅当足球被融入到通过社会而建构起来的规则体系之中时，它才是足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由此足球就不再是一个物理对象。一块石头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关系而存在，但是，只有当它处于一个特定的话语构形之内，它才能成为特定的话语对象，比如，它或者是一个供投掷的对象，或者是一个审美对象。一颗钻石，不管它是深埋在矿底，还是在市场上被买卖，就它的物质构成而言，它是同一个物理对象；但是，当且仅当它处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时，它才是商品。出于同样的理由，正是话语构成社会行为者的主体身份，因此，社会行为者并不是话语的来源——正是使球体成为足球的同一规则体系使我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对象的存在不依赖于其话语接合，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纯粹的存在——即与任何意义都不相干的“纯有”——作为社会分析的出发点。这恰恰就是与我们的方法相对立的行为主义的分析方式。我们如何来描述垒墙行为呢，是从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活动都是被赋予了意义的内在环节）开始呢，还是使用如下的描述：X 发出一串声音；Y 递给 X 一个立方体的东西；X 把这个立方体的东西垒加到一堆同样的立方体东西之上；如此等等，究竟哪一种更好，还是由读者去决定。

然而，还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在意义与行为之间设置一种区分？即便我们承认一个行为的意义依赖于话语构形，难道行为本身是与行为的意义不同的某种东西吗？让我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从意义的角度看。这里，传统的做法是在语义学（处理词语的意义）、句法（处理词语规则和意义的因果关系）、语用学（处理词语在具体语境下的实际使用方式）之间作出区分。关键点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即在意义与使用之间）建立严格的分界？自维特根斯坦以来，这一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词语的意义完全要视语境而定，这一点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一如皮特金（Pitkin）所指出的：

> 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词语的意义与词语的使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使用促使了意义的确定。词语的意义是从使用词语的具体情景中获知，并且是在使用的具体情景中形成的；因此，不论是意义的获知还是意义的形成，它们都取决于语用……一个词语的语义学上的意义是由该词语使用的各种情形汇总而成，包括使用该词语的所有复杂多变的语言游戏；所以，

意义完全是语用的结果。①

一个词语的使用是一个行为过程——在此意义上，这一行为过程构成了语用学部分；另一方面，意义仅仅是在这个词语的实际使用的语境中生成的：在此意义上，其语义学完全取决于其语用学，即便二者要被区分开来，也仅仅限于在这种分析的意义上才可以区分。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术语学中，每一身份或话语对象都是在行为的语境中形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注视这个问题，每一非语言行为也都具有意义，因此，从非语言之中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在词语使用中所发现的语用学与语义学之间的那种错综交织状态。这又导致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语言成分与非语言成分的区分并不对等于“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区分，因为语言与非语言同属于“有意义”这一总体，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这一总体之内的亚区分。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我们假定社会与话语是完全等同的，而对于自然界、对于物理、生物或天文事实——这类事实与人类所构建的意义总体显然并不是浑然一体的——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它们之所以是话语事实，原因很简单：自然观念并不是现存地放在那里、可以从事物的外表察识的东西，它本身乃是慢长而复杂的历史建构与社会建构的结果。称某物为一个自然对象就是构想它、理解它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依赖于分类原则。然而，这并不是要质疑下述这一事实：我们称之为石头的这一实存，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上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不过，它作为石头而存在这一事实却依赖于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方式——这种分类方式是历史的也是偶然性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我们称之为石头的这些物体也会存在，但它们不会是“石头”，因为，没有人类，也就没有矿物学和语言学，而正是靠着矿物学和语言学，才把它们加以分类，并把它们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我们无需在这一点上耗费时间。当代认识论的全部发展已经证明：任何一个事实，它的意义都不可能一览无余地被我们完全看透。例如，波普尔对确证论（verification-ism）的批判表明：事实不能够确证一个理论，因为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可能通过后来的更为全面的理论、不可能以更好的方式去解释事实（因而，它的意义是确定的）。（这一致思理路已经远远超越了波普尔主义的局限，

① Hanna Fenichel Pitkin,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Berkeley, 1972, p. 84. 也参见：Stanley Cavell, Must We Mean We Say? New York 1969, p. 9.

我们愿意提一下库恩的范式和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代表的理论进展。）科学理论的这种情形也可以适用于将对象加以分类和组织的日常语言。

杰拉斯的四个命题

现在，我们可以致力于回应杰拉斯的指责了。杰拉斯对我们的指责是围绕以下四个基本命题而组织起来的：（1）话语（the discursive）与话语之外（the extra - discursive）的区分相当于如下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说、写和思的领域，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实在领域；（2）肯定一个对象的话语特性就意味着否认那个话语对象所指称的实体的存在；（3）否认有外在于语语的（extra - discursive）参照点的存在就等于坠入了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4）肯定每一对象的话语特性就会导致最典型的唯心主义。让我们来考察这些命题。

我们可以把他的前两个论断放在一起来讨论。杰拉斯写道：

> 每一对象被建构为话语对象，意味着所有对象之存在是话语所给予的，或者说，它们是其所是乃是由于话语。这等于说（不是吗?）：并不存在前话语的（pre - discursive）客观性或实在性；这等于说：对象如果不被说、不被写、不被思，它们就不存在。

如果要回答括号中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吗?），答案很简单："是的，不是。"一个读者，如果他从此文的开头一直读到这儿，他将不难理解到我们这样回答的原因。因为（回到前面举过的例子）石头这一物体是一个供投掷的对象，它是作为一锤子，抑或是审美沉思的对象，这取决于它与我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是取决于话语接合的特定方式；但是，石头这一实体的纯粹存在，它的纯粹物质的和实在的基质（substratum）却并不依赖于话语接合。这就是说，杰拉斯把对象的历史的、变化的存在与该对象的非历史的、非变化的存在完全混淆在一起了。迄今，在我们与世界的交换过程中，对象从来没有向我们呈现为纯粹存在的实体（mere existential entities)，它们总是在话语接合中向我们呈现它的存在。树木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制造品的部件，或者是森林沉思的对象，或者是阻挡我前进的障碍物；大山能够用来抵御敌人的攻击，或者作为旅游胜地，或者矿物开采的源地，等等。要是我不在那里，大山原本不会是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

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山不存在。正因为它存在，它才可能成为上述这些东西，然而，上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种必然来自于大山的纯粹存在。作为某一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决不会遇到一个处于纯粹存在状态的对象——如此的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确切地说，我们遇到的存在总是表现为在话语总体之内被接合的某种事物。杰拉斯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尽管我们的文本已清楚地断定：只要每一个非语言的行为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是话语性的，可是他却仍然把话语归结为说、写或思的问题。因此，杰拉斯的指责完全是荒谬的；这种指责陷入到以下这些错误中去了：它在论证中偷换话语概念，并且在对象的所是（the being of an object）与对象的所在（its existence）之间确立了一种武断的同一。由于存在这些歪曲，显然也就很容易把这些虚构的矛盾加之于我们的文本。

第三项指责——相对主义——也好不到那里去。首先，“相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础主义者（fundamentalist）的发明。就像理查德·罗蒂指出的：

> “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对某一论题或任何论题的看法与对另外论题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人持有这种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说，在众多的看法之间进行选择，其根据要比想像的更缺少规则……因此，真正的争论不是发生在那些认为所有观点实际上都一样的人与那些不这样认为的人之间，而是发生在这样两类人之间：一类人认为，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的洞察力，只有通过对话这一方式才能得到维护，而另一类人则寄希望于其他形式的维护。①

实际上，相对主义是一个假问题。一个“相对主义的”观点一定是这样的——它断定：认为“A 是 B”和认为“A 不是 B”乃是一回事；这就是说，这是关涉到对象之所是（the being of the objects）的讨论。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语境之外，对象没有所是（being），而只有存在（existence）。因此，“反相对主义者”的指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指控的前提条件是：如此的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着（there is a being of things as such），而相对主义者对这些事物，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就宣称它们不可

① R.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atism, Minneapolis, 1982, pp. 166 - 7.

接近。不过，正如我们所坚决主张的那样，只有在某种话语构形之内，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只有在“语言游戏”之内，事物才有所是（being）。当然，如果现在还要问：“成为投掷对象”是否是石头的真正所是，这种问法肯定是荒唐的（尽管这一问题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显然，答案一定是：这取决于我们使用石头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要问：在一切科学理论之外，原子结构是否是物质的“真正所是”（true being），这种问法也同样是荒唐的；因为，答案一定是：原子理论是我们借以对某些对象加以分类的一种方式，而这并不排除将来或许会出现不同的概念化形式。换言之，关于对象之所是的“真相”（即真实与否）乃是在理论的和话语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一切语境之外的真理观念是毫无意义的。

让我们通过确认话语的地位来结束对该问题的讨论。如果任何对象之所是（being）——不同于对象之所在（existence）——乃是在话语内构成的，那么就不可能按照对象之所是（being）而把话语与任何其他的实在（reality）领域区分开。因此，话语性（the discursive）并不是诸对象之中的一个对象（尽管具体的话语理当是对象），而是一种理论视域。因而，关于话语观念的某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问题只能针对话语视域之内的对象提出，而不能就话语视域本身提出。杰拉斯下面的话必定属于这一类：

> 例如，人们再次注意到，每一事物——主体、经验、身份、斗争、运动——何以必然具有话语的“可能性条件”，然而，关于话语本身的可能性条件可能是什么这一问题，却丝毫没有引起作者的关注，哪怕是稍稍的驻足思考也没有。①

提这样的问题是荒唐的。如果话语性（the discursive）与所有对象之所是（因而与每一对象之所是构成的范围）具有同样的范围，那么追问话语之为话语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就是没有意义的。这就相当于问唯物主义者物质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或者问神学家上帝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

观念论与唯物论

杰拉斯的第四项指责涉及到观念论问题，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加以探

---

① Geras, p. 69.

讨。当然，进行合理讨论的首要条件是：正在使用的术语的意义应该是清晰明了的。考虑到观念论与唯物论之间的对立不仅在极其广泛的不同语境中被使用，而且这些语境常常相互交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混乱，所以对观念论与唯物论之间对立的理论阐释就变得格外重要。大致说来，在试图论及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时，人们通常把观念论与唯物论对立起来。

（一）外在于思想的对象世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在杰拉斯的整个讨论中，这是他犯得最多的一个错误。因为，在这里，并不是观念论与唯物论之间的区分，而是观念论（idealism）与实在论（realism）之间的区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的哲学在“materialism”这一术语的任何可能的意义上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显然是实在论。柏拉图的哲学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对柏拉图而言，“相”（Ideas）存在于神圣之地，在这个神圣之地，人的心灵把“相”作为外在于它自身的某种东西来加以沉思。在此意义上，整个古代哲学都是实在论，因为它并不质疑外在于思想的世界之存在——它认为外在于思想的世界之存在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寻找“外部实在完全附属于思想”这一观念，我们须得进到现代历史，从诸如贝克莱之类的哲学中去获取。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非但没有否定外部世界的实在（reality），相反，它是对其实在性的明确肯定。一如查尔斯·泰勒所断言的：

> 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种绝对观念论却非常不同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这些唯心主义都倾向于否定外部实在或物质实在。在贝克莱哲学的极端形式里，借助于对心灵——当然是上帝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心灵——的完全依赖，我们达到了对物质的否定。黑格尔的观念论非但不否定外部物质实在，反而最强硬地肯定了它；它不仅存在，而且必然存在。①

因此，如果争论的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观点肯定是实在论的，不过这与唯物论并没有任何关系。

（二）真正把观念论与唯物论区别开来的是断言实在（real）具有最终的观念性质；比如，在黑格尔那里，他断定：凡是现实（real）的，都是合理的。在与唯物论而不是实在论相对立的意义上，观念论并不是要断言思

① Ch. Taylor, Hegel, Cambridge 1975, p. 109.

外无物，而是要断言对象最内在的性质是与精神相同一的——即是说，它最终乃是思想。（当然，这里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先验的上帝，而是客观思想。）虽然第二种意义上的观念论只是在黑格尔那里才获得内在一贯地充分发展的形式，但是，古代哲学家大多也是观念论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对象的终极实在等同于其形式（form）——即是说，等同于某种“共相”（universal），因而是观念性的某种东西。如果我说我前面的这一对象是长方形的、综色的，是一张桌子，是一个物体，等等，那么这每一种规定也都可以用之于其他的对象——因为这些规定是“共相”，即形式。可是，接纳所有这些规定性的实体性的“那种东西”又如何呢？显然，它是非理性的、不可知的，因为，要认识它，就必须把它纳入普遍范畴之中。这种最终的实体性剩余——它不能被归结为思想——被古代哲学家称之为质料（*matter*）。恰恰正是这种最终的剩余被黑格尔这样的内在一贯的观念论哲学家彻底根除掉了：这种观念论声称实在（real）最终合乎理性，因此它才成为绝对观念论。

因此，形式既是思想的组织原则，又是对象的终极实在。这一点已经被人指出来了：

> 作用遍及于认识论和本体论，因为，殊相之所是（the being of the particular）本身无外乎是一种详尽的规定，而这种详尽的规定乃是根据认识的要求而得出的……。思想、词和物之得以规定与可思维的形式有关，而可思维的形式本身又处在与实体概念（the concept of entity）相互规定的关系中。[1]

因此，观念论与唯物论的真正分野在于是肯定还是否定实在最终不可归结为概念，（例如，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它阐述了一种语言图像理论，即是说，在语言图像中，语言与物分享着相同的逻辑——就完全处于唯心主义领域之内。）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从这一观点来看，习惯上被叫作“唯物论”的那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实在论。黑格尔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以至于他在《大逻辑》中把唯物论描述为观念论的最初的和最粗糙的形式，因为它假定知识与实有（being，即“所是”）之间具有同一性（参见《大逻辑》第一部分第二章最后的“注释”）。斯泰斯（W. T. Stace）在评论这一段落时指出：

① H. Staten, Wittgenstein and Derrida, Oxford 1985, p. 6.

> 原子论断定此物（即原子）就是终极的实在。就算如此，但此物又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诸如“不可毁灭的”、“不可分割的”、“微小的”、“圆的”等等之类的诸共相的聚积。所有这些都是共相，或者说是思想。“原子”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因此，甚至从这种唯物论中观念论也展现了出来。①

马克思在什么地方与上述这一切相切合吗？答案不可能是明确的。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无疑仍然处在观念论的领域之内——这就是说，处在最终肯定实在的合理性这一范围之内。对辩证法的那种众所周知的颠倒只不过再生产了辩证法的结构。断言历史运动的最终规律不是由人类头脑中的观念改变所致，而是由每一历史阶段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致，这根本没有改变什么。因为，观念论者之所以是观念论者，并不在于肯定历史运动的规律是这种规律而不是那种规律，而在于这么一种信念：存在着一种可以从观念上加以把握的最终运动规律。断定实在对于概念的透明性（transparency of the real to the concept）（即是说，通过概念完全可以把握实在——编译者注）也就等于断定：实在是“形式”（the real is ‘form’）。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中最决定论的倾向也是最观念论的，因为它们不得不把分析和预测建立在不可改变的规律这一基础之上，而这一规律不可能在历史生活的表面直接轻易地被察知；这种分析方式必须以闭合的概念模型的内在逻辑为基础，并把这种模型转变成实在（the real）的观念性本质。

（三）然而，这并非就是全部真情。在我们必须更准确地加以界说的意义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种疏离观念论的明确运动。不过，在我们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一看对观念论的疏离一般都有哪些体系构造以及主要牵涉到什么。我们已经说过，观念论的实质是把实在（the real）还原为概念，也就是肯定实在的合理性，或者用古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肯定对象的实在性（reality）——对象的实在性不同于对象的存在（existence）——是形式（form）。这一观念论可能采取我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的体系构造——即把实在还原为静止的本质的一种等级体系；或者，人们也可能像黑格尔那样，把运动引入体系之中——当然，前提条件是：它仍然是概念的运动，并因而依然完全处在形式的王国之内。

① W. T. 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 New York 1955, pp. 73 - 4.

无论如何，这已清楚地表明，任何对观念论的疏离只不过是弱化形式的过分要求——形式被认为是穷尽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性（例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把这种僭越性要求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但是，这种弱化并不仅仅包括对外在于思想的事物的存在的肯定，因为这种“实在论”与我们上述第二种意义的观念论完全是相容的。就像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从解构的观点得出的有意义的结论是：感觉的对象，甚至在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实在论者”那里，除非它处在与超感觉的概念性形式的关系中，它本身是不可思维的。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而且，一般地对于哲学而言，至关重要的界线并不是在思想与事物之间划出，而是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在形式与无形式（或不确定性）之间划出。①

对象的不稳定性

因此，仅仅借助于外部对象的存在而否弃观念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1）肯定外部对象存在与肯定对象是形式、肯定对象仍处于观念论和最传统的形而上学之内，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兼容的；（2）如果我们躲在对象的纯粹“存在”之中、躲在超越一切述谓的“那种东西”之中，那么我们对于“那种东西”就不能有任何言说。但正是在这里，另一种可能性立即敞开了。我们已经知道，对象之所是（being）不同于对象之纯粹的存在（existence），并且，对象决不会呈现为纯粹的“存在”，而它总是在话语总体之内得到接合（或得到表述）。而此一情形足以表明：话语总体并不是完全自足的——总会有一个外界来篡改这个话语总体并阻止它完满地自我建构。对象的形式和本质都被根本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所渗透，这一点恰好是它们最根本的可能性，而这一点正好也就是疏离观念论的一个起始点。

让我们更为仔细地思考此一问题。维特根斯坦和索绪尔都与可称之为意义的指称理论（即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一个与对象处于一一对应关系的名称）发生了决裂。他们指出，“父亲”（姑且以之为例）这个词之所以具有它所表示的意义，只是因为“母亲”、“儿子”等等这些词也存在。因而，语言总体是一个差异体系，在这个差异体系中，各成分之间的认同纯粹是关系性

① Staten, op. cit., p. 7.

的。由此，每一指意单元都卷入了语言总体之中（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就是：某物之在场总是对不在场的他物的一种追溯）。当然，这种纯粹关系性的或差异性的特征并不是语言认同所独有的，而是适用于一切意义结构——也就是说，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结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物都是说或写这一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而是说，语言的关系性和差异性结构也是所有意义体系所共同具有的。因此，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差异性的，那么就足以得出如下结论：差异体系并不是封闭的，它受到外部话语结构的干预，因为任何认同（即事物之所是，而非事物之所在）都是不稳定的。正是这一点表明了赋予事物之所是（being）以固定本质乃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形式（它构成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石）的弱化成为可能。作为社会的成员，人类建构着意义世界，正是通过这种建构（总是一种不稳定的、未完成的建构），人类使事物是其所是。① 于是，就有了观念论与唯物论的对立的第三种意义——它既不涉及对象的外部存在问题，也无关乎形式与质料的僵硬对立。在这种对立中，质料被构想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individual existence）”。正是在

① 与反动家理论家所采用的方式相同，杰拉斯认为，他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事物之所是（the being of things）。因此，他说，把一场地震称之为上帝发怒的表现，这是一种“迷信”，而称之为“自然现象”则表达了“其所是”。当然，问题并不在于，称某些信条为“迷信”就是没有弄清它们在我们文化中的原本意义。而是说，把“迷信”与“事物之所是”完全对立起来就意味着：(1) 世界观不可能再改变了（即是说，关于“自然”的观念，我们的思维形式在未来也不可能被证明是矛盾的、不充分的、因而是“迷信的”）；(2) 与过去所有的人（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不同，我们今天已具有把握事物的直接的、透明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作为中介。因为有了这些保证，杰拉斯把自己视为是真理的管理员也就毫不奇怪了。据说，马拉梅（Mallarmé）在某些时候相信自己就是体现绝对精神的实在个体，而且他感到被绝对精神弄得不知所措。杰拉斯对自己作出了相同的假定，但他要比梅拉美自然得多。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杰拉斯天真的“确证论（verificationism）”如今在任何思想倾向的哲学家当中都找不到辩护者。例如，奎因（W. V. Quine）——他固守于英美分析哲学这一主流传统——写道：“我确实……相信自然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神，而且我认为，要不然的话，那就是一个科学上的错误。但是，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看，自然对象与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类存在物都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假定而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且，抽象存在物（它们是数学的实体）——基本等级以及等级的等级，如此下去——在同一种意义上也是另一种假定。从认识论的意义来说，这些抽象存在物与自然对象和神是完全相同的神话。除了它们在促进我们与感官经验打交道的快慢程度上存有差异而外，它们哪一个都既不更好也不更糟。”‘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or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New York 1963, pp. 44-45。

第三种意义上的对立中，构成了对象的终极实在性固定形式的领域（观念论）受到了形式领域之关系性、历史性和不稳定性（唯物论）的挑战。因此，对于后者来说，并不存在消除“实在（reality）”与“存在（existence）”之间的鸿沟的可能性。严格而论，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概念策略：或者把“观念论”和“唯物论”看作“本质主义”的两个不同变种；或者这样来考虑——由于所有的本质主义都是把实在附属于概念，因而一切本质主义都是观念论，而唯物论就是试图打破这种附属性的种种尝试。当然，这两种策略都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把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回归到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向唯物论方向运动的开端，但也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与激进的关联主义（radical relationalism）相关联的：观念并没有构成一个封闭而自生的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可是，马克思向关联主义的运动是微弱的，这一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界限（颠倒的黑格尔主义仍然是黑格尔主义）。让我们检视一下这两个要素：

（1）对观念植根于社会物质条件这一特征的理解，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从指意的总体来理解。“国家”或“观念”并不是自我建构的认同，而是索绪尔意义上的“差异”，它们唯一的认同是在与其他差异（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向“唯物论”的前进也就是去彰显：构成意义总体的社会差异领域比迄今所能设想的更为宽广，也更为深入；而且，社会的物质再生产是决定最崇高的政治及智识生活的意义的话语总体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克服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明显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国家、观念、生产关系等等都表现出十足的差异认同，那么它们每一个的呈现都将与其他一些事物的呈现相联系——就像“父亲”的呈现联系着“儿子”、“母亲”等等的呈现一样。在这一意义上，一种因素作用于另一种因素的因果关系理论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葛兰西的“历史集团”范畴蕴藏的敏锐洞见：历史运动不是通过历史运动的规律来说明的，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联系来说明的。

（2）然而，马克思的激进关联主义却被直接转换成了观念论的术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当然，这可以解读为意识与存在的重新融合。但是，没有比这一表述更不恰当的了，因为，如果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那么意识就不能是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2页。

存在的一部分。[①] 而且，当我们被告知，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时，这只能意味着有一种特殊的逻辑——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它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本质。换言之，历史发展可以从理性上加以把握，因此，历史发展是形式（form）。《〈政治经经济学批判〉序言》只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描述历史进程的结果也就不值得惊奇了；同样不值得惊奇的还有：阶级斗争完全从这一表述中消失了。所有这一切都与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前提及形而上学思想相一致。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节的观点。第一，观念论与实在论的对立不同于观念论与唯物论的对立。第二，传统的观念论与唯物论都是本质主义的变种（它们的共同根基是把实在还原为形式）。因此，黑格尔把唯物论看作是观念论的不完美的、粗糙的形式是有道理的。第三，对观念论的疏离不能以对象的存在为基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这种存在。第四，疏离观念论的运动要想获得进展，必须对形式进行系统的弱化，这种弱化就是要表明：对象之所是（the being of the objects）具有历史的、偶然性的和被建构的特性；就是要表明：这依赖于把对象之所是重新置于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相关条件的总体之中。第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观点：一方面，他表明，人的现实意义来自于比以前的设想更为宽广的社会关系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他构想了一种关系性逻辑，这种逻辑以明确的本质主义的或观念论的术语连接着各种不同的领域。

我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义由此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当马克思作为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以及他在19世纪的思想背景之下进行思考的时候，他只能获得他所能够获得的对于关系性要素的认识，而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这种关系性要素加以深化。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一时代，精神分析学已表明，无意行为使所有意义都不那么清晰确定；在这一时代，

① 杰拉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推理。参见我们文本中论述这一问题的那一段，在此，我们写道："与话语与话语之外这种二分法的决裂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抛弃思想与实在的对立"，杰拉斯相信，通过对我们的观点所做的下述评论，他正在做出一个漂亮的唯物主义的举动："一个完全、真正外在于思想的世界，除了思想与实在的对立之外，它显然没有任何意义。"而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正在宣称：思想并不是实在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是相信纯粹的唯心主义的心的概念（conception of mind）。另外，他还认为，拒不接受思想与实在这种二分法就等于断言一切都是思想，而我们的著作所要屏弃的正是这种二分法，因为，我们恰恰是想把思想与实在融合在一起。（对传统心的概念的解构可以在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找到。（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1979.）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的发展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到纯粹差异性认同的作用；在这一时代，思想的转型——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实用主义到维特根斯坦——从根本上削弱了哲学的本质主义，既然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能够以一种比马克思更为激进的方式来重新阐述唯物论的纲领。

非此即彼

至此，我们该来考察杰拉斯的一般方法论了。在杰拉斯看来，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理论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僵硬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把两个截然相反的、相互排斥的选择完全对立起来，而没有考虑避免这两种极端的折中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杰拉斯对他所假定的这一理论错误的讨论涉及到三个要点：我们对“相对自主”（relative autonomy）概念的分析；我们对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文本的探讨；我们对“客观”利益概念的批判。就像我们将要表明的那样，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之下，杰拉斯的批评无不建立在对我们观点的误解的基础上。

首先是“相对自主”。杰拉斯引用了我们书中的一段话，据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证明了：

> 要么，基础的决定作用解释了应该是相对自主的东西的性质及其局限，如此一来，它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具有自主性；要么，它丝毫不被它们所决定，因而它们不可能是什么基础的决定作用……在这里，拉克劳和莫菲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可以选择“相对自主”这样的概念。毫不奇怪，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粗糙的经济主义。①

与之相反，杰拉斯主张要消除这种“刻板的选择”。例如，假若他的脚踝被链子拴到结实的柱子上，他或许就不能参加政治会议或打网球了，不过，他还能阅读、还能歌唱。在总体的决定和部分的限制之间，还是存在着大范围的解决的可能性。现在，认识到链子这个例子与杰拉斯意欲证明的东西完全不相干一点也不困难，因为，这个例子无非是一个花招——通过这个花招，决定（determination）关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限制（limitation）关系。我们的著作并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是相对自

① Geras, op. cit., p. 49.

主的，我们只是断言，我们不可能从“最终由经济决定”这样的范畴开始来对“相对自主”加以概念化的探讨。杰拉斯的例子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决定关系的例子：拴在脚踝上的链子并不决定杰拉斯阅读或唱歌，它只是限制他可能的运动——并且，这一限制可能违背杰拉斯的意志。既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肯定了经济基础不只是限制上层建筑而且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同样的道理，手的活动决定着它在墙上的影子的移动。当马克思主义传统断定某种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时候，这种断定完全不是说：国家或意识形态被束缚到某种经济或阶级立场的链子上，或者说它们是某种经济或阶级立场的囚徒，而是说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着或展现着经济或阶级立场。列宁与杰拉斯不一样，因为他明白：如果决定关系表达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那么这种决定关系意味着什么。无疑，列宁的观点非常简单，然而，就是这种简单的观点也比杰拉斯的链子具有高得多的现实性，因为，杰拉斯似乎暗示：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被生产方式限制的囚徒——如果它不受限制的话，它原本可以自主地活动。

我们的著作所指证的观点并不是说国家的自主性是绝对的，也不是说经济对国家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作用，而是说“最终决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和“相对自主”（relative autonomy）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当我们处理逻辑问题时，选择只能是非此即彼这种类型。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说明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采取一种高姿态，即是说，我们将自己摆在最有利于杰拉斯的位置上：我们将不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为例，而是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为例——这种马克思主义避免了粗糙的经济主义，而且它在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引入了所有可以想像的复杂而高超的论辩。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将运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从“最终决定”概念开始来建构“相对自主”概念呢？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的尝试：

（1）一种尝试是这样的：它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中介系统。这样做就允许我们思考“相对自主”概念吗？绝对不能。“中介”是一个辩证范畴；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使辩证法得以建构起来的范畴，因此，它属于概念的内在运动。严格地说，通过中介而相互关联（并被建构起来）的两个实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自发展开的内在环节。我们可以尽我们之所需而扩展中介的范围：以此方式，我们想必能得出不那么简单化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见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在建构“相对自主”概

念上有丝毫的进展。这是因为，自主（不管相对与否）总是意味着“自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但是，如果据称的自主实体的认同是通过它在总体中的位置而建构起来的，并且这一总体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那么该实体就不可能是自主的。例如，根据卢卡奇的观点，事实只有在它作为总体的环节或规定性时，才能获得它自身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总体——它在中介方面就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丰富——之内，认同的意义得以确立起来。在此情形下，自主关系所需要的外在性因而处于缺失状态。

（2）因此，让我们抛弃使用中介概念的这一尝试，去检视一下捍卫这两个概念逻辑相容性的第二条线路。我们是否可以宣称：上层建筑这一实体有足够的自主力量——即是说，在没有中介系统来将它与经济基础相联结的情况之下，它本身就具有自主性——而且，经济的最终决定可以归结为：后者总是设置自主性的界限［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杰拉斯的头发长得像桑松（Samson，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编译者注）的头发一样，以致于他能够把链子扯断］？我们能以这种新的解决方式获得什么进展吗？不能；实际上，我们与第一种尝试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况。某物之内在本质是构成它的认同的全部必然特征。因此，如果自主性的界线由经济来设置乃是一条先验的真理，那么此一限制并不外在于这个实体，而是该实体之本质的一部分。这一自主性实体是“最终决定”赖以在其中起作用的同一总体的内在环节，因而，在此一总体内并不存在着自主性。（实际上，所有这些推论都是不必要的。断言社会整体的可理解性来自于最终决定，同时又断言：对于那一总体而言，存在着一个可以逃避最终决定的内在实体，这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

自主与决定

相反，如果我们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概念，将会发生什么呢？这既不会导致自主是绝对的这一结论，也不会由此推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对于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活动不施加基本的结构性限制。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概念只会产生如下的结果：其一，不能根据“决定”这一范畴来思考不同领域之间的限制与相互作用；其二，并不存在着社会在其基础上得以重构为合理的、可理解的结构的什么“最终事态”，相反，每一领域的相对效验依赖于完全贯穿于社会之中的各种对抗力量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在某一时期会对收入分配和消费商品的机会施加限制；但反过来，诸如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的因

素或工会组织的程度也会对利润率产生有限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政治与经济发生危机的关头尤其能够取得。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参考了近期的大量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即：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过渡，完全不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逻辑的简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工人阶级斗争作用的产物。这就是说，经济空间本身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而且，“阵地战”不是在经济空间之外构成的关于运动规律的上层建筑的结果。确切地说，如此的规律贯穿于习惯上被称为“基础”或“下层结构”的一切领域之中。如果“决定”是“最终的”，那么它必定与“自主”不相容，因为“最终决定”是一种全能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绝对自主的实体必定是这样一种实体——它不与外在于它的一切事物建立对抗性关系，因为，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对抗而言，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部分功效是其先决条件。因此，为对立双方所共有的自主将总是一种相对的自主。

在杰拉斯所引证的同一段落中，我们如此清楚地写道：

> 如果……我们抛弃社会最终闭合的假定，那么就必须从政治与社会空间的多元性开始——这种多元性与任何最终的单一基础毫无关系。多元性并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是分析的起点。但是，如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空间的认同总是不稳定的，那么就不可能简单地断定自主与分散之间的等同。因此，完全自主与完全从属都不是合理的解决。[1]

因此，说我们在完全自主与绝对从属之间进行刻板的选择，这只不过是杰拉斯的发明。相反，我们的整个分析试图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例如，可参见我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对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的同等批判，或者参见我们对代理概念的讨论）。可是，要克服这种选择，就必须构建出超越这两个术语的新领域，而这意味着与社会的“最终事态”这样的形而上学范畴彻底决裂。显然，杰拉斯也试图克服这种选择，但是，他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的克服仅仅是通过一个骗人的戏法完成的：他一边从理论上肯定“最终决定”，一边又在他所给出的具体例子（一个链子）中将“最终决定”消除了。因此，他对这种选择的克服是处心积虑的，而他的话语却陷入了永久的自相矛盾之中。

---

① E. Laclau, Ch.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London 1985, p. 140.

杰拉斯对我们的“非此即彼”的还原论的另外两个例证，在此只简略地谈一下，因为，它们重复了同样的论辩策略，因此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首先是罗莎·卢森堡的例子。杰拉斯引用了我们书中的一个片段，在他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断定马克思主义基于一个著名的抉择：“要么是资本主义通过其必然规律走向无产阶级化和危机；要不然就是这些必然规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产生作用，在此一情形下……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而是变成了永久的现实。”对此，杰拉斯评论道：“这是另外一个僵硬的对立。要么纯粹的经济必然性承担着统一工人阶级的全部重任，要么我们只好分裂破碎。”[①] 不过，这一次，杰拉斯在引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微小”的细节；他的错误引证是如此地昭彰，以至于他使我们（这一次确实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学术上，他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不诚实。这一细节是：我们的文本提出的这一抉择并不针对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归谬法针对极端还原论的和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说的。杰拉斯的引文来自于这个段落：在指出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中存在着双重历史逻辑——结构的决定论逻辑和自发性逻辑——之后，我们开始在这个段落进行所谓的“边界实验”。即是说，我们试图去看一看，如果把决定论的活动领域或自发性的活动领域作一假想的扩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逻辑结论。由此，我们指出，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变成完全的决定论话语（即是说，只有它处于我们实验的假设的情形）的时候，杰拉斯所提及的刻板的选择才会出现。与杰拉斯的指责正好相反，我们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描述为逃避这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逻辑的持续努力。正是根据这些描述，我们才涉及到了“霸权”概念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及其活动领域。实际上，我们实验的第二步——把边界朝着扩展自发性逻辑的方向移动——就是为了引出我们书中所提出的政治选择，它完全不同于那些可能仍处于决定论模式之中的政治选择。

除了错误引证之外，看一看杰拉斯自己如何试图逃避“非此即彼”的选择，也是颇令人感兴趣的一件事。就像相对自主的情形一样，他的解决方式是新闻工作者的印象主义与理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混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杰拉斯使用了侮辱性的、挑衅性的语调，可是，一旦要描述他自己的政治与理论建议的时候，他却满腹疑虑地表现出自卫态势并且变得温和起来。）他问道：

---

① Geras, p. 50.

> “为什么我们不想一想，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工人）尽管具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结构性地位，都受到剥削，而且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如缺乏自主权、缺乏工作兴趣，更不用说他们十足的愁苦与辛劳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某些普遍性的经济趋势，造成他们工作普遍不稳定的某些趋势；所有这一切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客观的基础（不多，但同样也不少）。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去想呢?”①

是啊，为什么我们真的不这样呢？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发生了，当然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情况，被杰拉斯忽略掉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在第三世界和后工业都市的破旧内城中大量人口正日益边缘化，反对环境污染的生态斗争，反对不同形式的性别及种族歧视的斗争，等等。如果这是一个列举的问题——即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种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它们构成了许多对抗和竞争性集体认同的基础）罗列出来，那么这一列举也必须是完全的。但是相反，如果这是一个用关于反资本主义的行为者必然的阶级属性的理论来解答这种分散破碎状况的问题，那么仅仅停留于这种描述性的列举是达不到目的的。杰拉斯的“阶级主义”选择是通过在某一点上中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所造成集体对抗的列举而形成的。这一做法的愚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杰拉斯要把“阶级主义”建立在“历史的必然规律”的决定论之外的某种东西上，那么他必须提出一种目前在他的文章中还没有任何出现迹象的理论选择。

最后，关于“客观利益”问题。我们的著作并不是要批判“利益”观念，而是批判据说它所具有客观特性，即是说，我们批判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行为者所拥有的利益是在他们的意识之外的。建构一种“利益”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它要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和制度的实践才能产生出来。只有社会行为者参与到集体性的整体中以至于他们能够预测并能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协商，他们的认同才被建构起来。而且，“利益”是社会的产物，它并不独立于社会行为者（即利益的承担者）的意识而存在。与之相反，“客观利益”观念假定，社会行为者根本不在利益的建构过程之中，他们仅仅把自已的利益辨认出来就行了，也就是说，那些

① Ibid.，p. 50.

利益天然地存在着，好像来自上天的礼物一样。如何可能使这种见识与非本质主义的社会观念相一致，这只有上帝和杰拉斯知道。在关于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像杰拉斯所说的再度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承认，存在着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不稳定的历史的产物，它们总是处在不断消解与重新确立的变化过程中。然而，在以“虚假意识”的探讨方式来设定利益的意义上，存在的并不是客观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转入到杰拉斯对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分析所提出的责难中。我们之所以给予“话语”范畴以中心地位，是因为我们试图强调对象之所是（the being of the objects）的纯粹历史的和偶然的特性。这并不是一个随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轻易作出的偶然发现；相反，它深深植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中。在一个技术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是通过基本上重复的实践来进行的社会里，“语言游戏”或组织社会生活的话语秩序是极其稳定的。这一状况导致了这样一个幻觉：作为纯粹社会建构物的对象之所是属于物本身（things themselves）。把世界理解为通过一整套稳定的本质性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这一观念，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预设。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本幻觉恰恰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所是（being）的历史性。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快节奏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建构对象之实在的话语秩序——所是的纯粹历史性才变得清晰可见。在此意义上，整个当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实在化的一种尝试，就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系列脱离。在英美思想中，我们可以论及实用主义的转向和开始于晚期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后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批判；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则可以论及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激进化以及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理论的批判。规范认识论的危机以及对科学范式转换的非规则性的日益深入的认识都指向了同一方向。

我们的著作力图证明的是：当代思想的这种演变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同样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不断努力地去适应当代思想领域的这一现实状况，并渐渐地使自己疏离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的这一理论与政治成果给出了一个本身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努力有助于使这一思想传统重新焕发活力。在此我们遭到的反对特别值得讨论。杰拉斯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他的文章

里，我们惊诧地获悉：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杰拉斯那里，这清楚无误地表示背叛这一涵义。关于“背叛”与“抛弃”的这种荒谬说法，我们会怎么想呢？难道人们在理解哲学史时非要宣称亚里士多德背叛了柏拉图？非要宣称康德背叛了莱布尼茨？非要宣称马克思背叛了黑格尔？显然，我们会这样想：对于以这种方式重构历史的人来说，被背叛的教义就是崇拜的对象。如果我们论及的是宗教对象，那么任何异议、任何企图改变或促使这一理论演变的尝试都会被视为是叛教。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拥护者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科学似乎与常人所思、所行隔着一条绝对的深渊——这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别是完全一致的。当科学哲学正倾向于缩小科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认识论差距之际，可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却仍然牢牢地固定在陈旧的科学观念之上：这种科学观念更适合于实证主义时代的流行手册。

但是，这一论证线路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此一视域之内，马克思的著作变成了起源——即是说，在它自身之内包含了未来发展的全部萌芽。因此，任何超越它的尝试必定被概念化为“抛弃”。对于下述说法，我们非常熟悉：伯恩施坦背叛了马克思；欧洲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苏联官僚体制背叛了革命；西欧共产党背叛了他们的革命使命。如此一来，“革命”和“科学”的仅有的托管者就只属于虚假国际中的一小撮人：之所以说它是虚假国际，是由于属于这一“国际”的人都患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微小差异自恋”症，因而这个“国际”处于永久的分裂状态。所以，拥有真理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著作概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则完全不同，它建立在以下这些要点之上：（1）经典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将它的政治策略建立在工人阶级不断提高的中心地位这一基础之上，而这无外乎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结构加以简单化的结果。（2）从一开始，这一论断就证明是错误的，而在第二国际内部，对这一状况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应尝试：马克思主义正统派断定，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论断不相符合的资本主义趋势是暂时的，被认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方式最终将证明它自身。相反，修正主义者却认为，这些趋势是永久性的，因而社会民主党应该不再作为革命的政党组织，而应成为社会改良的政党。最后，革命的工团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进化同样持有改良主义的解释，但它试图围绕总罢工的神话对阶级进行革命性重建，从而重新肯定激进的立场。（3）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所特有的错位迫使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主要是工人阶级）承担起经典策略中没有预示的民主任务。而恰恰是对新任务的这种承担被命名为

“霸权”（hegemony）。（4）从列宁主义的阶级联盟概念到葛兰西的“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leadership）概念，霸权任务日益扩展，以至于对葛兰西来说，社会行为者不再是阶级而是“集体意志”。（5）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存在着一个从极端的本质主义（例如普列汉诺夫的那种形式）向葛兰西的作为霸权的与接合的社会实践的内在运动，它实际上把我们置于当代思想所探察的“语言游戏”和“能指逻辑”的领域之内。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论证的核心是：本质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瓦解的同时，新的政治逻辑和论证开始取而代之。如果这一过程无法进行下去，这多半是政治环境所致。如果我们今天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一系列思想潮流来实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换，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作为这一压制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

超越时间的批评

现在，让我逐点逐条回答杰拉斯对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分析所作的主要批判。首先，杰拉斯认为，我们玩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把戏：随意地挑出一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把他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范畴与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被迫离开经济决定论时他们的理论工作所呈现的另外一些方面完全分割开来。据他声称，我们给那些沿这一方向走得最远的人颁发了奖章。这显然是一幅讽刺画。其一，我们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本质主义（并不排除这种可能：一位“上层建筑主义者”却是一位本质主义者）。其次，我们并不是随意去思考“任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叙述一个特定的思想演变史，即始源性的本质主义（the originary essentialism）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逐渐瓦解的过程。对这一历史，杰拉斯不置一辞。然而，他描述的图景非常适合于他自己的想像，在他看来，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演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范畴有一种超越时间的（atemporal）合法性。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一点经验论和好感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来。

第二，由于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同时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二元论，所以我们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们断言的是，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论失败了，它才变成了二元论。一种理论，如果它一开始就是多元论，那么它不会面临着陷入二元论的危险。

第三，杰拉斯宣称，我们把自己展现为马克思主义漫长历史的最新阶

段，如此一来，也就陷入了阿尔都塞所批判的错误之中：即把过去（the past）理解为仅仅是自我的预告（pre - announcement of oneself）。在这里，杰拉斯倒是提出了一个相关的学术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任何历史，如果它配叫历史，并且不是纯粹的编年记录，那么它必定以我们所从事的那种方式来进行——用福柯的话来说，历史总是现在的历史。例如，如果我们今天有“收入分配”这一范畴，我们就可以研究古代或中世纪的收入分配问题，即使这一范畴在那个时候并不存在。只有从现在的视角对过去提出问题，历史才得以被建构出来。没有对过去的质问，历史之重构就是不可能之事。这意味着，实有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本身的多重折射——这一折射取决于对历史本身的质问得以可能的各种思想传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诠释本身是暂时的，因为未来的问题（future questions）将导致非常不同的过去图景（images of the past）。出于这个原因，阿尔都塞对过去的目的论观念的批判并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并没有宣称：我们就是被预告的过程的终点，就像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一样。尽管现在组构着过去（the present organizes the past），但是，这并不表明过去的“本质”已经完全得到了展示。

最后，杰拉斯在几个地方就我们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文本的处理提出了质疑。据他说，关于托洛茨基，我们利用了“倾向性的引证”。我们实际上要说的是：（1）波科罗夫斯基（Pokrovsky）向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即：认为国家具有某种独立于阶级的自主性（就像托洛茨基在俄国的情形下所坚持的那样），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吗？（2）对此，托洛茨基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答，他只是叙述了俄国的发展，并试图仅仅拿生活的常青与理论的灰色之间的反差来敷衍波科罗夫斯基问题特有的理论方面（“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思想被刻板的社会范畴牢牢束缚住了，他用这些范畴取代了活生生的历史力量，等等”）。[1] 因此，波克罗夫斯基的提问所蕴含的那类问题（指上层建筑的自主程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问题），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解决。读者检查一下杰拉斯所提及的托洛茨基的所有文段，就会发现，在这些文段中，丝毫没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讨论。至于这么一种说法，即：当我们已经在我们书中的另一部分肯定了相对自主性理论的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却从托洛茨基那里寻求相对自主性理论，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明白了，这最后一点纯粹是杰拉斯的杜撰。

① L. Trotsky, 1905, London 1971, p. 333.

关于罗莎·卢森堡，问题不再是错误引证，而是简单化，即：我们被认为把一切都还原为“象征”（symbol）。杰拉斯一开始就列举了五点，对于这五点，很难让人同意，因为它们不过是对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著作的总结。但是我们的分析层次则与之不同，而且与杰拉斯所总结的这五点也并不矛盾。比如，第五点的内容：“总冲突的经济维度与政治维度是相互作用、相互交叉、共同发展的”。[①] 接下来列举的九条说明了这种相互作用是什么，对此，我们也不赞同，因为它只是举出了这种相互作用的例子。我们的著作断定的东西——也就是杰拉斯不作丝毫的论证就加以否定的东西——是：通过所有这些例子，独特的社会逻辑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它就是象征的逻辑。当一种意义是附属意义（即是说，它是被附加到原初意义上的，例如，“玫瑰”可以象征“爱情”）的时候，这一意义就是象征。在俄国革命中，“和平”、“面包”和“土地”象征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要求。例如，一群工人为提高工资而发起的罢工，在极端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之下，也可能象征着对整个制度的反对，并激发起其他不同群体的反抗运动；以这种方式，不断扩展的多元决定与等同关系就在彼此孤立的众多要求中被创造出来。我们的论点是：（1）这是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这一著作中所描述的机制；（2）对她而言，在建构经济斗争与政治阶级斗争的统一性中，这是一个关键要素；（3）在工团主义者与党的理论家之间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中，她的著作被认为是一个调停。既然杰拉斯没有对这三点提出任何的反对，那么再继续这一讨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②]

① Geras, p. 60.

② 一个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进一步争论点。杰拉斯坚持认为，我们拒不承认罗莎·卢森堡曾有过资本主义制度机械崩溃的理论。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没有任何人会把机械崩溃的隐喻强调到按其字面意义来对待的程度，因此，第二国际时期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家都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终结的理论中不同程度地把客观规律与阶级的有意识干预结合起来。在该段中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确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解释与杰拉斯明显不同）：正是因为自发性逻辑不足以构成社会主体的阶级属性的依据，卢森堡才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不同的根据，并被迫诉诸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强化。对此一问题更充分的探讨显然需要比这个脚注更大的空间。

激进民主

就像派性文章通常表现的那样，在谈到政治的时候，杰拉斯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杰拉斯的如下宣称：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这是一条公理。[①] 事实是，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生活在火星上的人来说，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仅仅在杰拉斯的头脑中才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杰拉斯听说过斯大林主义吗？听说过一党制吗？听说过书报检查制度吗？听说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听说过波兰政变吗？听说过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吗？如果答案是：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正在玩的是什么游戏。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杰拉斯以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运用的方式来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当然，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去宣布：在杰拉斯王国（Gerasland），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与民主是相伴而生、协调共进的；不过，在此情形之下，我们不应该声称正在谈论的是现实世界。第二种可能性是肯定苏联集团的极权主义国家代表着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性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是自莫斯科审判以来“进步”知识分子为支持斯大林主义的最野蛮暴行而给出的可悲借口。第三种可能性是断言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的“退化形式”。然而，如此的“退化”得以可能，这一事实本身已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自明的公理。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接合完全不是自明的公理，而是一项政治工程；即是说，它是长期而复杂的霸权建构的结果，它总是受到威胁，因而需要不断地重新加以界定。因此，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是进步政治的“基础”。对杰拉斯而言，这就出现了如下的困难：我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不是把政治选择（选取某一种政治而不选取另一种政治）的任何基础都根除掉吗？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理解“基础”的含义。如果说“基础”能够使我们以绝对的确定性决定一种社会好于另一种社会，那么答案是：我们并没有根除这样的基础，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基础。但是，没有这样的基础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政治推理和政治选择（基于某些原因选取某种政治立场而不选取另一种政治立场）的可能性。（滑稽的是，像杰拉斯这样的对“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给予严厉批评的人却恰恰让我们碰

---

① Geras, p. 79.

上了他本人正在运用这样的抉择类型。）对于许多事情，即便我们不能像做算术题那样按照既定的规则系统去推定，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我们毕竟可以推断可行的选择方案的似真性（verisimilitude）。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智慧（审慎）与理论（纯思辨认识）进行了区分。一种建立在结论绝对可靠无误基础之上的论点，无非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它既不允许讨论也不容忍任何多元化的观点；另一方面，试图把把自身建立在结论的似真性的基础之上的论点，其实质上是一种多元主义的观点，因为它需要参照其他的论点，而且，既然这种多元思考的过程本质上是开放的，那么它所达至的结论就总是能够被辩论、被反驳。在此一意义上，似真性逻辑（the logic of verisimilitude）实质上是公开的、民主的。正因如此，激进民主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承认社会的一切价值都具有偶然性和完全的开放性——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要抛弃对单一基础的渴望。

至此，我们可以来驳斥杰拉斯这样的一个荒诞说法，他说，我们的观点与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拒斥的只是如下这种观念：人本主义价值具有一种实体的形而上学地位，正因为它具有如此之地位，所以它优先于任何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即便我们批驳如此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念，也并不是要否认人本主义的有效性；这仅仅意味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有效性是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论辩实践建构起来的。“人”（以其独有的能力作为各种权利之承担者的人）的产生的历史只是近代即最近300年的历史。在此以前，所有的人只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才是平等的。“人”的产生的这一历史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发展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巨大成就；勾画这一历史必定就是对产生于此一历史进程中的种种话语外观（司法制度的、教育制度的、经济制度的以及其他制度的话语外观）的重构，通过这种重构，那些基于地位、社会阶级或财富而形成的各种差异得以逐渐被消除掉。“人”原本无条件地就是这一多维建构过程的多元决定的结果。正是在此一话语多元主义之内，“人本主义价值”才被构建，才得以扩展。而且我们非常清楚，人本主义的价值总是受到种种威胁：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歧视总是限制着人本主义的出现和它的完全生效。拒不承认“人”具有一种实体的地位，也就是关注“人”得以出现、得以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因此也就是关注更大范畴的以这些人文价值的全面实现为其基础的现实主义。

政治意识的变迁

当今，社会关系的领域正日益扩展其“人性化”的趋势，这一局面的出现与西方社会最近二百年间政治意识变迁的基本进程（我们遵循托克维尔的说法，将这一进程称之为“民主革命”）密切相关。我们的中心论点是：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除此而外，别无意义（正像我们将看到的，这一论点完全不同于所谓社会主义显而易见就是民主的这一宣称）。为了说明我们的论点，我们将从分析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开始。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对抗是围绕着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一点而形成的。但是，重要的是要看到对抗发生在什么地方。第一可能是断定：对抗就内在于劳资关系这一形式之中，以至于断言这种劳资形式建立在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一基础之上。然而，这一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被视为形式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即是说，就工人不被看作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看作“劳力出卖者”这一经济范畴而言）并不是一种对抗关系。只有当工人反抗资本家对他或她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时，这一关系才成为对抗关系，然而，这种反抗并不能在逻辑上从“劳力出卖者”这一范畴必然地推导出来。只有当我们补充上另外一个假定——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时，这一关系才变成对抗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在那个时候已变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但是，所谓工人也以资本家那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利润的最大化者，这一观念已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拒斥。

由此，唯一剩下的解释就是：对抗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内在固有的，而是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这一关系的某些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譬如，由于工资水平过低，以至于工人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以至于他或她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以至于他没有机会参与某些娱乐，如此等等。因此，对抗的模式及其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行为者在生产关系外部被建构的方式。如今，我们越是深入地从纯粹的生活层面进行思考，就越会看到，工人的期望越来越同他们对其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取决于工人对各种不同领域的参与，取决于对他们自身权利的觉醒；民主的和平等主义的话语深入到社会之中愈多，工人所受到的妨碍其自然享受社会文化产品的限制也就愈少。因此，深化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其可能性取决于民主革命的扩展。进而言之，反资本

主义就是民主革命的内在环节。①

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对抗不是生产关系本身内在固有的，而是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生产关系的某些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并不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特权地位。我们应当记住的是，第二国际（尤其是考茨基）之所以持有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是与以下两方面分不开的：（1）把资本主义的崩溃看作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灾难，也就是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绝大多数人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2）认为资本主义将造成中产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作为其结果，当制度出现危机之时，一切都被归结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简单的最后决斗。可是，既然第二个进程并没有出现，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假定工人阶级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特权角色。在资本主义与各阶层的人士之间存在着许多对抗点（环境污染、某地区的资产开发、军备竞赛、资本的区域流动，如此等等），这意味着我们将从事各种不同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第二个结论是，通过深化民主革命而实行的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将发源于绝大多数人所选取的全球性决定，因而，它与社会结构中的特定身份有什么关系。就此而论，并没有哪一种斗争本身天然就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尽管在某种特定背景下，一些斗争可能会变成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民主革命

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民主革命的扩大与深化，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就是，民主革命本身取决于什么以及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马克思曾经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传统社会关系的动荡不安和逐渐消解，才能得到发展。如此动荡不安的效应是明显可见的：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之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与不平衡的联合发展相关的现象之中。在这些境况之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发的根本不

① 在我们看来，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种种不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是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果它是一种排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那么就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它可能是官僚强制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可能完全外在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相容性完全不是公理，而是为了把二者接合起来而进行的霸权斗争的产物。

稳定性以及对社会认同的威胁，必然导致集体想像的新形态的出现——这些集体想像以全新的方式重构那些遭受威胁的认同。我们的观点是，平等主义的话语和关于权利的话语在集体认同的重构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在法国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公民的公共空间就是全部的平等领域，而发生在私人领域中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受到质疑。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理解那样，一旦人类开始承认平等原则在某一领域内具有合法性，那么他们必将尝试把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之中。因此，一旦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引发的动荡变得更加普遍，那么越来越多的领域就会围绕平等与自由原则建构自己的要求的合法性。19 世纪工人的斗争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斗争，也不是最后的斗争。在最近几十年间出现的所谓“新社会运动”所进行的各种斗争是深化民主革命的新阶段。19 世纪末，伯恩施坦已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与社会向着民主化方向的不断进步将取决于社会结构内不同的位置所产生出的独立自主性，因为，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成功的工人斗争产生出一种联合效应：工人不再是“无产者”，而是变成了“公民”，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参与到国家生活日益增加的各种不同层面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立场分散”（dispersion of subject positions）过程的开始。毫无疑问，伯恩施坦的观点过于简单、也过于乐观，而他的论断却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多元化和错位并不必然带来不断增强的一体化和对体系的适应。上面提及的错位效应继续影响着所有这些分散的主体立场，这就是说，分散的主体立场变成了使新的激进化得以可能的场所，由此，社会的激进民主化进程就获得了全新的深度和全新的推动力。分散和零碎化过程（伯恩施坦所描述的只是它的最初阶段）的结果并不是日益一致化的和整体化的社会，而是 1968 年的大动荡。

还有两点需要讨论。第一点是关于自由主义。如果社会的激进民主化来自于各种自发的斗争——这种自发的斗争本身受到霸权接合形式的多元决定，而且，如果一切都取决于争论与决定的公共空间（通过这种空间，社会行为者日益增强自我管理能力）的扩大，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过程并不会对国家机器进行直接的攻击，而是牵涉到自由国家的巩固与民主改革。自由主义的诸多构成原则的总体——权力的分散、普选权、多党制、公民权等等——必须得到捍卫和巩固。只有在这些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的框架之内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当代民主要求的全部范围（从民族权利到种族权利和性偏好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到反资本主义斗争本身）。

第二点是关于极权主义。在此，杰拉斯再一次犯了混淆概念的老毛病。

当他试图描述我们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时，他把我们的这种批判理解为：好像我们的批判预设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同一性。显然，情况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社会类型上是完全不同的。唯一可能的对照是，在这两者中同样都存在着某种政治逻辑——正是由于这种政治逻辑，它们才成为拥有国家真理（State Truth）的社会。因此，激进的民主想像以开放性、多元性和永远不会导致终极基础的论辩过程作为其先决条件，而极权主义社会却围绕着对终极基础的控制权而建构起来。20 世纪之所以明显地存在着极权主义危险，原因十分清楚：错位效应处于支配地位、权力内在于其中的旧式结构消解了，而值此之际，权力集中于一点的趋势却愈演愈烈，以致企图从这个权力的聚集点“合理地”重构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在试图处理产生于错位与不平衡发展的诸问题时，激进民主和极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最后，作为总结，我们想指出三个基本方面，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认为今天都有必要越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政治视域。第一个方面是哲学观点，它涉及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部分特征、涉及到对传统形而上学范畴重要方面的多重依赖。在这一方面，就像我们力图证明的那样，话语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方法或认识论方法；它意味着，通过指认所是（being）的激进历史性并因而断定真理的纯粹属人本性，从而表明世界就是如其所是的世界：人类的全部的社会建构并不以外在于这种建构的任何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本质形式”，也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为基础。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马克思的社会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阐释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所引起的对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里的分析并不完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偏狭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局限于 19 世纪欧洲的经验。如今，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所引发的错位效应比马克思所预测的更为深入。这迫使我们在不同方向上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对抗观念加以激进化和转换。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政治。通过把社会主义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我们指出，最终使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变革乃是建立在社会主体及其斗争的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冲突的领域大大地扩展了，它不是仅仅被集中于社会变革的“特权主体”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这也意味着，民主斗争的扩大和激进化在实现完全自由的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终点。总是存在着对抗、斗争和社会的部

分非透明性，总是存在着历史。关于透明的同质的社会的神话——这种神话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给予抛弃。

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自己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不仅澄清了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尊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只能来自于对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承认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的著作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与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

作者：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文章原标题：Post -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166，November/December 1987，p79 - 106

（编译者：周凡，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①]：对拉克劳和莫菲实实在在的回应

［英］诺曼·杰拉斯　著　　李百玲　译

政客们在选举时，在面对令人不快的问题时，通常会采用话语的策略。这种策略表现为似乎在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回答，或者从外在的形式上看是回答，而实质并不是回答。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政客们微妙地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以利于自己，或是替换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或者只是重复了他曾经说过的话（也就是他首次提出问题时所说过的），或是谈一些别的东西，或是把这些动机兼容并包。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做出回答。拉克劳和莫菲正是用这种"政客的方式"回应了我对他们著作的批评。如果期待他们很热情地接受这些批评无疑是很愚蠢的。但是，即便是那些不太仔细的读者和那些赞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的人，也会意识到这种批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先概述一下我的批评，然后再逐一展示拉克劳和莫菲是如何对待它们的。

在简要的导言（后面我还将回到这些主题上来）之后，我对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批评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认为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了贫困化处理。其次，它提供的东西在思想上是很空洞的。这两个批评又各自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四个观点：第一，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漫画式的处理（讽刺），他们习惯性地把它视为伪造的、荒谬的、呆板的对立。第二，对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阐述歪曲了传统，萎缩、贬低、扭曲了这些观点。第三，他们自己的社会理论是大而空的：在一些决定性观点上含糊不清，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解释。第四，它在规范上也是不确定的，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学，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另外，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我介绍了一个主题，我在后面还将谈到它，也就是第五，这本书对所谓的"本质主义"、"接合"（suture）、"闭合"（closure）有一种夸张的修辞学的使用。对别人思想的批评是肤浅的，没有可靠的标准，这有可能形成一种蒙昧主义。最后，在作者公开的政治学结

---

① Ex-Marxism，本意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里姑且译作"非马克思主义"。——编译者注

论中，我提出：第六，他们两个似乎是激进的民主人士，但其论述民主的观点浅薄得令人失望，而且比浅薄更有害的是，它表现得很像冷战时反马克思主义标准的转喻。下面是一些基本的观点。

1. 诸极点

通过“误述”（misstating），拉克劳和莫菲对第一部分的回应显然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我苛刻地责备了他们“主要的理论结论”，把两极和其他替代办法对立起来，没有考虑避免极端而折中的可能性。[1]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一再重复的观点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批评基于过多的两极化处理，在他们自己觉得需要的时候运用折中的办法，但这种运用明显是不准确的、模棱两可的。这样的对照至少有三处，是我的批评结构的基础。[2] 这种“误述”的作用在于，从一个受到批评的极端游移到另一个极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造成答案的样子。

（1）首先，他们采用了最简单的置换法。这在我所讨论的第三点——客观利益中表现得很明显。由于拉克劳和莫菲没有提醒《新左派评论》的读者这种特别的对立是什么，我希望这件事情由我来做。这种“清楚的”“置换”（他们自己的词）在于：要么接受这种理论，“在无产者的‘千禧年’、绝对联合的工人阶级透明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客观利益；要么放弃这种理论，概念同时也变得“无意义”。我认为对于客观利益这一概念不需要这种绝对的对立。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千禧年”的客观利益与拒绝这个概念间做选择。现在的“回答”是：我们不会批评一般的利益概念，只会批评客观利益（好像我说过这个区别），并且因为我们知道存在的利益，不是我们提出的严格的“或者……或者……”的选项。我们不像拉克劳和莫菲那样，假设自己立足于客观利益和无利益之间。然而这并不是我所批评的，他们自己对于这些概念，无论如何“调整”，与我的批评都不相干。我批评的只是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愚蠢的选择。由此，他们认为“在全部的三个观点”中，我的批评都是基于“误传”

---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 -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hereafter WA), *New Left Review*, 166, November December 1987, p. 92.

② Norman Geras, ‘Post - marxism?’ (hereafter PM), *New Left Review*, 163, May/June 1987, pp. 50, 51.

(misrepresentation)。[1]

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不去计较这个问题，因为作者放弃了他们不想捍卫的陈述，实际上他们已经简单地用其他的同类说法替换了它，也就是说，客观利益的思想预设了某种东西作为“来自上天的礼物”铭刻在人的本性上，“只有上帝和杰拉斯知道”它如何同“非本质主义”的社会理论相一致。真的……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这个天赐的“主题”作为一个严肃论点的替代品，远不只是人的本性问题。[2] 它没能提供任何帮助。我和其他一些人对后一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基于人们需要的文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捍卫，而似乎忽略了这些人道主义者。这些思想开放而多元的卫道士们，看不到迥异于他们的那些观点有着可靠的基础，认为它只是有点疯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由于这些与我将要谈到的其他问题有关，所以请注意，他们使用的宗教信仰语言——“千禧年”、“上天的礼物”、“上帝”——是一种否定的参考。

(2) 关于相对自主性的问题有一点复杂。拉克劳和莫菲这次愿意捍卫我批评他们[3]所提出的严格选择。这说明我没有误传他们。他们简单地模糊了我所抗议的特殊对立（正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为的是再次显示他们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游刃有余。这次我从他们的书中引述了一段现在他们避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观点以作为证据，阐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作的选择：要么决定论的概念成为强势，从而相对自主的概念变得“多余”；要么实体被理论化，相对自主不是简单地被基本的决定因素所决定，因而这些决定因素不能决定它。事实上这就是选择。我认为，这些完全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和根本不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即“解释一切而不决定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选择要么公开拥抱经济主义，要么与历史唯物主义告别。同时，我也弄清楚了，在我的文章中，作者不是一两次，而是三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困境”的恰当解决：即（引用他们的说法）“政治和社会空间的多元性”，以及“社会不可简化的多元性”；我再次强调一下，是“多元性”。不仅如此，当我看到后面时，发现“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这一概念解释了：多元性

---

① WA, p. 92. For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gh, see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hereafter HSS). Verso, London 1985, p. 84; PM, p. 51; and WA, pp. 96 - 7.

② PM, p. 75 - in reference to HSS, p. 117.

③ PM, pp. 48 - 50 (vis - a - vis HSS, pp. 139 - 40) and 67 - 9.

——复杂而易变；“对抗的十字路口”；没有特许的中心，只有诸关节点的实践；多元组成，彼此限制身份、斗争、流动等等。对此的解释是，没有人会忽略这一事实：拉克劳和莫菲确信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①

在回应他们时我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我的脚踝被锁链缠住了，这根锁链就是我生活方式中基本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强有力地起作用，——同时我也很享受我能达到的相对自主。这个故事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就像是锁住人的那个锁链，也不是否认在这个复杂领域里存在严肃的争论和差异的空间。我再一次非常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用浅薄武断的“或者……或者……”的选项排除了深入的思想争鸣的可能性。而这个故事的要点是要展示基本的决定因素，不需要解释或决定什么；用最直白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必须“在极度的经济还原论和作者推荐给我们的多元性之间”做选择（这些选择在我看来，“要么一是全体，要么全体是一”）；我们被告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他们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对于解释这种政体来说是最主要的”。②

万能关系

拉克劳和莫菲的回应有三个方面。③ 首先，他们用相当含混的方式（这正是我所批评的）对待我的争论：他们要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决定……不决定一切”的选项，导致相对自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显得不可思议；要么由于严格限制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拒绝了这个概念——而我不是。这就制造了含混。我允许他们一遍遍地仔细解释，他们确实承认“每一领域的相对作用”，没有“在总体自主和绝对从属之间建立一个严格的选项”。而这是另一种回避，是对我的问题的转移。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仍然没有回答。

第二，他们指责我“要诡计”、“玩把戏”，通过锁链的例子把决定关系转移为限制关系。对此，最简单的回答是：我没有。但是拉克劳和莫菲简单地省略掉了对他们来说的困难之处。其虚伪之处表现在，把实现我的目的所必需的东西放在一起，在总体决定外建立另一种模式，把限制和压

① PM，pp. 50，63，此处为补充强调。

② WA，pp. 92 - 5.

③ PM，p. 49，此处为补充强调。

力相结合。在描述完它对我可能的限制之后，我写道，“锁链不仅消极地限制了我，它还促使我采取一定的行动”；反过来就解释了这一点。[1] 对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决定而不是限制，他们在数行行文中重复了三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单单忽略了论点的这一方面，而把它当作语言的把戏？我不知道。但是令人担忧的模式正在愈益清晰。无论如何，他们似乎营造了一种环境，他们的读者不会同时阅读我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辩论来说，这造成了视野的偏狭。

第三，通过以上的揭露可见，拉克劳和莫菲只是重复了我所质疑的决定概念。这样的“决定”不仅是限制，它也不是限制和压力（或条件、影响、原因等等）的结合体。因此，我们被告之：“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肯定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像一只手的移动决定它在墙上的影子的移动一样”；这就是表达关系；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决定概念和相对自主“在逻辑上不相容”，前者表示的是“万能关系”。通过“中介”的概念把模式复杂化不能改变任何问题，因为严格说来，经过中介的相关实体是不能分离的。如果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决定”是“一个先验真理”，那么就没有有效的自主的实体，因为它只是实体本质的一部分。这些评论重申了我所批评的决定的观点，我认为它们会被赞同，但是支持它们的观点是什么？没有。这就是决定的意思。他们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约定定义，没有更多的了。作者隐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近乎一千字之后，他们附加承认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定，但是这适用于全部），这里他们所有的“推理”是“确实不必要的”，因为肯定根本决定和有效自主的同时发生“从一开始便是不一致的”。我有把握地引用它们，并且与之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2] 只是通过简单的重复，甚至多重复几次，就能成为答案吗？这不过证实了我的批评，而他们并没有做出回答。更进一步说，如果讨论的水平就是这样，我只需打开我的字典就够了，字典上很清楚地写着，“决定”的第一个意思是“确定”和“限制”。[3] 从“反本质主义”理论家话语的多样性，以及援引维特根斯坦的权威著作来看，我们希望他们能表现得更好一点。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能够被明确的法令评判，这该是多么的荒谬。从其起源来看，以马克思的1859年序言为开端，所讨论的

① 同上。

② Cf. Raymond willliams, *Keywords*, Glasgow 1976, pp. 87 - 91.

③ David · Mclellan (ed.), Karl ·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77, p. 389 (emphasis added); Michael Evans, *Karl · Marx*, London 1975, pp. 61 - 65.

关系没有被明确表达为一个直白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力量（“协调”、“条件”、“决定”）形成的一系列术语，甚至只是“作为我研究的主线”。①随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可以被视为漫长的思辨，从精确的本性、视野、力量上看，这种关系都存在着内部差异。但是对于万能基础和墙上的影子般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这种还原论，是我一再反对的。如果真有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拒绝的。正如我指出的，拉克劳和莫菲全部立场的错误，是在任何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内，通过简单的绝对命令——对不起，有决定，就没有相对自主！——来控制这种不合逻辑的拒绝。一个新近的思想史（相关的）情节现在使其有了新的希望。阿尔都塞的全部规划似乎都基于语义的错误，因为他强烈坚持，决定关系不是表达关系，当……它们是决定关系的时候。

支配体系

把文字游戏置于一旁，我只是重提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直接正视问题。为什么在“最丰富的经济还原论”和“多元性”之间没有逻辑空间？为什么没有解释首要概念的空间？这又怎么能作为一个单独的逻辑事件被取消呢？我们这里只谈在马克思主义之内很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是否是议会民主制，依赖于所有的“自由”权利、实践和程序，这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差异”，对于工人组织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托洛茨基把它与纳粹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已经以各种方式阐述过。至于托洛茨基自己，认为议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是两种不同的（阶级）统治制度，在前一种制度下，工人能够创造“无产阶级民主的要素”和“防护墙”，“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内，利用这种民主制与之展开斗争，通过贸易联盟、政党、教育和体育俱乐部、合作社等等（创造）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还有卢森堡论议会民主的思想，我已经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批判，但是对她来说，这是“阶级斗争最有力和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它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创造了政治形式（自主管

① Leon Trotsky,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NewYork, 1971, pp. 144, 154-5, 158; Rosa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1972, p. 110, and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in Mary-Alice Waters (ed.), New York 1970, p. 80; 比较我的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Verso, London 1976, pp. 51-63.

理、选举权等等），它将会服务于……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①] 然而无论如何阐释，这种观点对于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都很平常，除了政治体制和结构由于对它们有特殊影响，因此不仅仅作为阶级或经济权力的附庸（“影子”）之外，没有提供什么可靠性。同时，与作者此处过于单纯的断言相反，政治民主对它来说是不可削减的：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言，它不是纯粹的表达或是简单的手段。作为具有重要后果的现实，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一种独立的制度结构，它的结构和程序必须符合相应的后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不像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科学所宣传的那样，认为国家是一个中立的竞技场，或者是“上述”阶级之间的裁判员或调节员。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拒绝这样的观念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看法，由剥削和阶级结构所施加的竞争的影响、限制和压力产生了更重要的后果，其作用是国家倾向于给予资本家利益优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权力——尽管不是没有例外，但是一般来说，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因此，只有相对的自主，尽管不那么真实，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体制是无效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思考。他们并没有断言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优先性是“一个先验真理”：虽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它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假设，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有例外，有太多伪造的可能性和强有力的历史性的反面证据。与此休戚相关的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便是，不用通过恣意而陈腐的各种思想（“决定”是万能的，“中介”意味着“不能分离”，等等）的定义而提出一些细枝末节：资产阶级霸权机制是什么，阶级权力在国家层面上决定（影响、限制或调节）政治后果的确切方式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解释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诸如经济权力模式这样的问题，都是基于资产阶级利益对国家间接限制或直接施压的各种方式的表现；（b）社会构成因素，即那些执行和裁决法律的人的阶级起源和形成背景，与统治阶级结盟的程度；

---

① 对尼科斯·穆泽利斯（Nicos Mouzelis）对这一观点做了简要评论。尽管他太关心（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拉克劳和莫菲的批评，但他还是主张有一种“还原论的类型……内在于所有马克思主义话语”。这是因为公开的非还原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仍然使后者遭遇一种微妙的“降级”。通过与经济的对照，它被视为结构决定论，并理论化、政治化为纯粹的代理和接合，因此在实践上的形态让位于原则。正如我在文中所说的，我不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仍然是不发达的，但是政治领域的建议不能被简单化为一种非理论化的接合。

(c) 结构限制因素，即由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关系而历史地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及其组成结构的（困难）程度，是否阻止或妨碍了大多数被统治的人接近决策？

这些都是难题，其中对证据的评价是批评性的。很明显，对此可以有很多种看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找到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假设的充足证据是很难的。在历史性证据面前，人们彼此尊重、认真讨论。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义务参与这些讨论。而难得的是尊重这样一种观点，在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如果严格依据定义的话，立即变得不可思议。这可能有点像：天马行空，或者内心悔恨；无论如何，可以被恰当地称之为思想“闭合”①。

双重逻辑

我反对的另一种极端对立是分散的工人阶级的统一过程。拉克劳和莫菲的选择（其形成与卢森堡的思想有关），要么是“必然规律”、“无产阶级化”、“危机”（由经济决定论而达到的统一），要么分散是“永恒的”（因此，阶级对于政治建构的统一体来说不是最基本的）。我对此的回答像以前一样，是“非此即彼”：可以预见共同的阶级地位和某种资本主义经济趋势，不是为产生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统一体，而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提供有条件的基础。② 作者们指责我的文章中有“不能容忍的”错误引用。不用说，他们这里只是一种“边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由不同的结构决定论逻辑和自发论逻辑所涵盖的“有效区域”轮流延伸。上述的选择只是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最“本质主义”、“排他的决定主义”版本的经验归谬法中得出。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不仅“指出存在于罗莎·卢森堡文本中的双重历史逻辑”：决定论和自发论，而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持续努力地避免‘或者……或者……’的决定论逻辑”。③

要不是其特征的特殊性，人们也不会想起这个已经被编造为玩笑的观点。但是当我被谴责为思想“不诚实”，至少可能“不诚实”时，我得采取更为严肃的态度。因此，让我们再深入地谈一下“表达”关系。它可能偶尔发生在单独的一句话中，或是你突然看到的手势中，“表达”了一个人整体的态度、性格或特征。因此，概括说来，不受约束的武断已经成为

---

① HSS, p. 13; PM, pp. 50 - 1.

② WA, pp. 95 - 6.

③ HSS, pp. 12 - 3; PM, pp. 61, 69.

拉克劳和莫菲思想的特征。他们的思想不仅不受其他人的束缚，甚至不受他们自己所写东西的束缚，谨慎地避开他们作为“回应”的“不可化约的二元论”和“双重无效”，这些术语在卢森堡思想中称为“双重历史逻辑”。我认为他们会认识到我的批评集中针对后面的术语，他们怎么可能忘了这个?[①] 在书中，他们巧妙地拒绝谈论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特征的“不断的努力等等”湮没于“二元论”、“伪造的二元论”、“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论”、“正是同一种二元论”等题目之下。为何会如此？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逻辑——所谓二元论的两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不是“两种积极的不同的解释原则”（他们安在卢森堡那里的），而是“最终的不一致”（安在葛兰西那里的）。[②] 他们并没有创立，仅仅是以特殊的方式再次宣布我们刚刚证明的“决定”与相对自主之间的不一致。他们仍旧一遍遍地断言，它真的是“边界游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提到它的原因，因为那是他们的观点，而不是我的，是一种排除任何连贯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支持诸如相对自主、霸权、多元决定论、卢森堡主义者的“自发性”等等（好的）概念。他们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的架构。任何有逻辑的头脑，如果被这种观点所说服，不为无话找话的措手不及所困惑，那就不得不在直接的、绝对的经济决定论和上述被认为是（好的）概念的孤立、敌对的逻辑之间做出选择。这恰巧就是所谓的“边界游戏”所开启的替代的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克劳和莫菲会采取“后马克思主义”路径。因此，当他们被指出存在一个虚假的对立选择，把历史唯物主义漫画化时，他们无辜地自我辩护道：这只是通过反证法来表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知的和我们所说的要更为复杂，包含着其他更为精制的逻辑。他们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所谴责的只是这种不一致是无效的。其实，无效这个词是正确的用语用错了对象。

这些回答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对他们的著作提出的第一个批评，作者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回答）不过是对所争论的观点空洞的重复而已。逃避或者置换真正的问题，策略性地排除关键方面，我的论点和他们自己的论点交替出现，否认他们早已提出的方案；有时夸大其词（如“上帝和杰拉斯”），并伴有针对个人的指责，这些都没什么用。如果我非常在意关于我思想不诚实的指责，我会拿出足够的材料来反驳。但我无意于此，一方面是由于我相信它是很少见的，人们通常自欺欺人；一方面是当它发生时

---

① HSS, pp. 26 (and 29), 51, 69, 99; and 13, 69.

② WA, pp. 97 – 9.

（我假设它时而会发生），如果没有精确的个人知识就很难了解它。无论如何，这一切有更加合理的解释，后面我会谈到这一点。现在这么说就够了，无论如何解释，有件事情是清楚明白的：这里到处是“做出回答”的形式，而它的实质或是内容却是——无。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正义的格言来概括：回答不必真的做出，但是必须被大家视为已经做出。

2. 马克思主义者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展现了对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我撰文指出，这是一种系统的贫乏化的曲解。针对我的批评，他们的回应中有两条开场白。[1] 第一条是对他们的方案进行概要性的重新描述，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作者纯朴的精神：他们在书中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摆脱本质主义的持续努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其他更好的逻辑正在浮现。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这是首要的、无所不在的，拉克劳、莫菲用这样的术语来称呼这种缺陷）、“还原论”、“经济主义”等等，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远离它”，因而对作者来说就产生了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要么是“不可化约的”，要么是“伪造的”或“不一致的”。这种“持续的努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省略这种自我陈述的方式。而我们已经看到了秘密：突兀而轻易地把逻辑上不协调的半“本质主义”铭刻在马克思主义上。我的批评清晰地展现了整个过程。在争论一开始，拉克劳和莫菲就曲解了。我写道：“绝对准确的是：不否认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理论价值的力量、见识和贡献……只是，这样的价值元素都以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参数为条件。”[2] 如果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要从根本上开创“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为什么要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同一件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各种各样的“价值元素”并不表明（它们其实表明了）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不包含（内在于它的）“反本质主义”。他们简单地允许它包含反本质主义，那么，请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它发扬光大，而要等到近来才又复原以往没有注意到的内部财富？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

① WA, pp. 97 – 9.

② PM, p. 48.

第二条是为补充积极的自我形象而树立的另一种形象。拉克劳和莫菲对我的观点——"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感到很惊讶，他们认为，"在杰拉斯这儿清楚地看到对于内涵的背叛"。事实上，"放弃"是他们的话而不是我的，不过没关系，我说过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拒绝了，或说是结束了马克思主义（正像作者现在做的）。[①] 我想如果能够给与之相反的观点留有余地，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那不是一种轻率怪异的观点。例如对于伯恩施坦，至少也有与我持不同政见的一些学者，如彼得·盖伊（Peter Gay）、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的观点。我承认，这沿用了拉克劳和莫菲他们关于伯恩施坦和索雷尔的看法。[②] 但是"背叛"说的是什么呢？原本的事实是，关于伯恩施坦或是索雷尔背叛了什么，我根本没有说过。然而："清楚的内涵"被如何介绍，"背叛"迅速地取代了"放弃"。作者表达了愤怒："我们怎样对待这种荒谬的'背叛'和'放弃'的故事？人们如何解释哲学史，难道要宣称亚里士多德背叛了柏拉图……马克思背叛了黑格尔？"他们如是说，"我们"认为，对个人来说，走进某种事物是通过这种方式："遭到背叛的教义是崇拜的对象……宗教对象"（再次做记号，关于宗教信仰的贬义）。进一步说，"我们很了解这个故事：伯恩施坦背叛了马克思；欧洲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苏维埃官僚体制背叛了革命……因此，'革命'和'科学'的惟一托管人是想像中的国际主义的一小部分，……它永远是碎裂的。"我想，拉克劳和莫菲这里也许想要建议读者，杰拉斯是某种托派分子，"我们"都知道。它是令人绝望的废物。

如果我真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之类的或是某种类型的托派分子，人们将会看到，这将会反映在我对他们的作品提出的特殊的批评和论点上。好点儿的是，作为虔诚的、不加质疑的思想的产物，这些批评和论点将会毫无疑问地涉及到：一个人应该回应（作为回答）一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放烟雾弹。我的意思是，如若不然我们思考什么？我个人认为这再一次证实了话语的"开放"和"多元"。对马克思主义最前沿（估且

---

① PM, pp. 40 - 1, 53, 64.

② 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New York 1962, pp. 68, 72, 143, 151; 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New York 1970, pp. 17, 19;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4, p. 290. Cf.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66, Vol. 1, p. 205, and HSS, pp. 30 - 1, 38 - 9, 41.

称之）及其全部著作的批评是明确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努力。但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被强迫性的，而反对这些批评，这只能是宗派主义的虔诚。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基于反思、质疑的思索而采纳他们的观点和判断。如此说来，它在不同的场合下确认了歪曲指控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现在如何能通过一种思想开放的知识被接受，而不止是用其他的虔诚方式（闭合和千禧年、固定和减少、令人作呕的“本质主义”及其同类语）来捍卫？

至于“背叛”的问题，尽管它被过度使用，但是我相信这个概念在政治上和私人事件上一样，有时是恰当的。人们会背叛同志或支持者，或者背叛他们自己订立的原则。准确地说，我认为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许多“反战”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行为。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在评价理论方法或范式上（他们的力量、问题和他们的失败）背叛的问题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背叛一种理论、历史或社会观念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会认为伯恩施坦或其他人“背叛了马克思”或是马克思主义。我不这么看。可能迷惑这些作者的是他们自己转嫁给我的观点，用尖锐而非温和、愉快的语调表达出来。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导致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评，也要求尊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它是一种慎重而严肃的类型，那么就有责任努力在精神上相遇。再者，也许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一些弱点（已经够多的了）需要修正（但是哪一种社会理论没有弱点?）。[①] 然而，出于同样原因，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义务受任何浮夸和陈腐的反马克思主义偏见的影响，那将更难期待和获得人民的尊重。如果任何背叛的概念在此处适用，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背叛了正确的思想标准（严格的质疑和争论）。拉克劳和莫菲也许不同意这些，更不用说得到他们的欢迎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的作品置于公众范围，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从友好的自我描述和作者的愤怒转到他们称之为“逐一地”回答我对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批评。他们的第一个（意味着回应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指责他们“随意（着重号是我加的）选择了一

① 只讨论这样一个弱点，见我的‘Marxism and Moral Advocacy’, *Manchester Papers i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87, and my conclusion to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p. 84 -5。

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说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讲述了思想的历史。他们当然使情况有利于自己。我给出了他们所讲的思想史的详细说明，展示了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如何被对待的，以及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从事这个工作，即（可大可小的）一些进展，直面这些思想家提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问题，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但是总会有一些失败，基于上述的错误而导致二元论。用讽刺的但不完全是轻蔑的意向找到潜在的证据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你拿走一些马克思主义，其他马克思主义将会……"，就这样走完一个简化注释的路线。我的观点不是说作者随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卢森堡和考茨基经过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线索——不是随意捆绑成一束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为什么我在介绍概要时说起，"要给予许多更加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逐一介绍的方式"）。我的观点是用质疑的思想方法，无论你选择哪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什么区别，你都会不费力气地"说明"同一件事。[①]

然后我继续确认这个原因。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给我们证实，在作者那里马克思主义范畴是如何被夸大为"本质"的，因此也没有说明真的存在"本质主义"。根据事实，无限使用范畴就是"本质主义"的证据。作为后者的受害者或是凶手，说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够了，不管你是否把什么还原为阶级或经济或其他单一的意义。因为"本质主义"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话语中起双重作用：作为概念和标记——这两者是相互脱离的。作为概念，大致有"总体性表达"的意思。作为一元论，明显地把复杂简化为单纯的本质，通过提及一部分以解释整体，如此等等。然而，作为标记，"本质主义"等于把每件事还原为一个本质而没有解释任何东西。它只是在社会"多重性"之中，依据或多或少的重要性作了一些类别上的区分。正如我指出的，作者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已经全部解释了，但事实上确实没有全部解释（它的基础，作为与"本质主义"相伴的"二元论"）。这一点也没有能阻止他们指责"本质主义"：一种更小的"本质主义"是，除了不是的东西，任何东西都被一种本质所解释，这有点像某种中世纪的魔法试验。

但是对于整个论点，拉克劳和莫菲什么都没有讲，在"逐一地"回应

---

① WA, p. 99; and PM, pp. 48, 52－6；我把作者无用的谬论置于一旁，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主义而是"本质主义"——似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完全忽略了我的批评。

中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沉默。事实是（正如我后面讲到的）他们自己不自觉地表明了（但是现在它在展示）本质主义的真正含义：把概念或模式提升到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程度，尽管每个证据都指向反面。这就是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或非历史的阐述，是一种自我封闭、不能证明真假的理论模型。①

他们的第二点（回应我的第四点）是这样的："假定我们是自我矛盾的，我们同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但是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论失败的结果而变为二元论，是以多元主义开始的理论成为二元论，这样说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从开头到结尾未经删减的事情的全部。至少这次拉克劳和莫菲做出了对批评原原本本的回应：这不仅重复了批评，简直和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两样。任何读者都能轻易证实这一点，这里提出的作为对我的批评真正解释的一部分，是简单地把批评"踢回来"作为回答。我自己理出了他们的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而世界不是，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为了应付它而成为二元论。② 但是他们作为结尾的这一点，是任何认真回应过程中的一个起点。为此，我得指出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它仅仅通过在任何表象和谱系中规定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元论；然后，通过漠视所有的概念性事物，把"自发性"、政治主动权、霸权、相对自主等等作为它本性之外的东西；二元论的另一半也是如此。我清楚地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把粗制滥造的版本搁在一旁，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既是一元论又是二元论，而不是把二者简单地结合起来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③（在这儿我有意被误构：很明显，我不想成为拉克劳和莫菲，而是一个"守规矩的"多元论者，像在上面和以前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作者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好比所有人都是素食主义者的观点一样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大多数人是带有"二元"饮食的不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建构方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唯一基础就是我接下来要确定的，拉克劳和莫菲下面会提到。我觉得，因为他们只是"目的论"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史，因为他们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对待确定的概念，当他们的思想与历史唯

---

① PM, pp. 56 – 7.

② WA, p. 99; PM, p. 58.

③ PM, p. 63.

物主义不协调时，他们就把这些表述为（追溯性地赋予他们自己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协调的东西。为此他们回应说，没有比他们走的路更正确的其他道路了。历史“总是当下的历史”，通过“用当下的视角来质疑过去”而建构历史；“没有自在的历史，只有对它的多重反映，这有赖于质疑它的传统”。[①] 通过阐述没有争议但却与此无关的真理，他们再一次逃避了问题。或者更糟糕，历史学家或社会哲学家不是一张白纸之类的东西。因此，如果今天有些人对正义的概念感兴趣，他们有资格依照兴趣重读马克思，并且表明他如何被这些思考所打动，尽管他的文本公开否认这一点。但是通过精确地参考文本及其上下文，他们不得不出示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所有独立的证据。人们不能脱离现在的视角来制造自己想要的历史。实际上（一直带有这种哲学倾向的）拉克劳和莫菲正是用其他人的方式提出：似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可以通过说明它在解释什么而获得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二元论，他们需要证实一些逻辑上的不一致，比如，葛兰西的霸权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列宁主义的政治联盟，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卢森堡的大众罢工，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之间的不一致。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不一致。通过把这些概念和论点置于另外一些阴影亦即未来的“推论”中，他们仅仅制造了一种不一致的表象，只是说“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无法回应批评的。一个人能做其他人不得不做的事情，用论点和论据来回应批评，并给出理由——如果有的话，从这种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值得认真对待，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超出事实视角依然是一种视角。

或者这种视角可以自给自足？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讨论的作者在他们文本中的其他地方宣称的“基础主义者的发明”也带有相对主义意味?[②] 也许吧。但是想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总带有这种哲学倾向），因为本质上，直到思想的最深处都是很明确的。因此，没有“历史自身，但是……有对它的多重反映”。那么，这又是什么呢？让他们随其所愿吧。如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是自足的，对我们三个来说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他们喜欢这种特殊的黯淡的安全保障。但是对我来说，我仍会尽我所能地劝说那些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

---

① PM, p. 59; WA, pp. 99 - 100.

② WA, p. 85.

现在我们对这种建构方式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书中坚持认为，有一种“象征逻辑”支配着卢森堡的大罢工和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思想，我表示怀疑。这是他们对于她的没有根据的偏见。他们认为我没有提供任何论点，只是“列举”。因此他们指出我把她的思想拆解为十三个独立的要点。他们曲解了这些思想，我所列举的都是我的观点，又怎么能够论证它？除了用尽可能详细的篇幅来列举出她的大众罢工的观点，使得读者能够掌握材料（文本证据），以便自己对于有争议的解释做出平衡和判断。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会同意”的。而我仅有的“列举”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奇怪的是，从革命经验中，他们挑出且仅挑出了那些很适合他们“象征性”解释的清晰论述，也就是说，为了工资的罢工在特定的环境下象征着反对作为整体的系统，就像“玫瑰”能够象征“爱情”一样。列举出的别的一堆观点，所有其他的“逻辑”或者因果：通过工人阶级新阶层的加入，使组织得以加强，军队向罢工个人射击，社会主义者煽动的结果，在加深的贸易联盟中工作，使用新获得的政治权力等等，他们不愿谈论这些，更鲜于对读者解释。这样，一个复杂概念的一个方面就被变为它的中心“机制”。因此，通过准确地重复一遍同样的事情而不增加新的说法，就是对批评做出回应。[①]

关于卢森堡有很多回应。但是我批评他们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处理方式问题，他们的回应要少一些。对于阿尔都塞：保持沉默；对于列宁：保持沉默；对于托洛茨基：“理论上”例行公事的阐述（一段之内有四处斜体）来回答相对自主的概念对所谓的文本来说是核心的，说他只是简单地退回到不成熟时期的观点；还有一两处脱离了它们文本中的位置，这足以证明他对不成熟时期观点的依赖。但是在同一文本中（仅仅是简单地回应了批评）有六处关于“相对自主”的阐述和通篇关于他最初对此问题所作的文章中支持俄罗斯和西欧国家历史性的比较讨论。通过拉克劳和莫菲良好的平衡感，得到一种理论分析。关于伯恩施坦、索雷尔和葛兰西呢？仍是沉默。[②]

因此，对于他们书中的第二个批评，作者们只好提供更多单纯的重复，通过劝说性的推理语调表现清白。除此之外，在“逐一”的回应中，通过一些有趣的空隙来回应无法弥补的沟壑，他们绕过或避开了他们假装回答过的四点质疑，而《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对马克思主义阐释意向的描

① PM, pp. 59 – 62; WA, pp. 100 – 1; in reference to HSS, pp. 8 – 14.

② PM, pp. 62 – 5 (and HSS, p. 71 for the two paragraphs); WA, p. 100.

绘，则有一点蛊惑人心的装腔作势。

3. 无效

我的批评详细指出了拉克劳和莫菲社会理论的核心缺陷："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的概念。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说，不能通过政治话语，比如"要素"或是"契机"而产生身份接合（即，作为构成，分别在既定话语的内部和外部）而不陷入"本质主义"；他们满足于居于两者之间。然而，我指出实际上这意味着系统的概念推诿。针对阶级同一性衰落的思想，内在性（接合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构成）是至关重要的，外在的"固定性"在支持"不固定性"时被消除了，似乎内部就是总体。但是接合话语导致了总体性的结束，它支持"多元主义"，诉诸外在，使某种外在的固定性获得许可。我认为：第一，这里没有使用清晰、一致的标准，只有为了便利而随意使用固定性/非固定性、内部/外部等等；第二，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假设的批评是完全无效的，因为它依赖于推诿的一方（没有外在的固定性)，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构成的身份；第三，概念近乎空洞，因为它不能解释不同政治话语的命运，除了求助于包括"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范畴。所有这些展开了好几页，占到文章的六分之一。[①] 我细述了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以及他们极力呈现的核心思想。我推进了对他们的批评：我相信这个批评系统、逐步、明确、清晰，有实质性的引用和完整的参照，详细地分析了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两人的回答甚为简短。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4. 规范

下面一个问题是他们著作中规范的缺失。当进步范畴、客观利益、"'人性'的人类学假设"、"普遍话语"都被拒绝的时候，我问道，他们"进步论"的基础何在？决定政治方向规范的基础是什么？拉克劳和莫菲以专业的多元论者的勇气开始说了：如果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就不容许大家"讨论"，那么就不存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但是由于"政治性的推论和偏好的可能性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

① See PM, pp. 67 - 75.

大可不必介意讨论之外的确定性。而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1]我当然得考虑这件事。事实上，经常讨论的理由可能是琐碎的，是“各种各样”理由中的一种。它们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简要地说一下人道主义话语。作者们没有否认人道主义价值的有效性，他们只是认为，人道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建构，他们喜欢这样说。然后只是讨论了人道主义的“出现”，以及这种“多元建构过程”“业已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话语表象”等等。但是“它是建构出来的”无法成为我们偏好它的理由，正如我没有告诉拉克劳和莫菲的，这类事物中的每一个都是被建构的；他们所看到的对人道主义构成威胁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都是被建构出来的。[2] 可能他们（从外部来说）在积极的条件下提到，人道主义价值的产物足以使他们可以不必解释理由。但是有点牵强，因为他们选择的价值涉及到“人”的人道主义概念，涉及到“无条件的‘人类’”。他们不会费力解释，“人”的概念如何优于另一个曾把人性排除在外的概念，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才成为选择它的理由；事实上又如何能认为“人”的概念（从内部来说）没有“任何人类学的基础”。这样的矛盾让人困惑，我已经注意到：他们诉诸于人的能力概念，而不涉及任何人性。如果曾有一种左派陈旧的正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或是“后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现在只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力量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那都是在否定人性。把最好的三年用于辛苦的争论，通过详细的推论来反驳它，我并不看重，关于必然性的说教和关于人性观点标准的推理，它们“可能是天堂的礼物”。至于其他，作者的见解也许间接依赖于他们公开抵制的假设，得出了标准化的“决定”内容，这一点我已经指出了。作为结果的自我矛盾和“间接”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表达：在话语的话语中，关于“人”的话语获得了外在于人道主义话语的认可，因为“人”本身不能作为原因。

第二，对拉克劳和莫菲民主革命概念的简要说明。这是关于话语的另一种话语。因为，如果你想知道他们为自己偏好的民主政治立场提供的理由，你能够发现的只是下面这些：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是本质对抗的，只是平等和权力的民主话语使然。这是一种强化论点的方式：单纯无知的重复，像前几次一样，但是现在甚至没有提示已经受到了批评——尽管被重复的东西毋需捍卫；只是假装捍卫自我而已。按照这种话语，资本家和

---

① WA, p. 81.

② 为什么他们在此不提“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

工人的关系也许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的（以及由此而来的镇压等等），但是按照另一种话语就不是这样的了，我认为按照另一种话语，这种关系不能被建构为对抗性的，因此这两种对抗的观念没有形成特别的规范。我们仍然需要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偏好这种话语而非那种话语。现在，试着把平等作为理由（不仅是“话语社会学”中的目标），而不依赖于任何他者，包括最低限度的人性概念，或是基本的人类需要和人类品质；也不依赖普遍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即普适性的范畴。如果到处适用的话，平等和人权的话语是“普适性的话语”，这里拉克劳和莫菲轻易地消除了这些话语，它们被彻底剥夺了作为理由的可能性。①

我们之前看到的对批评的诸多回答都是一种不幸的失败：它只是一种关于理由的话语，不能接合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失语的话语理论，不能指导任何事。

5. 本质

这种次要的言论在道德上处于真空状态，奇怪且推诿，原因很清楚：拉克劳和莫菲冒险从他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也许是“本质主义”，因为他们毫不吝惜地使用他们最后的概念。客观利益是一种“本质”；人类本性是一种“本质”（因此，接下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了）；过程是一种“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是一种“本质”；生产关系是一种“本质”；党派是一种“本质”；革命是一种“本质”；社会是一种“本质”。构成社会的各种独立“要素”的“本质”……对于有机的理论概念和真正的还原论之间的区别缺乏标准，变成对严肃思想的打击和一种蒙昧主义。人们可以坚持认为人有本性，（却又）不把它作为一切事物的源泉和中心，不否认社会的复杂性等等，它起一种确定的解释性的作用。有着重要解释作用的分类会涵盖更多内容，不只是建立一种本质主义。它们对于有目的的探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却处处发现被还原的“本质”，甚至在他们熟知的解释性的分类上。本质会“显现”给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人，以符合他们的标准，即他或她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即便不完全是，也会是二元论的。我曾经对他们的思想提出过论证的依据。然而，在我的文章中，整个批评和质疑的线索是很清晰

① PM, pp. 75 – 78; WA, pp. 101 – 5 (and HSS, pp. 3, 116 – 7, 152 – 3, 181, 188) .

的：为什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就比阶级的“本质”要少，为什么伯恩施坦能继续使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满足于他作为二元论者的需要，作者们出于需要求助于此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们只是选择了平静的失语来应对。①

6. 政治

我注意到一种趋势，在某些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书写中，似乎民主关怀和民主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他们以权威主义的形式混淆了整个传统，因此也就忽视了另一方面：民主的遗产。当然这是由于存在着一个传播非常广泛的非马克思主义潮流，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没有兴趣。因此，这股潮流也来自于那些公开表示与过去的马克思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不管怎么说，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在现实中被视作斯大林主义等价物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对这篇文章的“回应”是很特殊的，难道杰拉斯没有听说过斯大林主义吗？他们这样发问；而且一党体制除了重点强调审查制度外，还有其他内容吗？也许这样的“回应”在那样的环境里出现会让人产生疑问。很简单，他们从我的论文中转述了我的话，我也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但不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问题。但是他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斯大林主义如何？坦克大炮又怎么样？对于那些“不住在火星上，不住在杰拉斯地盘(Gerasland)”的人来说不是自明的。在他们的行文当中，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与现实的迫切需要隔离开，而快速的不费力的反驳是最愚蠢的行为。他们恰恰忽视了：他们引起读者注意的我的文中语句的整体语境，清晰地通过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通过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对比，表明我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遗产。我认为前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对革命的“背叛”，他们在自己的行文当中先前两页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斥责，这是事实。因此，我确实了解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事实是怎样的，你就应当怎样去“建构”它。就这样一个句子，便被再现为“不是自我”的所思。这也使他们从真实回答的需要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从辩护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民主的选择中解脱出来。②

拉克劳和莫菲遇到了麻烦，在我对他们的评论或者我曾经写过的其他东西中他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证据，我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联

① PM, pp. 47－8、56－8、64、70－1、74－5, and *passim.*

② PM, pp79, 82; WA, p. 101, and n. 28 pp. 103－4.

系是毫无问题的，这也是迫使他们重新建构新的理由的原因。他们会发现，实际上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问题是有永恒联系的，在1985年以前对于社会主义多元化必要性的认识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十年前就已经确切地形成了；他们会了解到，不仅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资源，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它的论述都是真实的。我汲取了自己前些时候被批评时的教训，我拒绝把党派问题化（没有单一的所指，否则这一观点又会被说成是“本质主义”）。[①] 这恰恰是我的陈述当中被他们诟病的一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设想，而且已经被深入地思考，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想、目标和事业，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必须的连续的组成部分。把这一传统说成别的什么都是不足为道的。这并不能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就没有问题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组织形式、权利和程序的理论精准性方面，在灵活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宪政秩序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必承载更大的压力去面对其他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们和我们来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在这一问题前需要冷静，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相关评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我注意到，很多作者几乎没有对这样的前景提供什么东西，这样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只是在不断地重复“激进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在我的论文中对于拉克劳和莫菲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看法，然而他们再一次提出来并原地打转，只是为了强调独一无二的开场白，以他们自己无法模仿的自由方式进行解释说明。他们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式：“自由国家的团结和民主的改良”，他们的激进主义会使大卫·欧文尴尬不已。[②]

每一次辩论，每一个论点，拉克劳和莫菲都灵活地贯穿了什么思想？我认为他们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成同样的社会类型，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他们使用“集权主义”指称左翼运动和法西斯主义共同的东西，谈到左翼运动时，他们把这一学说的源头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中，因为“要力图建立一个权威的理论组合”。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同样的社会形态，他们要对这种看法做出回应，这可不是简

① See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pp. 183 - 5, 188 - 90, 193 and passim; 'Classical Marxism and Proletarian Representation', *New Left Review* 125, January/February 1981; and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 Verso, London 1986 (in which that essay is reprinted), pp. xiii ff. and the essays in Part II.

② WA, p. 105.

单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捍卫或修正他们理论中认为集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根据的思想。这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的学说作为一种“回应”，通篇概括出来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定的诽谤。在结尾处，拉克劳和莫菲谈到“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尊严”。那么，他们就应当说一说，所谓的尊严，是不是就是对审判、大屠杀和古拉格集中营负责呢。①

偏离（Ⅰ）——存在

我文章的读者不可能弄错的主要观点是：反驳拉克劳和莫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批评他们偏好的社会理论，这占了40页中的38页，是整个文章的95%。其他的两页是关于本体论中的一个问题：客体是否存在于思想之外。在一些介绍性的评论之后，拉克劳和莫菲开始把他们回答的40%集中在这两页当中。为什么呢？这里提出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无可置疑的，但是他们未能回答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伪装式的回答。我对他们提出的社会哲学的两个主要批评，他们保持完全的沉默（关于元素、时刻和附属、对抗、压迫），这不禁使人怀疑他们是如何掌握平衡的。在任何情况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从不担心无话可说。我们列举几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和作者：维特根斯坦，汉娜·皮特金、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理查德·罗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贝克莱，海德格尔，查尔斯·泰勒、W. T. 斯塔斯、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萨特、W. V. 奎因和尼采。我们到达了哪一个阶段呢？正像我说的我们正在起点阶段：作者们正式肯定客体外在于思想而存在，但是他们所说的其他内容抹杀了这一观点，削减了这一理论的价值。因为，一旦你试图给这些客体赋予内容时，你要重视的是它们的存在（being），而不是“实存”（existence），存在（being）是一种特殊、相对的话语。你无法谈论任何外在于思想的存在，只有那些事物可以。我争论的就是这个观点。②

现在轮到我来反驳那些沉默不语了，我不会讨论：第一，拉克劳和莫菲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想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我还会对谁吹毛求疵？第二，支持“足球只是处于社会建构的规则系统之中”的观点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我设想有前社会或超社会的足球，但那只是原始的足球。

① PM, p. 81; WA, pp. 105 - 6.

② For this section, see WA, pp. 82 - 92; PM, pp. 65 - 7.

让我们以石头为例。如果没有人类，作者们会说，“那些我们称为石头的东西仍然存在，但是它们不会被称为‘石头’”，因为缺乏对其加以分类和区别的语言。为什么害怕引证？“石头”这个词，它的意义，它的文化联系，人类用的真正的石头等等，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称之为石头的物体存在，那么石头就存在，因为它们是“我们称之为石头的那些东西”和“石头”的共同所指的表达。先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称作石头的物体存在，它们有什么特性吗？例如使它们成为一种不同于我们称为水的另一种实体，又是什么会把我们称为鸟的东西区别于我们叫做饮料的东西？如果有一个肯定命题，石头（简称）和水和鸟，即使在话语和分类缺席之时，仍因它们的特性而相互区别，那么，一部分被某些哲学家称为存在着的物体，似乎从它们存在伊始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能说清楚，在思想之外到底存在着什么，以及在人类史前时代就有的内在本质。存在为了成为话语被倒空了所有的内容。很容易看出为什么相对论在这种观点下似乎是“一个假问题”，如此空洞的存在不受其他存在的外部控制，任何能控制它的希望都是误导。

现在，让我们重新考虑这种看法：“由于所有的‘经验’都依赖于精确的可能性条件，所以主体不可能……是社会关系的起源，即使在存在的最低限度上被赋予了可能的经验权力。”我不赞同这种逻辑，它只是以存在另一种（话语）为由漠视经验（权力）的条件。[①] 他们这里的批评有效地取消了话语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拉克劳和莫菲讲到“话语的可能性条件”时回应道，它是“无意义的”、“荒谬的”。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条件不是要成为话语，而就是话语本身。有像自然权力、人类的生物成分、一种确定类型的头脑这样的条件存在么？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说。如果不把他们称为存在的东西放回到他们称为实存的东西里面，他们就不能说“是”。但是如果这样的条件不存在，我们就不得不说所有的自然（本质）都是一种推论的建构。他们两人事实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自然事实也是推论的事实”——只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自然的观念（！）”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我则认为，这种（像一切）相对主义根源于混淆了阿尔都塞主义在真实物体和它的观念——知识的对象（目标）间做出的区分。

还有一件事。同等地看待两种“建构”，我把地震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上帝发怒的表示，后一种建构可以称为迷信。作者们认为我把自己

---

① PM, pp. 68 - 9 (and HSS, p. 115) .

视为“真理的功能”，一种“绝对精神”的体现。[1] 似乎我应该反过来考虑，这是一个严肃论点，而前一个不是。之所以不把它作为严肃的论点来看待是因为，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简单地把宗教信仰作为形成世界观的充分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用“千禧年”、“天堂”、“上帝”来抹杀客观利益或是人性的概念，而把我看作这些概念的崇拜者。但是当我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绝对知识、透明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和我们当前的知识程度有关）时，我们就得到了“真理的功能”。它根本不是论点的堆积，不是像他们说的，是杰拉斯用来树立自己形象时由于缺乏实质性的论点而需要引入的论点。我们只能再一次思考，关于作者们自己建构的话语“模式”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杰拉斯似乎不能建构关于宗教信仰的假设，拉克劳和莫菲用这个假设嘲笑包括杰拉斯在内的其他人，甚至在这里字里行间地警告他：杰拉斯把自己看成什么？看成一种绝对精神的化身。

现在我认真地对待这个论点，其出发点是，如果作者认真地检视他们的哲学话语，就不难明白他们按照真理的价值来区别地震和迷信这两种“建构”的理由，是两种可供选择的话语“存在”的结构。这里我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愿意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因为，你不能只说地震是上帝愤怒的表示，艾滋病也是，另外饥荒和广泛的贫穷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情况是人类应受的刑罚，而不是非道德的病毒作祟，而对第二种情况我们则祈祷有最好的方式解决。拉克劳和莫菲不会走这么远，为什么不呢？

偏离（Ⅱ）语言

我在谈论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思想和观点的看法时，一点也不委婉。作者们不高兴，报怨我的文章属于谴责类。他们请他们的读者来决定如何看待我“这样的语言”。[2] 通过对这件事的观察，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首先，关于我指责了他们，我要说事实正好相反。我和他们的思想打交道，用大量细节来与之辩论，用了两万多字的篇幅。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打交道的结果，但是作者无权只期望读者的赞成。另一方面，像上面所说的，他们没有给我同样的礼貌：直接地回应我提出的真正问题。对于指责的抱怨，只是他们试图从论点的平衡中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带有单纯

① See WA. N. 17, pp. 89 – 90.

② WA, p. 81.

自我谴责的意味（追随者、谴责者、小官僚、崇拜者）。在应该积极负责的活动中，这副肖像中的一些人适时地选择了沉默。拉克劳和莫菲在这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利用了读者的糊涂（对此可以展开很多评判），好像在他们现有的话语之外别无其他。

第二，至于他们抱怨的语言本身，我无意按照他们的“回答”进一步做出反应——或收回或调和我所使用的他们书中的某个单独的表达。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他们现在用于自我保护的贫乏能更清晰地表明这本书的倾向，更清晰地表现这本书的本质和思想标准。用什么话语可以描述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呢？当我们批评说另一种可能性 b 存在时，他提出虚伪的 a 或 c 的选择，他通过简单地改变选项来回答，然后解释说：“你看，我们没有说或是 p 或是 r，因为事实上我们认为 q。”[①] 坚持“决定论”，只在最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和绝对的多元论之间留下一种选择，然后在下一瞬间指责批评者不诚实，说这是一种强制选择的方法？[②] 他们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诉诸于一种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用自己预设的棱镜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抵挡这种批评？为什么拒绝了人性的人类学逻辑假设，却认可（包含一种话语）了人道主义中“人”的概念？是谁问他是否听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否听说过除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吗？谁又通过把它称作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来回避话语的可能性条件？“蒙昧主义”“缺少……合理的限制”，那似乎公平。“理论上的放纵”也是如此，我承认，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思想领域的放纵。这是近年来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甚为奇怪的讽刺之一，作者们在自己脸上贴上“顽固的严格”标签时一点也不尴尬。[③]

我现在请读者考虑这个问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著作来回应批评？谁能比他们更有兴趣对待这些批评呢？他们要抹去的不是一两个问题，而是对全部问题一再地躲闪推诿，沉默之后是纯粹的重复，要么自我矛盾，要么离题万里，在据说是回答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象样的答案。因为前面说过的原因，我没有指责这两个人思想上不诚实。我认为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们只是缺乏真正的答案。他们无法应对他们著作的批评，于是不顾一切地打击一切，无论如何，多少也要保存某种作为回答的外在形式。

第三，当然可能有比我现在采用的更为温和、巧妙的表达方式。很多

① 这是上面第一部分回答的结构。

② 参见前面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③ WA, p. 79. See PM. P. 43.

情况下许多话可以用更加友好，不太对抗的方式说。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我一直没有把这种特殊的争论环境做任何软化，我所理解的宣战原因不同于拉克劳和莫菲所暗示的那样，是表达对他们的怨恨。他们可能喜欢这种方式，两个有良知的学者平静地自说自话，偶尔出于粗鲁的宗派主义和基础主义恶意地攻击。但是这种受伤的幼稚并没有影响到我。《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们一页又一页（他们现在有所后退）用一连串的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传统贬得一文不值，从“本质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到“阶级论”、“先验论”，以及“讽喻”、“封闭”、“千禧年”、“固定性”、“透明”，一遍遍不懈地重复，改变次序地重复。[1] 很难想像有别的书会如此大量而轻松地使用错误的术语，用站不住脚的借口（轻率的对比和解释，没有严肃的词语来辩护）来嘲笑成熟的思想作品中的困惑、忧虑和困难之处。这足以彻底贬损马克思主义思想了。但是当拉克劳和莫菲遭到了直接的反驳，他们就一点也不优雅地叫喊。

民主和知识

第四，他们的抱怨和我的回应，都是更宽泛的主题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主张认识的客观性，被认为坚持必然性、绝对知识和走向真理的透明，如此等等；然而话语理论，作为（我所说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被认为是非教条、开放、多元而民主的。这种观点简单地融合了对知识的渴望（为信奉启蒙以来主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分享）和理性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概念。但是不像教条主义的信仰那样，真正的知识总是暂时性的，要根据新的信息和证据而修改，需要定期地重建以避免出错，因此开放对“多元论”的讨论和批评，同时留有辩驳或修改的可能，这样才能获得知识。对知识的渴望和全部诉求，也只是解释而已，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必须要满足一致性规则，有外部的参照和证据，尽管有时很困难，但是一般说来，所有人都是可以获得的，正如现实本身是可知的一样。

而另一方面，用绝对的武断和非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时，则谈不上什么民主。拉克劳和莫菲“民主地”阻碍了每个人走向（可以有意义地被称为）真理或是客观性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所有的相对主义者，包括他们自己，公开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们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建立了真理的秘密法庭，神秘地只允许他们来审判：作为“本质主

① 参见 PM, p. 45 n. 8.

义者”，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作为经济主义者，不能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作为决定论者，误解了历史真正的开放性等等；允许他们自己使用一种外部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语言（不说“这是我们愿意看待它的方式”，而是“就是这么回事，这些就是发展”）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允许他们得出冗长的、不知疲倦的、没有结尾的“就是这么回事”，与此同时，相对主义者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就把合理性的知识和一致性一起打发给恶魔。

拉克劳和莫菲抱怨我对他们的批评，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导致（他们）写作的心理动机的绝对规定”，说我明确地指责他们屈服于名利、政治压力、自私和年龄的压力。其实我没有。他们在这里指涉的是我文章导言中的概要性评论，其中，我用概括性的语言提出了问题：这种压力在与我同时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右转的过程中起多大的作用？在这种转向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① 我承认，通过把这些独特的思考放在批评性文章的开头，也许已经制造了被误解的基础。然而，我很谨慎地强调，我没有质疑作者的真诚，正如他们自己承认但是选择了漠视。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思考都是合理的，因为除了想像外根本没有遭到真正的社会压力的他们，追求理想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善待自己，他们准备解释整个世界，但是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情况也拿出来讨论，似乎他们自己不受动机的推动，与利益无涉，是真理的单纯追求者。然而一般说来，我们有理由把压力问题提出来——尤其在现在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下，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告别的人缺乏深刻的思想实质。如果拉克劳和莫菲认为这个问题与他们不相关，那很好啊。这种奇怪的自信使他们屏弃了作为理想的“透明”。我仍然不否认这一点，人们能够被他们思想的力量或思想的表演所打动。②

但是这就够了。他们两个表达了伪装的惊讶，似乎我本该把更多的篇幅用于讨论他们书中（我认为）消极的地方。这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解释有所贡献时，创造和占有概念并不一定是真理或品质

① WA，P. 81；PM，pp. 40 – 2.

② 谈到我的论文的导引，穆泽利斯写道：“争论语境中真正关键的，是几乎没有弄清理由，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在作者和马克思主义断裂背后的理由，而过多地考虑他或她不得不说的认识上的有效和无效（*New Left Review* 167，pp. 108 – 9.）。这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用40页篇幅讨论的是拉克劳和莫菲观点的有效性和无效性。。

的直接功能。因为他不是还原论者，他也知道对神秘概念的批评是必需的，然而却试图弱化这种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寻求一种非常特殊的理由。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实质性的攻击和非实质性的替代，利用了现今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充分关注，在他们回应的导言和结论中提到了好几次，但是思想工作并没有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只要提出严肃的问题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思想目前面临两种主要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宽广和强大，面临着各种理论问题、理解问题、分析和经验问题，比如资本主义性质是否改变了、社会主义形式和原则是否名副其实等等。持有不同信仰的社会主义者普遍认识到，这些答案不容易找到，只能是一种长期努力的结果，必须成为一种集众人智慧的集体努力，通过公开辩论，仔细权衡其他的观点，进行革新、修改和校正，还要伴随一定的热情和承诺，才能发现和认识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现在也面临着一种异常敌对的政治和思想环境。那些准备抹杀它的人从四面八方施压、嘲笑，使它的希望化作幻想，使它取得的成就愈益渺小。

在当下和未来的趋势中，社会主义思想担负着比它应有的责任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用清醒的精神指导对它的讨论，认识到其现实道路的复杂性，即：真理和谬误都在历史思想的地图上探索。而对现有观点的讽刺和简化，通过轻易削减导致其思想短路，或是轻率地使用多次回答过的粗俗化论调（至于粗俗化，今天不仅被马克思主义而且被相当数量头脑清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注意），这都是一种双重失职，它阻碍了富有成果的社会主义辩论，加深了当前辩论困难的外部环境。对我们所需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来说，这不是合适的类型。无论如何，现有的东西太多了。

作者：Norman Geras

文章原标题：Ex - 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169，May/June 1988，p34 - 61

（译者：李百玲，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助理研究员）

绝对的意志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批判

［英］迈克尔·拉斯廷　著　　吕增奎　译

在新著《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言中，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试图“批判并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话语表层”，努力使传统上与葛兰西相连的霸权思想脱离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把它重构为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虽然这项计划按道理应该整合各种公认的社会主义目标，但它的组织核心不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也不再是社会阶级的历史角色。相反，拉克劳和莫菲把自己的理论干预置入到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危机之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危机部分地源自于那些与自封的社会主义政权有关的“失败和失望”。更为明确的是，拉克劳和莫菲也是在回应新的社会冲突形式——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性的诞生，他们说：“这种新的社会冲突形式为一种走向更自由、更民主和更平等的社会创造了潜力，但并不只是创造了潜力。”

不管拉克劳和莫菲在语调上如何恭敬并且在意图上如何声称仍是社会主义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是一个重要的背离。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拉克劳的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①] 颇有影响，并且推动了一种对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对自主性和政治影响的宝贵的和重要的重视。这项工作非常及时。由于产生于西方右翼民族主义的上升时期，它为分析这种现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范畴。另一方面，莫菲的新作讨论了葛兰西。因此，两位这样的作者试图解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基础，这无异于一种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决裂。

现在，拉克劳和莫菲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论证逻辑扩展到这一点上：消解它的原初假设。鉴于这本早期之作的结构主义方法可能暂时——即使不安地——停留在富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之上，因此，《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后结构主义论证批评了它的基本假设。在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第一本书中，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支配体系中的本质，而支配体系仍然被定义为主要是物质性的。“召询”（interpellation）概念把主体性作为客观存在的支配制度的象征性或想像性建构物加以讨论，而后者则构成了维持统治制度权力的身份和角色。尽管那些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作家——例如拉克劳——把自己的大多数分析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支配模式，但对于其他物质层面上的社会构型（social formation）的决定性意义，乃至对于它们最终的因果优先性，他们保留了一种策略性的信奉。不过，《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把分析的基础从复杂的结构转移到各种话语上。在那些复杂的结构中，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个环节；而那些话语则拒斥了关于一种束缚社会意识的外在现实的思想。

拉克劳和莫菲抛弃了经典的物质和精神二分法，因而拒绝了那种认为精神现象被限制在物质世界所建立的各种界限之内的理论。他们驳斥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的依据是关于“话语的精神特征的错误假设”。针对这一点，“我们将肯定每一种话语结构的物质特征”。由于与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著作保持一致，世界被重新定义为文本或他们所说的“解放话语的无限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社会的多元性产生于那种无限的互文性之中”。

既然任何外在的或客观的世界唯有通过其在话语中的建构物才是可知的，因此，我们只能留意话语或“接合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的形式。拉克劳和莫菲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政治规划，他们认为这种规划符合一种激进民主理念对一种以物质和历史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替代。对他们来说，社会实践必须优先于任何把政治植根于对客观条件的分析之中的企图。

一、“霸权概念”的历史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包括四大章，它们令人难忘地逐步展开了它的论证。第一章“霸权：概念的谱系”把拉克劳和莫菲的霸权观置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之中。拉克劳和莫菲发展了佩里·安德森的洞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哲学危机是其主要的知识分子远离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拉克劳和莫菲以话语而非传记的形式发展了这个观点，从而考察了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的逻辑。唯物主义的经典模式预示了成功的革命实践的匮乏。这种匮乏导致了一种理论的沟壑，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留意观念的历史作用和上层建筑来在这种沟壑上架起一座桥梁。

拉克劳和莫菲回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三种此类反应，他们将其分别称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形式、改良主义形式和革命工团主义形式。在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主义——由工人阶级在革命行动中实现的统一——中，拉克劳和莫菲看到了对自己命题的预见，即工人阶级是象征性的构成，而且在其通过动员实行它的集体的自我定义之前，它并不是一种客观实体。他们说，“阶级的统一因而是象征性的统一”，断定“这无疑是卢森堡的分析中的最高点”。他们认为，卢森堡关于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正统”假定是无效的。“在自发主义理论中，没有什么在逻辑上支持她的结论。相反，正是自发主义的逻辑似乎意味着最终产生的统一主体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应该是不确定的。”

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更加简单化的，因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僵化了关于客观存在的阶级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并且试图把教条性的理论封闭性强加给一种在经验上早已不可靠的结构。“科学”的保证和知识分子的权威被扔进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巨大裂缝之中。许多其他的思想策略被采用了，成为对陷入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辩护。这些包括“对表面现象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各种现象（例如民族主义）的真正阶级特征被用来反对它们的表面特征——和“来自偶然性的论据”——在这种论据中，来自基本发展规律的现实分歧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和不相关的。在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中，“形态学预言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预言的立即变形不再那么确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另辟蹊径，其方式更类似于拉克劳和莫菲的方法。他们转而“注意上层建筑领域，因此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和问题重重”。由于承认“成熟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他们扩大了偶然性观念，弱化了历史必然性概念，并且除了工人阶级的能动性之外，还确定出不同形式的能动性（angency）。虽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帮助了拉克劳和莫菲的社会民主思想，但他们并没有自始至终彻底如此。“他们未能达到这一点：结束二元论和消除形态学上的必然性的环节。”换而言之，作为古典的社会民主派，他们保留了对各种关于物质基础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长期轨迹的思想的信奉。

像看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人们用批判的同情来看待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是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先驱。或许为了消除针对伯恩施坦的长期偏见，拉克劳和莫菲认为，他的修正主义并不等于改良主义或渐进主义，尽管实际上他是这两种倾向的同盟者。修正主义理论家和正统理论家之间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尽管正统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裂和分化特征将通过基础结构的变革得以克服，但是修正主义理论家认为这是要通过自主的政治参与来实现的。”由于正在增加的中间阶层、更强大的国家和内心满足的工人阶级，伯恩施坦被视为成熟资本主义

的理论家。他通过社会民主党来寻找更自主的政治行动形式和工人阶级的统一，由此对这种复杂性作出了反应。拉克劳和莫菲批评伯恩施坦继续把这假定为阶级的统一。他们认为，阶级必须不仅以在经济层面形成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外在”关系为前提，而且必须以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为前提。“工人阶级日渐增加的经济力量、社会立法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人道化’，这些全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家化’；工人不仅仅是无产者，而且已经变成了公民。”因此，根据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国家内，社会组织的功能比阶级统治的功能有一种更大的影响；民主化把国家改造成“全民的”国家。但是，伯恩施坦未能使阶级理论的终结在逻辑上成为必然，他仍然断言他所提出的差异中的统一将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之上。

拉克劳和莫菲还批评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根据是历史规律的说法。就此来说，他们本来会更同情伯恩施坦向伦理层面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则是维持非决定论的历史进步观的一种手段。但是，对拉克劳和莫菲来说，伯恩施坦仍然站在一种前后不一的妥协立场上，不仅维护主观因素的重要性，而且也坚持马克思因果理论的局部有效性。拉克劳和莫菲既不接受这种残余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接受包含在关于最后进步的伦理观中的另类形式的“本质主义”和目的论。他们维护终结所有本质主义的必要性，并且指出索雷尔是第一个这样的人，因而证实了其章节标题的尼采式反响。

拉克劳和莫菲把索雷尔视为自己激进的意志主义立场的先驱。“我们在索雷尔那里不仅找到了关于‘偶然性’和‘自由’领域的基本原理，它们取代了必然性链条的破碎环节，而且发现了一种思考‘偶然性逻辑’、总体化作用领域在其中得以重建的新地形的努力。”索雷尔吸引他们的是“激进主义”。由于这种“激进主义”，索雷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后果。索雷尔不仅批评了历史必然性思想，也批评了那种认为斗争的统一必然需要成为“阶级”的统一的思想。道德和表达性的因素决定了“集团”（bloc）的构成。“集团”是一个葛兰西随后在更加正统的框架内加以发展的术语。社会统一的可能性因而被归因于某些群体强制推行自己的经济组织思想的意志。索雷尔的哲学是一种行动哲学，受到尼采特别是柏格森的影响。未来是不可预见的，并且取决于意志，而统一性仅仅由冲突构成。“一旦其同一性不再建立在基础结构的统一过程（在这个层面上只存在混合物）之上，工人阶级就开始依赖与资本家的分裂，这种分裂只能在反对资本的欧洲中完成。对索雷尔来说，‘战争’因而成为工人阶级同一性的条件。”索雷尔把从工人阶级进入民主过程的收编中产生的种种妥协当作它的解散和“消散”，进而成为总罢工“神话”（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来说就是象征性的构造时刻）的鼓吹者。

在总罢工的“神话”中，统一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全方位斗争中得到实现。拉克劳和莫菲注意到，这种集体统一的观念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在索雷尔的追随者中，民族主义乃至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替代神话，这种神话有能力保证反对资产阶级堕落性的斗争”。拉克劳和莫菲竭力指出，这些右翼的结论并不一定来自索雷尔的论证，但似乎未受这些右翼的结论与索雷尔的论证相一致这个事实的困扰。

二、霸权的浮现

第二章“霸权：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追溯了这个概念在列宁主义传统和葛兰西著作中的发展。拉克劳和莫菲的目标是要证明被关于政治行为和霸权行为（或多或少被使之相等的）的思想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不确定性要素与任何关于经济或结构确定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他们由此认为，最初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而被采用的东西在逻辑上导致了它的废弃。在这里，就像在导论中那样，拉克劳和莫菲宣布并证明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莫菲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的解构非常有趣。他们从一种被置换的叙事（narrative）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核心思想战略。（叙事是那种各种历史主义和结构的模式借以能够书写为历史行动者的实践的形式）。党及其领袖取代了工人阶级。在落后的条件下，借助并不是由工人构成的群众，这使党作为所有先进阶级的代表的角色更加重要。“结合和不均衡的发展的规律”把社会理论的偶然性和多元性组合为“正常”进步的异常情况。所预言的苏维埃革命对西欧革命的发生的依赖，使东方的“第二位叙事”（和它的核心的政治实践概念）瓦解成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的正统的“第一位叙事”。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霸权的命运依赖符合其规定模式的历史规律。

拉克劳和莫菲断言，只有当霸权概念既脱离阶级又脱离历史规律的时候，民主实践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人们承认民主任务没有一种必然的阶级特征时，以及只有在以彻底的方式放弃阶段论时，群众民主实践的深化——它避开先锋者的操纵，也避开阶级霸权与民主任务之间关系的外在性——才能实现。”拉克劳和莫菲宁可论证阶级是由它们所承担的霸权任务构成的。关于社会集体的霸权性统一的思想，应该被用来取代前定的阶级之间的阶级联盟。政治不可能是利益的代表，因为没有外部界定的利益要代表。最后，生产关系并不是首要的，而且社会的能动性不能被等同于社会阶级。

拉克劳和莫菲声称，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中发现的极权主义霸权解释，采用了每一个这些假设的对立面。关键点是对列宁主义实践的认识论辩护。在肯定列宁主义实践的行为中，这种辩护（以党的领导地位的形式）否定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这是因为它把党的权威植根于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之中，将其定义为对物质基础中的力量的正确理解。“那种授予党的特权不是‘地形学的’而是‘认识论的’：它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并不是建立在政治层面的效力之上，而是建立在由特定阶级视角所享有的科学垄断之上。”

根据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战略的极权主义和先锋主义（vanguardism）源自于他们对本质主义阶级范畴的使用。布尔什维克知道工人阶级的指定角色，并且由于对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解而被授权为它的代言人，所以通过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有理由追求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纯外部的因而是操控性的关系。斗争在军事上被视为各种实体之间的斗争，这些实体的最终历史利益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要是社会主义曾被看作是一种由（只能被政治实践本身统一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决定的规划，那么俄国可能已经建立了一种更加多元和民主的政治。布尔什维克的确有一种结合（conjuncture）——结合的和不均横的发展——理论，也有很高的政治组织和决策才能。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源自于他们残余的正统性。

把斯大林主义的灾难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固有的本质主义，这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人们的确可以认为，正是布尔什维克对关于苏联社会的客观问题的合理争论的压制，才标志着列宁主义向斯大林主义的蜕变（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认识到的区别）。武断的、没有根据的霸权规划只有通过神话、意志和无休止的内外冲突的动员才建立了集体性的同一性。这种规划实际上是斯大林在党内民主的废墟上建立的实践。自主的、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瓦解，仍然是那些时代的曲折遗产。梅洛-庞蒂[①]正确地把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决定性失败看作是它对理性的背叛，因为对那种理性地理解物质和社会限制的可能性的信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根本。如果没有这种信奉，共产主义政治就服从于苏联国家的权力和私利。

在霸权概念从阶级话语中解放出来的必然过程中，拉克劳和莫菲认为葛兰西的工作是关键的一步。他们认为，葛兰西在建构历史集团时对政治的、尤其是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的强调，脱离了关于前定阶级之间或阶级

① 参见 Maurics Merleau - Ponty, *The Adventure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盟的思想。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关系优先于结构，而且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在意识形态的地形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本身被看作是一种物质实践，因而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被定义为对物质基础的反映。“对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复合的‘集体意志’；同样，由霸权阶级所接合起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一种必然的阶级属性。”因而，葛兰西在某种程度上用替代性的历史集团思想置换了列宁主义的阶级和经济决定因素话语，而历史集团则是社会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构成。虽然拉克劳和莫菲能在葛兰西的著作中为这个论证找到文本的根据，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它决不是葛兰西的全部观点。葛兰西保留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内核”，“为解构性的霸权逻辑设定了界限”。最终，对葛兰西来说，“在每一种霸权的构型中，必定总是存在一种‘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它只能是一个基本的阶级”。拉克劳和莫菲以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结束了对霸权的讨论。这种思想是用还原论的术语来解释的，因此，现在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它。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对完全内生性的经济变化规律的信仰，它包括：“所有产生于政治或其他干预的不确定性”；完全由这些规律所影响的社会主体的构造；主体的行为，比如说，“最终可以由经济利益来说明的”主体。拉克劳和莫菲为这种基础主义的观点提供的选择是这样一种观念：阶级完全是由话语活动来构成的，没有必要借助任何客观既定的条件。他们用一种同等单维的意识形态决定理论代替了一元论的经济决定论理论。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流抛弃了拉克劳和莫菲正在批判的观点。就像拉克劳和莫菲所意识到的那样，在社会结构中非经济层面的因果重要性、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阶级利益日渐增大的区别，最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主题。他们的答案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产生的修正论证，着手开始一些论证，使之成为替代性的解释模式的有力根据。

人们可以用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讨论的修正主义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导言中，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通过共有的意识，更具体地说，通过与其他社会阶级相对立的自身意识，社会阶级才被构成为本来的阶级。如果没有意识，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集体；如果没有对自身的意识，他们将成为其他某种集体。不过，虽然汤普森强调那种通过思想和共同行为来创造自身的阶级意识，但他仍然把这个过程视为对一种客观既定的状况的意识。尽管汤普逊和像他一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从自在的阶级转向自为的阶级，但像拉克

劳和莫菲一样，他们并不认为后一种观念应该完全取代前一种观念。这是他们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必定是一种本质主义，即使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并非如此。这个思想被一种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坚定混淆所延续下来。拉克劳和莫菲反对任何类型的逻辑封闭性，认为同一性和种类（discription）都必然从属于持续的重组。任何“先天的”或本质的社会形态规律并不存在，只存在正在发生的话语进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形态得以形成和再形成。但是，就像牛顿主义者或达尔文主义者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假设“先天”规律的存在。相反，他们致力于发现那些最能够解释世界本来面目的规律。在这样一些体系内的推论仅仅是那些被确立为它的核心命题的推论。正如奎因（Quine）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① 中所指出的那样，“先天的”联系仅仅是那些由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变成我们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的联系。有些封闭性是任何持续性研究纲领的经济前提（它不可能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根源），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要被等同于教条。拉克劳和莫菲的论证使他们从关于总体的理论封闭性的教条主义（它的来源可能在于阿尔都塞）跳跃到一种对普遍的偶然性同样“先天的”主张上。

拉克劳和莫菲详细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解决问题范式——的话语演化。拉克劳和莫菲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变成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otos）所说的退化的问题转换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术语学的策略解决了解释的不规则。但是，这并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惟一方式。人们也可以把这视为根据新条件对理论进行探索性前进的修正，给予国家、政治能动性和意识形态更多的承认，同时避免堕入碎片化的多元主义。在其知识程序上，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与任何其他的生产性社会科学范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更准确地说，在大多数方面，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它们优越。我将论证，拉克劳和莫菲的论证是根据错误的哲学术语来安排的。他们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必然真理的事例（他们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合理批判），也不利于它的必然错误性。这类理论容易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理论——那些更好地说明事实的解释——的质疑，而不是那些来自对同等解释的“先天”批判的质疑。

我们应该指出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假设之间的一致性。战后第一阶段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社会理论赞同文化解

① In Willlard Von Ormo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53.

释的中心性，明确地把注意力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上，从机械论的方法转移到解释学的方法上。不管是在文化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上，还是在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上，这种发展的核心都是那种认为社会是通过有些连贯和理性的社会规范体系建立起来的观念。这些规范被视为心理的或认知的普遍概念（皮亚杰、乔姆斯基、列维－斯特劳斯），或者被视为一种永久的历史解放潜能（威廉姆斯、汤普森、哈贝马斯）。

后结构主义者已经拒绝了那种认为任何更深层的真理或实在位于意识的表层之下的观念，并且批判了所有形式的本质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心理学的或唯物主义的本质主义。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在概念网络之外不可知的各种实在的建构和解释模式，而不是在于它是一种真实现象的参照模式。受到注意的是语言的表达功能和表述行为功能，而不是给予它在描述和解释中的作用。尼采是下述思想的原初来源：语言创造了而不是揭示了世界的深层结构，定义即是权力。资产阶级理性体现在特殊的社会分层和处置形式（监狱、精神病院、医院等等）中，福柯对它的批判即是从这种观念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最初被视为一种解读无意识的精神结构的解放性方法，但却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对任何可能的意识形式的内在界限的证明，任何时候都注定要误解意识的意向性的欲望对象。人们很容易明白的是，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为什么曾经对这种思想潮流的发展如此重要，为什么只有在对各种体系的无情批判中才是体系性的。解构主义主要的哲学核心是对如下三点的信奉：非现实化；形式和表达在内容和表象上的核心性；关于意识的碎片和分解形式的观念。消解现存的表象可能是鲁莽的，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解构理所当然之物可能削弱任何统一社会的道德和认知基础，或者会削弱它的过去和未来感。从理论来看，拉克劳和莫菲支持如此彻底的解构，尽管无疑他们批判了它更虚无主义的极端，并坚称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某种固定性和封闭性的必然性。

三、新霸权的基本原理

在晦涩难懂的这一章中，拉克劳和莫菲阐述了他们自己非本质主义的霸权思想。“缝合”（suture）概念是他们在这里论证的关键。这个奇怪的外科手术比喻取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特别是取自“银幕”小组成员在电影理论上对它的应用。“缝合”是指象征和想像的功能，它不仅被对他者的消失或不在场的渴望所要求，而且也没有完全地满足这种渴望。象征性的话语被制造出来填充匮乏，然而只能部分地再现它们的对象。这一点的背后似乎是一种

关于存在对思想的第一性的思想。拉克劳和莫菲把这种思想扩展到政治领域：

> 正是这种双重的运动（即匮乏和填充之间），我们才会试图强调缝合概念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就霸权实践的操作领域由社会的开放性、每一个能指的最终不固定特征决定而言，霸权实践正在缝合。这种原初的匮乏正是霸权实践尽力填充的东西。一个“在总体上”被缝合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这种填充在其中将实现它的最终结果，因而将会设法使自身等同于一种封闭的象征秩序的透明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社会的这种封闭性是不可能的。

拉克劳和莫菲试图将关于政治实践（其任何本质、必然关系或规律的独立性）的必然开放性的理论植根于拉康的象征实践理论之中。

在方法上，拉克劳和莫菲的理论论证有些类似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解释。他们确认出一种历史既定的计划，即试图重构由于现代的（后浪漫主义的）分裂和分割经验而失去的认知统一性。他们指出了不同的作家——黑格尔、阿尔都塞和后阿尔都塞主义的英国作家辛德斯和赫斯特①——如何试图调和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经验与对统一性和一致性的渴望。他们认为，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必定失败，原因是一种“先天的”不可能性：任何封闭的思想体系都能够解释一种原则上不确定的世界经验，或者正如尼采所说的，一种至少是由意志而不是理性理解所决定的世界经验。最多是在本意上，他们试图从对经验的构成因素的解构中找出那种封闭性观念。在其他人批判必然关系和总体性概念的地方，他们拒绝那种认为甚至可能存在一种毫无疑问的基本解释对象的观念。话语实践产生的是对象而不仅仅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拉克劳和莫菲指出，辛德斯和赫斯特从一种“总体性的本质主义”走向一种“要素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of the elements），“除了上帝的作用不再是要建立要素之间的和谐，而仅仅是要建立它们的独立性之外，只不过是用莱布尼兹取代了斯宾诺莎”。他们建议从思想的真实对象转向到构成它们的话语。这类似于物理学的注意力从原子的结构转向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吸引力和排斥力。自然科学中的这样一些转向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新研究领域，但还没有像社会理论中的后结构主

---

① 关于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著作的发展，参见 Gregory Elliott，“The Odyssey of Paul Hirst”，*New left Review* 159（September/October，1986）。

义者那样走得那么远。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些转向并没有质疑已确立的物理学的所有物质对象和关系，也没有抛弃对它们的已有认识。

这种观点似乎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尽管拉克劳和莫菲肯定“每一种话语结构的物质特征”，从而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术语学的策略。由于称一切物质的都是精神的，所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区别就像事实上一样被消除了。正是这个区别而非标签的丧失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或者没有社会实践的语言方面和行为方面的差别，或者没有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陷入到一种单维的解释学世界之中。他们的回答是：“要显示对立面就要接受如下两者之间的经典二分法：一方面是一种在任何话语介入之外构建起来的客观领域；另一方面是一种由纯思想表达构成的话语。”或许，这并不是反对古典的实在论立场的论证。

拉克劳和莫菲关心的主要是意义藉以毫无保证地被建构和固定的实践。象征秩序与它所指称的潜在差异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因为有永远过多的潜在意义，这些意义在话语的多义特征中找到了表达形式。意义的某种固定性是社会存在的限制条件，正像用精神分析学的话来说一样：“一种无法产生出意义的某种固定性的话语是精神病患者的话语。”但是，拉克劳和莫菲也重视那种不断地削弱必然性的偶然性。在一种使人想起美学现代主义的目标的论证中，拉克劳和莫菲说：“偶然性在必然性中的存在是我们先前称之为颠覆的东西，并且表明自身是破坏和怀疑每一种必然性的精确特征的象征化、隐喻化和悖论。”他们重新阐述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因此，它现在不是指因果性的结合，而是指过多的意指过程。在这种意指过程中，意义在能指中被浓缩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使能指成为不稳定的和多变的。

拉克劳和莫菲实际上正在用一种可疑的认知秩序来取代早期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解放理论。他们认为，需要最低限度的封闭性，而且人类也需要尽可能多地代表开放性和偶然性。这种框架与伯格（Berger）和卢科曼（Luckmann）的现象学综合①和涂尔干所拥有的共同点，多于它与社会主义思想所拥有的共同点。他们对现代性的社会学解释也以作为主导的历史过程的区别化为基础。

新概念表明了这种注意力的转变。拉克劳和莫菲为对立（客体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对思想领域中命题和反题的否定）之间已经确立的区别补

①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Penguin, 1971。自那以后，伯杰越来越关心这种受到威胁的秩序在道德上的再统一，而不是关心颠覆它。

充了对抗性思想。对抗性是社会的界限。它显然表示没有在语言中完全实现位于语言之外的经验要素。对抗性产生了重要的时刻。“如果主体是作为象征秩序的局部性和隐喻性收编而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那么对那种秩序的任何怀疑必定必然构造出一种同一性的危机。”由于扩展到社会秩序，从而使拉克劳和莫菲把葛兰西的有机危机思想改写为霸权的总瓦解，而霸权被构思为一种统一的象征秩序。但是，这就摆脱了与阶级或生产方式——作为危机的最终原因——的任何必然联系。那种通过分层和意义的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来颠覆社会的思想指向一种有趣的实践和思想领域，即使人们不接受这样一些意义是自由飘动的，并且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更熟悉的对立和矛盾（系统冲突与社会冲突）没有关系。但是，像在后结构主义森林的另一部分中的人种方法学主义者一样，拉克劳和莫菲把某个有效的社会分析环节误认为它的总体性。他们阐释了所有社会秩序边缘的不稳定性，好像社会秩序始终并且处处都是不稳定的。为了对话语的秩序和失序的新问题结构进行社会学的理解，拉克劳和莫菲发展了两个更深层的概念，它们与对抗性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等同（equivalence）是指那些把一种共同的同一性强加给对象的分层化，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差异。通过否认现存的差异，等同“给予本来的否定性以一种真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差异指生活对象和形式的积极属性，指它们的具体特征。拉克劳和莫菲认为，纯粹的积极性（毫无疑问的差异领域）和纯粹的等同（对立性中的完全同一性状况或冲突中的统一性状态）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社会必须在这些绝对的两极之间运作。但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层形式中，他们确定出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变革。这就是走向差异之极的转变。即拉克劳和莫菲所说的以现代的民主斗争取代前现代的大众斗争。差异领域的这种历史性扩大已经使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错误”等同关系陷入了危机，并使新社会运动的激进民主政治提上了日程表。

一个基本的哲学错误使这种解释注定成为超意志主义：它误解了语言的功能。拉克劳和莫菲拒绝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别以及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别，这使他们（大多数时候）抵制这样一种思想：语言拥有一种独特的指向功能，没有“被牢不可破地同它的其他目标混合在一起”。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既然在话语之外无物可指，那么它不可能有所指。相反，要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语言被看作是构成性的，要么按照赛尔（Searle）的观点来看，语言被看作是表述行为的。他们含蓄地批判了所有这些理性主义：这些理性主义赞同知识的进步（被看作是对外部实在越来越充分的理论化）或者人的更多的自我理解（被看作是由物质或其他的条

件所限制的潜能的日益实现)。不管是在亚当·斯密的传统中，还是在马克思的传统中，所有解放性的社会理论都植根于这样一些观念之中：能够选择的人类（即话语活动）与那种阻止人类行动的社会物质（和具体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互动或辩证的关系。

即使人类摆脱痛苦的最基本解放也依赖参照符号，依赖语言的描述功能。当牙医公然地通过一种被接合的实践来检查拉康的牙齿时，我们必定希望现实的判断（腐烂的/未腐烂的，非常疼痛的/不非常疼痛的）有一种独特的地位，而且拉康也没有遭受下述行为之痛：在这些行为中，这样一些事实被“牢不可破地同牙医可能想起的一切其他计划混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开始谈论拉克劳和莫菲所改写的霸权概念。霸权是建构社会统一的实践，位于两种社会极端性之间。它并不仅仅是结合一种有组织的差异体系，例如“根据效率或合理性标准来对官僚行政机构职能重新组织”。这可能成为一种没有对抗性的差异、纯粹的积极性。它也不是绝对斗争的条件，例如千禧年运动，因为在这样一种斗争中的等同并不是接合不同的要素，而是否定它们。拉克劳和莫菲的霸权概念与葛兰西的作为差异的统一的霸权有关。他们也运用葛兰西的“有机危机”思想来描述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社会和政治的同一性变得不稳定，而且“结果是霸权重组可以利用的流动要素的倍增”。拉克劳和莫菲把葛兰西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纳入到他们的民主斗争思想之中，这种斗争在从属阵营内肯定了差异，同时又试图建构等同与对立之间的关系。

但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上，拉克劳和莫菲背离了葛兰西。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将因而从葛兰西的观点中保留接合的逻辑和前线效应的政治核心性，但我们将消除这样一种假定：单一的政治空间是产生那些斗争的必要框架。”

社会同一性的开放性使霸权实践成为可能。在其他人所说的“封闭社会”（拉克劳和莫菲引证了中世纪的农民共同体）中，当共同体受到威胁时，存在各种以紧密的集体认同状况来取代差异的固定体系。但是，随着社会边界和分层变得更具有流动性，它们通过霸权来重新定义的空间也随之扩大。“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的霸权形式只有在现代的开端才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当时，特殊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发生在永远变化的状况之中，这些状况不断地要求建构新的差异体系。因此，接合实践的领域被无限地扩大了。”

拉克劳和莫菲主张，自主性本身是一种霸权建构的形式，依赖对其存在的独特政治空间的接合。国家被建构为一种“相对自主”的形式。同样，新社会运动是社会界定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多元主义状态的外在基础。“作为更广泛的霸权斗争的一部分”，它们的自主性必须得到捍卫和扩大。

既然“社会的开放性”是霸权的前提，因此就不可能有任何必然的霸权中心，不管它的基础是外在的物质条件还是一种有特权的主体——例如工人阶级。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霸权实践的基础是任何形式上的必然性观念的弱化。既然概念始终无法完全地掌握其潜在的对象，因此，没有任何概念体系能够给予霸权以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支持。拉克劳和莫菲承认，在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实际上都存在一些节点，即权力的局部集中。但是，他们似乎拒绝关于任何明确的节点或权力中心（例如葛兰西被定位在阶级关系之中）的思想，霸权斗争通常正是围绕着这些节点或中心得以展开的。最后，即使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概念也由于拉克劳和莫菲对开放性的支持而受到侵蚀。形态应该通过对其外部边界的界定构造出来。“正是只有通过否定性、分化和对抗性，形态才能把自身构造成一种总体化的地平。”“霸权的接合塑造出一种既定的空间，同时也在其中运作”，社会形态则是这种“霸权的接合”的结果。因此，社会形态的存在不可能成为政治实践的客观基础。

四、霸权与激进民主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最后一章中，拉克劳和莫菲试图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规划。他们对激进历史进行了总结性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重新阐释。对他们来说，主要的分水岭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出现，而是民主革命，最初是人们反对古代政治及政治制度的斗争。（正如拉克劳和莫菲所承认的那样，“民主革命”一词来自美国自由主义的守护神托克维尔。）他们断言，这是最后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中，“两种社会形式之间的对抗界限出现了”。在此之后，一种鲜明对立的社会划分变得越来越“薄弱和模糊”，而且“它的构造开始成为政治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不存在没有霸权的政治”。他们把马克思解释为通过寻找一种新的划分原则——社会阶级——来应对这种对抗性的危机。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这种应对失败了，因为它不断地需要那些调整自己对未来的完全适用性的“补充性假设”。对社会对抗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解释事实上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古典故事的故事。E. P. 汤普森的工人是那些捍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身份的工匠。宪章派是激进的民主派，而不是一种阶级运动。拉克劳和莫菲不但质疑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想像之间的“连续性环节”，而且把当代的社会主义规划等同于民主革命。

作为颠覆性话语的核心，民主革命思想是这个论证的关键。从属关系

仅仅被定义为压迫，因而能够通过“接合实践”被建构为社会对抗性。在拉克劳和莫菲的理论中，社会主义背后的生成性力量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转向话语领域。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想像中，民主革命是至关重要的突变。这种政治想像使之成为可能的是“提出各种不平等形式是非法的和反自然的，因而使它们等同于压迫的形式。这里存在着民主话语的深刻的颠覆性力量，这种颠覆性力量可能使平等和自由延伸到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之中，因而可以充当一种酵母，激发各种反对从属的斗争形式”。拉克劳和莫菲把对经济平等的批判看作是“民主话语内的一个环节”。“它的辐射效应沿着各种日渐增加的方向成倍增加”，包括例如性别领域。他们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平等最终不会像在其他领域中那样在政治领域中广泛实现。人们不可能想像，人类在某一方面是永远不平等的，同时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在某个时代，他们会在所有方面实现平等。”这是对拉克劳和莫菲仍然希望描述成社会社会主义的东西的一种重铸，但从根本上来说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重铸。

拉克劳和莫菲很重视“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新社会运动”是一个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反核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地方主义运动、反官僚运动等等——连接起来的术语。这些斗争是新从属形式的产物，而那些新从属形式则是拉克劳和莫菲——从阿格列塔（Aglietta）那里借用的——所说的“密集型的积累体制”的产物。“社会生活的这种‘商品化’破坏了以前的社会关系，用商品关系取代了它们。借助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日益渗透到许多领域之中。”新社会运动成为反抗这些分散的和多元的从属类型的形式。新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制度既为资本服务，也为工人带来好处。它首先通过官僚化产生了自己特有的从属和反抗形式。大众文化是那些更普世主义的渴望的承载者，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力量。在这种更加多元的氛围中，自主性、差异和自由成为日益显著的积极价值观。因此，在当代社会中，既有一种扩大的权利和合法要求观念，又存在着更加广泛的商品化和科层化。这种双重的运动产生出许多斗争的场所。

拉克劳和莫菲说：“在战争时期，新对抗性和‘新权利’的激增正在使霸权形态陷入危机。”但他们想论证，那些将要用来克服这种危机的条件决不是预先规定的。（他们为什么会假定它会被克服呢?）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寻找一种必然的统一是错误的。他们批评高兹（Gorz）和图雷纳（Touraine）试图用另一种有特权的历史主体来取代某种有特权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相反，人们应该把这些社会运动看作是内在多元性的和多

义性的，能够在非常不同的话语内构建出来。例如，有许多不同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它们能够产生出十分不同的对抗性和等同化。“因此，对抗性的接合形式决不是被预先规定的，而是霸权斗争的结果。”

拉克劳和莫菲声称，就这些新社会运动而言，民主革命思想是左派和右派接合实践的关键。新保守派根本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潜能来扩大社会权利并要求实现它们的国家，他们批判“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颠覆联系”。“通过动员反对新国家组织官僚特征的全部活动来反对福利制度”，新保守派赢得了对其福利制度批判的支持。右翼理论家把自由重新界定为私人领域、所有权利和差异价值，同时批判国家的扩张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或者导致政治的超负荷和不可治理性的危机。这已经带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并且不可能只被贬低为一种次要的上层建筑现象。

尽管拉克劳和莫菲宣布信奉不确定性，并且拒绝“没有为霸权实践留下任何空间”的进化主义目的论，但他们仍然发现有必要把新保守主义的民主批判说成是自我矛盾的。新自由主义诉诸“一组来自保守主义哲学的主题，他们在保守主义哲学中发现了为不平等辩护的必要因素”。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这大概是因为自由主义传统无法始终如一地为不平等辩护。他们似乎暗中假定了在现代世界中“某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实践逻辑，即民主革命的逻辑。这种观点打出了意识形态牌来支持激进民主。保守主义者似乎必须被迫自我矛盾地求助极权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逻辑，而左翼激进派在民主话语中仍能保持一致性。

在对社会主义规划的重构中，拉克劳和莫菲似乎不愿宣誓放弃当时至少是来自民主革命内在逻辑的巨大帮助——如果不是保证的话，同时谴责这样一些在其他各处都存在的准本质主义逻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其意识形态模式形成的任意性。民主革命决不是对近代西方正常历史惟一合理的解读。韦伯表明，一种更加悲观的合理化和祛魅（disenchantment）逻辑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主导规划。根据这种解释，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并不是主流民主实践的不幸堕落，而是它的主导话语。最近，福柯给予这种论点一种新的历史重要性。是谁说新保守主义的个体权利观而不是集体民主（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是不合乎逻辑的？为什么斯图亚特·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主思想中的矛盾（即多数人的决定本质上往往压迫少数人）比激进派所指出的矛盾（平等权利与个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不令人信服呢？关于竞争性话语的思想产生出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比拉克劳和莫菲似乎愿意思考并为激进民主派提供少数的重新保证基础更加深刻。

按照对民主思想的这种解读，拉克劳和莫菲开始提出一种左翼的替代。

他们把这种替代说成是“一种不同的等同体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则在新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划分……因此，左派的任务不可能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它”。他们的计划是令人失望的抽象和程序化。这个任务的主要障碍是传统左派的“本质主义先验论”。拉克劳和莫菲把这种“本质主义先验论”等同于那种常常指定给阶级、国家、经济和雅各宾主义革命思想的优先性。并不存在任何“先验的变革主体、社会领域中的有效性层面与有特权的断裂点和断裂环节。所有这些假设都会聚到一个共同核心上，即拒绝放弃那些关于被缝合社会的假定”。

因此，如何鉴别那些藉以追求激进计划的新对抗形式呢？如果没有“对抗表面”可被先验地选择（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划分和党的特权地位重蹈早期本质主义的覆辙，好像在它们的政治影响中至多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建构那些通向一种民主霸权的等同呢？

在差异的对抗性和多元性中，统一拥有对立的两极。在这种对立的两极之间，拉克劳和莫菲找到了某种可以辩解的立场。他们看到，在现代世界中，差异的倍增和政治空间的增殖有一种历史的逻辑。这些新兴的差异要求社会主义者重新考虑平等与自主性，反对潜在强制的和同质化的平等主张。由于追随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所以，拉克劳和莫菲指出，激进民主的总体化主张本身在范围和结果上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他们称赞那种对抗性必须以之为基础的否定原理与互补性的“社会肯定性”之间的另一种二元论形式。他们说：“任何霸权规划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民主的逻辑之上，但是也不必由一组社会的肯定性组织建议构成。”社会主义者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民主与等级制之间的对立，而且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身份。拉克劳和莫菲断言，否定本质不应当表示政治话语中缺少一种乌托邦的想像。“如果没有乌托邦……就根本不会有构造一种激进民主想像的可能性——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其他的形式。每一种激进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由极权主义的理想国神话和改良主义者没有计划的、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所代表的两个极端。”拉克劳和莫菲在自己的政治想像中返回到偶然性的第一性。“这种赋予社会以本质上的不完善和不稳定特征的张力或开放性环节，是每一种激进民主计划应该开始制度化的东西。”“虽然激进民主计划必然包含……社会主义的维度——也就说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它拒绝那种认为这种废除必然消除其他的不平等的思想。”他们说：“结果，不同话语和斗争的离心性（de - centering）和自主性、对抗性的增殖和大多数空间——他们在其中能够肯定自身并发展起来——的建构，是下述可能性

的必要条件：传统理想主义——毫无疑问，它应该被扩展和重构——的不同内容能够得以实现。”

激进民主之所以是凌驾在其他政治计划之上的选择，是因为在拉克劳和莫菲的解释中，它特别依赖“肯定每一种‘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依赖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拉克劳和莫菲几乎没有证明其激进民主承诺的合理性，但是对他们来说，激进民主明确的价值观之一似乎是它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开放的。

五、结论

我将以某些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明确批评作为结束。《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是一种重要又正确的洞见，即社会和政治的同一性是意识形态的建构物，而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其他层面的消极反映。对话语自主性的这种思考和它的特殊社会影响已经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果没有这种对话语逻辑——即一种重大的范式转换——的新的理论思考，拉克劳和莫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兴衰的细微理解本来是不可能的。

拉克劳和莫菲试图解决社会主义规划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毫无疑问，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斗争或垄断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时，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阶级承诺可能会神秘化。在中介理论中，定义过程必须给予拥有的分量。

无论如何，有一些人反对他们的分析。这些反对涉及到他们对偶然性的评估、对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科学知识观的批判和对内在话语一致性或连贯性原理随时产生的依赖。这些观点在面对变革时不是重构解放的社会理论，反而因为一种彻底意志主义的和最终独断的道德和审美保证而取代了它。

对社会现象偶然性的支持和对理论本质主义的反对混淆了两类不确定性。当然，任何充分的理论体系必须对反事实的验证保持最终的开放性。拉克劳和莫菲所描绘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可以当作是它对新历史现象的开放性和反应度（responsiveness）以及它的僵化性的证据。然而，拉克劳和莫菲不仅仅是在要求理论应随经验而变。相反，他们彻底拒绝可验证的解释理论观念。既然理论无法穷尽潜在意义的丰富性，因此，它们本质上是各种错误的再现和把封闭性强加给不确定状况的意识形态企图。他们声称，这是双重的错误，因为无论如何都存在能够据以合理评价这样一些解释的独立的永恒经验。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核心命题根据现在或过去的环境

来看是错误的，而在于因为哲学的原因，他们从不可能是正确的。对于社会理论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梅洛－庞蒂的反应是一种更让人满意的反应。梅洛－庞蒂承认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免除知识的不确定性，但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最有预见性和解释性的模式，同时又承认它们的局限性。社会知识的特殊本质和情境本质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应该通向一种正确的人性，而不是导致放弃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理解。

承认封闭性或积极性的标准是任何可行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必需的，同时又否定社会也依赖认知结构这一点，对此，拉克劳和莫菲之间并不一致。除非在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否则理性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曾经试图赋予政治实践某种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秩序。在描述社会行为的规律性并把描述建立在这些规律性之上时，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都这样做。预防计划的发展和根据估算的选民偏好而进行的政治纲领设计，是那些依赖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和可能是什么样的断言的日常实践。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信念，政治是难以想像的，而且当所有的解释图式确实体现了价值观并在对世界的描述中帮助构建了它时，它们也作出了那些不能还原为其意图的真理声称。不仅在所体现的意志种类和令人信服的或强制的结果上，而且在对可靠的描述和解释的依赖程度上，各种政治实践都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理论在它们的承诺中一直是唯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在下述主张上是唯物主义的：物质的匮乏是社会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典型生活经验的核心决定因素。因此，消除物质匮乏是解放的前提。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历史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把人的生活置入到一种目的论的框架中，而人的理性通过这种框架为针对匮乏和压迫的斗争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实在论的，是因为它们假定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诸种结构，这些结构是复合的、生成性的，并且不仅仅是现象观察的综合。拉克劳和莫菲怀疑所有的这些立场。

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本质上既不是一种决定论，也不是一种意志主义。它既探求关于那些限制人类行动的结构的知识，又致力于那些能够带来自由的行动方式。恰如 G. A. 柯亨已经证明的那样，[1]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确实必须以人类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为前提时，它也假设这样一些选择必须是在不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作出的。无疑，基本的社会主义命题是：

---

[1]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物质束缚迄今为止一直是决定大多数人类生活的可能性的核心因素。这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命题，而是一种历史命题，它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变革是人类解放的核心。拉克劳和莫菲所假定的更大的选择自由，可以理解为匮乏减少的结果（至少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多数人来说）和经济变革的结果本身，但不可以理解为对唯物主义解释的话语论证。许多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在论的解释模式。① 对于决定论—意志主义和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些解释模式选择了辩证的解决方法，而拉克劳和莫菲只不过是从某个错误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

自由主义的进步理论与它们的社会主义对手共同拥有许多实在论的和唯物主义的属性，即使它们都提出了这样一种发展理论：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非集体的能动性、交换和竞争而非冲突以及多样性和自由而非平等是它想要的终结状态。斯密、穆勒和凯恩斯也是解放的理论家和支持者，尽管社会主义者既不同意他们的解释，也不同意它们的道德偏好。在对结构化历史过程的实在论信念框架之内，这样一些理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对于所有人都有帮助。

拉克劳和莫菲的政治思维模式使他们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目标。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话语实践，他们看到的不是曾经寻找理解人类生活的物质束缚的马克思，而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他曾经设计出一种新的社会想像即新的社会分裂术语——人民与旧制度之间曾经的分歧已经失去了它的极化力量。根据这种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说明阶级冲突，而仅仅是将其合法化。尽管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追求这一点，但他们暗示说，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发现和建立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因为它打断了一种更加细微的民主政治形式从自己的大众起源中发展出来。社会主义者多么忌妒美国的历史好运啊！

这种多元主义的论点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危机的一种反应。新的社会冲突地点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而且用阶级动力学无法轻易地解释这些地点。如果社会主义者要继续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霸权斗争中的竞争者，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重视多元性和区分思想。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范式内解释这种变化中的社会主义政治议程是有可能的。关于相对自主性和归根到底的决定的思想，无论在阿尔都塞的阐释中它们的本质主义陷阱是什么，都使各种结构具有了某种意义。在那些结构

① 参见 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2nd ed.（Brighton: Harvester, 1978）and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Brighton: Harvester, 1979）.

中，资本家的表述仍然占据支配地位，但不再具有绝对的力量。政治空间的区分和倍增是发达资本主义中新的阶级关系与国家和公民关系的产物。拉克劳和莫菲本人关于商品化和一种“强积累体制”的论点，本身植根于这样一种解释模式之中，甚至在他们否定这种解释模式的本体论基础时，也继续使用它。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匮乏的政权下总体上处于从属地位，在19世纪的文化争论领域中受到限制，这些等于一组与一百年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条件不同的资本主义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考虑到了国家扩大的角色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理论和经验描述的层面上，这种是对这些变化的反应。福柯对社会控制话语的分析可以看作是一种以对重新可见的支配形式的理解为基础的对过去的投射。当代的监视可能使监视的发展成为一种历史问题。

对于拉克劳和莫菲所提出的真正的解释难题，我提出了两种解决路径。第一，我们的问题现在是要解释一种混合的或折衷的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通过公司操作的范围和许多市场形式中的国家计划干预，经济决策已经被部分地社会化了。一些普遍的社会权利已经得以确立，而且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保证，例如，西方的大多数个人现在能够期望度完正常的一生，而且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异常。政治权利在形式上是按照平等原则来分配的，尽管政治实践对其他权力形式的依赖扭曲了政治空间的用途，从而有利于经济上的强势者。[①] 性质上的或非经济的需求议程——环境主义等等——的出现，尽管基本上仍然反映出富人的状况，但却是克服绝对匮乏和后工业秩序兴起的结果。教育计划和老年人得到保护的生活标准表明了一种不那么工具性的人类生活视野及其可能性，同时也表明在某种程度实际上避免了物质条件的专制。社会主义的分析常常错误地把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环节置于视野之外，并且直到想像的环节可能出现时，仍然同陈旧的前过渡理论图式接合在一起。在对资本主义民主——在其中，大约40%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政府支配——的分析中，我们最好承认向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的）制度的“局部性”过渡已经在发生，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后果和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产者对这种权力再分配的反对并不只这些。

第二个建议与拉克劳和莫菲的论点有更多的一致，即资本在自己的运作规律和后果上仍比它所产生的反抗地点更坚固。即使在技术、劳动分工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时，积累过程仍是一个常量。这个过程的消极影

① 参见 C.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响源自于资本把所有的对象和活动都还原为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仍然能够赋予抵抗和渴望的形式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身份。社会主义的统一原则——用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说，等同于赖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事实上可能是对资本而不是对阶级的反抗。

拉克劳和莫菲没有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解释理论，反而用来自话语逻辑的单独论点取代了那些谈及结构和能动性的辩证解释。他们拒绝了话语性空间和非话语性空间之间的区分，也否定了“所谓的非话语性联合体——制度、技术、生产组织等等”——的独特性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所有的社会区别都是解释和重新定义的产物。虽然这在不稳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它却遮蔽了下述两个领域之间的重要区别：一类是那些对重新定义更加开放的社会领域，另一类则是那些对重新定义不那么开放的社会领域。文化和解释的空间在社会中并不是被平均分配的。霸权的危机同时打开了重新定义和再具体化（recrystallization）能够在其中发生的许多空间。因此，可以说，日常的制度和实践代表具体化（crystllized）的社会规定，而且在这种形式上，它们比在其更加弹性和不稳定的状态中拥有更多的规律性、可预见性和规则统治特征。从这个事实——即没有任何制度具有完全类物的（thing - like）或具体化的结构和过程（这是正确的）——到结论——即没有任何结构和过程的分析是可能的——进行论证是错误的。事实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固态”（solid - state）模型来分析？这是何种解释和描述对经验来说是最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归纳问题。与拉克劳和莫菲的霸权理论相反，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优点在于它鼓励反思那些使这样一些集体性的重新规定成为可能的现实原因和条件。

拉克劳和莫菲批判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理性”基础，并将其改造成集体意志的表现。他们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它让他们自己的激进民主政治几乎完全失去了基础。拉克劳和莫菲既不接受社会主义的自然主义辩护（即一种基于人性理论的证明），也没有接受一种伦理的辩护。对他们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能力规范可能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证明模式，特别是自从它与关于通过话语实践来建构社会的思想有了一些联系之后。不过，拉克劳和莫菲似乎没有承认他们的政治正在虚无的空间中漂浮——实际上是在大西洋中部的空间漂浮，因为民主革命的话语在美国仍然活得非常好，相反社会主义思想却几乎没有得到认可。

拉克劳和莫菲可能相信他们自己“先验的”社会偶然性和开放性观念需要对激进民主规划的承诺。但是，对更广泛的思想运动——他们的偶然性思

想就是从中产生的——的思考使这看起来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哲学贯穿着个人主义——例如存在主义——的包装以及集体主义的包装。话语理论被用来合法化工党的改良主义[1]以及这里所建议的无休止的对抗性颠覆实践。解构思想没有必要——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拥有一些平等主义的含义。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常常看起来好像相信某些人在他们的游戏中比另一些人更好，并且建构了一种以难以理解而知名的文化话语。

对私人迷幻剂的称颂和对差异神话的集体肯定与各种普遍的权利（例如民族或种族的神话）几乎没有关系，看起来好像符合哲学解构主义的精神，如同符合拉克劳和莫菲的激进民主化纲领一样。解构主义运动本质上是非理性主义的运动和对理性局限性的确认，而且不是一种把理性的范围扩展到迄今尚未说明的领域的企图。因而，我们必须期望它的政治脾性随后将会形成。拉克劳和莫菲在政治上仍然与激进左派一致，人们对此不应该产生怀疑。但是，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这本书对下述思想提出了质疑：激进政治的信念可以拥有任何理性的基础或历史的希望。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论证基本上是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而且由于与经济主义和阶级主义理论明显的封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流行的认知开放性和偶然性原则的吸引力开始产生出来。我并不认为这些观点就像拉克劳和莫菲所断言的那样，天生是封闭的。拉克劳和莫菲的论证利用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索雷尔和其他人——拉克劳和莫菲把他们称为自己的先驱——的结构中非常重要。但是，当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是根据非理性主义的传统来思考时，拉克劳和莫菲的论证可以被一种对立的反对观点所利用。为什么偶然性的论点和对抗性中的集体专断规划不像符合共和主义或激进民主那样，符合非民主的社会同一性呢？所勾画的那种观点看起来至多是相对主义的。在最差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哲学合法化，这种政治形式比拉克劳和莫菲可能开始思考的更加可怕。

作者：Michael Rustin

文章原标题：Absolute Voluntarism：Critique of a Post - Marxist Concept of Hegemony

文章出处：New German Critique，No. 43，Winter 1988，p146 - 173

（编译者：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博士）

① 参见 Elliot。

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

[英] 尼科斯·穆泽利斯 著　　王 平 译

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①] 以及诺曼·杰拉斯冗长的回顾性文章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位于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和前景争论的中心。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论断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建基在强调规律、严格的阶段演替、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等等的必然的、决定论的逻辑上。这一逻辑简化了复杂性并且导致一种关于社会的本质主义观点以及一种封闭的、一元论的理论论述类型。马克思先前的所有尝试——通过强调不确定性、复杂性、代理人的重要性、政治等等的相对独立性以弱化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核心的打算——只是理论大厦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大厦的基础依然不可避免是一元论的。换句话说，当以往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回避决定论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掉进二元论或折中主义的陷阱。因此，折中主义抑或二元论的决定论结局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两难困境。

对于杰拉斯来说，那些被拉克劳和莫菲看作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一种对理论传统的系统扭曲，在著作最成功的代表性部分，它试法避免还原论和一元论的结局而不必诉诸于折中主义或经验主义。无论人们去看马克思的著作还是去看卢森堡、列宁抑或葛兰西的作品，他们总是发现对来源于经济的结构决定的基础重要性的强调，这些决定不仅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导致总体封闭的一元论原因而发挥作用，而且还作为一种能够为那些可能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东西设定界线的框架而发挥作用。而且，在整个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一种结构类型优先于其他结构类型的优先性观念，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表述，不均匀重量的因果性等级观念，既不是一元论的也不是折中主义的。因此，只有拉克劳和莫菲的概念摩尼教（Conceptual manicheism）才向我们呈现出决定论与折中主义的两

①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这篇文章写于他们应答诺曼·杰拉斯在《新左派评论》刊登的文章之前。

难困境。

这篇论文打算推进三个相关的论题：（1）人们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范式以反对一元论结局的观念，这不仅可以通过涉及特定作者的经验性著作，或者更恰当点，通过考虑某些基础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如生产方式）的逻辑地位和构造模式来实现。（2）《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用一种同样无法接受的片面的偶然性逻辑取代人们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中所看到的片面的必然性逻辑，无论他们如何试图去减轻他们的片面性，都会滑向二元论/折中主义；（3）与杰拉斯的立场相反，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都内含一种还原论类型，尽管这种还原论并不像拉克劳和莫菲所认为的那样无能为力。

然而，首先我想非常简要地评论杰拉斯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评价，它对读者也许制造了某些混乱。文章一开始，杰拉斯打算用一种通常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新倾向，他们根据诸如此类的考虑与马克思主义绝交，比如，“年龄和职业状况的压力”、“智力风格的诱惑”、“对认知和原创的渴望”、成为“最新思想家”的渴望，等等。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这些评价与拉克劳和莫菲所采纳的立场联系起来，考虑到它们先于杰拉斯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批评，读者们很容易认为它们是直接对它的作者说话。两种立场因此是有序的。首先，紧密追踪拉克劳和莫菲的智力轨迹，正如他们在政治学中原则化的运作一样，我想一开始就强调，杰拉斯的“知识社会学”评价决不应用在他们身上。其次，然而是最重要的，一场争论背景中真正关键的是，例如，它很少去探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背后意识和无意识的理性，而更多地去确立他或她要说的认知合理性和非合理性。

1. 核心马克思主义：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现在转向我的第一个主要论题，我认为，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是否导致一种封闭论述的问题，人们必须一开始就尽可能清楚地把一种实体性理论从一种概念框架中区分出来——后者不仅仅是提供一系列关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经验证实和知识制造的陈述，而且简单地“描绘出问题域及因此为它的经验探究准备基础”。[1] 概念框架和实体性理论之间的区分或多或少与阿尔都塞在“一般性 II”（Generalities II）和“一般性 III”（Generalities III）

① 见 S. F. Nadel,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Vol. Ⅰ, Lodon 1962, p. 1.

之间的区分相对应："一般性 II"由概念工具组成，当它们被应用到"原始的"理论材料（"一般性 I"）上去时，最终导致了成熟的实体性理论（"一般性 III"）的产生。①

现在，在我看来，核心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体系的问题，只能在"一般性Ⅱ"的层面上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考虑到这些，正如杰拉斯所认为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人们既可以发现开放的也可以发现封闭的实体性理论（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去探知它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基本概念工具是相适应的。与拉克劳与莫菲的立场相反，我认为，假如人们仔细地考虑这些概念工具，尤其是假如人们将它们与同等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工具相比较，将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正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实体性论述（"一般性Ⅲ"）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工具（"一般性Ⅱ"）。

实际上，与社会科学中的任何其他范式相比，马克思主义更能提出富有成效的研究社会形成的办法，从代理人和体制结构来看都是如此，两者既是争夺稀缺资源支配权的集体行动者的构造，又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它的制度化部分或"子系统"或多或少彼此相容或不相容。正如戴维·洛克伍德在若干年前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整合出关于社会形成的一个系统和社会整合的观点。② 无需诉诸于二元论，它赞成对系统部分或制度整体（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之间的非相容性的考察，以及这种方式的考察：即在其中这种非相容性有没有导致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尽可能多地使用拉克劳和莫菲的术语，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学者提出诸如接合实践的效果、抗争、主体地位和与之相反的对象之间的对抗等问题，也即提出主体地位（或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作用）是怎么嵌入更大的制度性整体的——这些整体为主体的实践规划和设定界限——等问题。

---

① 见 L. Althusser, *For Max*, Allen Lane, London 1969, pp. 183 – 90 and p. 251。必须承认的是，并不总是容易在概念框架（Gen. II）和实体理论（Gen. III）之间做出区分，在这样的意义上，所有陈述既包含实体的又包含超理论的/方法论的要素。然而，依据重点在哪里，理论之间的一种区别能够而且必须做出，它的当务之急是关于如何去看待社会世界以及试图告诉我们某些我们已经不知道它的功能和结构的理论。

② D. Lockwoo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在 G. K. Zollschan 和 W. Hirsh（编辑）的,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1964. 也见 N. Mouzelis, 'Social and System Integration: Some Reflections on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ember 1974.

简而方之，马克思主义要求对实践→主体地位与主体地位→实践的关系作严肃的和系统的研究。

因此，与拉克劳和莫菲的后结构主义途径不同，与各种各样以行动为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符号的互动论、民族方法学、交换理论、冲突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体和行动者不是在一个制度的真空中运转的；相反，他们的战略或实践必须在特定的结构约束下来看待，在整套机构下来看待，而整套机构（通常是不相容的）的组织原则，行动者也许可以意识到，也许无法意识到。另一方面，与帕森斯功能主义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行动者概念化成仅仅是制度的木偶。它的概念工具就是如此，以致人们不仅以产品而且以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制造者的眼光来看待集体行动者。由于帕森斯社会学——尤其是在它的宏观社会学领域内——建立在推崇封闭概念的框架之上，因而它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这一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有高度影响的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比较。将变得更清楚的是：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不会必然地导致经验分析上的一元论类型或二元论类型。

正如频繁地提到的那样，帕森斯行动理论（不管它的标签）系统地低估了社会生命的唯意志论维度，将人类描述成社会制度的被动产品。它用严格的涂尔干风格不断指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如何塑造人的行为的，而无须展示相反的步骤：通过将标准化预期制度化和将需求意向内在化，行动者尤其是集体行动者是如何建构和改变社会的。发挥作用的方向通常是从系统/社会到行动者，而不是相反。当帕森斯从“个体行为”和“他我相互作用”的分析转到将社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系统而理论化时，这一系统偏见变得尤其突出。[1] 在这一宏观分析层面上，行为者不仅被描绘成被动的，他们好像也一起消失了。在帕森斯和他的门徒的经验性著作中，行为者实际上进入了社会场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帕森斯主义的框架，而是无视帕森斯主义的框架。

这已被帕森斯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概念化的方式所详细阐明。人们只需要考虑他著名的 A GIL 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四个子系统（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正是借助于这个框架的帮助，他分析了所有社会系统的功能。这些子系统的每一部分对应于四个基本的功能要求的每一部分，这是任何系统为了幸存下来都同样必须要满足的。例如，“适应”这一子系统严格对应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层面上的经济，以及由有助于

① 见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1957.

“适应”要求解决的所有步骤组成——也就是，对应于一个社会的存活所必须的所有资源的保障。这些步骤通常分散在多样的社会群体和集体中。用“适应”的盒子把它们集合起来，是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特征：它有助于同样的功能要求或系统需求。因此，“适应”这一子系统是一个严格的系统范畴，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不是奠立在或不对应于具体的集体或代理人。作为一个概念，它根本上不同于作为一个支配阶级、一个正式组织或一个利益群体行动者的概念。当然，有时帕森斯这样对待子系统，好像它们是集体行动者，适当赋予它们只有决策代理人才有的特征，这也是确确实实的。[①]

集体代理人

为什么帕森斯经常把制度化的子系统甚至整体社会及它们的核心价值当作决定和调节社会场景中所有事物的神秘的神人同形同体论的实体来看待，原因当然是，他的功能主义框架没有为作为社会世界制造者的集体代理人留下概念空间。实际上，他的每一子系统可以进一步分成四个“次子系统”，而且四重系统的划分步骤可以无限继续。在这一系统中的令人困惑的洋葱般的系统图式内，集体行动者一起消失了。只是因为没有简单的概念工具对它们进行严肃考究。一旦人们从有着他/她的需求意向和角色预期的个体角色的扮演者转向分析的宏观层面，代理人概念就被系统概念所取代。

现在将会变得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更充足的分析工具。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像帕森斯主义社会学家一样，将整个社会构成分成子系统或制度部分。例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三重子划分更多涉及到的是系统而不是代理人范畴。然而，帕森斯主义的子系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子系统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使经济领域概念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即它的制度的成分不会导致像帕森斯一样的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子划分。在马克思主义将经济看作生产方式的表达以及生产关系组成每一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的范围内，这一关键概念在系统的/制度的和代理人/行动的方法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实际上，生产关系的概念非常自然地——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平面之间无需任何特别转换地

① 关于这一观点，见 Stephen Savage,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Action*, London 1987.

——从制度分析的问题通往“战略行为”的问题，反之亦然。[1] 由于它不需要智力的技巧来推动这样的转换，即从分析劳动力的技术和社会划分是如何将行动者分配进生产领域的不同地位/位置转向来探究这一结构位置所导致或未能导致的斗争和实践类型。对这种方式——凭借这种方式，行动者对他们的阶级地位做出反应，通过试图维持或转变与生产资料（或生产方式）相应的他们的境况——的关注越是明显，拉克劳和莫菲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就变得越重要：比如主体认同和他们的“真实利益”的感知所形成的方式，这一自我认同和感知被固定在“结合点”上或被新的斗争或对抗的兴起所搅乱的方式。另一方面，对主体位置或阶级地位是如何群集在一起以形成更大的制度复杂体的关注越明显，对战略行为的考虑就越被“悬置”起来，并且制度分析就更惹人注意，这种分析类型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是完全缺失的。在这样的背景中，“悬置”就意味着对行动者的技巧、战略、意识形态等有关的考虑的暂时悬搁——这一悬搁是必要的，是为了用一种非烦琐的方式来处理对整体制度秩序和它们的内在关系的分析。换言之，“悬置”并不意味着对制度结构的物似（thing - like）特征的本体论信仰。它只是一个考察社会特性的启发性装置，通过排外的和直接的与代理人概念相联系并不能把握它。[2]

当然，马克思主义概念所鼓励的代理人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平衡在马克思主义中并不总是能维持。它要么已经被极端的唯意志主义阶级理论所打破，这一理论因根据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阶级的诡计来解释所有社会发展而终结；要么，在另一个极端上，由于如此地强调结构的约束和冲突，以至于行动者被贬低为仅仅是“结构的承载者”。但是且不管所有这些，假如人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以及考虑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确实为考察社会提供了概念工具，无论是在行动者的集体战略方面，还是在制度系统和它们的再生产要求方面，都是如此。这恰恰是为什么受马克思著作影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比那些受帕森斯功能主义

① 关于制度分析和“战略行为”方法之间区分的详细阐述，见 G. D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London 1984, pp. 289 及其后。

② 正好是这一悬置类型，拉克劳和莫菲把它作为本质主义拒绝了。对于他们来说（以及对于人种方法学家和其他的现象学倾向的社会理论者来说），任何涉及到导致结构的/系统的而不是实践/代理人的考虑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的一种具体化。然而，正如我将要在下面讨论的，他们因为过度害怕具体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不能系统地处理具体的接合实践嵌在其中的整体制度背景。

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分支影响的人能够更意义和更令人信服地阐述社会长期发展的原因所在。且不管趋于背弃所有社会理论的传统历史学家，帕森斯功能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如何改造复杂的社会这种问题可以提供怎样的见解呢？什么样的作者可以与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进行比较，如巴林顿·穆勒、霍布斯鲍姆或布劳德？例如，把以上作家的历史探究与帕森斯、艾森斯塔特或斯迈尔泽等人的并排放在一起，前者的实质优越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更进一步的阐述就没必要了。

2. 制度分析的转换

当然，对于拉克劳和莫菲来说，主体实践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区别是个伪造的东西。在其他事情当中，他们也许将指出制度结构不是无中生有的。像任何其他与社会有关系的东西一样，必须用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它们同样是发生在一个以开放、脆弱或偶然性等等为特征的多元的政治或社会空间中话语实践的结果。然而，代理人/制度的结构区分的解除——人们不仅在拉克劳和莫菲的著作中发现它，而且在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叙述中发现它——制造了更多问题，这超出了它所解决的问题。因为，它要么从后门（即无需认可和适当的概念化）引进制度复杂体概念以及用来限制或促使社会行动的方法，要么一贯地忽视它们，以完全不能够严肃处理与整个社会构成的构造、持续和长期改造相关的问题为代价。

让我们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一点。首先，且不管拉克劳和莫菲对社会固有的脆弱的、开放的、偶然的以及间断的特征的强调，他们确实提到这些特征看起来几乎不能应用的场合：“在一个中世纪的农民共同体中，向不同接合开放的领域是最有限的，因而，不存在霸权的接合形式：当共同体发现自身受到威胁时，存在着一个从一封闭的差异系统内的反复实践到前沿的、绝对的等值物的突然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当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发生在不断要求新的差异系统构造的永远变动的状况中时，只有政治的霸权形式在现时代的开端取得支配地位的原因。”[1] 所以，除非人们把一个中世纪的农民共同体看作与拉克劳和莫菲所说的“社会”（social）（这是荒谬的）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关于开放和流动性的本体论评价显然是指“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社会。而且，即使人们将目光集中在前者上，它也

①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以下简称 HSS），p. 138.

并不总是像拉克劳和莫菲所描述的那样不稳定或脆弱。人们并不一定要采纳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为了强调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从处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空间的特定主体的视角来看，总是存在容易受它们的实践影响的体制安排和不容易受影响的其他体制安排。当然，就拉克劳和莫菲没有将论述认同为语言（而且我认为，与杰拉斯相左，他们确实没有）而论，那么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即所有的制度安排，无论持久与否，都是推论性地被构造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应该把推论性的构造与脆弱和不稳定联接在一起——把任何与制度持久性有关的都打上本质主义的标签——这没有绝对的理由。由于一个社会构成的核心制度经常显示如此的一种弹性和连贯性，以致它们全面的、极端缓慢的转变只能在一段相当冗长的时间中来看待，因此这需要按照世纪而不仅仅是年或更短的时间段来评价。

例如，应考虑将统治者或公务人员的公共地位与他或她的私人财富严格区分开来。[①] 这一制度性的分离，“私人的”从“公共的”中的分离，西欧国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巩固下来，而且在今天看起来几乎不可逆转。因此，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一结构特征，和其他同等持久的和弹性的结构特征（例如私人财产制度、市场制度、货币制度，现代公司中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制度分离等等）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核心，它进入主体的社会环境，不是作为被商谈的或被根本改造的事物，而是作为一个无可争议地既定的、相对不可动摇的、持久的制度地形（institutional terrain）。这一地形既限制又制造可能特殊的接合实践，它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也许会严重地影响更具伸展性和脆弱性的制度安排。门外汉甚至社会科学家有时倾向于将一种社会构成的持久的制度秩序具体化的事实（即，倾向于忘记它们是被推论性地建构和复制的）并不能使它们更少持久性；相反，对待它们的“自然的态度”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制度弹性。

现在，究竟拉克劳和莫菲提供了什么样的概念工具来以一种体系性的方式探索更具弹性的、缓慢变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特征？通常的回答是：他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这样的工具。当然，在一个高度哲学的/本体论的层面上，他们确实承认偶然性、开放性和脆弱性有它们的界限。例如，他们谈到“作为偶然性领域的局部限制”[②] 而存在的必然性，

① 关于西欧国家和王室家族之间的不同，见 Otto Hintze，*Staat und Verfassung*，Gottingen 1962，pp. 275 - 320。

② HSS，p. 111.

谈到“既非绝对固定性也非非固定性是有可能的”① 这一事实，等等。但是，这些高度抽象的矫正平衡的企图是极具装饰性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没有被转化成特殊概念工具（一般性Ⅱ）的构造，以用于对与“必然性”和“固定性”有关的那些社会的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实际上，在一般性Ⅱ的层面上，唯一严肃的理论性努力是重建霸权概念以及展示接合实践是怎样不断地构造和解构自我认同、主体位置、分节点、社会和政治的空间的，等等。但是，这些实践的存在状况——实践在其中为资本主义更永久的制度结构既支撑又限制的方式——从没有被清楚地说明过。拉克劳和莫菲最接近于描绘接合实践和主体位置的全部背景的地方，是在他们谈论“话语构成”和更一般的“话语领域”时。② 但是这些概念对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性是如此含糊和不充分，以至于两位作者并没有在任何严肃的、体系化的方式上来使用它们。实际上，当不得不谈到资本主义构成的广泛特征和它们的长期变化时，正如杰拉斯已经恰当指出的那样③，他们回复到如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上去，如剥削、商品流通、劳动过程、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界限，等等——甚至连令人讨厌的“社会”概念有时也颠来倒去！拉克劳和莫菲自由使用的以上概念是如何与论述分析关联起来的？这种关联从没有被弄清楚，并且两种概念类型之间的鸿沟造成一种更显著的二元论，它比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发现的、被他们如此猛烈批评的二元论还要显著。

社会主义战略

不必说，所有这些概念的不充分对具体的社会主义战略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④ 例如，《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并没有理论工具用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某些接合的实践比其他东西更重要以及因此更容易在使一种政治空间霸权化时更成功。对于他们，正如杰拉斯指出的那样，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论，人们决不可以预先说某些主体位置的相对重要。他们为这一不可知论类型给出的理由是，任何给予某些位置和实践以特权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本质主义。对于拉克劳和莫菲来说，传统左派致命的局限是，“它试图先验地确定变革的力量及其在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程度，

① HSS，p. 121.

② HSS，p. 134.

③ 见‘Post – Marxism’，p. 74.

④ 见 HSS，pp. 149 – 94.

并确定特权的位置和决裂的时机。"[①] 但是，他们没有严肃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无需诉诸于本质主义和无需把本体论或认识论的特权归于特定主体的社会构成内，评价某些地位的中心性的可能性。当然，人们可以一心一意地认同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即不存在铁定的历史规律，不存在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的历史必然性，不存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的"特殊使命"，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同样运动，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同样的，例如，它们在致力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扮演霸权角色的机会。

作一个非常明显的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工人阶级的运动，无论如何松散和无组织，在一场霸权的竞争中有着更强大的改造能力，因而也有着更多扮演领导角色的机会，比方说，与性解放运动相比。这一事实的原因更多地不是与政治主动和接合实践相关，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更为核心的结构地位有关。这一核心性可以通过一种分析方法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判断，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主要的制度性领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被接合，这种核心性也可以借助一种宏观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来判断，这种分析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中系统的结构的/制度的区别。[②]

显而易见，拉克劳和莫菲通过承认不是所有的接合实践都是可能的而回总体的不可知论："这个社会的符号构造的逻辑在坚持经济学家的历史概念（在形态学层面上）方面面临着严格的限制。一旦这种限制被解除，就可以通过社会抗议自由地跨越各种形式的阶级界线（自由地，即任何抗争和要求的先天的阶级特征——显然不是在一个既定的事态中每一接合都是可能的这样的意义上。)"[③] 但是，如果每一接合都不可能，我们如何评估可能性的程度，是什么使得某些接合比其他接合更可能？在此，《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再一次没有提供任何答案。这一问题既没有被提出也没有被回答。或许这是因为拉克劳和莫菲没有以供提出此类问题的概念工具。需要再次重复的是，要提出此类问题，人们需要一个概念框架，它引导学者去关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为战略行为既设定界限又提供机会的方式。

考虑到拉克劳和莫菲对接合实践的强调，他们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是

① HSS, pp. 178 – 79.

② 例如，这一尝试可以在马克思的 *Grundrisse* 中见到。

③ HSS, p. 86.

我在前一节中所批评的帕森斯主义/涂尔干主义方法的恰当对立面。因为他们专一关注的不是社会系统和它的核心价值是如何塑造和限制主角的实践，而是实践如何构造以及不断颠覆社会。帕森斯功能主义，因为它对集体行动者的忽略，把制度结构描述成社会背景下调节每一个人的具体化的实体；拉克劳和莫菲，因为他们过分害怕将制度结构具体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且在一个制度的真空中分析实践。制度系统与使方法适应社会的实践/行动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显然并不新鲜。对在某些目的论的功能主义（包括帕森斯主义的）类型中发现的对本质主义的过度敏感在社会学中有一段非常长的历史。从这一点来看，《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尽管在某些关键的方面不一样，但与那些解释性的社会学（符号学的互动论、现象学的社会学、民族方法学）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对本质主义和具体化的过度恐惧使它们偏离了应当是所有社会分析的中心的关注：即总体的社会构成是如何构造、再生和改造的。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当它被灵活地运用时——可以帮助学者避免系统盲目的行动理论与目的论取向的系统理论之间的精神分裂症般的分立，所以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社会改造问题上依然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某些东西。

3. 政治的相对独立

但是，假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将制度分析还原为战略行为的分析（反之亦然），那么它将很难避免将非经济领域还原为经济——而且这无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相对独立的再三声明。现在，在我看来，拉克劳和莫菲是对的：无论关于政治或文化“相对独立”的观点如何被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只要用这一方式去行动，我们就拥有了一种二元论类型——尽管我是用一种与拉克劳和莫菲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一二元论和它的最终解决的。

我将通过集中关注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方式详细阐述这一点。冒过度概括化的危险，我将讨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这种关系所提出的两个同样不令人满意的观点。第一个观点由一个直截了当的还原论方法组成，由此，政治现象要么按照资本的再生产要求来解释，要么按照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计划来解释。由于这一还原论思维在相关的文献中已经被广泛地讨论和批评，所以我将集中精力在第二个方法上，它试图回避第一个方法中的还原主义，而是特别强调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在此，正如拉克劳和莫菲正确指出的那样，马克

思主义战略所拥护的“经济优先性”命题是双重的：要么通入引入“最后的决定”的说法而以诡辩的一元论告终；要么通过陷入“二元论”而避免一元论。在后一种情形中，政治领域被认为在本体论上不同于经济领域——这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既然结构的决定在经济的层面上起作用，那么代理人/时机的考虑就在政体的层面上盛行。经济因此不直接决定政治的发展，而只是描绘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什么是可能的。因此，在这一套限制中什么会真正出现将依赖于政治的时机——而且这不再为特殊政治结构和矛盾的理论化留下空间。①

现在，这一方法使政治领域受到了一狡猾的和诡辩的贬损。因为只要承认经济的约束或力量不再被认为是政治的直接决定因素，那么尽管政治现象相对独立，也不应服从于像经济一样的分析类型。一方面，经济现象能够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倾向来说明。另一方面，就政治现象而论，它们的流动的、瞬息的或更少“物质的”特征意味着，结构分析必须被关于政治时机的研究所完全取代。

那么，在此，我们确实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有一个定性的、本体论的区别，而且这一本体论的二元论对于一般性Ⅱ的层面有影响。因为对“相对独立”的强调并不导致恰当地用于政治领域研究的特殊概念工具的创造。相反，政治和国家继续用阶级/经济的术语来界定。因此，例如，在实体性声明的层面上，一只手所给予的关于国家的相对独立，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却被另一手褫夺了，通过主张国家必须用经济、阶级的术语概念化的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后，伴随着重大的异议，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很少显示出政治的非还原论理论。例如，与帕森斯功能主义（它为阿尔蒙德、道尔奇、阿普特、奈特、艾森斯塔特及其他人所写的著作中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创造了复杂的、尽管不令人满意的概念大全）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这样类型的概念武器库。我们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国家本身的理

① 在研究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这一理论立场的采纳，参见 John Taylor, *From Modernisation to Modes of 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the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1979, pp. 132 及其后。对拉美的一个更具体运用，参见 D. Portantiero, ‘Dominant Classes and Political Crisis’, *Latin America Perspectives*, Vol. 1, No. 3, 1974。关于同样导致对政治的经验主义处理的一种稍微不同的途径，参见 P. Hirst, Economic Classes and Politics’, in A. Hunt ed.,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1977；也参见 A. Culter et al.,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London 1977.

论，而是一个关于国家是如何有助于或无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要求的理论。①

这种情况产生了问题。因为假如资本主义构成中的国家被定义为作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或者被定义为作为执行资本功能的工具，甚至被定义为阶级斗争的领域，这显然排除了对这些情形的探究，在这些情形中统治/强制手段的拥有者支配着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或排除了这些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国家政策阻碍而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不必说，这一类型的情形在资本主义外围中实在太普遍，在那里，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特殊意义上的阶级在组织构成上很脆弱，统治逻辑通常胜过市场逻辑，或者，说得更清楚点，政体的再生产需求与经济的再生产需求相对来说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为前者让道。② 考虑到这一点，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关注西方社会长期的历史转变时（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多或少把它的动力施加在社会构成上），他们的分析要比当他们涉及外围资本主义社会时（在那里，时常是国家的逻辑和动力占优势）成功得多。③ 这不是说人们不能够在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之间建立系统的联系，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完全独立于经济；也不是说支配性的政治或其他非经济的斗争（种族的、代际的、基于性别的）在系统性上比其他阶级斗争更重要。尽管这一论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详细阐述为了政治研究的特殊概念工具，但是它使得

① 见 A. Przeworski, ‘The Ethical Materialism of John Roemer’, *Politcs and Society*, Vol. 4, No. 3, 1982, p. 290.

② 关于这些情形的分析，见 N. Mouzelis, Politics in the Semi - 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1986，第 3 章和第 4 章。

③ 例如，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中心—外围发展文献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学术著作是关注这一区分的中心部分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之，安德热·甘德·富兰克高度图式化—形式主义的作品被认为是关于外围资本主义轨迹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样这也不是偶然的：不存在这样的作家，他分析所谓第三世界各种各样的发展轨迹是用这样的方式，例如，它可以与 B. 穆勒用来描绘早期现代化者的发展路线的敏锐的和富有洞见的方法相比较。假如第三世界的研究依然没有他们自己的 B. 穆勒或沃勒斯坦，这也许与这一事实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一领域太占主导地位，因此没有足够的工具用于研究社会构成，在这些社会构成中控制统治/支配方式的斗争通常比控制生产方式的斗争更重要。关于这些观点的详细阐述，见 N. Mouzelis,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Crisis’, Sociology，前言。

所声称的经济的首要性成为政治定义的一部分。在那样的意义上，它不能够用一种理论上一致同时经验上无限的方式来研究经济和政体之间复杂和变动的关系。

拉克劳和莫菲的解决办法

拉克劳和莫菲对待二元论只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讨论：他们完全拒斥经济与政体的区分。在广泛的意义上政治这一术语渗透进了所有的社会空间（存在生产政治、家庭政治、学校政治等等），制度领域之间所有的区分以话语的方式被建构起来。从"前构造"（pre - constituted）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来开始分析，目的是为了检验他们所声称的内在关联，然而这却使他们的观点重新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政治不应该被当作"社会的一个确定的层面而应当被当作社会关系的创造、再生产和改造的一个实践"来看待。[①] 这一对二元论问题的解决也许很讲究，但并不令人信服或有用。首先，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交往中存在政治的维度的这一常见的观念——这一观念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以"话语"（discourse）的术语呈现——不能够成为忽略甚至否定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套有差异的制度结构存在的理由，这套结构有着突出的政治特征：即，它被调整得适合全部统治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系统（政治党派、国家官僚机构、立法和司法部门等等）的核心制度特征可以被分析性地又具体地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制度特征区分开来。我们经常使用政治这一术语既指不同的制度领域又指作为所有社会境遇中内在维度的"政治"的事实，不能作为拒绝前者而赞成后者的很好理由。

此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构成中经济和政体之间的区分的事实是以话语的方式被建构和再生产的，决不意味着它不是极端持久的或者它不构成先进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特征。在那样的意义上，由于接合实践不可预测的结果，而认为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这是根本不正确的。我宁可认为，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分离（在特定的意义上，即在资本主义构成中经济与直接的政治控制绝缘），以及国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既为了维持这一分离又为了推进积累进程——的特殊方式，构成了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永久特征。[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是以

---

① HSS, p. 153.

② 关于这一观点，见 C. Offe 和 R. Volger, '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6, 1975.

资本主义真正是什么的任何本质主义概念为基础，而是以探究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构成的不同特征的比较历史研究为基础。

假如拉克劳和莫菲所提供的解决二元论问题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不令人满意，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否存在着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否存在着一种避免经济还原论（或拉克劳和莫菲术语中的一元论）的方法而又不至于陷入折中主义（或二元论）？换句话说，当保留独特的理论外观时，马克思主义能够克服“一元论对二元论”的两难困境吗？对有些理论家来说，非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观念在术语上是一个矛盾——因为用非经济主义方式处理政治领域的概念框架事实上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其他人来讲，非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政体理论是可能的，假如有人创造了新的概念工具的话，这些概念工具：（1）试图用一种方法将非经济的制度领域概念化，这种方式并不构成它们真实定义的一部分（以及因此把经验的探究排除出去），这一关系类型被认为与经济有关；以及（2）试图避免经济主义而又不至于导致将政治领导与经济领域分离，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在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中就发现了这种分离，也就是说，无须抛弃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某些基本特征，例如它的政治经济学倾向以及它的代理人—结构综合。我的观点是，后一立场应该被严肃地探讨，尤其是因为，至少在当前时刻不存在可供选择的宏观社会学范式，它可以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探讨在世界经济和政体的背景下整体社会被改造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拉克劳早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①] 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创造如此新概念工具的严肃尝试。例如，他的阶级召询和对抗与大众召询和对抗之间的区分是朝向阐述不是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应该用阶级的术语来概念化这一观念的重要一步——用一种理论上一贯的方法。然而，就是在这里，大众召询和对抗镶嵌其中的特殊的政治—制度背景被系统地忽略了：当生产方式构造阶级召询和对抗的结构基础时，大众召询的结构基础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构成。[②] 所缺失的是一个分析概念，它可以用一种与经济层面上的生产方式概念相类似的方式对政体层面发挥作用：例如，统治方式的概念，它由特殊的政治技术（统治力量）和分配这些技术的特殊方式（统治关系）的接合组

---

① Ernesto Laclau, *Politi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NLB, London 1977.

② Ibid. p. 166. 关于这一立场的批判性回顾，见 N. Mouzelis, ‘Ideology and Class Politics: a Critique of Ernesto Laclau’, NLR, March – April 1978.

成，如果理论上被推进，可以以一种逻辑上一致和经验上无限的方法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的联接提供概念工具。这一反还原论的战略类型并没有被拉克劳的早期著作所采纳，它不仅分析性地将政治行动者和阶级行动者区别开来，而且将政治制度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区别开来。当然，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不仅宏观政治的制度背景而且经济制度结构后退为作为接合实践的视域，它开始占据中心舞台。制度系统和代理人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当拉克劳和莫菲通过聚合所有那些以行动为取向的理论家时，那些理论家们对本质主义的过度恐惧使得他们无视任何对整体制度秩序是如何持续和变更的严肃探究。

4. 方法论的整体论和独断主义

我想通过简要地讨论另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人们发现它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存在，在许多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中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存在——来结束这篇文章。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和他在社会现象研究上的整体论取向不仅不可分解地与本质主义相联系，而且与独断主义甚至政治的极权主义手段相联系。

独断主义结论可以从马克思各式各样的全部作品中得出，那是不可否认的。例如，正如拉克劳和莫菲所指出的，在他更实证主义的或更决定论的作品中，社会被描述成一个总体，它的本质按照严格的经济规律而展开，这些规律给予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以统一性和稳固方向，这一点是确确实实的。在事物的这一图式中，人的能动作用被最小化了，因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它的革命角色被镌刻在劳动力分工的恰当位置上，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恰当运动规律来保证。这一关于社会发展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概念可以轻易地与科学主义社会观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往往通过天真地断言存在单一“科学的”以及因此是“无须争论的”解决每一种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办法，而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这同样是确确实实的。政治领域未能概念化，以及马克思对没有阶级对抗的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的预见，只是强化了这一虚假的科学偏见类型，它已经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中各种各样的独断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①

然而，无论是决定论的/机械论的要素，还是科学主义的/独断主义的要素，都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而且，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要素本质上都与整体论的概念框架没有关系。实际上，普遍被接受的是，与19世纪其他进化论的理论不一样，马克思对发展阶段的设计——它强调作为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基本机制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为避免这类严格单线的、决定论的发展观提供了概念工具，例如，在孔德的进化论著作中就阐述了马克思的观点。此外，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被构建的方式——每一阶段明显根据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按照生产力的数量增长而被概念化——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所指向的斗争重要到何种程度，以及社会生活的分配/占有方面而不只是技术方面重要到何种程度。

这方面的最好证据当然存在在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著作中，在那里，阶级和阶级派别既没有扮演次要的角色，也没有呈现为服从“资本逻辑”的木偶。实际上，马克思概念设计中生产关系的支配地位是反对技术主义—中立主义社会观的坚强保证。可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中政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点是确实的，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恰好是将历史和政治的维度系统地引进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这一点也是确实的。至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自然的、永久的市场规律的那一断言，实际上是规律性，它建立在导致特殊剥削形式的历史性的特殊斗争上。

人们可以无限地继续争论马克思著作的那些显然是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的方面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以及贬低代理人和强调结构决定、资本的运动规律等等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然而，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无论是否被认为是决定论的，或者在他早期晚期著作之间是否被发现有一个根本的断裂，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著作为用一种理论上一致的方法看待社会构成和它们的全部再生产/改造提供了概念工具——既从代理人的观点又从结构/制度的观点。这一平衡的整体论类型并不必然具有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的社会研究取向，也不必然导致独断主义的政治态度。方法论的整体论本身不是不可分解地与关于社会的本体论性质的断言相联接，也不与社会制度的相关与非相关的程度相联接，也不与任何特定社会整体中确实盛行和应当盛行的政治控制类型相联接。

① 关于这些关联的详细分析，见 I. Balbus, *Marxism and Domin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1982。

最多，整体论的框架仅仅是建议一种反原子论的探究战略：它尝试提供概念工具，以提防用一种区划的、无连贯性的或特别的方式研究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它提供一种语言，不是树立障碍，而是促进研究整体社会被构造、再造和改造的复杂方式。

作者：Nicos Mouzelis

文章原标题：Marxism or Post – Marxism?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167，January/Februay，1988，p108 – 123

（编译者：王平，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理论探讨的“四个过错”

[英] 格雷戈尔·麦克伦南 著　　黄文前 译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解决有关当代社会理论中“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我只利用正在兴起的这个潮流中的一个样本，即米歇尔·巴雷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① 一书。这种限定中心的理由在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教育、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领域现在非常广泛，因此通过引证众多著作、表明总体倾向，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探讨主要问题就相当容易，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将对那些倾向的讨论建立在像巴雷特的这样的一个单一文本上似乎更加有益，一方面因为巴雷特是一位广受人尊重的评论家，另一方面因为她所探讨的领域——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于激进的批评者的自我形象依旧特别重要。

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论题是要说明，与其说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批判容易被表述为是对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和分析对象完全不予考虑，不如说是对人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那种理论的屏弃，或者是对它的解释范围的极端的调和。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常常更多地依赖于对一般概念结果/策略带有贬低意义的描述，诸如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还原论”、“功能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而不依赖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假设的否定，诸如现代工业秩序在体制上的资本主义特性。对此，很少有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严肃的研究分析。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的和次要的基调

我的论证的第二部分是要指出，虽然“现代主义”理论探讨的推论结果——还原论、本质主义等等——现在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几乎都被看作是不可饶恕的过失或“过错”，但却很少得到一种细密的分析研究。而且，在它们得到超出示意性描述的地方，这些解释问题明显地不断复杂

① M.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1991.

化，往往会破坏批评者的稍带轻蔑的表面言辞。这样，在米歇尔·巴雷特的书中，与主要的屏弃基调相并行的还有一个次要的不确定的修正基调。统治这本书中的“声音”就是明确表现为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声音。因此，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近年来，争论发生所在的整个范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有力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际是经济还原论）的假定不能够作为思考20世纪后期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基础，20世纪后期的‘决定因素’与19世纪中叶工业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非常不同。”① 作为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因此被看作是“可悲的不适用”。②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极限”，葛兰西正是在濒临此极限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③ 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阶级理论模式而言，现在“并不很成功”，它一直“在一个非常基础的层面受到质疑”，确切地说，已经全部“崩溃”。④ 并且尤其是它关于主观性的认识，或者是虚无的，或者是“糟糕的”。⑤

由于受以下事实的鼓舞，即“整个社会理论领域正在以更加严肃地探讨文化和主观性问题的方式来进行改造”，巴雷特更愿意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解构“真理的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加深马克思主义“虚假的经济”幻想的困扰这个问题。⑥ 利用一些目前为人熟知的后现代主义的重要问题，她认为这个中心的转变需要对“新阐述话语理论在竞争、提高和吸引力等方面”的强调。⑦ 这个新的话语视角的中心内容可能表现为福柯式的策略，即将一切理论、同一性和范式看作是真理的体制（regimes of truth）。在这个体制中，争论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兴趣，为坚守“真理的结果取决于过程”⑧ 的兴趣所取代。另一个新的层面是关于多元化、社会化的心理分析的观念：而且人们认为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各种情感的力的“连结”（concatenations）的认识。这些连结具有“一定的力量和一致性”，然而缺少“明确的动机或逻辑”——诸如“世界杯热”。⑨

---

① Ibid., pp. 16, 139.

② Ibid., p. 147.

③ Ibid., p. 51.

④ Ibid., pp. 4, 57, 46.

⑤ Ibid., pp. vii, 119.

⑥ Ibid., pp. 4, vii, 155.

⑦ Ibid., p. 47.

⑧ Ibid., p. 143.

⑨ Ibid., pp. 118 - 19, 154.

就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毫不妥协的，并且围绕一个新的替代视角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非常肯定的声音。不过，巴雷特——如同许多最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碰巧没有像她通常表现出的那样如此全身心地投入“主要的基调”。对我而言，她的犹豫不决还表明了一种值得称赞的意识，即如果没有对现代主义方法论的四个“过错”的某种描述，那么社会理论中真正的解释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证实。因此这篇文章中的第三个也即最后一个重点是要说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种比两者中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更为深刻的关注对象的延续性。那种延续性关注部分是认识论的：什么会被看作是社会知识？部分是实践的：这种知识有什么用途？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公开承认这些问题的延续关联方面无疑存在某些困难，因为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对知识实践的“唯理论的”看法，在需要被迅速取代掉的敝旧之物名单中都是高居榜首的。

还原论

在四个“过错”中，巴雷特最为频繁地指称“还原论”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害。除了上面提到的总的看法外，巴雷特还做出了许多有效的具体判断：例如，她非常怀疑真实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否能经得起“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坚决以此来解释原始概念——的不良影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①] 拉克劳的早期著作作为对还原论的明确干预而被援引。[②] 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受到冷淡的赞许，因为他们虽然勇敢地试图摆脱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问题，但却最终没能完成这次解放。[③] 显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惯常致力于还原论——甚至是其最优秀的实践者都没能够摆脱它——而且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整个批评判断中，他将还原论描述为实践活动中易于沉迷的、显而易见的坏东西。

评价后马克思主义对还原论的批判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于确定马克思主义是否被看作是过时的，或者严格地说，是确定现在清楚可见的错误是否一直在此存在着，而却一直没有被看到。例如，在那些精彩的论述中，有一种论述表明世界本身已经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许能够对先前的社会形态做出分析，却无法分析目前这个具有完全不同“决定因素”特征的社会形态。

---

① Ibid. , p. vi.

② Ibid. , p. 57.

③ Ibid. , pp. 26 - 8, 51 - 4.

我认为这个“历史”论证的貌似真实和简单性容易引起误解。首先，就它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看，这个论证是不一致的。毕竟，后马克思主义从后现代主义中整歪了这一观念：对“社会”的构想既不是根据拥有确定的“真实的”经验特征，也不是根据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整体。[①] 然而，说马克思主义适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早期阶段，但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社会状况，这似乎需要比目前“推论的”元理论（meta - theories）自动提供的更多的经验的现实性和理论的整体性。巴雷特顺便花了一定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她承认“决定因素和社会整体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②] 但这种回避的暗示——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回避——属于论证的次要的审慎基调，而不属于主要的屏弃基调。

除了理论一致性问题外，马克思主义还原论境况的不适用和过时这个根本问题还需要解决。这里，主要观点是如今有关阶级解释的主张的说服力减弱，是现在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非阶级的决定因素，整个文化领域变得极其重要。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要“回避”这些观点的确困难，然而在目前的争论背景下，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注意——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甚至在“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经常受到这种批判的攻击。从一开始，马克思经济学的“形而上”特点就受到持续的攻击。19 世纪后期纯理论社会学新建立起的传统的标志，是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发展理论两方面的分析中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的多元反驳为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历史决定论”和“先验论”（a priorism）的反对同样也是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主要问题。在数十年中，对还原论的持续关注尤其惹人注目。[③]

---

① Ibid. , p. 64.

② Ibid. , p. 46.

③ 马克思逝世后的每一个 10 年都见证了或者探讨或者回避决定论和还原论问题的重大努力。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有关这个问题有太多的著作可以实际列举。早期的重要著作有 G. Simmel, *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92], New York 1977;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1897], London 1907; L. Boud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Chicago 1907; B. Russel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olshevism*, London 1920; S.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New York 1926; G. D. H. Cole, *What Marx Really Meant*, New York 1934; M. Eastman, *Marxism: Is it a Science?*, New York 1940; I.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1948; H. B. Action, *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London 1955; K.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61。

此外，如果我们认真反思19世纪欧洲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飞速前进和错综复杂——例如，想一想那个时代任何伟大的小说——那么声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比在那遥远素朴的“经济”时代，文化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屈尊俯就的（patronizing）。至少，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准教义（near - dogma）应该获得彻底的比较研究，而就我所知这还没有开始进行。

但是，与主要观念不同，近几十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马克思主义过去看上去解释翔实之处现在显得毫无分析创造性，这种观念被证明决不是“明显的”或者是必然令人信服的。实际上，坚持认为与马克思主义所曾考虑到的相比，这里一直存在着更多的“决定因素”，而且文化一直更加重要，这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性”言辞更加一致。在这种意义上，虽然说“近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有力的批判”可能是对的，[①] 但因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一直在说着同样的事情，就说这种批判是全新的，这却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历史的”论证没有得到解决，后马克思主义对还原论的批判重点是方法论的，或者严格说是元理论方面的。在这方面，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对分析的简单性或是对分析的完整性的强烈渴望是最成问题的。因此，很少有后马克思主义者会怀疑社会—经济阶级是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实际上，他们一般如何思考阶级深深地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概念的印记。他们所反对的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明显专一的、还原论的关注。

实际上，自然和社会科学元理论中旷日持久的、复杂的争论主题，是什么真正构成“还原论的”解释纲要，以及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或“坏的”事物。[②] 巴雷特本人——在次要的基调上——显示了她对这种复杂状况的意识，当她竭力主张有关决定论和唯物主义意义的一般问题可以有效地“暂时被搁置”时，我们就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阶级还原论特殊的、根本的缺陷上。[③] 但这种搁置并不容易做到，如果考虑到下面这个最初的假

①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16.

② 例如，见 A. Peacocke, ed., *Reductionism in Academic Disciplines*, Guildford 1985, D. Charles 和 K. Lennon, eds, *Reduction, Explanation and Realism*, Oxford 1992.

③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159.

设，即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关注的错误与其说是它对阶级之重要性的坚信——对此，后马克思主义通常不会反对——不如准确地说是它的方法论上的还原论。

排除式的还原论和宽松的还原论

那么，作为一个解释策略，还原论的问题是什么？这里，我们必须记住在自然科学中，将一个较高水平组织（例如，如桌子这样的固体日常用品）的术语还原为较低水平组织（例如，原子、亚原子粒子、夸克，如此等等“不断缩减”）的本质和过程，这种解释的还原已经广泛地被看作是成功探索的真正范式。它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很难认出任何坚决反科学的批评家，他们宣称一切还原论都是非法的。典型的“抵抗”方式不是否定还原论本身的价值，相反是宣称还原论不是社会科学的恰当的策略。新近，人们还开始广泛承认，在大量自然科学研究中范式解释也被证明不同于任何经典“物理主义”意义上的还原论。

实际上，关于什么是还原论甚至是“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所必须的，存在着相当多的哲学争论。“排除式的”还原论（Eliminative Reductionism）就是一种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根据另一个领域的客体和过程全面地说明这一领域的一切重要事物。这样，例如，某些“行为主义者”和“物理主义者”就被描述为，断言心理过程能够完全没有任何重大损失地还原为有关大脑活动的论述。这个观念是说：几乎凭借定义，较低水平的术语就不仅能够说明而且能够取代较复杂水平的术语——比如说，在 H_2O 这个水的定义中，关于“水”的一切说明无不精确地包含在其中。

这里继续这场争论会陷入困境，但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指出甚至在最坚固的领域最牢固类型的还原论（the hardest sorts of reductionism），都逐渐被看作是可争论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仍然没有人准备承认还原论因此会被看作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研究策略。实际上远非如此：根据另一个领域的事件来解释这一个领域的事件的某种规范观念（regulative notion），仍然同我们所指的“解释”本身的核心意思相近。你甚至可以说随着对严格的还原论（strict reductionism）之构成的进一步研究，“宽松的”还原论（Loose Reductionism）自身则悖理地变得更受人尊重，而且它的更深程度的模糊变为某种力量。

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不可能符合一个“排除式的”模式，这似乎是明确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意识形态理论中

假定能够完全排除诸如此类现象——例如新右派社会改革的工作纲要——的术语和指称（referents），并且用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术语完全取而代之，这简直是荒谬的。甚至在对这个问题最通俗的讨论中，这种“排除式的”还原论都不起作用。相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是，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在某种广泛的因果意义上与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紧密相关。

称那种广泛的、因果意义的连结为还原论，这是合乎逻辑的吗？有些人会认为从严格的还原论走向诸如伴随、依赖、限制或物理的/物质的先决条件这样一些更广泛的概念，恰恰完全离开了还原论的范围。① 相反，另一些人认为，在两个领域之间设定虽不牢固但仍然是“等级体系的”依赖/派生的连结，这是继续从事相当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徒劳追求。这是因为彻底的还原继续被看作是在无法达到它的境况下的一种规范的理想。②

这种“弱的”还原论（weak reductionism）的构想一定是处理马克思主义还原论问题的恰当的还原论。确切地说，甚至在某些年长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批评家的文本中③，人们发现无法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潜在的宿命决定论，而不是它的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因果决定的一般意义，后者往往被承认是完全可接受的。这样，弱的还原论的问题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如果你把弱的还原首先看作是对严格的还原论的逃离，那么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还原论的。在一本深刻地讨论了这许多问题的书中，赖特（Wright）、莱文（Levine）和索伯（Sober）将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明确地描述为反还原论的，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反对社会科学中“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等价物，也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④

对弱的还原论的介绍

同一立场的另一种理解——这是我本人赞同的——是说在马克思主义

① 例如，A. Garfinkel，*Forms of Explanation*，New York 1981.

② 例如，J. Dupre，*The Disorder of Things*，Cambridge，Mass. 1993，尤其是第二部分。

③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例子，见 G. D. H. Cole，*The Meaning of Marxism*，London 1948，p. 29；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见 K.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 2：*Hegel and Marx*，London 1962，p. 107.

④ E. O. Wright，A. Levine 和 E. Sober，*Reconstructing Marxism*，London 1992，pp. 116 – 20.

这里必然有某种弱的还原论作为指导原则，但在特定（弱的）意义下的还原论最后证明毕竟不是这种“坏的”事物，而且它的意思确实不是对“被解释”现象层面的任何不分青红皂白的贬低。因此，新右派意识形态的出现只有通过论及阶级形态的条件和利益才能得到因果解释，这种说法肯定不表示较高水平组织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本质的重要性。相反，正是因为各种话语——比方说关于民族归属、大众资本主义以及传统家庭生活——非常有趣和动人，以至我们试图认识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根据以及它们如何能在某种意义上从结构方面“得到解释”。考虑到这一点，没有人需要为提出将阶级利益以及经济制约和倾向看作是产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因果连结之关键进行辩护。

与这两种选择不同，巴雷特的思路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因果特性的结构基础的观念，即使不是“排除”意义上的强大的还原论，仍旧在“原则上”非常有力地暗示了被解释范围的无足轻重。她可能推论出，这种过分的简单化确实不仅应该得到还原论的专门术语，并且还应该得到通常与此相伴随的贬抑的含义。我不确定这场关于还原论的争论能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并且当然无法在这种阐释的背景下确定。但在我看来，似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研究中的现实例证的大量逻辑分析和思考，巴雷特利用“还原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歪曲就仍然远远不及轻蔑的论调所暗示的有说服力。与此相关，后马克思主义表明——通常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但在有关现代主义主旨的“破坏工作”中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修辞学上的作用——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确能够没有任何还原论的推动，虽然这无疑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却非常成问题并且长期未展开。

在巴雷特的注释中，“阶级还原论”的最后一个意思值得研究。正是在这里，她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它的普遍的经济主义，而且表现在它关于独特的意识形态应该被看作是“属于”独特阶级的假设。[①] 这里提出两点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这种奇怪的“庸俗”表现。首先，这种批判是极端不公平的。马克思确实说过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是统治阶级的观念，但它显然不是得自这一点——并且直接同马克思的主要实践相对立——即一切意识形态能够仅仅凭借它们的内容被分配为统治阶级的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观念。如果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了这一点——并且我们在这里再次拥有一个巴雷特的文本中没有做出严格论证的重要主张——那么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这种庸俗的看法不应该被假定为马

①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56.

克思主义者曾考虑过的看法。

第二点是要说明即使巴雷特竟然简单地将这种庸俗的看法归于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可能得出，意识形态的实践在任何自主的意义上都是自由的。不仅仅马克思主义，而且任何强烈的社会学信念，都在可能帮助我们彻底阐释意识形态表面独立力量的社会形态的结构特征中寻找线索。

巴雷特论证这些问题的一个结果，是试图最终区分和评价马克思和福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基础时，尽管在这两位“伟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我还是希望促使我们去思考他们之间的重要的一致之处。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很容易将马克思关于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这一主张，描述为提前建立一个类似福柯的研究纲要：不是探讨流行于社会上的一套套统治观念的“真理”或价值或必然“所属”，这似乎是马克思极力主张的；相反，是探讨这些观念如何促进阶级力量的关系，研究它们如何作为真实被接受，看它们如何使团体和机构的策略合理化，并且展示它们如何能够建立起（资本主义）独特的社会控制机制。

为了进一步认识福柯和马克思的一致性，我们只需要反思统治“西方”世界学术创造的“真理的体制”近来的根本转变。向审计、质量管理、责任说明、顾客服务、操作指示、评估、目的和宗旨、目标、任务说明等等的普遍推进，产生出惊人的、激烈的新话语。而且正如大多深刻的真理体制，坚持完全处于那种新准则“之外”的态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激进的学者开始迅速卷入一种过程，借此，不仅较旧的精英价值观念，而且较新的传统教学法的替代品，也只能在管理主义（managerialist）新词汇的某种变体被证明是正当的并且被再现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证实。在那些辛苦工作并且不仅具有研究意识而且也具有学习意识的集体中，究竟谁会否定教育学中的“反思实践”机器——职员的成长，自我、导师以及同事评议制度，等等——经常是有用的、也许甚至是必须的?

但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这些观念体系、这些合乎规范的斗争、这些“技术”、机制和影响的相对自主，使意识形态的此类形式与支撑它们的广泛的阶级形态和经济调整相分离了吗？没有。那么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可还原为那种较低级复合体的利益、本质和过程吗？不能。

功能主义

还原论与现代主义解释的其他三个主要“过错”——即功能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紧密相关。就米歇尔·巴雷特而言，与还原论的问

题相比，她较少谈论功能主义的问题。就一切实践目的来看，她可能认为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她无疑假定功能主义并非好的解释实践。因此，巴雷特重复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批判标准——这是功能主义的。[①] 她申斥同辈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莫菲沉迷于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功能主义的说明。[②] 她批判马克思主义根据自身"同社会阶级专一的功能性关联"来探讨意识形态。[③]

这里要立即指出的一点是这两个概念的效果实际上不是同等的或同样广泛的。例如，还原论的逻辑包括根据某一复合整体的（较基础的）部分来说明此复合整体，而功能主义通过将现象看作是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整体的组成要素或部分来解释其意义。因此，恰当的比喻与其说是还原不如说是"扩张"。这样，虽然马克思主义往往会习惯性地被描述为不仅是功能主义的而且是还原论的，但是这些解释模式确实具有许多不同的、值得仔细研究的重要性。

继还原论模式的讨论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包含功能主义的解释吗？而不管怎么说，它是如此糟糕的东西吗？马克思主义确实包含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似乎不可否认。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或福利国家的发展和重要性的可识别的说明没有不对现象进行解释——政府活动、纪律策略、教育学观念、有权申请福利的人的类别等等——却不参照反映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生产方式特点的劳动市场的再生产、资源的分配以及就业前景。那种更宽松的标准进入研究中，并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更具体的实践活动或组织安排的出现、持续或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的这种境况有几个方面证明，不仅对批评家而且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令人担忧的。其中之一关系到在"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说明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促进或抑制一种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尽管某些高级概念的讨论似乎要求马克思主义认可某种生产力的功能主义[④]，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觉得这种

---

① 见 L. Althusser, *Essays of Ideology* 中的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d Investigation), Verso, London 1984;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97.

②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75.

③ Ibid., p. 157.

④ 例如 G. A. Cohe,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1978; P. van Parijs,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1981.

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真实的，而且也不是自主地引人注目的。不管是赞成或者反对这个论断，我认为与其说是功能主义自身，不如说是“技术主义”造成了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难题。因为许多赞成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图式中生产关系居于第一位的人，仍然依据特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现象遵从资本“需要”、“逻辑”或“利益”的方式致力于大规模的功能概括，这毋宁被看作是社会（阶级）关系的功能总体。

进一步说，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变体都是含糊的功能主义，因为它们的基础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需求”有关。[①]这典型地说明只有人民——而不是各种制度——有需求。马克思主义因此由于其势不可挡的功能主义拟人观遭到屏弃。这样，虽然每当谈论起例如教育改革如何运作“以满足资本的需求”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退缩，但我不认为“拟人观”的论断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如果各种复杂制度是作为满足人类各种基本需求的方式逐渐形成的——正如它们必然如此，那么说由此而产生的制度本身具有需求就是不恰当的。虽然任何种类的社会制度都受到直接的实用性和逻辑上的追切需要的重要调节，但它们最终在关键意义上都必须被看作是“目的论的”：它们出自人类的目的和需求，或者受人类的目的和需求的影响。运输系统、计算机网络、经济模式——这些“工具”制度显然是为了满足各种需求设计的，而且如果它们想要有效运作，它们自身就会有一定的“需求”。更概括地说，社会或经济制度具有各种需求也许是更有争议的，但一切社会的制度特征，包括分层原则、居住方式、性别划分、社会—经济资源和赢利，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都是适合的、有利的机制——它们的运作和变化都与其人民特殊的和普遍的需求有关。当然，困难在于，除了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上，往往很难明确指出哪些需求通过制度状态下的哪一点得到满足。那么，这就很容易从假设某种改革或话语可能部分满足某种一般的功能解释，走向确信这种改革或话语确实成功地满足了那种需求，并且无需对所谈论现象表示过多兴趣。追溯功能的适用性[②]——萨特曾称它为“疲弱的马克思主义”（lazy Marxism）的基础——肯定是一种无用的、无法接受的做法。但假定功能的解释永远没有根据或者是通用的，这同样是一种相当疲弱的后马克思主义。

---

① 例如 A.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 London 1981.

② W. G. Runciman,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Vol. I*,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1983, p. 212.

即使这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特殊的"贬"义的功能主义。例如，围绕福利国家的讨论目前带有女性主义者、绿色环保运动以及"种族主义者"挑战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特点，而且每一种贬义的功能主义的变体都相对容易发现。例如，福利国家以破坏地球的工业经济增长为前提并对此加以维护，这种说法相当于一种绿色环保运动的功能主义。家庭的工资标准——对现代福利服务非常重要——用于加强男人养家糊口的观念和实践，男人投身于公共领域，而妇女被限定于家庭劳动或者作兼职，赚一点零花钱，这种观念相当于女性主义的功能主义。在这里，父权制是全部制度，它被看作具有一种独特的和压倒一切的逻辑，以及随之而来的再生产的需求。当然，为结合各阶级、种族、性别以及生态洞见（ecological insights），人们已经做出了更不可思议的努力。但在这些努力没有流失为对分离主义逻辑的"累加"集合（additive collection）的情况下，它们仍然结合成为另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的图画，其再生产的逻辑仍然具有——虽然是难以捉摸的——根本的功能主义的性质。

功能主义的复兴

功能主义分析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与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意识形态倾向的剩余结合（residual association）。在这个范式中，将社会总体设想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的体系，其活动由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和有目的的动机推动，这一理论关注与目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实现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时"运作"非常好这个规范信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功能主义在规范性方面引起的众多严厉批判是它应得的。我当然不是试图去复兴它，然而，即使我们的理论不是贬义的过度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理论总是能够完全逃脱某种正常运作的规范意识，这似乎也是幼稚的。① 无论如何，我想如果我们仔细回顾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兴盛期以及后来的毁灭，那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似乎决定性地削弱了帕森斯伟大理论的雄心及其为资本主义系统辩护的气息。在一种受到过低评价的分析中，至少是被左派批评家过低评价，② 默顿将帕森斯的功能前提重新构想为需要检

① G. Macdonald 在进化生态学中论证了这一点，见 'Reduction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Charles & Lennon, *Reduction*, *Explanation and Realism*, p. 92。

② 见 R. Metron,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1968.

验的假设，而不是探究的假定标准。他表明，一种广义的功能主义见解不仅一点也不怕变化，而且还需要对变化有所认识。他精确地区分了不同种类的“功能作用”，尤其是潜在的功能和明显的功能。重读他的论著，我无法找到任何与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或绿色环保运动——的分析方法完全不一致的地方，而且这种看法也可以利用“新功能主义”的一个主要形象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获得，新功能主义因此再次在社会学中享有某些影响。① 在这种回顾中，极左派和女性主义对一切种类的功能主义的批评现在似乎就有点让人尴尬。

也许通过声称帕森斯学派的原始称号——“结构—功能主义”——实际上对我们这里正在研究的理论层面非常适合，能更好地复兴功能主义。换言之，如果“功能主义”失败，很难看到“结构主义”如何可能继续存在。并且如果某种结构主义被去除，那么任何种类的大范围的社会理论看上去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功能解释能够被有效地看作是结构解释的等价物。这实际是有关这个主题近来的一些最好的讨论的要旨。在这些讨论中，多元关注未给微观因果解释（micro - causal explanation）以特权，这导致了下面观念的产生，即理论分析也许不存在压倒一切的单一目的。根据实证主义的模式，功能解释必须与对具体的选择机制的说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后者保证了经验的功能连接。“实在论者”——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是实在论者——是否也必须致力于因果解释的优先权，这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② 但是确实到了反对“细致的”解释总是必然比较粗略的探究更好这种观点的时候了③，也到了采取一种认为“解释找到了相称的地位”的元态度的时候了。④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实体组织的一切显然不同的层次都有它们相对自主地“发挥作用”的逻辑，如果功能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一定必然继续是相当含糊的、临时的和思辨的——正如就社会整体的特性而言，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多地辩解。功能主义的解释最终不是对因果知识的失败的诉求。

① 见 J. C. Alexander, ‘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Newbury Park 1985.

② 见 D. Little,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Boulder, Co. 1991; R. W. Miller, *Fact and Method*, Princeton 1987.

③ F. Jackson and P. Pettit, ‘Structural Explanation in Social Theory’, in Charles and Lennon, *Reduction*, *Explanation and Realism*, p. 31.

④ Garfinker, *Forms of Explanation*, p. 59.

它毋宁是使一种现象的产生“有意义”的另一种方式。功能性解释设定了关于它的主题的某些“原因”问题：为什么福利国家似乎是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来发展？为什么男性工厂工人反对妇女以同等身份进入劳动市场？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后）现代的世界中存在着复兴种族民族主义的强烈愿望？显然，如果没有关于事物如何产生的因果阐述，我们就无法在这些种类的探究上有很大的进步。但关于社会机构的全部意义、持续或消失的论证似乎需要功能主义的心性结构，而不（仅仅）是“机械”结构。两种相关联的推理形式没有在概念上准确地相互描述。实际上，考虑到后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惯常的反对以及与其将理论看作是再现不如看作是想像的宗旨，人们可能希望后马克思主义友好而公正地对待功能主义的故事内容（story - lines）。后者提供了一种“意义”，这是远离科学迷恋可论证的一步。但再次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发现的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驳斥的论证模式，它只是对这个问题的某些比较细致的关注点不予考虑。

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功能性解释必然的伴生物。现实地思考复杂的本质和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人类生理学、DNA 结构或精神分裂症的中心的——本质的——某些一致认识，那么这些领域的解释至少就传统认识来说是彻底失败的。本质主义是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能够在原则上将事物和结构描述为具有两类特点。一类是，如果没有这些特点，事物和结构就不能真正被看作是此种事物和结构。在无挡板篮球（net - ball）运动中，你绝对必须有网子、篮球、参加者和禁止踢球的规则——这是无挡板篮球活动的实质，否则最好将它看作是澳大利亚规则的一种。另一类是，这些特点严格说来对正在讨论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在这个例子里，也许是球队的颜色，或甚至是当你不得不传球时所依据的规则的变化。

在《真理的政治》一书中，巴雷特赞扬了拉克劳和莫菲的反本质主义（也作反还原论），表现了今天在“对社会理论中‘本质主义’更普遍的批判”的旗号下福柯权力分析的力量。[1] 毋宁说在探讨权力的“方式”而不是权力的“动机”和“主体”时，她强调指出福柯避开了各种传统的本质主义的陷阱。确切地说，巴雷特的反本质主义似乎比她的同伴们走得更远，

---

[1]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 77, 136.

因为拉克劳和莫菲可以说表现了对“本质特质为差异之无限作用的社会领域”的基础性说明。[1] 至于福柯，他本人对主观认同的偶然本性和话语本性的极端坚持，最终可以被看作是哲学特有的诡计。借此，“抽象的正确性”的一个新的去个性化和准普遍性的假设无法反对政治知识的本质化。[2] 例如，福柯自己的欧洲中心论和男权主义从可能突显对真理的偶然性、策略性要求的话语结构中“消失”。

马克思主义者是本质主义者吗？另外，不管巴雷特说什么，本质主义者能够自我辩护吗？在我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答案似乎都再次是有保留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信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逻辑”观念，即使这个逻辑包括“矛盾的”过程。同样地，当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剩余榨取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不同的、特殊的逻辑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时，它揭示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人们认为，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这里，在具体的社会分析中，本质主义无需等同于还原论或“表现主义”：诸种生产方式的不同方面可能表现于任何社会形态中；一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可以被看作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等重要方面具有不确定的结果。换句话说，正如存在着不成熟的和成熟的“功能主义”和“还原论”，也可能存在着简单的和复杂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许以这种方式得到最引人注目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看到社会和有机体之间的一种“类似”，由此赞成对社会“单元”、功能和要素的一种本质主义的探讨；马克思主义还从理论上真正将社会解释为一个具有本质的发展逻辑的复合体。[3]

我感到这种本质主义有点儿过度，而我更愿意与各种“温和开通的”实在论者一起去谈论——以不同方式得到实现的——潜能、能力和倾向。但要知道这只是对本质主义的限定，而不是反驳。因为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介入解释的“结构”类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某一点上——至少在原则上——去决定哪种倾向是复杂过程的实质，哪种则不是。任何具有有趣而大胆的主题、谈论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理论都必定是本质主义的。这种理论将确定中心概念以便在复杂的整体内去“辨认”预设的（purported）主要机制和力量。如果马克思主义再一次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利剑而衰败，

---

① Ibid.，p. 78.

② Ibid.，p. 151.

③ 这种倾向的强大的本质主义在 S. Meikle 的 *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London，1985）中得到论证。

那么女性主义、绿色环保主义等强大的理论说明形式也都会衰败。“综合的”解释策略当然是合法的，并且可能是大有作为的，但从当代各种争论来看，对社会结构不同本质层面进行一种简单的“累加的”理论探讨，对此显然没有人会感到十分满意。这些不同层面作为一个新的巨大图画——实际上作为一个新的复杂的本质主义——往往被看作是需要首尾一致的紧密结合和重述。

偶然性能够得到理论说明吗？

作为“深层”解释的共同的必然特点，本质主义没有完全复兴也是由于设想可靠的本质主义认识模式的替代物时的困难造成的。当然，人们常说，社会理论必须准备好去接受社会生活的极端偶然性、它的间断性和它的特殊性作为基础假设。[1] 但我们仍然不能确信在任何本原的意义上这真正可能意味着什么。人们怎么可能对偶然性进行理论说明——难道不正是这个观念指面对偶发事件时解释的投降吗？巴雷特喜欢引用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社会关系必须被看作是不符合任何单一因果原则或一致逻辑的各种机构、组织形式、实践和实践者的集合体。[2] 但对于当人们开始确信这些集合体不仅仅是偶然的相互关联后的所作所为，这个有趣的提法并没有真正去面对，也没有排除这些集合体或许更重要的可能性。巴雷特在这本书中也引证了福柯。在关于放弃因果性和必然性而以“多种形式的相互联系的群集”[3] 取而代之的观点中，福柯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偶然性的逻辑。可是，如果不是去发现某些更深刻的——本质的？——形式或逻辑，那么为什么要再次费心去思考群集和相互关联呢？作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仅仅“指出”和描述相互关联，如果这就是它们的一切——偶然的相互关联，从这种观念中可能产生何种解释的价值？在我看来，巴雷特、福柯或赫斯特的这种疑问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认为福柯的精神和挑战在于他试图立即脱离

---

① 见 A.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1984; R. M. Unger,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Cambridge 1987; N. Fraser and L. Nicholson,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1990.

②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65.

③ Ibid., p. 130.

“理论”——因此这是对那些努力运用“福柯的理论”的众多追随者的一种嘲讽。至少在表面看来，解释的问题并不是使他过多担忧的事情。但对巴雷特来说，问题很不一样，因为不清楚她是否对偶然性较必然性在形而上学上明显更重要感到满意，也不清楚她是否对偶然性的理论说明这个（矛盾的）观念表示满意。不过，这是反本质主义的严格要求，巴雷特不难发现它在福柯、拉克劳以及莫菲的说明中发挥作用。更为貌似有理的结论也许是承认某种程度的本质主义是根本不可避免的，而不是试图（但失败了）提出“更纯粹的”反本质主义。通常的争论是我们应该将哪种本质看作是重要的，而不是本质是否能够被废除。

本质主义是思考人、群体和社会的一种“绝对的”方法，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观念是怎样的呢？对人和各种制度同一的本质“核心”的详细说明难道没有建构起对差异的巨大的压制？差异似乎是现代多元渴望的实质。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我的论证中又一次没在任何地方表明本质主义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可担忧的。不过，幸亏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一篇重要论文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超越两极化争论的重要方法。①

努斯鲍姆担忧地指出，由于女性主义者、发展专家（development specialist）以及其他人的集会，本质主义的观念今天往往被讽刺性地不予考虑，好像它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好像很容易获得一个替代品。由于努斯鲍姆不相信这两点，所以她重新建立了有关当代道德和政治的可辩护的本质主义的总看法。她的策略是：她的本质主义不是人类本质活动和兴盛的“绝对”观念，不是完全脱离了对时空中人的具体关注的某些价值观念。不过，她认为我们能够理智地审视人类历史，并且提出对各种事物和功能的共同认识。如果在生活中缺少了这些共识，我们很可能根本就不把这看作是真正的人类生活，因此它们是真正生活的本质核心，并因此是共同的、激进的人道主义政治学的基础。可以预料到，努斯鲍姆在这个本质特征表中列入了一些显然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例如必死性，对食物、饮料、住所、性欲以及自由活动的需求，但她同时强力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发达的”社会中，这些需求在许多方面仍然非常明显地未能满足。紧接着上面的内容，她描述了我们的各种认知能力，我们对欢乐和痛苦的体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我们与自然的关联，我们的心境与活动。还有对各种成就的自治、协作以及协调的思考，乍看像是粗略地列举逐渐呈现为人类个

① M.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s Social Justice: In Defenc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2 (1992), pp. 202—46.

体必不可少的本质的概念。

努斯鲍姆继续说，正是因为这个人道概念是一个本质的概念（即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基础的”），所以对绝对主义和对差异无感知的指责是危险的、错误的：“在它的真实意图中，它考虑到对每一组成部分进行多样地详细说明的可能性。”[①] 差异、相对性、变化——但不是相对主义，因为无论如何在目前，核心概念不仅说明了交叉文化的最低限度，而且似乎获得了一切文化惊人程度的真实一致。[②]

在对努斯鲍姆关于女性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论证——它非常赞成马克思——进行仔细研究时，我打破了我所声明的仅仅坚守巴雷特著作的打算。但这种偏离的原因很简单：巴雷特自己在《真理的政治》的最后要求对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决定性的重新讨论”。[③] 这样一来，虽然巴雷特的确正确地感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人道主义一种它不该受到的批判，但很难设想她怎么能在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重建人道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努斯鲍姆的研究所充分证明的，强大的人道主义冲动需要而不是废除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正如大多数“后”辩论家竭力主张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指出下面一点是有趣的：还有其他女性主义者，她们在关于采用一种比近来探讨本质主义的典型方法更融通的方法，以及在理解如果没有某种本质主义很难设想一个人如何能够成为某种独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这些方面比巴雷特都更明确。[④] 在这种倾向下，她们谈到“有策略地”从事本质主义研究的必要性。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彻底屏除的缺陷不断增长的意识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我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很难设想如本质主义这样的事物及其对一般原则的固有信奉怎样才能真正得到“有策略的”讨论。不管怎样，本质主义似乎需要完全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

普遍主义

对普遍主义反理论的批判指向一连串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无论

① Ibid.，p. 224.

② Ibid.，p. 223.

③ Barrett，*The Politics of Truth*，p. 164.

④ 见 D. Fuss，*Essentially Speaking*，London 1989；G. C. Spivak，*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London 1993.

在什么时间地点，它都声称对一切社会适用。这有时被认为是对一般社会反思的"超历史的"渴望，而历史唯物主义有时被看作是这种意义上的古典的普适理论。一个稍为不同的解释是普遍主义表明一种理论对"普遍"真实的要求——并不必然对一切社会都是真实的，但却是无条件的真实，也即不管认识主体的态度和兴趣。米歇尔·巴雷特在她的书中利用了这两个意思。她谈到普遍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主要"弱点"，同时更概括地谈到"普遍话语不断消退的魔力"。[①] 巴雷特更持久地关注于以一种认识论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说明存在的困难本质，这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它暗示了意识形态分析假定了对一种与不完全的、受到歪曲了的物质（意识形态）——这是分析的内容——相比更真实的、更普遍的知识（科学）追求。因此，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元理论方向，即哲学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意味着与意识形态建构内部出现的对实在的歪曲相比，客观主义的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实在"如何是真实的"。

在这个方面，巴雷特认为，意识形态的概念由于不可磨灭地带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确凿无疑的认识论的"，并带有一定的贬义。[②] 马克思被假想为一位实在论者，实在论则是被福柯断然否认的事物，而这种否认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福柯对"现代主义者"替代物的优势之一。[③] 巴雷特断言，马克思不相信这种"错误意识"普遍存在，但却不停地、甚至过分地谈论意识形态的歪曲和幻觉。[④] 马克思以此方式大规模地引入了唯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为此，他现在必须受到尖锐的批判。

我们再次可以先赞同巴雷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计划带有明确的认识论——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主义的——倾向。巴雷特指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次主题，它企图以在认识论上中立的方式来讨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过，她在总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描述为唯科学主义的，这似乎是正确的。[⑤] 那么，作为所概括出的两种意义的解释的过错中的任一种，普遍主义的情况怎样？

首先，我一直认为将普遍主义解释为"超历史的"会使人产生误解。

---

①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 vii, 163.

② Ibid., p. 9.

③ Ibid., pp. 13, 138.

④ Ibid., pp. 5 – 6, 155.

⑤ Ibid., pp 7 – 8. 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个例子见 J.. McCarney, *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Brighton 1980。

毕竟，即使我们采用了一种“包容”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论，它在主要方面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理论——它被运用到各社会制度的全部时期及其具体的生存条件上。现在，甚至是马克思也没有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的普遍主义看法。他的观念似乎表明了抽象概念的演变阶段。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潜藏的危险的阶段，不过绝对不能作为非法的在先天的基础上被排除掉，正如十足特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辩护者经常断言的那样。①

如果马克思没有坚持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历史理论，他的那些更独特的理论无疑会为众多的普遍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等等——所充斥。而且，经过反思，我们清楚地看到，几乎每一种社会理论都必须使用这种意义上的——结构和力量、真理的制度、正面和反面、文化、意识形态、性、种族特点——普遍概念。这里，普适性或对一般性的努力追求是意义的真正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语言都具有一种必然普遍的要素。

我们还必须追问，一种非普适性的理论看上去会是什么样的？谨防普遍主义的过错，后马克思主义和后女性主义作家经常谈到使我们的理论扎根于“特殊性”、“具体性”和“地方性”的必要。尽管这种断言深得人心，但在我看来还是无济于事的。例如，马克思自己的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理论相当大程度上“扎根”于他的时代和环境——而他也为此受到责备。不过，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要求是矛盾的。我们永远无法实际知道什么时候某种特殊性是充分的特殊性，而且无论如何你能想到的最不重要的特殊性——群体、自我、经验、思想、言词、事件、行动——本身必然是从无数更特殊的事例中抽象而来的。巴雷特本人通过询问我们如何能够“抑制理论的普遍假设而无需完全屈从于特殊主义”，② 公开承认了这个问题——至少在次要基调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但我们也许能够以此来展开这个问题：进一步区别对待许多普遍化的话语所体现出的富于想像力的和科学的能力，并努力去寻找并没有从特殊性走向一般性而且多少类似于此的这个有趣理论的哪怕是一个单一的例子。

并非本意的真理要求（inadvertent truth claim）

就认识论的普遍性而言，巴雷特观点中的张力尤其引人注目。不仅马

① 见 D. Sayer, *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 Oxford 1987.

②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 161.

克思由于过分强调认识论而“被拍卖”（under the hammer），甚至“较温和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如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也如此，汤普森仍然保留着意识形态通过“掩饰”（dissimulation）的机制发挥作用这个半传统的观念。[①] 这导致的逻辑结果是，如果不把“重点安排”在阶级或者没有一个中心的“认识论层面”，我们一定会疑惑“意识形态的理论还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和准确性”。[②] 巴雷特还继续断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貌似激进的新理论家——后结构主义者、拉克劳和莫菲——的见解本身最后证明是明显“认识论的”。[③] 甚至福柯最终也被描述成“绝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实际上，他被认作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在超凡的元水平上对其他人的话语产生概念的影响，并且提出“本身充满真理要求”的各种命题。[④]

对这一切我深表赞同，而且巴雷特对此也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无所不在的认识论相当决定性地引起了她自己的主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使认识论进入意识形态，并且不仅马克思主义也许还有意识形态，现在都必须因那种错误的普遍主义而被取代。实际上，当关键时刻来到时，巴雷特根本没有准备好去论证后面这个激烈的态度。相反，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折中的办法。因为她知道——正如并非如此激进者所表明的——任何对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严重干预都必然会背上随之而来的认识论的包袱，她承认“放弃认识论的追求”是极端困难的。[⑤] 不过，她可能会建议我们严格“减少”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论的说明”。[⑥]

与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批判到做出某些肯定这个转变相伴随的论调的改变是引人注目的。从一个似乎取缔并指责认识论的立场来看，我们现在得到的仅仅是一个贬低它的立场。而且当我们考察巴雷特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的说明时，那种比较折中的元立场的全部理由就变得明显了。尽管巴雷特由于汤普森的立场等同于“温和的认识论”而无情地予以屏弃，但她从衰退的认识论领域“营救”出来的是那些“神秘化”的以及受

---

① J.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1990;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 29 – 30.

② Ibid. , 31.

③ Ibid. , pp. 41 – 2, 78.

④ Ibid. , p. 145.

⑤ Ibid. , p. 41.

⑥ Ibid. , p. 167.

到现代主义严重“歪曲”的概念——这些术语似乎只是学究式地（pedantically）不同于汤普森的“掩饰”。[1] 换句话说，在关键时刻，巴雷特自己再现了意识形态彻底的认识论定义：她事实上无法“否认”，（某些）科学发现必须被看作是“普遍真理”[2]，以及如果没有准客观的事物被神秘化或歪曲这个背景假设，说意识形态是神秘化的和歪曲的就根本是毫无意义的。这本书的主要困扰是对什么被歪曲不确定，而不是对某物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意识形态被歪曲这一点不确定。巴雷特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调再次使我们误以为离开旧的思想方式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而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肯定的方向已经逐渐显现。但在这两点上，事实都并非如此。

结论：共同的基础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表明诸如米歇尔·巴雷特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往往将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建立在对主要的、困难的解释问题——例如，那些围绕现代主义理论探讨的“四个过错”——的表面的或次要的思考之上。后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带着一种完全不该有的优越的和确定的论调继续表明甚或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理论的某些新方向——福柯、后结构主义——为更“适用”的意识形态、主观性或诸如此类理论的论证提供了资源，这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巴雷特说，新的“话语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明的一个明确的、创造性的替代品。[3] 然而，如同每一个熟悉这类理论的人所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除了同滑稽的“实在论”范式的否定对比外，“话语理论”虽然有趣，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异质领域。而且，不管是话语理论或其他我能想到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性主义的替代品，都没有提供巴雷特认为新的视角确实提供了的“更精确的概念”。[4] 进一步说，新的认识词汇中的许多术语显然——有时相当明显——不如那些起源较久远的术语精确。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在任何彻底的解释努力中对“四个过错”的各种看法不仅是可辩护的，而且也许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想以一种更肯定的说明结束这篇文章，因为我根本不是要称赞各种公开而彻底的还

---

① Ibid.

② Ibid., p. 158.

③ Ibid., p. 47.

④ Ibid., p. 168.

原论、功能主义、本质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理论因此必然比那些不是如此的理论要“好”。而且在对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方面进行辩护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无条件地存在下去，或者说它独一无二地掌握了真理。最后，虽然我一直在抱怨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缺少分析性的区别，但我从未说过他们一般关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或它们缺少急迫性。自 1991 年我感觉到那个问题以后，我并没有一直在内心同巴雷特的书作斗争。实际上，这正是我为什么与那种夸大的、屏弃的“主要基调”相反，试图强调《真理的政治》中细致入微的、含糊不定的“次要基调”。

那么，我们如何去描述我认为存在于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和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基础呢？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的中心问题关系到社会理论的解释状况。[①] 后马克思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它的新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适用于”主体性等问题的解释，与此不同，一些极其有趣的文章认为，我们必须试图使解释本身找回正确的视角，更加关注描述和想像的问题。这就是当巴雷特谈论到“放弃”我们在意识形态理论中解释的追求的困难时所指出的。[②] 不管怎样，我感到在谈论意识形态现象时有必要加强我们的描述语域（descriptive register），以期获得更大的经验的或直观的适用性，但结果我们接着开始担心我们也许变得过于“特殊”（particularist），由此向我们的解释的适用性意识妥协，而反之亦然。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理论探讨中最富于暗示的方面是它对认识的解释方式和描述方式之间的重叠和一致——而不是不一致——的探究。不过，这个范围异常宽广，而且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主要的理论说明：这是一个包含了系统阐述抽象观念的各种“修辞”模式的领域，而且这是一个一般试图重新强调理论见解和影响的情感层面的运动。[③] 考虑到这一兴趣在理论修辞和劝说模式（modes of persuasion）方面的宽广和开阔，那么也许指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加入了这种努力应该不太令人吃惊。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仍然在本性上赞成对参与理智斗争的全部动机进行更加“现代主义的”描绘。朗斯曼（W. G. Runciman）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对社会理论方法论

---

① 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家共同关注。例如，见 J. Holmwood 和 A. Stewart, *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ory*, Basingstoke, 1991。

②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 41 – 2.

③ 有关社会理论中“修辞学转向”的一个有用的纲要，见 S. Seidman, ed.,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1994, pp. 187 – 241。

的思考在我看来是那个含混领域所曾产生出的最精确的和最成功的理论之一。朗斯曼区分了社会科学中四种相互关联的研究逻辑——报道、解释、描述和评估。在这个模式中，描述不再被看作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只有记载事实之义的“报道”等同。相反，描述是一旦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材料产生最大的信赖，而且对某些潜在的关键解释有一定把握后，我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报道、解释和描述的模式对社会科学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要综合起来成为一个中立的、单一的以及完整的解释说明，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的。虽然朗斯曼认为对立的理论家在报道问题上能够达成合理的严格一致，但下一步是内在地可质疑的，因为“一切描述都是不完全的，正如一切解释都是暂时的”。[①] 这意思是说，虽然描述依赖于熟悉的因果解释或功能解释方式，并且肯定不会取代这些模式，但严格地说，最完满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认识”总是超越解释，唤起对评价和描述内在的高度许可。

在我看来，朗斯曼等人自由阐述的那种理论表明，虽然解释——至少在其传统的意义上——成就了认识，但后者更宽广，并且也许最终更有智慧，它包含了对所讨论现象及其广大的人类意义的各种引人注目的再现、分析、洞察以及其他显然“不寻常的”描述方式。因此，探索认识的这个总的模式维护了解释权力的重要性，但却认为社会认识领域不仅在水平方向（一定范围的解释可能共存）而且在垂直方向（解释是一个更大的研究之链的部分内容）都是十分多元化的。

本文主要关注方法论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但这些元理论争论的政治含义不难看出。正如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无论是激进的多元论还是彻底的还原论、本质主义等等，两者都能够通过采纳我在这里探索的综合解释的多元论而得到推进，那么在激进的民主政治中，鼓动了在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新的——有时实际上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直接选择的教条的两级化，在我看来似乎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不必要的。[②] 在那个方面，我赞同巴雷特要求重建激进的人道主义观念作为继续前进的一种方法。[③] 不过，站在这个反批判的立场，我的主

---

① Runcima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Theory*, p. 227.

② 我在我的 *Marxism, Pluralism and Beyond*,（Cambridge, 1989）和 *Pluralism*（Buckingham, 1995）中围绕多元论继续探讨了这个论题。

③ 聚集在复兴激进的人道主义旗帜周围的其他人——多少有些不同——有 p. Johnson, *Feminism as Radical Humanism*, Boulder, Co. 1994; J. Weeks, *Invented Moralities: 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1995.

要观点是，围绕这个要求的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它或推进它。

作者：Gregor McLennan
文章原标题：Post - Marxism and the 'Four Sins' of Modernist Theorizing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218，July/August 1996，p53 - 74

（编译者：黄文前，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副译审，哲学博士）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体：后马克思主义信奉民粹主义和实用政治

［澳］鲍里斯·弗兰克尔　著　　周凡　译

在过去20年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英美国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这不仅对大政党的性质和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原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队伍内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激变。现在，这些从前的激进分子要么认为左派和右派的旧范畴没有什么意义，要么就主张：在过去的历史运动中使用的政治概念已不再适用于当代状况。[①] 在此，我想特别聚焦于两个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即以美国杂志《目的》（Telos）为理论阵地的后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英国的一些杂志、尤其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为阵地的后马克思主义学派——面对新自由主义政体、基于它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背景所作出的极其不同的回应。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政治的新鼓吹者不仅反对激进左派的普遍价值，而且也特别青睐于那些对反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主义学说表示赞同的传统与理论——正是从这些传统与理论的混合物中，他们借取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另外，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近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而《目的》杂志一直在从理论上呼应着这种运动，并为之提供丰厚的“后现代的民粹主义”的理论滋养。这些反社会主义的分析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它们毕竟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的问题，只要想一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

① 在此，我并不涉及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样的“超越左与右”的理论家。参见 A.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1994, and N. Bobbio,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Cambridge1996。后者符合大量的自由主义—左派的学术分析——这些学术分析仍然相信普遍价值，就吉登斯的情况而言，他公开认同布莱尔的“激进中心”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我也不涉及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s）以及那些拒斥陈旧的政治划分的理论家。诸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之类的后工业理论家也预言一种以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后唯物主义的”控制论结合为基础的新型政治的出现。参见 A. Toffler, The Third Wave, London 1980。

和后现代文化进程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明白，它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与可行的替代性政治的可能性及方式密切相关。

在讨论这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前，回顾一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前几十年间大量的古典精英理论的出现——它们也声称理解实用政治的作用——这对于我们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将是十分重要的。吉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许多批判是针对那些相信教育和平等目标的社会主义者的乐观主义而发的。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忽视政治的现实作用的形而上学理论而加以屏弃。从这个方面来说，古典精英理论与近期以来后现代主义对于阶级分析和宏大叙事的批判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马克斯·韦伯，这个最终成为一名准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家，告诫人们对于直接民主的倡导者的幻觉要保持高度警惕。街垒一旦倒塌，不仅专家要取代革命者，而且迈向较大平等的每一步只能导致进一步的官僚化。同样，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于1915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领导与普通党员之间的断裂的清醒的批判最终以“寡头统治的铁律”结束——我们知道，米歇尔斯把“寡头统治的铁律”运用于所有的组织。

卢卡奇在他1952年出版的《理性的毁灭》中坚持认为，对精英理论家的偏好、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偏爱以及对其他带有非理性、悲惨的存在主义、生机论和犬儒主义因素的哲学倾向的专注，在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赞同与附和声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 虽然卢卡奇的论战性观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譬如，帕累托和米歇尔斯对墨索里尼的钦佩，或者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对纳粹主义的信奉；但我们也知道，精英理论导致了按照熊彼特式和美式的精英循环的多元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进行重新定

① G. Lukac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trans. P. Palmer, London 1980。尽管《理性的毁灭》在语言上的含糊之处颇多，但是，卢卡奇的这部著作仍值得根据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近期复兴来加以重新解读。尤尔根·哈贝马斯对包含于后结构主义及其他理论之中的当代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和反普遍主义价值的批判或许可以看作是卢卡奇论题的更精致、更现代的版本，在哈贝马斯那里，只是没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法罢了。例如，可参见 The New Conservativism, Cambridge 1989。

义。[①] 这些关于权力的多元主义观念大体上延续下来并且成为20世纪中产阶级的公民概念的基础。尽管韦伯的官僚理论和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却担负不起由于忽视这些理论家提出的基础性问题而造成的后果。同样，人们也并不一定同意莫斯卡和帕累托把人民划分为狮子和狐狸的这一刻板的、反历史的分割法，或者料定精英与大众有基因上的内在差异，人们也并非必须承认理解幕后政治操纵、选举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以及当代社会中非民主实践的其他形式的必要性。

80多年以前，米歇尔斯曾发出这样的警告：“社会主义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民主的问题，而且，它不只是处在技术和管理领域，它也处在心理的领域之中。”[②] 30年来，新左派、反文化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为了发展出一种用来取代斯大林式独裁、指令性计划、官僚化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和“正确路线”的革命宗派的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而孜孜奋斗。就像列宁发现帕累托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比之于通常的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难对付一样，我们也发现，新近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政治理论的实践者对社会主义者和新社会运动广泛坚持的观点和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政治背景

如果说古典精英理论是在回应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新一代实用政治的分析家们在早期投身于新左派之后、在《目的》宣称左派和右派之间在进行一场从历史上看已经过时的内战之后，他们致力于阐发一种悲观的、幻灭的民主和权力概念。这些新近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以反民主的姿态出场，相反，围绕《目的》杂志聚拢起来一个派别声称：只有根本的民粹主义得以复兴，才能有效对抗公司资本主义和支配性的文化、政治精英。在19世纪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民粹派及其他民粹主义运动不能说服民众加入他们的事业之后得以长足发展的。而

① 远在卢卡奇之前，赫伯特·马尔库塞在1934年的论文《与极权主义国家观中的自由主义作斗争》已充分阐发了法西斯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哲学之间的联系。“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reprinted in Negative,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 1968.

② 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trans. E. and C. Paul, New York 1962, p. 35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的》是在抛弃了它早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事业这一初衷之后转向民粹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另一个学派——我称其为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以《经济与社会》杂志作为他们的旗舰，尽管这个杂志并不是完全信奉他们的观点，但还是发表了大量与之不同的文章。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也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并且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与“现实的自由主义制度和政治治理”的新形式达成妥协。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以来，这一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逐步形成——是对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具体历史状况的各种回应的一种思考。他们的政治背景是英国保守党统治的几乎20年里以及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统治的13年间左派的衰落。

这两个反马克思主义学派都对普遍性价值和制度表示强烈反对，即便它们表达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并且它们各自从极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基础出发。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两个学派间还是具有某种类似：诸如它们共同拒斥与社会主义政党相关的“集权”（overarching）政策、它们都借用保守的权力主义者卡尔·施米特的作品作为思想资源，以便为它们对激进左派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作支撑。

保罗·皮科恩（Paul Piccone）和“《目的》团体”处理的问题产生于196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文化，尤其是产生于1980年代推行里根主义政策以来社会—经济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广泛涉及到削减工业化，对传统工人阶级和农村选区的居民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造，各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由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和其他新社会运动所推动的针对文化自由主义作出的民粹主义的反动。

虽然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的哲学灵感来源于尼采和海德格尔（通过福柯这一中介），但他们的政治领域实际上是朝向福利国家的历史性转变，英国的撒切尔、梅杰和布莱尔的新自由主义政体，以及澳大利亚的霍克、基廷和霍华德的新自由主义政体，无不在贯彻福利国家政策。像尼科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彼得·米勒（Peter Miller）和格雷厄姆·伯切尔（Graham Burchell）这样的英国福柯主义者或“政治治理”（governmentality）理论家们可能把伦敦作为他们的出版总部，但是，他们大大依赖于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伊安·亨特（Ian Hunter）、杰弗里·明森（Jeffrey Minson）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澳洲“小分队”——这个队伍在理论上互相支持并通过会议、文稿的准备形成一个网络。他们的“现在的历史”网络目前已扩展到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大学。我们将会看到，这个

网络包括了前阿尔都塞主义者、“政治治理”的福柯主义阐释者以及另外一些来自不同理论传统的学者。他们中有些人依然相信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作为摆脱激进主义的“68”（指 1968 年）一代，他们大多共享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不满，并表现出对政治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感。例如，许多著作家（巴里·辛德斯）仍然表达了对各种形式的民主化的谨慎的赞许。和处于社会主义立场时的米歇尔斯一样，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涉及到公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至为紧要的问题。比如，辛德斯也是米歇尔斯和其他一些相信超凡魅力型领导的学者的强有力的批评者。因此，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的反阶级分析和极度的否定性不可能导致他们走上米歇尔斯曾经走过的道路——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幻灭到拥抱纳粹主义。不过，在《目的》杂志的情形中，对左与右旧有区分所谓超越已经包括了从 1960 年代的批判理论到信奉保守的美式民粹主义、欧式的激进右派理论和反左派运动（像北方联盟）的全部历程。①

新的实用政治分析家声称：左派仍然面向于、从属于已往时代的政治经济，因此它要么不能承认新的调节技术，要不然就是提出进一步促进官僚化和文化同质化的政治方案。因而，在他们的工作中识别出这些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些因素向左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突显了社会理论家的内在危险——当他们拥抱从前与反平等主义和反民主政治相关联的折衷主义的社会哲学的时候。

《目的》团体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回应

《目的》杂志反映了近 30 年来政治的发展状况。《目的》杂志创刊于 1968 年春，它最初的批判理论家群体在 1970 年代开始分道扬镳，其公开分裂是由于《目的》反对 1980 年代早期的和平运动以及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出现了分歧和冲突。② 由于编辑保罗·皮科恩在 1980 年代晚期和 1990 年代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版面刊载右翼作者的文章，并开始大

---

① 例如，可参见 special issues on the Leagues in Italy, Telos, no. 90, Winter 1991 - 92, and on the French New Right, Telos, nos. 98 - 99, Winter 1993 - 94。

② 从《目的》编辑的眼光来看《目的》谱系，可参见 P. Piccone, 'The Tribulations of Left Social Criticism: A Reply to Palti', Telos, no. 107. Spring 1996, pp. 139 - 68, See also E. J. Palti, 'Is there a Telos Right?' in the same issue, pp. 121 - 27。帕尔蒂（Palti）的批判使他文章标题中的问号变得多余。

力宣扬民粹主义政治，所以，《目的》变得几乎难以认别出它当初的“血统”。不过，有些方面还是没有改变。《目的》从来不介入现实的政治运动或斗争。长期以来，它主要是一个专门发表、解释欧洲批判理论和社会哲学的理论刊物。这种超脱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分析之外的倾向从没有被它原先的编辑部成员所充分克服。甚至它最近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嘉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右翼理论和政治的过滤而实现的。即便最早的一批批判理论家大部分还留在编辑部，这也不足以断定保罗·皮科恩早期的立场就不会发生目前朝向信奉民粹主义的逻辑演变。皮科恩多年以来就一直在把这个确定的标记加诸《目的》之上，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目的》的编辑和所有者，皮科恩具有多变的个性，在他身上既表现出爆炸性的冲劲、权力主义的专断，又表现出开放的、无拘无束的民主化的思想交流的风格。正是这些品格使得《目的》上的争论充满兴味，这也部分解释了在探索和吸收右派思想观念的时候，皮科恩（从他个人特有的风格看）何以能做到处乱不惊。

在社会—政治层面上，重要的是不要忽视美国过去30年间激进变革的鼓吹者所面临的衰退景象。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那样经历了那种程度的去政治化以及“市民文化”的根本侵蚀和商品化。缺乏强大的工会或社会民主党，加之左翼运动的彻底边缘化，这一切都体现在没有能力阻止或逆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对社会方案的削减。种族主义猖獗、贫穷加剧、工作场所及社区条件不断恶化，常见的城市抑郁特征和政治懈怠也似乎愈发难以控制。许许多多的居民早已懒于投票，更谈不上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和政党。当把这些令人沮丧的特征同日益加深的文化商品化、过去十年显著繁荣的消费、大众知识分子以牺牲激进政治为代价投身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理论等等现象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理解到《目的》团体遭遇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①] 尽管对当代美国这一状况的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后现代的回应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惬意安适地相容并存，但大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和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是把自己看作是反右翼的人士。《目的》却不这样。《目的》对美国状况的解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超越或者说综合了左派和右派的理论说明。

---

① 例如，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可参见 Todd Gitlin's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1995。

景观政治

在《关于民粹主义的六个命题》一文中，皮科恩为自己在美国鼓吹民粹主义提供了历史的和政治的框架。[①] 这些命题以对美国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的专家治国论程式的悲观而貌似有理的叙述而开始。按照皮科恩的说法，如果有团体拒绝这种专家治国的“常规”，那么他们就会被媒体忽视并被官僚抛弃。在景观政治的时代——不要把景观政治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混同起来，当媒体仅仅注意惊人非凡的特别事物时，政治活动就趋向于采取非暴力反抗的形式，因为，惯常的抗议、游行和集会都不被理会。而且，如此的景观政治需要对政治问题进行预先的包装以适合媒体形式。所有的两可歧义和不确定都被排除，如些的情境性被当作是“正常的”。政治全都被化约为单一的问题——它们顺从于自动的道德说教安排并为专家治理程式预先作了准备。因此，只有较小的改动才是可能的，因为政治目标必须在去政治化的游戏规则之内达到。如此一来，专家治国方法的增选也就完全可以通过景观化的政治行为来预见。

左派批判的残余也可以在皮科恩对福特制的叙述中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使自己美国化的文化工业策略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在碎片化的、具有众多边缘族群的社会中——这种社会被具有特权的上层白人（WASP）精英有力地统治着，它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的排斥机制为基础——锻造民族同一性和统一的市场。这种社会同质化策略取向大大促进了标准的大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和“美式”消费者生活的高标准而文化的高度贫穷化。但是，福特制时代的文化、经济的同质化外加军事凯恩斯主义却没能开创出社会平等。文化特殊主义的“重新发现”——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工业就预示了这种“重现”——顺利地融入林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法团主义策略之中，这一策略赋予先前被排除的团体以公民权，据以保证正式的代议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混合收编策略使政治组织充分地多样化到足以恢复最低程度的否定性，没有这种否定性，官僚机器就会产生一种使生产体系陷入经济瘫痪的巨大威胁。

在此，皮科恩把他早期的论点“人为的否定性”——玛里奥·特朗蒂

① 参见 Piccone, ‘The Empire Strikes Out: A Roundtable on Populist Politics’, Telos, no. 87, Spring 1991, pp. 4 – 7.

(Mario Tronti) 和塞格·鲍莱纳 (Serge Bologna) 的意大利阶级分析的再加工——扩展成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作用的宽泛的文化和政治阐释。[1]《目的》宣扬修订版的意大利左派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行会工人到福特制普通工人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对于资本主义的革新非常重要。没有劳动冲突，老板就可能丧失他们的竞争锐气，就难以永葆创新的势头。和特朗蒂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对照的是，皮科恩的"人为的否定性"概念为他后来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对福利国家的右翼批判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如今，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关系使如下这一点变得毫无疑问：随着人们意识到社会病理的非预料的结果，势必需要增强官僚的介入，所以完全被管理的社会（阿多诺、马尔库塞）的神话也就破灭了。不过，鉴于这种介入巩固、强化了导致管理介入的条件——生产率不高、缺少动因、合理性不强等等，所以这种介入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危机管理取代了计划，由于官僚的过度管理所导致的意料之外的混乱例行地通过非暴力反抗得到表达，譬如，就堕胎、同性恋权利、种族主义或学校控制产生的争论。

集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因此，阶级统治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阶级的无序状态；政治斗争路

---

① M. Tronti, 'Workers and Capital', Telos, no. 14, Winter 1972, pp. 25 -62, and S. Bologna, 'Class Com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Party', Telos, no. 13, Fall 1972, pp. 4 -27。皮科恩对这两篇文章的介绍清楚地表明：尽管他钦佩特朗蒂和鲍莱纳对普通工人的起源所作的分析，但他还是拒绝接受他们的阶级分析。参见 P. Piccone, 'The Crisis of One - Dimension Ality', Telo, no. 35, Spring 1978, pp. 43 -54。依皮科恩之见，正当韦伯式的合理化与官僚化观点弥漫于一切之际，这种观点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泰勒制的推广、同质化和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都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效地运作或长足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拉尔夫·奈德尔 (Ralph Nader) 式的人、巴里·康门纳 (Barry Commoner) 式的人、女权主义者、黑人和其他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提供一种非官僚化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使瘫痪的体制处于警醒状态，并有助于它发展出一种适合于后福特主义政治经济的机制来。换言之，1960年代的各种运动并没有构成对这一制度的真正否定，而只是起到了一种实用性的现代化的作用。皮科恩的理论依赖于作为超全知的大写主体的"资本"的观念（在皮科恩看来，这一"超全知的大写主体"的合理性永远不会丧失）。参见我的批判文章：'Identifying Dominant Misconceptions of States', Thesis Eleven, no. 4, 1982, pp. 97 -119。

线被重新绘制：传统的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正在根据民粹主义问题与新阶级的伪解决之间的冲突而被重新界定。[①] 由此，皮科恩认为，全新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政治划分莫过于集权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划分：集权主义者赞成扩大国家再分配机器，据说这样意味着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被害者研究”（Victimology）被当作“新阶级”最偏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自我确证模式；民粹主义者赞成地方自治、财政紧缩和参与性民主形式。遵循卡尔·施米特的“机动化立法”这一概念——今天合法的东西可能明天就不再合法了，因此需要不断通过改变立法来从法律上证明种种干预的正当性——皮科恩认为这种外加的合法性导致了社会聚合力丧失其权威性，所谓社会聚合力也就是使社会秩序协调一致的东西，即大众的信赖。政治作为一种非暴力反抗，把合法性之上的道德实体化并威胁要破坏这种合法性。非暴力反抗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政治，在它取代常态政治之处，它总是倾向于毁坏作为集体意志之构成的政治，因为，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总是以非协商的形式出现。左派一直是大帮凶，因为，它不再关注真正的人民、工人阶级或任何人：它仅仅以匿名的方式对华盛顿讲话，它通过电视、报纸以及必要的用于吸引注意力的示威，使大众变得中立化。当它没有进入这种中央集权主义逻辑的时候，它只是利用外加的合法性去反对被它当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而加以屏弃的东西。对皮科恩而言，这是一种灾难性的认输态势。

既然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前的“新政”国家面临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它为一系列财政的、生态的和动机上的危机所困扰，那么它们原来的法律基础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它仅仅成了一个特定的代码而已。作为对现代化影响的抵制，《目的》一直相信，合法性只能在它能够再度重建道德连续性并将之形式化的情境之下局部性地重新确立起来，这是因为，以族群、民族、语言或宗教路线为基础的前现代的组织模式在官僚主义的光彩面和现代主义的外观的掩饰之下仍然延续着对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的调节功能。因此，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提出的颇为时髦的“重构市

① 皮科恩对“新阶级”这一术语的使用类似于新右派运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福利国家的专家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和公共部门的雇员。主要的差别在于：皮科恩把“新阶级”议程与启蒙运动的哲学传统以及所有国家至上主义纲领的政策（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抑或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参见：P. Piccone, ‘Beyond Pseud - Culture? Reconstructing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ncepts’, Telos, no. 95, Spring 1995, pp. 3 - 14。

民社会”的要求并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在它进行自我构成之前，“市民”社会需要的社群主义的结构已不复存在，并且，无论这一重构多么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它都不能被程式化为官僚主义事业。实际上，皮科恩坚持认为，“伟大社会”为了维护处于衰落之中的社群而加强国家干预的这一经验表明：这种干预远远不是社群重建的催化剂，而是加剧、加快了社群的解体。他宣称，经受最少的政府干预的社群（如亚洲人聚居区）在其他那些把最大程度地渗透国家干预作为其目标的社群（如美国黑人聚居区）继续加速解体的时候却能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形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社群拥有组织良好、发育健全的传统和习俗，那么它们将会获得繁荣发展；而那些被同质化的社群却在走向衰落。

皮科恩注意到，那些自称是“美国爱尔兰人”、“美国黑人”等等移民美国的居民，其举止表现完全同其他人一样，因为他们消费着同样的文化产品。从他的这一评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出，皮科恩的思想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左翼的反文化同质化倾向，同时又包含着右翼的反多元文化融合的观点。从新的支配逻辑的观点来说，这里的连字符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那些残存下来的真正抵制文化同质化的社群并不是因文化工业而驰名的社群。因此，文化排他主义退化变质为较之那些易于证明他们的排他主义的“被压迫”身份的人具备许多优势的向上爬的中产阶级骨干的意识形态。作为“新阶级”的事业，文化多元主义最终竟使多种文化的官僚主义精英掌管的中立化的社群进一步解体——而这些官僚却声称他们正促进这些社群的重构。皮科恩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反新犹太人主义的源头追溯到启蒙意识形态的同一性逻辑。在文化上桀骜不驯的犹太人——拒绝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同质化进程中失去他们的特性——势必慢慢消失或被消灭掉。现在，文化工业温和地继续着完全同样的普遍性的同质化工程。由于斗争的失败，法西斯主义赢得了这场文化战争。① 皮科恩争辩道，如今只有一小撮顽固的左派知识分子依然激烈地反对文化工业。作为被重新界定为高雅的学术门类的学科，很久以来，“大众文化”已不再被当作是大众的鸦片。

皮科恩持一种似乎矛盾然而可能正确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本质不是被左派所传承而是被法国的新右派理论家——比如阿兰·贝诺伊斯特（Alain Benoist），尽管他的主要思想可归结为对美国及其文化霸权的宽

① 参见 P. Piccone, ‘Old Prejudices or a New Political Paradigm?’, Telos, nos. 98 – 99, Winter 1993 – Fall 1994, pp. 3 – 22.

泛批判——所继续。因此，只有通过支持排他主义的文化以及在新的联邦法律的架构之内运作的有力的自治社区，对文化同质化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①] 民粹主义的社群主义维持具有生机的传统的多元性，并且必然要求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集权化——这种集权化的倡导者要么是跨国集团势力，要么是民族的新阶级的福利专家和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赞赏者。

民粹主义的不良政治影响

皮科恩把批判理论的遗迹与美式的偏狭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集权主义、欧洲右翼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神话和极度的反现代主义揉合在一起。因而，“美国中西部偏远一隅或瑞士的山区州的简朴的社群的具体存在仅仅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大概很容易过上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这种生活处在独立的政治组织之内，即是说，它摆脱了现代性的种种病态：无家可归、犯罪、不负责任、颓废和最终的自毁”。[②] 鼓吹具有厚重地方色彩的社群以反对国家集权的官僚主义，这种理念促使《目的》同广泛的右翼社会文化势力结成理论同盟，但是，右翼社会文化势力的偏执度以及它的反共产主义政治是同《目的》编委会的一些成员所拥持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和文化开放性的残留观念不相容的。可是，由于《目的》乃是一个不介入选举政治或其他组织化的政治的学术性期刊，所以，左派与右派社会哲学的这种不融洽的理论联姻虽然不能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存在，却可以在《目的》独立的专栏中超然地保持着。换言之，在《目的》上宣扬简朴的社群是一回事，而动员“乡村民众”力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同一地方的这些选民已经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金利奇的共和主义者（Gingrich's Republican）或美国一系列的其他组织、欧洲各种激进绿党或幸存下来的民兵成功地动员的话。想着要把北方联盟（the Lag Nord，意大利在野党，主张联邦主义和地方

① 对文化同质化和美式资本主义的拒斥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例如，1944年，在纪念尼采诞辰100周年之际，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在布拉格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宣称，国家社会主义捍卫“机体成熟的国家”，反对东方的亚细亚国家和西方的美式国家。参见W. von der Will, 'Nietzsche and National Socialism',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ch 1997。《目的》对“有机社群”的拥护所表现出的反国际主义也借助于反资本主义同质化的类似辞令。

② P. Piccone, 'The Tribulations of Left Social Criticism', p. 165.

自治——编译者注）这样的地方主义模式引入美国！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愿望是《目的》的编辑们过度迷恋欧洲的一个例证，这些编辑们从来不能与他们自己的美国社会的各种具有活力的推动力量达成妥协。

当皮科恩管控《目的》之际，另外一些专栏编辑——比如，加里·乌尔门（Gary Ulmen）、罗素·伯曼（Russell Berman）、弗兰克·阿德勒（Frank Adler）和蒂姆·卢克（Tim Luke）——也推波助澜地培育、发展民粹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新理论，并且向读者引介欧洲的新右派卡尔·施米特的作品和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史。[①] 鉴于《目的》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它深奥、敏锐的洞察力常常被过度的普遍化、政治上的天真以及不成熟的痴迷所抵消，所以无法对它的观点作出整齐划一的分类。像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的作品——他的论述民粹主义的权威之作一度为《目的》所宣扬——他发表在《目的》上的许多文章所提出的论点既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在文化立场上十分保守。[②] 当不同的编辑以忽视其他问题为代价而强调某一特定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编辑们之间也常常表现出内在的差异。譬如，罗素·伯曼的观点就分明显示出《目的》内部在修正的"民族性"（Nationhood）的意义范围内（而不是在旧式的国家主义的范围内）鼓吹民粹主义的一个支系的思想倾向。同拉什一样，伯曼相信：普世性的国际主义把忠诚夸大得过于空洞，以至于这种国际主义被攻击为极度缺乏现实性，是反人道的，因为它否认了实际起着作用的各种特征和身份的复杂性。[③] 一如伯曼所言："履行'爱邻如己'这样的道德规范可能是困难的；仅仅基于他是人类的一员从而要求他爱每一个人，这样的道德标准是行不通的。督责过厉，易起怨恨。地方与国家的忠诚纽带总是过于松弛，但是它们从未被也不能被据说颇为适宜的普世性道德观所代替。甘于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这种意愿总是具体的、特定的；它不能够通过无

---

① 例如，可参见 P. Piccone and G. Ulmen, 'Schmitt's "Testament"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Four Exchanges', *Telos*, no. 85, Fall 1990, pp. 93—148; P. Piccone and G.. Ulmen, 'Populism and the New Politics', *Telos*, no. 103, Spring 1995, pp. 3 –8; T. Luke, 'Searching for Alternatives: Postmodern Populism and Ecology', in the same issue, pp. 87 – 110; F. Adler, 'The Original Model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the Turn to Statism', *Telos*, no. 104. Summer 1995, pp. 68 – 76, and R.. Berman, 'Popu - lar Culture and Populist Culture', no. 87, Spring 1991, PP. 59 – 70.

② 参见 'The Second Elizabethtown *Telos* Conference (April 5 – 7, 1991)', Telos, no. 85, Summer 1991 which discussed Lasch's work.

③ 参见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New York 1991, P. 36.

限的抽象而过分地抬高。"①

但是，地方主义——尽管伯曼更偏向于地方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国际主义否认有限性，那么地方主义则太过于狭隘，它斩断了人性与无限性的关系。因此，伯曼提出以"民族性"作为地方主义文化以及民族对民族的关系的新形式的调节场所。"民族性"将不同于目前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因为国家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切合于全球主义和文化同质化的诉求。② 但是，在试图确定如此抽象的"民族性"概念何以真正不同于国家主义、何以摆脱了国家主义的消极方面时，伯曼的论述显得既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民族性"的"无限性"品格对于特定的社群而言究竟如何比所谓国际主义的虚幻性更加具体呢？在一个有两万人的小镇上，大部分市民之间真正实现面对面的关系尚且不可能，何况成百上千万的市民的"国民身份"。当波斯尼亚和前苏联地区的暴行被复活的民族仇恨火上浇油之际，伯曼却在那里大肆批判普遍的国际主义，这颇有悖论意味。伯曼试图在同质化的共同性全球主义——他错误地将之等同于普遍主义的伦理观——与狭隘的地方主义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他的这一努力植入了左派和右派的各种运动所拥有的情感与忧虑。尽管联邦主义获得了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绿党的支持，但伯曼对"民族性"和联邦主义的鼓吹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而且它加固了《目的》经常表现出的对国际主义特别是对贝尼迪特·安德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些著作家的厌恶，因为，他们所发现的不是《目的》所梦想的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简朴社群"，而是各种传统和"被想像的社群"作为被创造之物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新近性和新颖性。③

① R. Berman, 'Beyond Localism and Universalism; Nationhood and Solidarity', *Teles*, no. 105, Spri - ng 1995, p. 47.

② Ibid., pp. 49 - 52.

③ 例如，可参见：P. Piccone, 'Beyond Pseudo - Culture? Reconstituting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ncepts', *Telos*, no. 95, Spring 1993, P. 13。依皮科恩之见，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代表了犬儒主义的启蒙传统——这一传统促进了"新阶级"并"坚定地向模糊的无阶级社会前进"。同时，皮科恩也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曾经是右翼用以反对左翼世界主义的一种偏好，在后现代的破碎时代，被'新阶级'重新界定的左派自从对'一国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探索以来，正日益变得保守，并且沦为国家权力至上主义、管理主义以及现状的最投入的捍卫者。" 'Secession or Reform? The Case of Canada', *Telos*, no. 106, Winter 1996, pp. 46 - 7。

挽救民粹主义

尽管皮科恩对后现代文化研究抱极度的批判态度，但他却愿意把自己所倡导的民粹主义清楚地刻画为“后现代的民粹主义”，以使之区别于传统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形象：一群穿着劳动服的无知的乌合之众——他们挥舞着干草叉，以私刑处死黑人，追逐犹太人、移民和另外那些令他们感到厌恶的非本土的人士。① 皮科恩与克里斯托弗·拉什一样，维护那种对共同精英表示抵制的民粹主义，但是，他不相信传统的社群主义现在能够复活。《目的》对平等主义政策的批判日渐激烈，它进而攻击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左派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伪装下兜售文化同质化的主张，因为他们在这样做时，公司式的美洲和跨国资本主义倒没有遭到真正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在促进世界性的和国家的共同积累行为时表现出了真正的共谋，而《目的》正是从这里作出自己的推断的。因此，《目的》的回应就是：支持那种对大众文化表示抵制的民粹主义的文化。

新自由主义的许多批判者对 1945 年之后的 30 年的经济和福利国家形式总是念念不忘，甚至不加批判地渴望它们的有一天重新复归，而《目的》的态度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起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经济的世界性的法团主义，《目的》的理论家起码指出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对于当代两党政治的附庸化或“景观式”的表演性以及政治对立如何被同化或者使之丧失效力，“《目的》群体”也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对已成为文化研究痴迷者的原左翼分子的批判尽管充满了保守的夸张，但这一批判却意外地击中了目标——这是缺乏对大众文化及其信徒的激进批判的明证。而且，要认识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和法团主义的决策者的价值和生活风格同广大的选民（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中的选民）是极其不一致的，而这种认识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就足以得到验证。

这种“对精英的反感”（拉什语）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民身份和民主的当代意义的问题。② 皮科恩把民粹主义当成是治疗当代弊端的一剂万灵药，他的这一信条本身反应了一个较大的问题——它是所有的“第三条道

---

① P. Piccone, ‘Postmodern Populism’, *Telos*, no. 103, Spring 1995, PP. 45 - 86.

② C. Lasch,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95; 亦可参见 Aidan Rankin’s review of this book, ‘Christopher Lasch and the Moral Agony of the Left’, NL - R 215, pp. 149 - 55.

路”（即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与1950年代以来的一党官僚专制之外的选择）的鼓吹者都要面对的。说得更具体点，它使那个一直困扰着左派的老难题更加突出了——这一难题就是：左派如何发展出一套真正为大多数人所拥护的适当策略。左派如何回避那种虽剥夺了法团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力量却无意间加强了同质化的政策呢？它又如何避免重蹈《目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形形色色的极端保守主义运动和权力主义价值这一覆辙呢？换言之，左派如何才能一方面防止右翼民粹主义价值而一方面又获得那些工人和基层选民的支持呢？——要知道这些工人和基层选民有一种牢固的“职位意识”，他们害怕失去工作、服务和做生意的社区，并且他们要么对移民、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提出严厉指责，要么对破坏“他们的文化”的绿色运动表示激烈的反对。

“批判理论”框架内的右翼偏见

就《目的》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宣扬欧洲左翼社会哲学而论，它最近之所以转向各种右翼民族主义者、地方主义者、文化传统主义者的议程，主要是为文化主义的议程所驱动——文化主义的议程在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对政治经济的忽视。关于《目的》从对资本主义的左翼批判转向对欧洲法团主义和美国的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右翼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所有社会—政治编辑的判断现在都要经过“有机的公共文化”的棱镜过滤。《目的》的右翼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民主党的社群主义最近的表述，与那些对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文化破坏公共制度、公众团结的价值、信任和关怀的方式也提出了的警告的“社会资本”理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同样，《目的》也表现出对作为其民粹主义议程之一的环境问题的一些兴趣，但是，对于德国绿党、其他的左派以及对文化同质化持批评态度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批判家的社群主义哲学，《目的》却置之不理。何以如此呢？

尽管皮科恩及其同仁鼓吹社群主义，但他们却抛弃了左翼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策略，这显示出占支配地位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1970年代以来，一股大大超越了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潮流盛行起来。相比社会学家所谓“对现代性的反动”而言，所有“具有强烈对抗情绪”（backlash）的民粹主义者、农民法西斯主义者或基督教民粹主义民兵——他们向华盛顿“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的政府”展开斗争——无疑表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状况。暴力的、和平的反政府运动，以及为之张目的各种邪教和哲学学说的扩散增殖，也是美国政治走入死胡同的一个证明。既定的

政党体制虽然承诺要调整市场，但是这种调整却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混乱与痛苦，加之左翼反对团体不能在制度结构上实现变革，在这种情形之下，权威主义的和宗教形式的民粹主义试图要打破这种僵局，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由此，反国家主义与反平等主义就相互滋养、互依互生，成为《目的》群体之议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虑到这种右翼反国家主义——尤其是它早已不再与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思潮调情——唯一合乎逻辑的是：《目的》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排他主义者应当格外具有吸引力；从意大利的北方同盟，到反对欧盟旨在倡导文化差异的法国右翼势力，再到美国的组织化的社群主义残余，无论是黑人宗教团体还是被共和党右翼（除共和党政治家之外）动员起来的共和党的支持者，都属于文化排他主义者。毫不奇怪，《目的》支持欧洲新右派这样的口号：一百种旗帜和地区构成一个欧洲，反对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和同质化的欧盟。[①] 因而，若干严重的缺陷、不能接受的偏见和难以置信的方案均频频出现于《目的》的文章中。

《目的》团体探讨方法的弱点

首先，对皮科恩及其同仁称之为“新阶级”的专业人员（在政府、大学和公司部门中任职），《目的》一直保持着过分的攻击。[②]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目的》团体对这个术语有争议的使用几乎没有与保守党人和新右派反福利国家的理论家和智囊团对这同一个概念的运用区分开来。

---

① 对施米特的著作与欧洲右翼——从法国的贝诺伊斯特（Benoist）到俄国的齐利诺夫斯基（Zhirinovski）——和美国的《目的》之间的联系的全面评述，可参见 G. Dahl，‘Will “The Other God” Fail Again? On the Possible Return of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The - ory*，*Culture and Society*，vol. 13，no. 1，1996，pp. 25 - 50。对于欧洲新右派使用后结构主义理论来支持针对欧盟的跨国主义文化差异运动的方式，达尔（G. Dahl）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后现代主义者要么作为敌人被攻击，要么被用来支持保守主义的议程。后现代主义和认同政治的歧义性——即是说，它们或者与民主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相一致，或者与反普遍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及社团排斥相呼应——变得越来越明显。也可参见 Hans - Georg Betz，*Radical Right - Right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 1994，该文全面评述了形形色色的右翼运动如何回应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

② 参见我对“新阶级”概念的讨论，in *From The Prophets Deserts Come*，Melbourne 1992，ch. 3。

皮科恩利用半真半假的陈述和漫画手法将各式各样的社会—政治视角、各类职业以及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不同角色类同化。因为“新阶级”被人以如此粗鲁的方式妖魔化，造成美国社会衰弱的各种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之间被划定的因果关系导致了日益右倾化的政治。对“新阶级”的这种妖魔化的典型就是皮科恩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自由市场宣传：关于地方社团的破坏如何如何归因于官僚的干预、而不是由于大量失业、贫困以及文化资本的缺乏。《目的》反复宣扬的是跻身于 OECD 国家（即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但其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又最低的社会的自助式个人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皮科恩的自力更生观念就是返回到苦行僧式的清教伦理。提倡以私人协会和诸如救世军之类的慈善机构代替公共综合福利体系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了皮科恩完全缺乏对穷人和失业者的同情——皮科恩把这些人形容为“受益受得上了瘾的人”——这是他极度仇视福利国家的典型表现。[①] 《目的》的另外一些撰稿人，如罗伯特·布雷斯勒（Robert Bresler），发表一整套极端右倾的观点，大肆攻击左派学术、同性恋研究、妇女研究及多元文化主义，而且还预警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金利奇（Gingrich）的共和党议会推出更“懦弱的中间路线”，民粹主义者势必愤怒得发疯！[②]

《目的》向右派游移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性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抵制公司全球主义，并能产生出社群主义形式的地方民主。因为皮科恩及其同仁那里没有再分配（即福利政策）的政治经济模式，所

① 参见 P. Piccone，‘Introduction’，Telos，no. 106，Winter 1996，p. 6。在此，他赞同右翼提出的取消加拿大的联合福利制度以解决债务问题的号召。另外参见《目的》全体编委的专题讨论：‘Nationhood，Nationalism and Identity：A Symposium’，Telos，no. 105，Fall 1995，p. 102。这篇专题讨论强调《目的》编辑变化着的立场，并且，它因皮科恩对国家教育制度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攻击，以及对各种形式的排他主义（不论是纳粹主义、创世论还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包容——它以“人民的鲜活文化”的名义将所有不是“官僚精英的抽象普遍主义”的形式都容纳进来——而特别引人注目。

② R. Bresler，'The End of New Deal Liberalism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Telos，no. 104，Summer 1995，pp. 13 – 26。

以他们最终诉诸于小规模的资本主义体系。[1] 既然《目的》团体缺乏对普遍公民权的兴趣，他们也就很少考虑公民在他们的简朴社群内外可能会拥有什么社会权利、什么样的管理（它与法律机构相对立）对于防止平民歧视、贫困及社会不公正将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目的》抨击大公司创造的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不过，相信地方小企业能构成对跨国公司支配权力的严峻挑战也未免过于天真。大规模失业、陈旧破损的城市基础设施或者自然资源的缺乏、地方就业及生产来源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足以超越地方单元的生产、分配和协调的宏观经济过程的观念。而且，要创造一个真正的社群主义社会，必须大力促成对军工集团的完全替代、必须彻底解决由于军工企业的解散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及利润危机。然而，所有这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方式都得不到民粹主义者的赞同，因为他们强烈拒斥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或经济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只是一味地选取小企业和自愿主义作为他们的梦想中解决问题的万能之计。

作为对存在于超国家的、国家行政的和经济的力量中不可阻挡的官僚做法的抵御策略，各种社群的、协会的、联盟的、地区性的运动确实起到了解决更加民主的政治问题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些抵御策略不变成偏狭的、排他性的或独占式的，它们才能起到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哈贝马斯指出，当代西欧福利国家的一个优点是：民族主义者的亲密结合由于作为公民的移民的大量融入而日渐松动和弱化。伴随着民主进程通过授予社会权力并提供社会服务来确保社会的一体化，种种“由法律调节的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2]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去中心化的或自给自足的社团模式都没能详细说明：如果替代性的简朴社群和协会缺乏地方财政上的、物质上的和组织方面的必要资源，或者它们主要以少数民族的或种族的排斥性为其建立原则，当前享受着福利收入及其相关服务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何以生存下去或者何以有跻身其中的感受。

---

① 作为拥护小企业民粹主义的标志，他们于 1991 举行的伊丽莎白镇会议的发起方包括了商业和社会协会（the Institute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及美国青年联合会（the Young American Federation）。《目的》为此进行辩护是通过下述的宣称来完成的：“过去与右派有关的一些组织越来越意识到：左与右的陈旧划分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重新划分政治的界线时机已经成熟”。参见‘The Second Elizabethtown Conference’, p. 7。

② J. Habermas,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NLR 219, p. 11.

毫不奇怪，《目的》对意大利北方联盟和法国新右派有了好感，因为它们为了地方性和地区性企业的种种传统形式及不平等的社群而挞伐新自由主义。不过，地区性的或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策略相对而言并没有力量去遏止文化同质化或者去防止《目的》所重视的社团实践的毁灭。无论是魁北克还是北部意大利，民粹主义者几乎没有力量去改变社会关系，即便支配这一地区经济的传统模式的公司目前继续在新复苏的“简朴社群”中起作用。《目的》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欧盟内部的联邦主义要么是大公司所支配的欧洲的一种延伸，要么就是国家或地区联盟的创建（这种联盟建立在普遍的社会立法和政府控制的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展的基础之上）。欧洲和澳洲和甚至美国的公民将不会为了空想的“具有生命力的社群（lived community）”——它们将为市场力量进一步减少总体上匮乏的公共福利和社会设施投资留下完全自由的空间——而支持社会福利供给及公共部门就业的完全取消。

我们，这些（同质的）人

就像上文业已提及的，《目的》对开放的自由意志主义价值和狭隘的、性别歧视主义的、少数民族的、同性恋恐惧的以及其他保守偏见的混合体表现出一种矛盾性的赞许。由于认同施密特关于“全体人民基本同质性”是议会政治政府的先决条件的信条，皮科恩和乌尔门坚持认为：“比之于亚洲或非洲移民，更偏向欧洲移民并不必然就是种族主义者，在美国的社会构成上存在着文化维度，意欲维持兼有犹太—基督外观的西方社会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恐外症的表现。”[①] 不妨试一试向美国土著人、黑人伊斯兰社团成员、各种背景的亚裔美国人以及西班裔语的美国人兜售这一观念！令人不安的是，不仅《目的》对移民的态度听起来类似于欧洲、澳洲、亚洲和北美洲主张单一文化的种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态度，而且它也代表了一种以社会的固定不变性和偏狭的排他性为特征的世界。《目的》丝毫没有向最近几十年大量移民这一传统屈服，它要么拒不承认移民社群的权利，要么就选取不可容忍的同化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是恐惧和偏见的永久象征。

最终，皮科恩的简朴社群与拉什怀旧式的18世纪类型的民粹主义同样不能引领后现代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复兴。在批判《目的》的原编辑安德

① p. piccone and G. Ulmen,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Populism Ⅱ’, Telos, no. 104, Summe－r 1995, p. 10.

鲁·阿拉托（Andrew Arato）、琼·柯亨（Jean Cohen）和约翰·基恩（John Keane，由于基恩极其崇拜哈贝马斯，所以皮科恩称他为“哈贝马斯迷”）时，皮科恩坚决主张，如果没有社群主义的首先发展，“重构市民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人们或许会问：偏狭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如何陡然变成宽容的地方民主人士从而去创造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的市民文化？年老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理论上说明了他们自己已走进“完全被操纵的社会”的死胡同——由此，认同那些想从资本主义异化中突围的历史主体也终成不可能之事。同样，皮科恩在20世纪70年代企图证明，由于文化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管理体系既破坏了简朴社群又毁掉了非同质化的个体，[①] 因此，对于挑战官僚化的“人为的否定性”所不可或缺的“质朴的否定性”已不再存在。且不论何以构成“简朴社群”这一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就连皮科恩也含糊地承认：那些一心想着商业自由化同时又未被污染的“社群”理论家们不可能制造出大的政治反对派。

尽管皮科恩相信，北方联盟形成了面对面的政治风格——这一风格超越了“单向度的”、“完全支配”的理论，然而，对于诸如安伯托·鲍什（Umberto Bossi）这样的一些领导人的组织化的权威主义，皮科恩还是感到有些不安。正是，北方联盟对联邦模式的支持使皮科恩把鲍什及其民粹主义者们的基本批判搁置在一边。就像皮科恩所说的那样：“联邦模式在今天只是在多元文化混乱与随之而来的对现存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支配以及后共产主义社会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它企图寻求返回到前现代的伪替代方案）的单一种族的教条主义之间达成一种合理性的妥协。”[②] 不过，“简朴社群”将如何避免“单一种族的教条主义”（如果多元文化主义被拒绝的话）仍然是一个谜。像他眼中的当代英雄卡尔·施米特——他选择了第三帝国的权威主义秩序，认为它优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的混乱”——一样，皮科恩根据克服混乱和“机动化的立法”（它由干涉主义的福利国家

① See Piccone, 'The Crisis of One Dimensionslity', *Telos*, no. 35, Spring 1978 p. 48.

② Piccone, 'Federal Populism in Italy', *Telos*, no. 90, Winter 1991 -92, p. 15.

所造成）来认定当代的种种问题。[①]

按照皮科恩和乌尔门的说法，《目的》把“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危机的批判、施米特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卢卡奇对异化的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晚近以来民粹主义者和右派对“新阶级”和中央集权国家的批判融为一体。[②] 批判理论的右移就这样终结于浪漫的“简朴社群”观念和伪装得并不高明的怨恨政治——例如，对于像赞助性行动（afformative action）这样的改革，《目的》就怀着极度的仇恨。就像卡尔·施米特宁可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不要混乱一样，皮科恩及其同仁作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跳跃：以“地方人民”的名义对美国混乱失序及社会弊病提出了一种生机论的批判。但是，神秘主义的或真正“质朴的老百姓”——《目的》的理论家们如今用他们来取代无产阶级以作为激进变革的主体和对象——极可能把这些“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成是属于专业精英集团的“无根的世界主义”的成员（《目的》曾把这些人蔑称为“新阶级”）来加以抵制。在《目的》表达民粹主义者的怀旧、无权、怨恨、迷茫的时候，它使我们联想到：“来自上面的政治”（不论它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与“来自下面的政治”保持充分的联系，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由于不能抵制狭隘的价值观念和偏狭的地方政治——皮科恩及其同僚们本身也让武断的偏见损害了名声——《目的》现在已超越了不作响应的时刻。美国资本主义的状况长期以来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形式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就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目的》早期把这两位当英雄来崇拜）所说：

---

① 参见：Mark Neocleous, ‘Friend or Enemy? Reading Schmitt Politically’, Radical Philosophy, No. 79, September - October 1996, pp. 13 - 23。这篇文章批判了那些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人、那些原先是激进分子的人——这些人对施米特的法西斯主义表示了谅解，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他们把施米特作为“填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所留下的空白”的一个工具。追随施米特的批判者（诸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马丁·杰），尼奥科利厄斯（Neocleous）强调了这一事实：施米特激烈地抵制社会主义和启蒙传统，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推崇为一个样板，他不是要拯救“魏玛”而是要拯救魏玛宪法中的极权主义内容。对于施米特战后顽固守旧的排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猛烈批判，可参见：Mark Lilla, ‘The Enemy of Liberalism’, New York Review, 15 May 1997, pp. 38 - 44, and W. Scheuerma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Exception, Cambridge, Mass. 1997。

② P. Piccone and G. Ulmen, ‘Schmitt’s “Testament”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p. 138.

> 儿童无休止的问题，已是隐藏于心中的痛苦的象征，是一种找不到答案以及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表达的最初问题……。如果儿童反复的尝试受到了阻碍，或者对儿童的限制太粗暴，就会使儿童的注意力转向另外的方向。正如常言所说，儿童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冲动被抑制的地方，容易形成不易觉察的伤痕、无感觉的小硬块。这样的伤痕导致畸形。他们可能形成坚定而出色的个性；也可能滋生出愚蠢——当他们沉默不语时，这种愚蠢表现为一种病态缺陷、盲目和无力；当他们在内部产生出瘤疾时，这种愚蠢表现为一种怨恨、恶意和狂热。①

在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左派群众运动，《目的》的右翼民粹主义转向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所有的精神领袖、左翼或右翼的种种派别、形形色色的天启预言家和冒牌的行家，无一不被市场所扯平。和大部分其他货色的民粹主义一样，《目的》的"简朴民粹主义"通过提供据说能治美国病的另类假万灵药，或许能吸引那些理想破灭的消费者。但是，它可能会遭受与其他那些寻求群众运动的理论家同样的政治无能力的命运。

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和顺从式新悲观主义

如果说《目的》过分迷恋于地方自治和民众自主权，那么福柯主义的实用政治分析家则部分依赖于施米特对政治浪漫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把社会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自治社群观念当作是空想而不予考虑②，并且力图表明：充分发展的自我反思的、自我决定的主体是如何同样的不现实。③ 像《目的》一样，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也攻击普世主义的观念，不过，他们的攻击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理论立场。这种对普世主义的批判把他们引向了对"总体化"理论（诸如那些被《目的》所倡导的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攻击。尽管这些"政治治理"理论家对福利国家同样地忧心忡忡，但

①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The Genesis of Stupidity',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 - ent, vetso, London 1979, pp. 257 - 8.

② 例如，可参见 J. Minson, *Questions of Conduct*: *Sexual Harassment*,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Govetnmen*, London 1993, pp. 8 - 11.

③ 这是明森作品的中心论题，例如，参见 *Rethinking the School* , Sydney 1994。

是，他们不介入反对“新阶级”的辩论。饶有兴味的是，拉什在《残忍世界中的天堂》一书中对福利专家的批判与雅克·唐泽洛特（Jacques Donzelot）以福柯主义的分析见长的著作《整顿家庭》发表于同一年。① 罗斯（Nikolas Rose）和米勒（Peter Miller）超越了唐泽洛特所谓“通过家庭来统治”的概念。这是因为唐泽洛特在1970年晚期撰写他的一系列作品之时，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尚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其英文版是在撒切尔执政那一年出版的。在新自由主义引发了自我调节的“政治治理”概念（罗斯声称，政治治理开始取代由专家所操纵的集权式的官僚控制形式）之后十年，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才开始写作。

《经济与社会》或“政治治理”的理论家们是从福柯、韦伯和尼采那里借取理论资源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无论是他们的首要分析对象还是他们所赞同的社会改变的层面，都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变化。罗斯的批判（《控制心灵》）源于他长期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辛德斯聚焦于民主理论和权力——这是他早年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一种延伸。伊安·亨特、杰弗里·明森和其他那些以布里斯班的哥利弗斯大学（Griffirth University）为基地的学者关心的是学校教育、官僚主义和伦理学。他们可能是这个团体中最为保守的。杰弗里·明森和辛德斯及其他人一样，是从撒切尔当政的英国逃出的流浪者，他们支持霍克和基廷1983年至1996年的工党政府，尽管工党政府实施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② 在当时广泛批判上层官僚攻击公共服务并宣扬自由主义市场重建的政治气候之下，作为官僚政治以及道金（Dawkin）在澳大利亚大学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辩

① Jacques Don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1979。拉什为该书做了一个支持性的书评。保罗·赫斯特为该书所做的支持性评论（载于Politcs and Power, no. 3, 1980）导致了编委会的分裂，许多女权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离开了这个杂志。

② 例如，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和科林·默塞尔（Colin Mercer，原葛兰西主义者），他们目前通过文化政策研究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olicy Studies）猛烈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并大力宣扬要培养精通旅游业和大众文化产业的文化政策技术员。这种工具主义的和生产主义的文化概念与亨特和明森对官僚主义和常规政治的称颂密切相关，直到1996年，这种文化概念仍然适合于霍克和基廷政府所采用的新市场进路。进一步的讨论可参阅我所作的分析：in *From The Prophets Deserts Come*, *ch.* 7。关于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分析，可参阅我的论文：‘Beyond Labourism and Socialism: How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Developed the Model of “New Labour”’, NLR 221, pp. 3 – 33。

护者，亨特、明森和梅诺迪斯（Meredith）变得声名狼藉。① 这些改革使知识分子的活动及其有组织的结构受制于渗透着生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做法的各种形式狭隘的解释原则。②

对于那些属于“当代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网络的不大有名的成员，要搞清他们的政治承诺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多半具有这样的特征：对福柯进行文本学的分析并把新福柯主义理论直接运用于有关学校教育、酗酒、精神病人和失业者的主题上。③另外，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他们两个与辛德斯和罗斯保持着长期的个人关系和学术联系。不过。他们的经济政治分析迄今多半摆脱了“政治治理”方法——尽管汤普森成了《经济与社会》的编辑并且成为“当代历史”网络在伦敦的联合召集人。像《经济与社会》编委会的其他成员一样，汤普森和赫斯特保持着对自由主义左翼政治及其分析的明显赞

① 例如，可参见亨特和明森的文章：‘The Good Bureaucrat’, *Australian Left Review*, November 1992, pp. 26 – 30, and D. Meredyth, ‘Humanists and Rationalists’, *Australian Left Review*, May 1992, pp. 12 – 16。这些文章构成对迈克·普西（Michael Pusay）颇有影响力的反新自由主义著作——《堪培拉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 in Canberra, Melbour – n 1991）——的集中抨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左派评论》（Australian Left Review）以戴维·伯切尔（David Burchell，他目前也是‘History of the Present’network 的成员）为主编，而且，它目前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杂志了，因为它一直为工党政府过去若干年的政策辩护。

② 参见 I. Hunter, D. Meredyth, et al. , Accounting For the Humanities,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olic – y Studies, Brisbane 1991。也可参见 B. Hindess and I. Hunter, eds, ‘The Rules of the Game Accou – ntability’, special issue of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Review, no. 1, 1991。贯穿于辛德斯、亨特和托尼·本尼特文章中的核心内容是对自治与责任的抽象探讨——这种探讨大体脱离了工党政府发起的对公共部门的总攻击以及它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对市场惯例的热情采纳这一大背景。

③ 例如，可参见迪安（M. Dean）、泰勒（D. Tyler）、麦克考勒姆（D. McCallum）、奥斯本（T. Osborne）、瓦尔沃德（M. Valverde）及其他一些人的作品。对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而言，随着学术时尚从 19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到 1980 年代的福柯主义分析，他们学术论文中的概念虽然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丝毫没有背离他们政治上不偏不倚的学术姿态。

同。[①]尽管赫斯特也曾被吸引到施米特对政治浪漫主义的批判上来，但他严厉地拒斥“轻浮地、一知半解地跟随德里达、福柯和拉康”[②]的“后现代主义的”知识界。按照赫斯特的说法：“在西方城市和校园中足够安全的知识界拒不提供关于历史和工人阶级的令人鼓舞的神话，大众文化和全面管理剥夺了知识界的功能，它除了使政治失望、相对主义以及思想、道德的秩序的终结成为它自己政治悲哀的理由之外，似乎再没有留下什么。”[③]像我随后将讨论那样，赫斯特的工作本身被批判为是“政治上的浪漫”。因此，考虑到这些政治差异，而不是对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的作品进行详细的研究，所以，我将集中于它们理论的主要方面。

晚期自由主义的主要特色

自《控制心灵》[④] 这本书出版以来，尼科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彼得·米勒合写[⑤]）来阐发他关于权力的新理论。最近，罗斯的早期论点在他的论文《社会的消亡？重估治理的范围》[⑥]中以更加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按照罗斯的观点，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自由主义的早期形式被“福利国家”这一新的治理方案所取代。专门知识的权威与正式的政治统治机构在试图驾驭、控制由工业化生活、雇佣劳动及城市的存在所带来不良后果的努力中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一起。团结一致被专家权威重新缔造出来。这一进程的完成与其说是由

---

① 尽管赫斯特和汤普森提到了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的作品，但他们最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例如《质疑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1996），全然没有受到“政治治理”框架的影响。与最近几年的《目的》不一样，《经济与社会》杂志尽管给予了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以特别显著的位置，但还是刊发了种种不同的观点。

② P. Hirst, *Representatiue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Cambridge 1990, p. 136.

③ 同上书，第137页。在拒斥哈贝马斯的合理社会以及哈氏对施米特的批判的同时，赫斯特却赞同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憎恶。不过，赫斯特认为，“正是卡尔·施米特在论述亚当·穆勒（Adam Muller）的作品中，对‘后现代主义的’的政治浪漫对供了明确地诊断。”

④ N. Rose,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1989.

⑤ 例如，可参见 N. Ros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Expertise in Advanced Liberalism’, Econo - my and Society, August 1993, pp. 283 - 99; N. Rose and P. Miller,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3, no. 2, 1992, pp. 173 - 205.

⑥ N. Rose, ‘The Death of the Social? Refiguring the Territory of Gover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5, no. 3, 1996, pp. 327 - 56.

起关键作用的国家（它将其触角延伸到全社会）实现的，还不如说是通过"创造出各种'对规则的统治'——即试图把国家变成对远离它的人和事进行规划（塑造、指导、引导、导向和控制）的中心。人及其活动通过社会来加以控制，即是说，通过社会规范来影响他们并以社会的形式来建构他们的经验和评价"。①

最近几年，"福利国家"这一自由主义类型开始被新的统治形式所取代，罗斯将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称为晚期自由主义。如果说通过"社会"治理——"社会"（the social）相当于国家独有的领空——是早期自由主义国家的特点，那么晚期自由主义则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和"通过社群治理"的专门技巧。罗斯并不认为与"社会"相关的管理形式和政策已经消失了，相反，晚期自由主义的新技术或合理性与福利国家的早期形式以及那些被跨国机构（比如欧盟）所采用的政策是并存的。但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渐渐让位于"社群"（the community），即把"社群"作为对个人及集体存在的管理的新领域，换言之，撒切尔主义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政权"把专门知识的实质性权威从政治统治的机构中分离出来，把专家重新安置在由竞争、负责制和消费需求所支配的市场之中"。②

首先，从"社会的观点"看，治理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社会以及社会性的公民身份的观念下的政治伦理形式。现在，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形形色色异质性的、部分交叠的"社群"实际上或潜在地博得了我们的忠诚。它们的基础可能是道德社团——即宗教的或女性主义的——或者是生活方式社团（包括服饰及生活方式），或者是赞同地方激进主义、关注健康问题和残疾事业的社团。其中一些社群可能限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场所，而另外的一些可能是"虚拟社群"——它们以各种符号、网络以及不遵循同一时间和地点的各种身份为基础。③尽管这些各不相同的社群大多可以在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像民族国家）内部被发现，然而，我们看到，正是这种新的身份和忠诚形式引发了许多关于公民意义的当代政治辩论——因为有太多相互竞争（或对抗）的忠诚，有太多对于独有"权利"的维护。大众教育、公共住宅、新闻传播和社会福利的种种方案在实质上无不带有社会一致的公民形象。对比之下，"社群"的词汇和特性更切近、更直接，也更少政治上的造作。不过，由多样身份和忠实的增殖（比如，少数民族性

① Rose，'Government，Authority and Expertise'，p. 285.

② Ibid.

③ N. Rose，'The Death of the Social?'，p. 333.

质的社团，艾滋群体或地方居民）所带来的道德的多元主义确实导致了新的管理形式、新的伦理承诺和新的身份形式的出现。

通过社群治理

其次，“通过社群治理”包含着“为了调整、改革或动员事业而对个人与社团之间的忠实的这些特有方面加以创造和工具化的种种策略”。[①]新自由主义体制提倡各种“社群”具有选择权、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自调节、“授权”、个人责任等等。这些特性同时适应亲市场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动员“社群”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照管自己的同时，大力裁减中央及地方的福利性服务。通过激励个人承诺以及基于健康问题、亲密关系、宗教、住所等等而建立起来的个人与“社群”的道德亲合力，“社群”不仅成为“治理的领域，而且成为治理的工具：它的种种关联、结合力、约束力及其从属关系均被赞颂、被鼓励、被培育、被塑造、被工具化，以期达到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称意的结果”。[②]对这种新的治理方法，罗斯给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涉及到同性恋社群的健康宣传策略——这些策略同时包括自助组织、包容和排斥的原理以及鼓励责任和自律的方法。另一个“通过社群治理”的例子是大力宣传以“社群”工商企业家的参与活动和“社群自尊”为基础的内城更新计划。总而言之，当激进主义组织需要新的纲领、资源或政策的时候，推动各种“社群”能够导致新的政治争论的产生。它也能够带来新的治理调节和控制形式，因为“社群”已被工具化了并成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原来国家性的活动被抽空了内容，并且，通过象征语言和经由社群的统治技术，这些国家性的活动被重构了。

第三，我们正在见证经济治理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在20世纪的头60年里，一整套社会保险、失业政策、税务制度、关税和利率机制被建立起来，以更好地管理劳动力市场、提高生产和社会整合作用。追随辛德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罗斯坚决主张，有鉴于巨大的跨国市场的发展，经济关系不再是国民经济学的同义词。尽管“执政党仍然要以他们可得到的领地化的政治机器来管理全国的居民，他们也不再把自身构想为对自然地行使职责并系统地结为一体的国民（他们的“社会”聚合力是社会的经济安全的条件）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③]从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

① Ibid. p. 334.

② Ibid. p. 335.

③ Ibid. p. 330.

现如今，公民的经济命运相互之间是脱开的，因为“以国民经济学的名义对社会的统治让位于为了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以及跨越国家边界的循环而对特定的区域——地区、城镇、部门、社群——的治理”。①因此，公民和企业都日益被迫去发展和增进他们自身的技术、灵活性和作为活动的倡导者的资质。例如，失业政策就被各种新规划——比如澳大利亚的“工作族”，在其中，失业人员被要求提高并包装自己及其经济资本以使他们变得“随时可得到工作”——所取代。风险的私有化与公共利益津贴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被指定为目标的一些团体——土著居民、移居者、青年——有助于使调节的新形式更加精制优美。②

与那种把社会和经济看作是对抗性的观点一道，罗斯标明了一系列在市场形象中被重构的社会机构。经济统治“在最大化个人的主导空间的名义下将被去社会化”。③利用在墨尔本的帕特·奥·玛利（Pat O'Malley）的工作，罗斯特别关注的是：人们对邻里警戒（Neighbourhood Watch）及其他地方治安形式日益增长的信赖，个人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险政策的置换，个人养老金对私人抚恤金的替代，等等。④与这些自调节的新形式一道出现的是新的治理方式对包容性和排斥性的重新界定。被治理的对象不再是通常的社会团体。包容性的“消费社群”极易受到对个人生活细节（如健康的、非致瘾的生活方式，规定饮食和适宜的养生法）的高度调控的影响。身份政治与“社群”的自调节并不是建立在由专家干预的早期统治形式的基础之上，而是把个人消费选择权的积极行使包括进来。“包容性社群”——它的生活风格由各种形式的个人消费、保险、健康的增进等等所决定——与高度危险的和边缘化的“反社群”（它们经常出现在破损的市建房群和内城的商店门口）是明显不同的。太多的准自治机构目前正在这些“野蛮空间”内运作，它们支持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反社群”。义工、有用的个人装备品、青年招待所、“老人之家”、“培训”失业者的私人机构正在取代或减少各种福利官僚机构，因为对陷入悲惨境地中的人们的安

---

① Ibid. p. 339.

② 参见 M. Dean, 'Governing the Unemployed in an Active Societ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4, no. 4, 1995, pp. 559 – 83.

③ Rose, 'The Death of the Social? ', p. 340.

④ 参见 P. O'Malley, 'Risk, Power and Crime Preven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1, no. 3, 1992, pp. 252 – 75.

置可能具有某种潜在的好处。[1]

最后，罗斯指出，从社会团结到自我、安全、包容与排斥的个人建构的转移已经发生；由此，他详细勾画了使这种转移得以可能的新的治理技术的范围。如果专业人员能够调整作为大众成员的当事人和集中化的社会规划，那么晚期自由主义一方面就改变了中心与专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专门知识的应用。专业指导规则、引起诉讼的行为和复审机构都有助于改变对专业人员的管理。不过，它是对医院、教育机构以及改变专家角色的大量公共机构的专业人员的预算和审计责任的一种分配。现在，并不要求专业人员“以他们专长的深奥语言来预测他们的行为，而是通过把它们转变成能够赋予其会计学价值的成本和利益来预测他们的行为”。[2]专业人员肩负的责任的去中心化并不混同于权力的转移。审计可能使专业人员的行为向公众的监督敞开，但是，普遍的结果是要求太多的成本管理机构遵循集中化的控制——也就是将专家的知识变为同样遵守会计逻辑的技术性的语言的市场逻辑。毫不奇怪，正是病人、贫困者以及这些机构的公众消费者直接面对着成本裁剪机制的后果。专业人员愈来愈被迫调整自己的专门知识以适应新式规则——例如，通过定量分配时间给病人、参与资金筹措、实行用户支付，或者当预算开始吃紧时就尽量节俭使用有限的资金。

抨击“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语言

在对新自由主义政体所贯彻的新式合理性观念和新技术的详尽佐证中，罗斯和其他一些“政治治理主义者”把许多卓越而敏锐的洞识提供给了我们。我对他们的责备不在于他们承认把市场价值、“通过社群治理”的种种技术与个人、家庭和团体对认同、自主、自我实现和选择权观念的积极的、新保守主义的追求联系起来的方式。就像格雷厄姆·伯切尔指出的，英国撒切尔和梅杰政府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在“降低国家的作用”。对于在许多领域和机构中建构“经营”的新形式，它们还是有许多新创造。“政府对个人的个体性以及个人在他们生活中与自己的实际关系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影响。通过使个体的积极自由的条件具有合理性，政府在个体自身

① Rose, ‘The Death of the Social?’, p. 346 - 7.

② Ibid. p. 351.

的核心处对个体施加着它的影响力。"① 对置身于大规模组织化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转变之中的社群和个人的积极参与的这些精致分析，是对那些只提出阴谋的、强制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同质而粗糙的"新阶级"概念、或者怀旧式地想往回归到公共及个人服务和认同的无差别的、共同的定向上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的一种必要的矫正。

就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有助于我们向社会文化的、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变化妥协而言，他们的著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政治治理"理论具有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隐含的反社会主义、反激进的刺激性结论。虽然回归到对异族的、性征的、文化的、医疗的和生态的运动和身份进行压制或缺乏承认的政治或管理形式并不值得想望，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把那些必要的普遍主义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克服了认同政治的经常不合作的和内视性的方面——一笔勾销。

追随福柯对"总体化"理论的批判，巴里·辛德斯、奥斯本和罗斯这样陈述道："对当前时代进行判断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在社会理论中，实在过于频繁的诱惑是把某些支配性的、令人消沉的独特性强加给我们当前的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性'、'风险社会'。"② 不过，罗斯和"政治治理"理论家虽然没有向他们自己称之为"过度的和怪异的解释"的东西屈服，但是，他们倒是提供了他们自己的"支配性的、过度的、怪异的和独特的概念"，他们自己的"晚期自由主义"概念。实际上，"晚期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内含着许多总体化的特性，这种总体化的特性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都是"政治治理主义者"所竭力拒斥的。这正是罗斯的理论分析的力量之所在，尽管他假装像其他政治治理主义者一样并没有陷入到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总体化"分析中去。不然的话，他何以能够理解"社会的消亡"和"通过社群治理"的出现？

在我注目于福柯主义者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分析被"政治治理主义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之处的时候，我并不愿意卷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或学究式的辩护。成问题的地方多的是。例如，米勒和罗斯关于马

① G. Burchell, 'Liberal Government and Techniques of the Self',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2, No. 3, 1993, p. 276。这个主题被罗斯在《控制心灵》中详尽地阐述过。

② A. Barry, T. Osborne and N. Rose,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Introducti - 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2, no. 3, p. 265.

克思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分析方式皆已过时的自负宣称。他们如此写道：

> 由诸种二元对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府与市场、强制与赞同、绝对支配与独立自主等等——所构造的政治语言并不足以描绘晚期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实行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如今，政治权力的行使要借助于在诸多不同权威（这些权威在各种项目中管理并支配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方方面面）之间结成足够多的权宜性联盟。权力与其说是把限制加之于公民，倒不如说是“制造”能忍受一种被控制的自由的公民。个人的自主并不是政治权力的反题，而是政治权力运用的一个关键术语，之所以愈来愈如此，就是因为大部分个体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受众，而是在权力运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①

如果米勒和罗斯仅仅是指国家或公共部门始终不再作为政治—行政机构的运作方式，而是作为积极参与到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称之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市场和非市场活动中的方式，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②但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线提出质疑并不等于抛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强制与赞同之间的区分甚至抛弃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永久而重要的差别。同《目的》一样（《目的》现在拒绝

---

① N. Rose and P. Miller,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 174.

② 参见我在《超越国家?》(*Beyond the State*?, London 1983) 一文中对理想类型的“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概念所做的非福柯主义的和反阿尔都塞主义的分析。尼奥科利厄斯（Mark Neocleous）在《管理市民社会》（Administer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1996）一文中坚决反对福柯、唐泽洛特（Donzelot）和罗斯取消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低估国家的必要作用、并把一切都归结为无所不包的“社会”概念。他写道：“福柯的‘战争’、‘抵抗’、‘权力’和‘社会’概念比马克思对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为争取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市民社会的本质，而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固有内容——所做的概念化探讨要弱得多。福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的拒绝以及对战争概念的扩大鼓励我们把一切斗争都合并为普遍的斗争，并将之重新命名为社会战争，就到此为止。这不仅不能解释社会秩序何以总是表现为永久性的战争状态，而且也不能解释在这种秩序内国家（如果起作用）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我们同意尼奥科利厄斯对福柯主义者的批判时，仍有必要拒绝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清晰范围的模糊使用——既不屈从于福柯主义者把一切归结为社会，也不听任阿尔都塞主义者把一切归结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作为当代问题的替罪羊的做法），[1]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尽其所能地竭力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气味的东西统统去除掉。从1970年代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1970年代晚期以来形形色色的反认识论的、反基础主义理论的根本性转变，这种“除味”活动一直清晰可见。[2]

马克思主义的洗澡水

然而，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初期，当卡特勒（Cutler）、赫斯特、胡赛因（Hussain）和辛德斯还在那里干劲十足地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的动力——这与他们曾经经历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的一般模式的无休止的讨论相对立——的时候，罗斯、米勒和其他“政治治理理论家”已经完成了他们理论形态的彻底转变，以至于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残余皆已被清洗得一干二净。不仅仅“阶级”变成了忌讳的概念，就连“资本主义”、“资本家”这样的术语也几乎从他们的著述中消失，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怕他们的理论被“过时”的政治词汇所玷污。自1960年代以来，显而易见的是，福柯对具体的社会文化体制所做的有价值的谱系学分析已被借用于激进的政治分析或者被用于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目的。然而，当它企图解释特定国家的或跨国的资本积累的宏观经济过程时，福柯的作品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毫不奇怪，“福柯效应”导致的结果是：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在几乎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政治治理”的技术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从撒切尔到布莱尔政府的财富分配问题。[4]除了说明这些新规则是为了“指导行为”之外，他们没有分析这些晚期自由主义模式对资本主义产业各部门利

---

① 参见 P. Piccone, ‘Scapegoating Capitalism’, *Telos*, no. 97, Fall 1993, pp. 85 - 96.

② 例如，可参见 A. Cutler, B. Hindess, P. Hirst, A. Hussa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I*, *London* 1977，及《意识形态与意识》（*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和《政治与权力》（*Politics and Power*）。辛德斯、赫斯特、罗斯及其他一些受到像福柯这样的法国理论家影响的学者是这两个杂志的编委。

③ 参见 Cutler et al.,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11, London 1978。赫斯特和汤普逊至今仍然保持着对政治学的浓厚兴趣。

④ “政治治理主义者”的标准的引文出处是格雷厄姆·伯切尔、科林·高登（Colin Gordon）和彼得·米勒合编的《福柯效应：对治理的研究》（*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 1991）。

润率与政府调节的种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所造成影响。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罗斯和米勒拒绝“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或“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观念时，他们如何能够抛开低收入人群和公共部门来分析财富的再分配呢？作为对福利和其他社会政策的一种分析而出现在他们著述中的，几乎总是对统治技能的检视而不是对影响社会各阶级的分配结果的检视。而要是聚焦于“阶级”问题，就会有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理论的危险。

而且，当他们急于分析个体自愿追求能够增进新型晚期自由主义的个人目标的所有方式时，这些“政治治理”理论家们对于国家机器所不断实施的种种强制形式却三缄其口，不置一辞。当然，在英国、澳大利亚及北美，对罢工矿工的大规模准军事攻击，或者不断发生的警察的残暴行径，对工人、绿色运动成员、抗议的学生的拘捕，所有这些按照“强制与赞同”范畴来说，可能仅仅是彻头彻尾的“幻觉”，更不用说“镇压”或“统治”（domination）应该完全是多余的。同样，他们对晚期自由主义的分析始终忽视了几乎从来没有卷入各种“通过社群治理”的新模式的集中化的安全与保卫机构（如大型联合军工企业）。

对林林总总的“通过社群治理”的新形式，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比喻：它们并没有把资本积累这个变体婴儿与肮脏的洗澡水（即某些陈旧的调节方式）一起泼出去。正是因为治理已被法团化（corporatized），所以，被应用于大量福利及公共机构中的市场模式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的消失。相反，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凯歌行进是与对私有财产的维护相关的，而这种维护是以牺牲非商品化的公共机构为代价的——相对而言，许多此类的公共机构迄今还没有受到商品化标准的影响。不过，如果某个人拒绝商品化的观念——因为商品化与资本循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等等一整套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观念有关——那么，明摆着的是，他就不可能表述一种令人满意的国家（比如英国或澳大利亚）理论：这些国家机构改变了它们在再生产或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的瓦解过程中的相互矛盾的角色。

“通过社群治理”的目的何在？

罗斯和“政治治理主义者”充满洞见地指出，预算和审计过程如何遏制了专门知识的应用、如何通过把责任转移到每个服务单位和每个专家从而维持了中心的控制。可是，中心州和联邦税、审计和调节政策直接和间接地提高资产者的公司利润水平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此，我不涉及

大量折旧补助和税款裁定——这些都使得诸如低档债券之类的衍生物有利可图。并且，我也不列举不胜枚举的如此这般的例证：许许多多的依赖税务政策的公司、由于面对不充分的市场发育或者提高劳动利用水平的无能而对人为提高短期股息和利润水平所给予的种种认可。而我也注意到“政治治理”理论家们有意回避诸如“国家的财政危机”之类的有价值的观念。直截了当地说，“政治治理”和“塑造自私的个人”的技术的用意何在呢？它只是要巩固各种“为调节而调节”的新形式吗？或者说，它们也是被政治经济的必要措施——这些措施对解决财政危机、提高与其他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资本家的竞争力、恢复在市场的重要部分的利润水平是必需的——所驱动的充满生机的新技术吗？这些有利于“通过社群治理”的“社会”变化是全国性治理创新的结果吗？或者，是接受了右翼智囊团、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类的跨国机构、诸如商业联盟、商会等等之类的全国性最高团体的大力说服而提出的建议的结果吗？对社会福利和其他非赢利的公共机构的财政分配为什么始终被指定的目标以至于市场交换的逻辑和价值优于非市场的标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关于商品交换的生产的发展、阶级划分、工人为了拆解从私人市场标准出发的社会福利供给而进行的斗争等这些先在的历史观念，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具体的国家制度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其他历史发展的观念，我们如何有可能弄懂这一切？

罗斯在这些问题上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他在提出晚期自由主义模式的同时，却加进诸多告诫，其大意是：“社会”（the social）并没有消失，因而不能把从自由主义到晚期自由主义的这一变化图解性地从时间上加以分期。事实上，“政治治理”被描述的方式让人想起更早的两个理论争论。《控制心灵》在一定意义上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论点。这就是说，主导意识形态的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者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工人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无思考的依附者，或者说，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从属阶级的心灵之中，但它不可能成为在极大多数有特殊地位的人中间取得控制的一套价值和惯例系统。同样，尽管福柯主义者据称要通过强调个人如何积极参与新式的调节与自我认同的建构来反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弱点，但是，他们忽略了人们对“企业文化”、审计、管理主义以及大量非商品化选择形式之毁灭的广泛反对。他们也没能把对新管理经验（许多人把这些经验当作是生存策略而接受下来）天花乱坠的表面宣传与这些个人是否积极主动地相信新自由义的惯常做法与价值原则有效地区分开来。

福柯主义者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晚期自由主义几乎是

简单明了的（就是傻子也能懂），因为，主体积极地自我构建种种新的控制技术。这是计件工作的理论等价物。尽管计件工作把工人套在自我剥削的马车上（即是说，工人自愿地参与到使自己遭受到剥削与压榨的非正义的运行机制的建构之中——编译者注），但是，在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富于斗争精神的工人反叛这种体制的许多实例。然而，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对于这种他择性的治理形式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在此意义上，罗斯及其同仁在他们对秩序与控制的专注中接近于呈现一种新结构主义的功能主义者的姿态。不过话得说回来，福柯对过去二百年的历史有一种片面的理解：他把这段历史看作是监视与“治理”的历史。社会进步的脆弱形象可能被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拾掇起来，但是，在总体上，他们却愉快地沉浸在“体制一体化”和“体制适应”的暗淡格调之中——虽然他们并没有使用帕金森的术语。30年前，帕金森式的功能主义者们也抵制各种批判——这些批判认为，他们的理论被定向于体制的均衡从而不能充分调解社会冲突。这些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也同样坚信：他们的作品对于反抗、对于可能发源于建构“通过社群治理”方式的政治争论有足够的体认。不过，他们对于“政治治理”技术过于专注，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对他择性的政治方案做出起码的强调。

一些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也分享着韦伯对官僚政治的模糊态度。这就是说，他们一边受到晚期自由主义的新控制形式的困扰，同时，他们对于晚期自由主义的控制技术以及它对大众的有效控制又怀着一份拂之不去的敬畏之情。就像精英理论家认为精英必不可少一样，“政治治理”的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看待这些新的控制形式的。由于拒不承认那些赞同话语分析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政治治理”的整个理论明显蕴含着这么一种要素：这种要素类似于丝毫没有主观价值标准的客观科学——这种纯客观的科学从超然的、完全自明的姿态来观察种种社会控制的展现。最终，所有的社会变迁——从启蒙运动到晚期自由主义——实际上都被归结为控制的另一种形式。由于痴迷于解构总体性，这些福柯主义者是仅有的被准许分析总体性的人。

自治民主的不可能性

罗斯给人们这样一种模糊的印象：他可能仍然抱有一种不愿放弃的希望——自治社群是可能的。他说，晚期自由主义导致了“反政治”的动机，而“社群”只不过是这一动机偶然展现的一个主题。因此，这些“新兴的政治合理性观念”的每一种——公民共和主义、联合主义（associationalism）、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皆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这么一种治理的方式——这种治理没有直接的政治定向、确定的民族界域、充足的官僚配

备、合理性规划的集权国家的统治方案。相反，新式的治理将通过合理利用治理对象本身在各种场所和不同位置（企业、联合会、邻里、兴趣团体，当然还在社群）的自治特性而实现。①罗斯将联合主义者和公民共和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包括保罗·赫斯特的作品——误读为反民族疆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工程。准确地说，许多联合主义者和公民共和主义者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把联邦的或集权化的国家与地方联合会和社群在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反官僚合作的新形式下联合起来。②我将马上回归到福柯主义者对"集权的政治纲领"充满敌意的批判上来。同时，认识到下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巴里·辛德斯把罗斯对左派的批判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进展就表现在对自治社群之可能性的信誓上。

在过去10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巴里·辛德斯对许许多多熟悉的左派观念——即关于阶级、政治利益和客观目标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积极的解构。他最近最偏爱的目标是试图揭穿各种社会主义民主概念。巴里·辛德斯宣称，并不存在"普遍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各种替代性的社会安排能够明确地划分为较高级的民主或较低级的民主"，"在任何具体的制度安排中，也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民主的"。③ 因此，自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群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为，对议事日程的控制欲与公民当前的自治意愿是相冲突的。④在一个层面上，辛德

① Rose, 'The Death of the Social?'. P. 352.

② 参见 P. Hirst, Associ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1994；同时参见 P. Hirst,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P. Hirst and S. Khilnani, eds, Reinventing Democracy, Oxford 1996。在此，赫斯特论辩道："如果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核心活动（如福利、公共服务和经济生产）不再是由自上而上的行政管理来支配；如果政策不再变成管理精英的特权，那么整个社会，而不只是国家，需要从政治上被作为许多机构的复合体——它需要公共和大众对机构主要人员及其重要决定的控制有一个实际的尺度。即是说，市民社会必须不再被看作是'私人'领域，它需要呈现出这个术语原初意义上的'公共性'要素。就像我们要为国家立一部宪法一样，我们也需要为社会创立一部宪法。"

③ B. Hindess, 'Imaginary Presuppositions of Democrac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0, no. 2. 199 - 1, p. 192。辛德斯、罗斯和明森把他们的批判指向了基恩、哈贝马斯和赫勒及其他一些人所鼓吹的"浪漫的共和主义"。尽管我赞成这些批判中的一些内容，但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却趋向于忽视对政治浪漫主义以及对批判理论家所鼓吹的有节制的反拯救政治（anti - redemptive politcs）的批判。可参见马丁·杰（Martin Jay）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变化的总体评述，in *Fin - de - Siècle Socialism*, London 1988。

④ B. Hindess, 'Imaginary Presuppositions'.

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反对是老派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平等与自由的不相容性的批判的一个当代翻版。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辛德斯不过是表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观念：从理论角度阐述的制度模式并不必然能够在社会的实践层面上操作。但是，如果他说，关于民主制度，我们不能先天地知道任何东西，那么他就处于放弃对一切实际政治的支持的可怕危险之中。因为，尽管不可能保证任何政治安排都完全按照它的设计者的意图而运作，然而，我们通过充分的历史证据毕竟可以认识到各种类型的制度安排保证可以防止公平、参与和民主控制。而这恰恰是辛德斯在他对普遍范式——这种普遍范式把社会安排划分为较高级的民主或较低级的民主——的拒绝中所极力否认的东西。

对辛德斯近期作品的积极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并没有抛弃对进一步民主化的赞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驱除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幻觉，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达到同时使最广泛的现存社会运动的不同参与者以及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共通点的形形色色不同组织都满意的民主观念的困难性。而且，跨国组织日益崛起，民族国家政府的控制权与经济权力正在不断弱化跨国的文化交流形式日益繁盛，所有这一切都对广为散布的民主的自治社群观念的意义与可行性提出了疑问。既然当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如果这种民主观念不能意识到各类组织不能化约为具有自决能力的个人的同义语，就不可能把自治社群单单建立在公民的民主参与的基础之上。①因此，所有关于进一步民主化的理论必须消除对社群（以公民个体偏好为基础）的种种幻觉，并向各类组织的复杂作用妥协。

精明、实际而又浪漫的理论

巴里·辛德斯的严肃而困难的问题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草率地把它打发掉。不过，反过来，辛德斯的问题也让人产生了一个直接的疑问：从他对民主的极度悲观的质疑中能产生出何种恰当的政治形式呢？联合的民主的自治社群概念——为辛德斯原先的合作者保罗·赫斯特所倡导——并没有通过辛德斯的检测并由此而被归结为一种不可能的梦想。事实上，辛德斯想要的是关于权力的一种新表述和新理论。他说，如果没有支配，也就不可能有自由，因为他律（或他治）是人类恒久不变的条件。因此，我们不仅必须放弃关于自治公民的乌托邦观念，而且也必须放弃仍旧决定当

① 例如，可参见‘Denocracy and Big Government’,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 Today Conference, Monash University, July 1989.

代政治的种种虚幻的政治想像。[①]辛德斯对阿尔都塞的论述旨在使人回想起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那些充满着费尔巴哈式的或“人本主义的”问题的著作的拒斥，正是在这种高超的理论策略中，辛德斯批判地考察了福柯著作的所有那些段落——他认为它们非常类似于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支配观念，也非常近似于其他的普遍主义者的“政治虚构”。[②]同时，辛德斯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政治语言将继续被那些无原则的现实主义者与那些非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所支配。[③]

在议会政党机构中的“现实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绿色组织的及其他解放运动中的乌托邦主义者进行斗争之际，辛德斯像另外那些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一样也注定要陷入离题而空泛的抽象批判之中吗？或者，对自治社群的这种批判仅仅是对他拒绝激进政治的一种详细的合理化解释和对澳大利亚工党及英国工党的常规政治的间接赞同吗？尽管辛德斯再三否认，但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 1980 年代早期的作品与对议会为何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机构以及英国工党何以不能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所作的实用政治分析几乎难以区分开来。辛德斯忧虑的是，那些不切现实的激进分子甚至拒绝给予工党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机会。他坚持认为，一项足够艰难的业绩，即便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成功。[④]不足为奇，尽管有所批评，但辛德斯和另外那些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对于澳大利亚工党能够执掌政权 30 年并通过发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还是十分钦佩的。除了“成功的管理”之外，辛德斯并没有搞清楚：如果英国或澳大利亚工党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于使社会经济政策朝着特别类似于保守党政策的方向发展，为什么选举的成功还是值得获取的。

饶有兴趣的是，赫斯特的联合民主对英国的福柯主义者也很有用。正

---

① B. Hindess, *Discourses of power From Hobbes to Foucault*, Oxford 1996, ch. 6.

② 同上。

③ 参见 B. Hindess, ‘Sources of Disillusion in Labour and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unpublis - hed paper delivered at V. Gordon Childe Centenary Conferrence, Brisbane 1990。蔡尔德（Childe）在《工党如何统治》（*How Labour Govern*, 1923）中得出的著名结论是：澳大利亚工党背离了自己的理想，它从一个充满灵感的社会主义团体堕落为操纵权力的巨大机器，蔡尔德的结论堪与米歇尔斯对社会民主的幻灭式的分析相媲美。辛德斯既不接受米歇尔斯的“现实主义”又拒绝蔡尔德的作为西方政治语言难以根除的特征典型的理想主义。

④ B. Hindess, *Parliamentary Denocracy and Socialist Politics*, London 1983, p. 156.

是一些重要的特征——诸如维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干涉主义政策——使联合民主接近于普通的社会民主模式并远离替代性的生态可持续政策。赫斯特的联合主义模式实际上是被一种可疑的现代化观念——这种现代化观念在英国其他一些分析家的著作中也特别清晰可见——所驱动，这种现代化观念天真地假定：只要英国采用德国或其他非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管理方式，深层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反过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吹者们也拥有同样的幻觉。另一方面，正是赫斯特对英国多元主义传统和联合主义政治的拥护使他受到罗斯的钟爱。在这个方面，罗斯把社群的"反政治"理解为对建基于"国家集权的政治纲领"之上的社会民主党的或社会主义的政治的一种反动。这种地方主义非常契合于对建基于"总体化"和普遍主义范式之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现代反对。不过，尽管赫斯特反对激进政治和阶级分析，但他还是赞成明森所偏爱的替代性政治经济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明森批评赫斯特的模式是政治浪漫主义的原因所在。①像亨特一样，明森拒不接受社会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教学法——它以培养全能的、自我决定的个人为目标。像卡尔·施米特一样，明森特别厌弃那些对统治的专门化、程序和作决定的偶然性质视而不见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浪漫主义者不断权衡每一个历史要素、每一个非完美的经验过程，以之抵制普遍的、超越的伦理或终极目标。②

尽管明森对那些耽于幻想的、过分简单化的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

---

① J. Minson, *Questions of Conduct*, ch. 9.

② 同上书，第一章。这里不是讨论施米特对政治浪漫主义批判的原本目标与明森利用施米特来反对"68"一代之间的深刻差别的地方。从德里达对友谊的讨论到自由主义的重新界定和关于欧洲联邦主义的争论，施米特作品的复兴在《目的》团体中的原马克思主义者——尚塔尔·莫菲、保罗·赫斯特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展现。艾伦·肯尼迪（Ellen Kennedy）——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尝试着去证明法兰克福学派从施米特那里借取了思想资源（'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elos, no. 71, 1987, pp. 37 – 66）——也曾为邦德斯班科（雅克·德勒斯也称颂过邦德斯班科，the Bundesbank, London 1991）写过联邦主义的辩护。施米特的"大经济区"（Grossraumwirkschaft）概念极大地影响了阿尔伯特·斯庇尔（Albert Speer）对战争期间大欧洲共同市场的建构。这一政策影响了莫尼特（Monnet）和德勒斯对欧洲共同体的建构。参见：J. Keegan, 'From Albert Speer to Jacques Delors', in Peter Gowan and Perry Anderson, eds, The Question of Europe, Verso, London 1997。关于反施米特主义的欧洲公民概念，可参见 J. H. H. Weiler, 'Does Europe Need a Constitut – tion?' 收入同一论文集（The Question of Europe）。

所向往的透明社会丝毫没有复杂性可言）的批判是中肯的，但是，当他从伦理哲学走向现实的政治时，他的反政治的浪漫主义的消极意义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对澳大利亚工党原实权派和右翼党魁格雷厄姆·理查德逊（Graham Richardson）为所欲为、翻云覆雨的政治活动的个性化记叙所作的发人深省的评论中，明森对这位工党要员大为钦佩——这位要员声称可以说谎并不惜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策略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①] 为了抵制一些人"对政治和政治家示以公开的怀疑与蔑视的所谓超脱而圣洁的姿态"，明森利用西塞罗，同时也利用卡斯蒂格莱昂（Castiglione）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诌臣手册》（Book of the Courtier）来粉饰理查德逊的品行。依明森之见："参与政治并试图使自己满足现实政治机构的需要（毫不遮丑地说，正是这些政治机构创造了这种妥协方式），这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要求人们学习正确估价与政治领域相匹配的伦理能力。问题是：我们往往不把人们对公共机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理解为一种道德表现"，"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伦理等同于表达全部个性和对社会的一般义务的种种'价值'。"[②] 因此，这就是民主和"严肃的政治伦理学"的全部意义所在。由于对伦理学的这种反普遍主义的界定，明森不可能对成功的纳粹政治家提出一种伦理的批判解释，因为，纳粹毕竟"满足了现实政治机构的需要"。由于明森宣告"与政治领域相匹配的伦理能力"是说谎者和坚定的行政官员（如理查德·尼克松）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违背宪法原则和公共信任，但如此一来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不加制止而听任他们达到目的？就让我们天真地相信政治家将会承担起对社会的一般义务吧！

福柯主义者对现状的维护

放弃明森、辛德斯及其他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东西，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放弃过于简单的政治观念是一个代价，放弃自我决定的或自我治理的目标以回归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政治是另一个代价。缺失普遍的价值使英国的福柯主义者的政治目标主要取决于当下的实用价值以及陈旧的政治和组织观念。马克斯·韦伯没有认真考虑通过来自下层的民主运动抵制官僚化的可能性。辛德斯、明森和亨特在一个大的框架之内最大程度地削弱了基层民主观念。因为他们始终不渝地以反政治

① J. Minson, 'The Book of the politician', *Editions*, March 1995, pp. 20, 28.
② Ibid., p. 20.

浪漫主义的名义坚决揭露自治社群和激进的“观念论”。因此，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所想像的“治理技术”在其隐含的意义上就非常接近于目前盛行的各种形式的当代组织化的和行政性的管理结构。这一实际目标的结果就是直接或间接支持“现实主义的”右翼工党政策。毫不奇怪，在他们的理论工作难以找到借以替代他们实际支持的澳大利亚或英国工党左派的政治倾向。

另一方面，罗斯和伯切尔——以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即不敢丢弃加引号的道德上的“善”与“恶”）——坚决地主张，并不是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创新都是“坏的”。[①]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的福柯主义者肩负的责任就是清楚地说明：他们实际上欢迎什么样的“政治治理”的新方式，特别是要说明，在我们最大程度地重视个人和集体在形成知识、质疑权威的能力以及“在他们以自由和承担的义务的名义来构建治理的实际方式的能力的条件下，为什么这些统治技术可以被利用”。[②] 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明确拒绝自我决定、摆脱控制的自由以及其他普遍价值——这些价值是个人极力要争取的，并且以政治浪漫主义的幻觉形式为基础——的优先观念，他们为什么赞同“最大程度地重视个人和集体的能力”？

如果辛德斯关于西方政治语言注定要被“无原则的现实主主义”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所支配的这一断言是正确的，那么变得对现实政治安排十分有用的辛德斯式的抽象批判就没有什么见识可言。既然大部分公民——不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不准备放弃自治社群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人们将继续以这些术语来表述主要的政治目标。

多元文化主义和普遍

同样重要的是诸如文化多元主义之类的问题——这类问题把《目的》团体和福柯主义者所信奉的反普遍主义理论作为其关注的中心。我们已看到《目的》理论家如何抵制文化多元主义、如何选择了民族同化主义以及对传统的“有机社群”所做的各种辩护。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辛德斯和“政治治理”理论家却维护文化多元主义与多样性。但是，他们对普遍伦

---

① 参见 Burchell，‘Liberal Governmment and Techniques of the Self, p. 280 and also Rose’, The Death of the Social?’ p. 353；在此处，罗斯写道：“此一分析的作用既不是去赞扬也不是去指责而是提供一种诊断。”

② Rose，‘The Death of the Social?’

理学和国家集权的政治纲领的拒斥使他们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维护收效甚微。正是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异族成员、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形式的族群差异——辛德斯认为不可能把它们归属于普遍的范式——只有诉诸于可普遍化的利益才能真正地得到最成功的维护。只有通过承认差异、相互尊重和宽容而达成一种较为宽泛的先验的平等观念，民主的公民身份的改进才能成为可能。通过一种泛民族的政治策略——例如，澳大利亚的多元主义文化治理政策——而不是让地方性社群唯我独尊，从而抵制了各种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单文化偏好者所煽起的仇恨和分裂。要使那些反过来依赖于更国际主义化的普遍伦理观念的普遍价值规范得到发扬光大，民族性的和地方性的价值始终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国际主义开始于国内”包含的意义所在。

当《目的》退到“简朴社群”的时候，英国的福柯主义者指出：在“社会”消亡之后，就是“社群”也受到政府的管理。《目的》团体尽管明显右转，但是，对于诸多形式的政府权力，它还是表现出强劲的准无政府主义式的不信任。比较而言，“政治治理主义者”的助益在于让我们警觉到利用激进价值以行控制之实的新方式。在挑战左派提出的替代性的统治技术或新的“左派逻辑”的时候，他们致力于促使政治运动超越惯常的权力形式以及种种附属于替代性制度安排的口号。不论是《目的》还是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在使我们认识到改变资本主义的艰巨性上，他们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目的》倡导的“民粹主义”策略只有通过大力支持那些被公司资本主义政策和跨国组织（像欧盟之类的）所伤害并且日益变得无权无助的人们隐隐作痛的怨恨和深深的偏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政治治理”理论家以一种悲观主义的情怀注目于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这些社会变化使激进的民族政治很难再去漠视他们自己对如此“包罗一切的”权力的反对

晚期自由主义理论家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像《目的》一样，他们也没有提出一种赋予他们关于新统治技术的分析以实质内容的政治或经济理论。他们着魔似地倾心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以至于他们一向不重视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技术与私人公司要求政府运用新古典经济政策的这一需要之间的由经济所驱动的联系。罗斯和米

勒退向了心理主义的“情感经济学”或对消费情感的调控分析。[1] 虽然福柯主义者过分地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是以自我调节的个体为基础的制度，但是他们却没能分析晚期自由主义何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调节模式——这种调节模式依赖于持续的再生产和特定形式的资本积累的存在。也就是说，与“通过社群治理”相关的种种调节形式并不比自由主义统治的早期形式（这种早期自由主义统治产生出了作为1930年代大萧条的结果的“福利国家”）更有持久性。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的福柯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这种积累维持了为当代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和晚期自由主义统治所需要的利润和发展水平——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动力也不感兴趣。与之相关的环境破坏和经济危机达到一种什么状况才有可能导致地方的、全国性的或跨国的政治和管理的种种新形式的出现呢？上一代的批判理论家没有抛弃激进政治经济学，尽管他们使用了消极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和权力关系。不幸的是，“政治治理”理论家使他们的理论批判大体上脱离了经济社会主义者关于文化的、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生态可持续性的方案。

《目的》和英国的福柯主义者都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广泛的政治僵局进行了反思。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排他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吸引力并不能孤立地从工党、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绿色组织、中左政党在过去20年里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的失败来加以说明。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68”一代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以其向布莱尔、克林顿及其他人的更加不公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退取代了他们先前对林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的反对。如果《目的》的民粹主义代表着一种倒错的批判理论的政治困境，那么，这些一度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前却信奉福柯主义的理论家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当他们展现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技术之时，他们把自己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间接的学术辩护者。因为，出现在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关于民

---

[1] 参见 P. Millers and N. Rose, ‘Mobilizing the Consumer: Assembl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 - 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August 1997, pp. 3 - 35。这些作者成功地展现了那些以操纵消费者和制造“虚假需求”的基础的理论弱点。但是，在拒绝激进的霸权与支配理论之时，米勒和罗斯的“主观化政治经济学”（politcal economy of subjectification）因完全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业的大环境及其生产作用的批判而特别引人注目。现实存在的这一事实——个人帮助公司把消费建构成“个人称心如意而社会也愿意接受”的现实形态——并不需要打着研究人的技术（这种技术使人心可知、可测）的幌子来绝对地支持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关系。

主和公民身份的实用政治观念是对较为广泛的平等主义的各种计划性形式的再分配——这些再分配形式依然需要在地方的、全国的和跨国的层面上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更为直接的拒斥。这些规划在各种地方性的协会和社群与联合的和跨国性进程的协同之下完全可能得到较好的实行。但是，如果要么局限于对“简朴社群”偏狭坚持，要么局限于对“晚期自由主义”形式的统治做一种超然的、诊断性的描述，那么政治经济改革的困难任务以及相应的对破坏生态的生产与消费的最大程度的减少或取缔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

作者：Boris Frankel

文章原标题：Confronting Neoliberal Regimes：The Post - Marxist Embrace of Populism and Realpolitik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No. 226，November/December 1997，p57 - 92

（编译者：周凡，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论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阶级

[美] 乔纳森·迪斯金 著　　周凡 译

一、民主、后马克思主义与阶级

民主和多元论的概念成为当前左派新的强势话语的支柱。这一体现在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本（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及鲍尔斯与金蒂斯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之中的新话语无疑是导致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广泛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它对激进的社会思想家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然而，在围绕从阶级到民主的观念转换的讨论中，对民主这个词的运用通常并没有加以认真的审理。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从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致赞同的因素中获取的民主观念进行了建构和批判。

我尤其主张，只有那种把经济生活、政治行动和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作为它的分析对象的理论立场才配享有民主这一名称。其次，激进民主并不是关于政治体制的陈述，它是以建基于“开放性”与接合之上的新联合想像来取代在经济、政治和身份之间建立的陈旧的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想像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建立在公民权、多种多样的压迫形式、权力及抵抗这些观念之上。这种新话语清晰地聚焦于分析社会中的权力和经济，因此，我坚持认为，这种尝试为替代性的社会概念铺平了道路，它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并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这篇短文中，我的目标是对这些关于民主的新概念的一个维度、对打造政治主体间的一致性的新形式提出新的理解，通过论辩我要表明的是，这种新的一致性把阶级分析仅仅归结为主体历史维度的一个方面——阶级意识或推动力量，由此，这种新的一致性也就将那种考虑到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替代性的阶级分析边缘化了。

二、民主：超越马克思主义

如今，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经济主义的批

判已是人所熟知的老调了。这种批判的依据是：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决定论）中，经济成为支配性的解释因素，并且经济本身被还原为它诸多维度中的一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针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判已不再令人惊奇了或者说已不再生疏了，但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批判针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把作为主体的人或代理人仅仅归结为阶级身份——的剖析是十分深入的。

历史进步的承担主体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标志（一般地说也是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标志），并且此一问题被集中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和政治概念之上。

尽管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内部总是承认各种历史的和心理的因素对人起着构成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认为是某些被称作阶级利益的东西在引导着政治忠诚。在此一视域下，政治不过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主体尽管复杂多样，但最终是阶级属性的表达。后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正是这种还原做法束缚了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因为它一般地把人的行为（以及具体地把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和主体的经济力量连结起来。由此，政治行为、政党等等这些具体概念都从这种还原作用中推导出来。

在此，对阶级身份的批判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主体处于“客观的与主观的”层面之间的缝合线上，或者说是处在经济结构与人的主体性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缝合线上。换言之，通过上述逻辑，一致性在经济、政治及代理之间建立起来。

当然，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源于相同的一致性。这种话语一致性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之创立所依赖的诸多条件之一。

激进民主理论（正确地）对这一观念——即那些被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社会恶行所剥削或压迫的人的利益能够明确地被描述为阶级利益或阶级利益的衍生物——提出了挑战。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对代理与压迫之间的关系重新概念化的要求并不需要终结一致性这一概念本身。以相互关联的方式，鲍尔斯、金蒂斯、拉克劳与莫菲都坚决主张，压迫与解放斗争之间的新的一致性恰恰建立在现存压迫与主体性的诸多形式的异质性这一基础之上，而且这种新的一致性是在全新的、激进的民主概念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拉克劳与莫菲的工作，这种新的话语一致性与民主和多元主义概念或开放性概念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正是民主的这一意含被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谓的“封闭性”。

三、拉克劳与莫菲论封闭性与开放性

正是这一理论进程——即它把像规律一样客观的结构性话语同代理人的政治行动和意识连结起来——被拉克劳与莫菲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在我与布莱尔·桑德勒合写的论文中（指《后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想像中的本质主义与经济：重新打开缝合》），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拉克劳、莫菲还是鲍尔斯、金蒂斯，他们都明确地声称他们已识别出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的关键要素到底是什么——关键点在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劳动力从理论上被概念化为一种商品。他们论辩道，因为正是在这里——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规定其他商品的价值之方式来规定劳动力的价值的时候——活生生的、多元决定的主体被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运动规律的客观对象。接下来，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旦主体性因素被化约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留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案之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而且我们也和零星的几个令人苦恼的偶然性实例一道被留在这个圆圈之内，因为，偶然性被当作是恰好就这么多的几个特例或者是一些偏差从而被轻易地消除掉。

在重建一种开放性民主的意义的趋向中，拉克劳与莫菲利用了后结构主义哲学和话语理论的所有工具。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特别是他的多元决定概念）以及拉康的缝合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攻击本质主义并指向一种新的存在概念，在这种存在概念中，任何客观在场的观念总是指涉这一存在的限制、边界和条件。

在此，应该注意到拉克劳、莫菲同鲍尔斯、金蒂斯之间的差异的一个要点。鲍尔斯和金蒂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在经济本身之内扩展民主，他们并没有为了民主而充分阐发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所要做的事情。在这里，我力图表明民主这一概念何以作为一种新的一致性的名称，因此，我要凭借拉克劳与莫菲的作品来加以说明。

为了建构一种新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避免了“客观主义”和“阶级还原论”问题——拉克劳与莫菲提供了这种一致性赖以建立的新领域：话语的领域。在一系列令许多人震动的命题中（尽管我大体上接受它们），拉克劳与莫菲拒绝“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且他们断言“每一话语结构的实质性”。在他们的话语世界中，社会关系决不能被刻画为封闭性的或完全内在性的。如此的内在性意味着诸对象先于它们间的相互作用而完全建构出来，因此这些对象处于一种外在性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总

体内在性和总体外在性都不可能的领域之中，社会被构成。”（1985：111）毫不奇怪，在这种开放性的新话语领域中需要加以重新改造的第一概念就是主体本身。

四、民主概念本身

主体被置于总体内在性和总体外在性都不可能的领域之中，从而解构也就达到的一个转捩点上，在这之后，拉克劳与莫菲开始通过他们的对抗概念、接合概念和霸权概念来重建历史性统一（unity）和主体一致性（coherence）观念。在此，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挑战摆了出来：以真正多元决定的因素来构造某种一致性（coherence）。接合和霸权这两个概念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因为它们关涉到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诸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永久的开放性在这些模式中暂时固定下来。一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表述的那样，主体变成了“话语结构内的‘主体立场’”，并且“‘接合’在这个意义上处在构成实在界的首要的本体论层面上”。

现在，我们慢慢接近了拉克劳与莫菲的民主概念的意义。首先，在代理人（或经济）已被解构过的特征中构造的临时统一（unity）在话语实践的领域特别是在“政治想像”中被建立起来。由此，统一是一种历史性的统一，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统一，是各种主体之间以及各种社会运动之间的可改变的、矛盾的统一。

民主是一项关于非还原论的政治想像的方案，正是在这一领域或范围内，拉克劳与莫菲希望它能将一致性提供给破碎状态的主体身份和各种运动。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这种民主如何构造政治行动的新空间。

这种民主概念由于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观念，所以它一再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拉克劳与莫菲宣称，阶级政治构成了本质主义的政治想像，因为它把阶级装扮成一种实证性身份——这种身份完全由生产结构所赋予，并且仅仅以政治的形式获得表达，它不是由接合实践所建构。各种实证性身份按照等级有区别地连结在一种固定身份与另一种固定身份的关系之中，比如主人与奴隶，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构民主化的身份，其关键的概念是等同（equivalence），而不是实证性（positivity）。至为重要的是，身份并非任何空间意义上的连结，尤其不是“上”与“下”的连结。在民主想像的状态下，发生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被肯定的不是实证的和级差性的身份，而恰恰相反，是在各身份之间的相互等同（equivalence）。“民主想像并不在社会的（级差的）实证性之层面上建构它自身，

而是作为对这种实证性的逾越和颠覆。因此，在民主想像中，没有本质主义的妄断染指其间。”（Laclau，1990：187）

此一等同逻辑使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之中的权利和平等的概念能平稳转移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及私人领域成为可能。在拉克劳看来，它是一个元概念，具有普适性意义，因为，它充分考虑到了各种主体之间的平等。

五、民主、政治和阶级

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民主现在变成了这样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多元决定的不同主体遭遇、接触，并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而建构其自身，这些永远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主体竭力把平等逻辑扩展到每一个新的领域。正是在此，鲍尔斯和金蒂斯通过公民权概念和扩展民主的尝试而同拉克劳与莫菲的哲学工作汇合在一起。读者将会注意到：民主的话语的、抽象的意义与归属其名下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活动处于分离状态——然而，有一个重要“桥梁”把这两个层面的话语连接起来：权利和抵抗的表达。这就是说，新的统一并不是所有人共享目标的产物——这种共享的目标只有在所有主体拥有共同身份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我们这些为改变而斗争的人都在表达自身，由此，在权利的表达中，争论也就会不停地延续下去，而这恰恰就形成了尚处于建构中的统一性的基础。正是民主空间的这一观念对这种新的统一性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传统的阶级分析是一种唯理论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起码从本世纪初期以来已经不能“抓住”社会代理人了，这部分是因为它没有使用人们赖以构造他们自己的斗争的话语方式。（Bowles and Gintis，1990：68；Laclau and Mouffe，1987：168）

因此，新的政治规划围绕权利的表达方式来构建，并且把权利扩展到新的领域。而这恰恰是鲍尔斯和金蒂斯最近的著作的聚焦点，所以，我坚持认为，他们最近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拉克劳与莫菲以哲学方式表达的激进民主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表征与证明。

六、结论性的思考

民主和权利的这种新话语意味着什么？它存在哪些问题？首先，注意如下这一点是重要的：我相信问题既不在于后马克思主义信誓话语实践的激进观念，也不在于它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一般批判。除此之外，

我承认：自由主义和民主是矛盾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是激进规划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对它们的重新概念化、通过把它们与政治行动的新形式连结起来，这些概念完全可能被改变（或被重塑）。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激进民主话语中存在着两种特定的还原作用，这些特定的还原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后现代哲学传统在一般情况下都会遭遇到的部分。

首先，如果民主话语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是可能改变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核心范畴当然也同样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创造非本质主义的知识形式的人来说，颇为费解的是，为什么拉克劳与莫菲花了那么多时间去重新阐发民主观念，却花了那么少的时间去处理阶级概念。我认为，对此一问题的合理解答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固守经济、政治和身份之间的同一性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即是说，如果其目标从一开始说就定位于重新思考同一性这个问题，那么后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带着先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指认为一种总体性的象征——这种总体性被视为是当前应该超越的一种不良企图。这样一来，要进入新的领域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远远地抛到后面去。尽管拉克劳曾表白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但是，一般而言，拉克劳以及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看起来并没有认真地检视这些马克思主义碎片。

尤其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阶级概念被空前地缩减了，它仅仅被化约为其多项意涵中的一种——阶级身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种成问题的同一性观念支配着后马克思主义者，以至于他们把阶级理解为是把经济和主体身份绝对对接在一起的因素。在此一视域之下，阶级分析以及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整个价值理论本身由于暗示着“总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一种禁忌，因为，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们无非是本质主义的推理形式。(Amariglio and Callari，1989)

最后，后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同一性的尝试意味着社会分析一定得使用相同的语言和概念——这些语言和概念不过是社会对抗本身的产物。如果政治的本质不能在经济中寻找，经济的本质不能在生产力中寻找，那么为什么理论的本质却可以在权利的语言和民主责任的扩展中去寻求呢？这又如何说得通呢？像这种试图以各种方式在思想中——而不是在改变现状的斗争经验中——建构社会关系的观点把理论化约为政治，而且几乎没有给“相对自主性”理论留下任何余地。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阶级还是很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仅局限于人们表达阶级要求，仅局限于人们在某种

程度上是阶级代理人。但是，作为对剩余劳动时间进行剥削和社会分配的阶级，其分析作用却被新话语力量一扫而空。

然而，阶级分析也是构建对社会的特定理解的一种方式，并且阶级与历史进步的代理之间也是可以发生关联的。例如，像阿玛利格里欧和加莱利所论辩的那样，平等交换的概念以及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剥削可以被理解为导源于从作为个人的某些权利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那些个人（Amariglio and Gallari，1989）。但是，可惜的是，这些路径并没有被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探究。马克思主义本身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还原论的同一体的象征。

民主话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信奉一种反决定论的分析，也不在于它孜孜以求、反复强调的身份构成的方式。相反，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范例都起之于对政治同一性的固守，这暗示着像我们这些依然希望利用并改造阶级语言的人俨然是反民主的。

现在，我们一定要向各种形式的权力提出疑问，我们一定要力求在具体的市场中建造平等。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过程以及主体和这种剥削之间的特定动力并不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之内，而这种疏漏势必会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Jack Amariglio and Antonio Callari：*Marxian Value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The Rol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Rethinking Marxism，1989，2（3）：31－60.

2.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Democray and Capitalism*：*Property*，*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Basic Books，1986.

3. 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London：Verso Press，1990.

4.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Verso Press，1985.

5. Bruce Norton：*The Power Axis*：*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s Theory of Postwar U. S. Accumulation.* Rethinking Marxism，1988，1（3）：6－43.

作者：Jonathan Diskin

文章原标题：An Essay on Post－Marxism，Democracy and Class

文章出处：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4（2），p139 － 145（1992）

（编译者：周凡，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激进政治的未来[①]

［英］西蒙·托米　著　　刘智利　译

>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最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杰夫·诺南（Jeff Noonan）用最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一种似乎广泛存在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针对下面这些人的主张的：他们抛弃了主流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现在试图为自己攫取一件“晚期”（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标准的左倾激进批判者的外衣。[②] 诺南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他所认为的那些后马克思主义作家任意的蒙昧主义和浮夸言词——其中他批判的目标是拉克劳、莫菲、阿拉托（Andrew Arato）和琼·柯亨（Jean Cohen），而且指向他们关于新解放主体的主要主张。明确地说，诺南声称，后马克思主义者为“对抗性”和“多元论”进行辩护，抛弃了“经济民主”，并且赞同一种“认同政治”，从而重新借助了J. S. 穆勒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这种“认同政治”与其说要归功于激励和启发激进左派的集体主义和团结性，不如说要归功于尼采的贵族式“个人主义”。[③] 简而言之，后马克思主义表明自身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批判的最新和最精致的化身，因

---

① 本文的初稿是2000年8月提交加拿大魁北克市国际政治科学学会（IPSA）世界大会的论文。

② Jeff Noonan, ‘Subjecthood and Self - determin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Postmodernism as Democratic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5 supl., *Civilization and Oppression* (1999), pp. 147-169.

③ Noonan, “Subjecthood and Self - determination,” p. 166.

为左翼激进主义硬是把一切归属于“私人领域”，抛弃了“消极自由”（个人免遭干涉）的成就和实质，至少不再将其作为合理政治行动的现实目标。诺南澄清的是许多左倾激进著作中仍然不明确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者用源自后现代视角的洞察力来更新、补充和扩大古典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企图，只会削弱激进的要求，消解反抗全球资本的意识形态，因而导致对现状的接受。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最有害的批判：它在理论上似乎发展了左翼的激进抱负，但它最终又“让一切恢复原状”（引自最受喜爱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在本文中，我重新考察了诺南在批判时所直接引用的著作，补充了其他人——主要是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和柯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有理由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见解和政治学——的著作，然后在此基础了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同的解读。[①] 我的解读表明，后马克思主义决没有求助于古典自由主义，它含蓄而又明确地寻求发展一种受马克思启发的对资本主义

① “后马克思主义”（post – Marxism）一词似乎完全是含糊的，但在这里它被用来指那些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家，他们接受了如下观点：(1) 一种对能动性和主体性、尤其是对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存在论进行后结构主义的解读。这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人道主义的”倾向；(2) 一种对基础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后现代（即后尼采主义的）批判。“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中立性；权力和认识的关系没有“外部”。所有知识主张都是临时性的，并因此受制于“解释之争”；(3) 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体的非一元论、非目的论的解释。现代性的特征是对错位、脱节、流动的体验。身份是自我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是“完全偶然的”，因此是自己身份的创造者。客观的社会学名称（“阶级”）越来越不是主体性的本质。这是我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比其他人所允许的理解要狭隘，并且排除了其他人可能会将其包括在内的那些人，例如哈贝马斯。另一方面，我不同意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的解释，他把“后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场“运动”。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错误的，因为关于这样一场运动的观点可能不符合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形象”——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避免“意识形态”或“现代主义”形式的思维和实践。它无论如何看起来也不是一场思想的运动——在可能适用这个名称的那些人中，思想运动一词暗示着某种共同的目标感。参见 Stuart Sim, ‘Introduction: Spectres and Nostalgia: *Post* – Marxism/Post – *Marxism*’, in Stuart Sim, ed.,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像“改良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强加给其他人的一个词语，而不是他们强加给自己的一个术语，除一些著名的例外之外（例如拉克劳和莫菲）。此外，这是另一个让左翼批评家感到愤怒的来源，他们明显地把整个概念看作是一种象牙塔式的浅薄研究。

的左翼激进批判，也寻求发展激进的民主“政权”。这种激进的民主“政权”本质上承认早期自由至上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森堡、潘内库克、葛兰西等等）的要求。这并不是要论证“后马克思主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暂时假定，有可能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之外分离出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或学说——这是令人怀疑的），也不是要论证尤其是拉克劳和莫菲的目标和抱负是复活“马克思”这个人物。显然这是荒谬的，因为采用“后马克思主义”外表的实质——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一样——是要强调他们接受下述看法的程度：不管是被视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意识形态，还是被视为一种能够成为激进左翼活动核心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都已经彻底“死亡”。然而，这也不是说马克思或马克思的遗产在对左翼激进批判进行重新定义的斗争中无足轻重，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著作中“缺陷”的分析普遍地带有非常明显的愤怒（即它是目的论的、宿命论的、决定论的等等）。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这方面是一种重要的干预。事实上，就像他一样，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马克思的实际价值在形式上主要是幽灵性的：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它在面对统治、剥削和等级制度时不断地提醒一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必要性。[1] 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来看，还是从实现马克思的“革命”目的论的元叙事来看，全球“马克思主义”革命都不会发生。尽管如此，但即使在“后工业”的状况下，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所表达的问题结构（the problematic）仍然是理解资本的运作及其对个人和集体的“影响”的重要资源。

诸如杰拉斯这样的思想家用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或惯性来看待这种对“历史”的终结的接受。我们决不应该像他们那样做，而是相反，把这种对“历史”的终结的接受视为一种相信政治行动偶然性和历史性的标志，也是对尽管“已经失去”但却是另一个马克思的辩护。[2]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下文的内容可能被解读为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但这种辩护的意图却是重申这样一些理论家希望自己提出的与诺南等人相反的要点，即要拯救左翼的激进主义并推动广为构想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需要抛弃多余

---

① See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l. Peggy Kamuf (London: Routledge, 1994) and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 (s)* (London: Verso, 1996), pp. 77 - 78.

② Norman Geras, 'Post -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的特征。这些多余的特征曾经有助于维持一个过时的“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辩护的初衷是抵制那种长期被马克思主义左派所采用的令人惬意的假设：那些承认“特殊性”和“认同政治”在现代条件下的本质特征的人是普遍主义的敌人，广而言之，也是左翼激进政治的敌人。相反，显而易见的是在交战和对话中这种“拒绝”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它不仅把“现代”的阵地让予厌恶激进民主要求的意识形态力量，而且它还正确或错误地暗示，左翼激进主义的目标必须是对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超越。在一个世纪里，灾难性的政治“整体论”伪装成普遍性。在此之后，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破坏左翼激进主义的事业了。

一切固定的……

诺南和杰拉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指控之一是，它是“个人主义的”并且接受“对抗性”和“多元主义”是描述现代性的事实。这似乎公然违背了左翼激进派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标是沿着那些——有助于消除个人、人民和文化之间的破坏性差异——集体主义、合作的路线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如果“左翼激进主义”意味着什么，那么它是对团结、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信仰的一种简称。相比之下，就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如莫菲和赫勒）现在都乐于把自己说成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沉醉于“对抗”（agonistic）、“冲突”和特殊性。因此，无论后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何种形式的规范理论，都必然会贯穿着那种促进并保护个人以及个人的思想、行动和兴趣领域的欲望。既然这样的修辞清楚地再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因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后马克思主义必定会捍卫西方社会为了“保护”个人和“他的”所有物而发展出的制度和程序，接着必定会捍卫在自由资本主义下被合法化的权力和不平等的既定结构。

上述批评的起源显然在于这样一种方式：后马克思主义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承认，它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叙事。这种指控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某种东西能把像拉克劳、莫菲、赫勒、利奥塔、高兹和杰拉斯这样在其他方面不同的人物统一起来，那么它就是对作为“元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在这个关键的地点上，上述所有人全都承认对各种历史哲学的“后现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后康德主义的）批判的重要性和中心性。在更黑格尔主义的表现形式上，马克思主义却是此类历史哲学的典范。他们全都抛弃了“历史”（History），目的是为了支持一种方法，该方法强

调现代性和在现代性下更普遍发生的历史进程的“局部化”（localised）、“碎片化”（fragmented）或者“错位化”（dislocated）特征。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本质”并不是专横地“展现为”先验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necessity or inevitability）。基础/上层建筑的目的论逻辑也不适合他们，事实上其他任何解释历史和社会变迁的模式也不适合他们。在这些方面，杰拉斯和诺南的指控是完全正当的。如果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自我形象”的话，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建立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完全偶然性和境遇性之上，明确地拒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论图像。然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他们对后者的拒绝在本质上明显是“内在性的”，旨在拯救马克思的双面哲学的另一副“面容”（本来面目），即赫勒在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所说的“实践本体论”。[①] 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的著作中，马克思非常卓越地描述了一些趋势。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从他自己对这些趋势的理解中得出了一种过于保守的结论。重复一下令人难忘的那一句话：“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仅是对封建主义（它当然是马克思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且是对所有“固定和不变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逐渐加上支撑它们的世界观和真理——逐步瓦解的一种描述。然而，由于没有‘正视偶然性’（如赫勒所说），马克思在它之后却逐渐展开对身份的重建性说明，因而立即限制并弱化了对身份和社会生活之“解构”的描述。因此，新的偶然性自我（重新）穿上了那种源于“他的存在条件”的身份。在封建制度下非常惊恐的“没有主人的人类”发现自己被重塑为“无产阶级”，并且由于这一点，无论他或她由于那些固定和不变的关系的瓦解而获得什么样的特殊性，都凝固到他或她作为一个“阶级”成员所获得的新的普遍的元身份（meta - identity）之中了。就在马克思宣布偶然性和历史性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的元叙事逻辑获得了胜利，把个人往回归入到人类的奥德赛走向现代先验性的故事之中。按照这个策略，我们可以补充说，难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会挑选出马克斯·施蒂纳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对手中，这种批判或许是最严厉和最持久的。施蒂纳对现代性的可能性的解释证明了一种对“正视偶然性”的深刻和令人苦恼的意愿，因此，当施蒂纳怪诞地描述形而上学建构物的时候，他就征服了“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在它之

① Agnes Heller,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Value’, transl. Andrew Arato, *Kinesis*, Vol. 5, No. 1 (Fall 1972).

上所建立的所有政治和伦理的“结果”（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国家），就如同征服一个纯粹的“幽灵”、一只“在钟楼里的蝙蝠”。[1]

在很大程度上，后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决没有把施蒂纳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尽管如此，但施蒂纳的批判不仅预示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窒息性特征进行拒绝的主要方法，而且预示了凡是能够完全包含极其偶然的个体的同一性都将逐渐消解。在他们看来，施蒂纳而言，现代性唯一最重要的趋向是同一性的逐步错位、分裂和碎片化，以至于从作为集体术语的“现代主体”的角度来谈论最终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这个术语没有任何社会学或是政治学的价值。相反，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根据是，在现代社会演进的某些阶段上，对受制于包罗一切的“资本逻辑”的个体主体来说，阶级名称无可否认地构成了最重要的同一性来源。正是在这些阶段上，我们除此之外还看到了阶级意识的提升、工人好斗性的增长、工会成员数量和活动（被允许的）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与“工人阶级”身份、目标和愿望相匹配的政党的诞生。然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相比，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身份形成的这种过程本身受制于出现在现代性内部的更深层的分裂性趋势。换句话说，就像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令人难忘的描述一样，各种破坏“固定和不变的”关系的趋势延伸到阶级的构型和身份之中，而那些阶级构型和身份则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2] 结果是，阶级冲突非但没有变得愈发激烈和更具全球性，反而与一些基于其他的非阶级身份、目标和愿望而进行的其他斗争相结合，并在某些局部性的情况中还被它们所补充。在许多日益增加的其他斗争中，工人阶级斗争仅仅成为其中的一种斗争形式。这里只能略举几例更为突出的斗争：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争取民族和种族权利的斗争，争取男女同性恋者平等的斗争，争取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斗争。当然，这里是批判“个人主义”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主体，并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我们获得了集体共享的经验。不过，拉克劳和莫菲、赫勒和高兹都否认这种经验对于全部现代经验的重要性。[3] 对他们来说，现代性的经验

---

① Max 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transl. Steven Byington (Rebel Press, 1993 [1845]).

②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83).

③ See in particular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i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1980).

告诉我们，就“个人”现在已经从“主体立场”整体的角度被视为其自身同一性的创造者而言，连‘阶级’也在逐步消失，而那些“主体立场”则是由“个人”积极或消极地积累起来的。尤其按照赫勒的解读，我是谁或是什么在现代条件下完全由我自选的（sefl－chosen）各种同一性决定。在这些方面上，我们是自身“活动”和存在（Being）的承担者，而且任何为了维护一种“阶级”、“种族”或“性别”的集体政治（赫勒称之为‘生物政治学’）而否认“自我”的这种保护人身份的企图都必然带来专制的结果。因此，正如赫勒所说，对焦虑和失范状况的描述在整个19和20世纪期间成为存在主义思想和文献的主要内容，它决不是纯粹的文学繁荣，而是对“纯”偶然性的描述，推而广之，就是对“纯”现代性的描述。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后现代政治状况》中，我们读到了这种描述。①

在这个意义上，至少那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提出完全偶然性的“主体”作为它（后现代）理解现代的基础的观点是准确的。有人认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后马克思主义重复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发现，并且暗中走向了对“消极自由”的辩护。但是，这种看法是一种难以根据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东西来予以支持的观点。此外，后马克思主义的建议可能是在否定“特殊性”对于现代自我思想的核心性时，任何左翼激进派都应该警惕陷入困境的既定之物。在个体的形象被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占有和盗窃了数十年之后，就像莫菲所建议的，确实到了该为更加进步的事业而收回“个人”的时候了。② 在这种语境中，下面这一点似乎有丧失在对“个人主义”的召唤之中的危险：后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说，一种后马克思的个人主义在起源上绝对是“反人道主义的”。这意味着“个人”（individual）这个术语的内容被当作是有待“填充”的虚无。“个人”这个术语依然是纯粹的潜在，也就是偶然性，一直到通过建构个人的身份来进行自我选择或自我创造之时。我们可以比较这种解释与洛克、霍布斯或斯密的解释。在这里，个人不仅广为人知，而且为人熟悉：在霍布斯那里，个人是一个“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在斯密那里，个人是自己趣味的精明传播者；在洛克那里，个人是一个“自我所有的”新教徒，他在直觉上被赐予一种洞察一套指引正确行为的法律的能力。这种个人之所以广

①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Morals* (Oxford: Blackwell, 1990), p. 6. See also the introductory essay in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ér,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②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1993), p. 13.

为人知，当然是因为“他”应该是我们。这些“个人”不是空无一物，不是临时的容器，而是人类理性行为的模型；而且，我们没能再现它们，这被认为是我们邪恶或疯狂的一种标志。我们先看看罗尔斯的著作和他“直觉推导的”、“无拘无束的”个人吧。罗尔斯的“个人”的言谈举止恰好非常像罗尔斯本人：中产阶级的；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关心正义；虽然是世界的一分子，但最终却只关心本国的正义。这并不是“认同”政治（即一种承认差异性或“变易性”是个性的构成部分的政治），而是一种理性和理智的政治，一种关于旨在否定偶然性、未知之物、“非理性”和危险性的现存建构物的政治。未知之物回避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及其追随者试图支持的“真理体制”，因此，依据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总是已知的“事实”，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想控制和塑造的正是“偶然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或“自主”（self - mastery）与消极自由是相对立的。至于对“消极自由”的辩护，诺南的批判再次显得很有道理——至少在表面上。如果除了一个特定的个人外没人能确定这个个人的“主体立场”，那么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有责任根据个人的偏好，允许他或她拥有一个表明需要、愿望和欲望的空间。正如诺南所暗示的，这表明对下述观念的一种背离：“个人”可能首先被归入在“阶级”范畴之内，然后为了这样的目的被归入在“普遍性”范畴之内。根据这一解读，个人除了其所在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并且除了类存在的重要性之外，还有（有争议地）“类存在的人”（species Man）——（早期）马克思主义解放话语中的范畴——的重要性。关于“自主”，我们需要控制我们的生存条件，而关于对生存资料的控制，我们需要“社会生产”。然而，诺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所争论的东西，包括拉克劳、高兹和赫勒，他们全都在最近的著作中公开声明，一种进步的政治包含保护与生产资源国家控制相对立的“社会”控制。[1]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根本不同的东西是“社会”（正如在生产的“社会化”中一样）得以实现的基础。

---

① As per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p. xiv; Agnes Heller, *Beyond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7), pp. 200 - 201; see also André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Verso, 1994).

他们和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得出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与其说是理性或任何对世界的具体规划，不如说是“控制”或“自主”能够得以实施的手段。例如，就像已经论证过的那样，显然后马克思主义者极其敌视关于集体的“利益”和“需要”的观念，进而极其敌视关于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的观念，而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都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自我选择或自我构建的东西。他们的理由是理论性的、政治性的，在赫勒那里，当然是伦理性的。我们有必要考察他们为什么反对在现代条件下的身份同质化观念。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描述并不是简单地符合现代性的动态，现代性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根本的偶然性”感。政治和伦理的维度源于这种观察。如果个人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立场”的整体构建出来的，那么把一种身份形式凌驾在另一种身份形式之上的企图，必然篡改了“个人”这个术语的含义。这反过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用来证明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共产主义政权的特权地位的修辞在理论基础上已经不再是无可非议的了，即使它以前如此。在上个世纪的整个进程中，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归责”（imputation）论，或许是在官方和反对派的马克思主义中都特别明显存在的一种倾向的最极端版本。在卢卡奇的那本书中，需要和利益的缺失不得不被党归咎于遭受虚假意识之害的工人阶级。[①] 不过，正如拉克劳所指出的，“虚假意识”是一个在理论视域内才有意义的概念。在理论的视域内，它不是偶然的或自我界定的，而是总是已经根据历史发展的元叙事来设定的。[②]“虚假意识”是指一个人应该拥有但尚未拥有的一种自我/命运/身份意识。正如后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它指某种东西的匮乏，而不是指一种身份的实证存在。那种内容包括“虚假意识”的学说告诉我我不是谁（自觉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强化或思考我是谁或什么。它掏空了我的自我界定的内容，并且把界定身份的作用归于我可能控制不了的外部主体或力量。正如赫勒坦言的那样，这样一种地位“毁灭了我”。[③]

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样一种政治被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进步政治的无希望的理由。这样一种政治把政治责任不正当地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实体。如果我想留在历史“潮流”中的话，就要求我承认是这个更大实体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② Laclau, *New Reflections*, p. 37.

③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p. 263.

的一部分。它告诉我，只要我把自身作为以“普遍性”（the universal）为目标的运动的组织部分加以确认，我就找到了价值和本真性（authenticity）。它告诉我，“我”紧随着“我们”，“我们”因此由很多个从属性的“我”组成。它告诉我，最终普遍性可以看作是所有特殊性的总和，因而“特殊性”作为社会存在的范畴没有任何有效性。相比之下，许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焦点都放在颠倒那些迹象的尝试上：从许多多元的且有区别的“我”来建构“我们”，因而承认那些被自觉地建构为局部性、临时性和偶然性之物的政治形式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当然，后马克思主义所希望的是这样一些斗争的参与者将保存如下意识：他们是为自我决定和平等进行更广泛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因而认为自己是现代想像、自由和平等的普遍价值以及“激进民主”之“展现”（拉克劳和莫菲）或“现实化”（赫勒）的参与者。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特别强调那些群体——致力于“单一议题”政治或致力于关注某个群体发展的政治——之间及其内部之间结盟和联合的必要性。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些形式的自我组织、结盟和合作开始崭露头角并获得成效的程度。西雅图抗议、恢复街头示威以及在布拉格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抗议，所有这些全都被后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与一种完全偶然或“后现代”的政治保持一致的反抗形式的例证。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正试图努力实现的诡计是肯定地承认现代社会产生并支持的多重“主体立场”，同时保持对左翼激进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总体信奉。例如，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超越主体和客体、普遍和特殊、个人和类之间的“分裂”是必然的、必要的（在规范的意义上）、可行的或值得追求的。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政治行动的目标不应该是最终废除或超越作为竞争、多元性、对抗性的“政治”。相反，他们认为现代性的趋势正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不仅走向身份增加了的碎片化，而且走向身份的“错位”和“去中心化”，并且超出了现代性的趋势本身。然而，人们可能会再次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至少分享了对“总体化”理论的部分不信任。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趋势中所得出的结论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论完全相反。例如，F. A. 哈耶克出色地论证过，现代社会已经增加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了社会和经济功能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个社会世界太复杂、太具有异质性和太难以控制和理解，以至于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而且，任何这样做的尝试都将破坏这种脆弱的“交换过程”（catallaxy）和那些构成公民社会并赋予现代社

会动态特征的自主的相互作用。[①] 最好不要触及（哈耶克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东西。按照这样一些认识论和社会学的论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英国新自由主义（“撒切尔主义”）至少部分地得到了支持。

对赫勒、拉克劳和莫菲来说，事实正好相反：现代性内部的趋势是社会功能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它向作为“传统”的斗争和批判开放，受到越来越多的考察。当然。在一个有趣的悖论中，人们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被反复灌输在这一政治化的过程中，恰恰在此时，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宣称“国家退却”的必要性。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在于它用效率和功利的原则去推翻“传统”或“共识”，并且因为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不仅被它的批评者而且被它的支持者看作是“革命的”。毕竟，正是撒切尔夫人以“私有化”的名义废除了给人以无与伦比美感的红色电话亭，因为私有化显示了经济效率。为人喜爱的电话亭的消失充分说明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英国人对制度和传统的“想像”，一种最典型的永恒象征物已经受到严厉的政治注视（伪装成公用事业），并且已经被“征服”。现代性的“影响”之一当然是，一切指责红色电话亭的东西都逐渐去指责以前免受注视的所有领域。政治以外的空间越来越少，因此斗争和竞争以外的空间也越来越少。因此，如果现代性意味着什么，那么它也就意味着一种不断扩大的政治界定和范围的发展，一种最终会深入社会存在和集体机能每一方面的发展。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实质在于，如果“政治化”不是带来“合理化”，那么政治的扩大进程就必须与民主化进程相一致，增大“灵活性”和“竞争性”。换句话说，由政治化所创造出的空间不该立即被市场功利性在其他方面压倒一切的力量所填充。因此，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不应该受到担忧或反对，尽管许多“具有传统思维”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强烈要求应该如此；社会生活的政治应该成为某种根据民主竞争来预示批判和改革可能性的东西。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担心公私之间的“界限”变得如此容易打破，以致不能“保护”个人免受可能的国家干预。后马克主义者对于这种忧虑基本上一笑置之。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关心个体相对于集体的“权利”。相反，后马克

① 这样的观点确实是哈耶克两部最有名的政治分析著作的核心：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4）and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它们看起来也十分像哈贝马斯在分析对复杂、现代的经济进行“操纵”的问题时所阐述的观点。

思主义理论化似乎最能激怒左翼批评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坚定地捍卫“资产阶级的权利”，甚至捍卫宪政和更普遍地作为“民主”组成部分的法治——如果不是关于民主的整个故事。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仅仅是权利不能像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然法派所坚持的那样被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一种特殊的“霸权话语”的持续有效性——无论权利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宪法之中，这种特殊的“霸权话语”都会维护它们。这仅仅是把权利的观点重新表述为在普遍和特殊之间、或者更常见地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公有—集体观念的具体化。毫无疑问，卢森堡是20世纪最好斗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她明白这是为什么。正如她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权利，只有权利。”

因此，当诺南试图消除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在“公共领域”问题上的分歧时，他的批评再次放错了地方。两派都坚持在特殊和普遍之间因而坚持在相互作用的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进行稍微区分的必要性。此时，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表明了以一种基本的或其他的形而上学形式来固定这种界限的连续尝试。上述形而上学形式“保护”与国家及其代理人的要求相对立的个人“自主性”的完整。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内，这样做的实质当然是保护个人财产免受一些人的侵犯，这些人可能对被某些特权的个人和团体所享有的“巨大财产”（洛克）表示强烈的不满。换句话说，它是要永恒地、一劳永逸地确立那种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中很受欢迎的观点之一是，当把任何固定公私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尝试看作一种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操作或是左翼激进主义者应该敌视的任何尝试时，有相当多的危险。如果他们认为最终有可能在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否定的普遍主义元政治学内调和每一种特殊的要求，他们就只应该对它漠不关心。马克思之所以致力于调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客体，是因为他认为技术的发展将使‘需要’的满足成为可能，这反过来又可能消除冲突和竞争的基础，把“政治”变成“对物的管理”，恰如恩格斯的不朽名言所说的那样。

当谈到对工业会“解决”政治问题的程度进行评价时，后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沿着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相反的方向上运行的现代性趋势。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不仅丰裕决不会实现，而且这样的前景也变得更加渺茫，而不是变得更加可能。正如赫勒所说，现代性产生了更多的“不满”，同时这种“不满”又是现代性的动力来源。① 然而，这种不满既不是物质

① See the essay ‘The Dissatisfied Society’, in Agnes Heller, *The Power of Shame: A R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因素的产物，也不是现代社会的存在论和社会学基础变化的产物，它反过来反映出对我们的偶然性和历史性——我们自己的“惟一性”——增加了的意识。一旦每个人都知道他/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可能被那种认为他或她在社会母体中的“位置”是“天命”（上帝的意志）的产物的想法所抚慰，那么，消解那种根据出身来安排身份的社会母体就意味着用“定数”（destiny）和那种在“美国梦”中最清楚地表达出的观念——任何人都能够成为一切并且能够拥有一切——来取代“天命”（fate）。然而，当我们对生活机会的平等和获取物质产品的机会平等的希求使政治筹码变得更高的时候，就加强了关于“稀缺”（scarcity）的印象。根据这种观点，“丰裕”的希望本质上是“拯救”的希望。它是“政治终结”的希望，“正义终结”同时也是自由终结的希望。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对于具有某种意义的“自由”而言，在现代条件下，任何购买都必须在政治领域、稀缺的领域以及权力和争论的领域内通过行动而不是对“丰裕”的管理来构想和实现。正是在现代条件下生活永远具有政治的特征，才使拉克劳得出如下评论：“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天我们处于解放的终结和自由的开端。”①

“经济民主”与政治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诺南持有下述观点，那么他就错了：后马克思主义对与普遍性相对立的特殊性或身份的捍卫，必然需要承认古典自由主义对公私界限必定瓦解的地点的解释，因而必然需要承认古典自由主义对公共—集体力量的目的和范围应当是什么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诺南的如下抱怨是错误的：后马克思主义即使不是明确地也是含蓄地为经济社会现状辩护，从而不可能广泛地扩大对再生产过程的社会控制。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所固有的东西是承认“经济”在政治上被建构的基础，因而承认经济本身的基础是同样受到民主控制的权力关系。围绕着一个原初主体，人们可以构建出对需要和希求、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原初的主体，那么按照定义，特殊者的经济“利益”直到决策之时才会被知晓。因此，有人认为，“自由市场”是惟一的手段，个人的需要和希求可以借此得到合理的满足。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观点，

① Laclau, *Emancipation (s)*, pp. 100 - 101; see also the essay Cornelius Castoriadis, ‘Marxism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in David Ames Curtis, ed., *The Castoriadi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

因为他们认为预先断定任何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协商结果在本质上都是非民主的。例如，在其“自由主义”最明显的一部著作《超越正义》（Beyond Justice）中，赫勒颠倒了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逻辑，藉此勾画出另一种对“经济理性”的解释。她解释了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者按照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所作出的如下假设：(1)“原子”的先天存在，被赋予了作为“竞争者和接收者”的利益；(2)“作为再分配者的国家”；(3)“由国家重新分配并由不那么幸运的原子收到的金钱”。[①] 赫勒认为，只要我们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经济关系，那么我们总有责任把公平看作一种再分配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关于权力、所有权、排斥和支配的问题。一些人给予，另外一些人接收。当代自由主义对正义的关心，就是关心如何正确得出这些在其他方面完全被动的各方中每一方拥有和应该拥有的“份额”；用标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公式把“应得物”给予每一方。就像赫勒接下来所表明的那样，由于破坏了那些支撑原子分析的期望，实际上有可能使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逻辑改而求助蒲鲁东而不是罗尔斯。也就是说，起点是如下期望：每个人的“才能和天赋”都应该得到发展，即应该用那些允许才能和天赋无限制地发展的条件（“生活机会的平等”）来把“机会平等”这个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目标激进化，然后，我们断定只有对生产资料的民主控制才能保证这样一种抱负。[②]

甚至这个对分配正义的简短讨论也证明，赫勒乐于认为经济和社会从属于作为激进民主实践的政治。这一点是后马克思主义写作的特色。我们可以把这一点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对古典自由主义立场众所周知的重申比较一下。在《自由宪章》中，民主被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③] 赫勒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在上文对这种批判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种行动恰恰促进了哈耶克对民主的恐惧，而哈耶克的这种恐惧只不过是再现了自由主义者自洛克以来就对民众产生的恐惧。哈耶克的主旨是民主必须满足私人积累的需要和利益，而这些需要和利益与集体主义、福利国家以及其他以“社会正义”为名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尝试是对立的。恰恰正是这样一种关切支持并理解了《通往奴役之路》在其他方面的怪诞分析。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有为那些由资本主义的占有而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提供一丝安慰的尝试都被解释为滑向

① Heller, *Beyond Justice*, p. 182.

② Heller, *Beyond Justice*, pp. 200 - 201.

③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p. 106.

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此外，由哈耶克所阐明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关心的是赞同确立那些保证积累而不是使积累服从于更大的社会需要、要求和利益的统治形式。当然，这总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假象呈现出来：在国家插足的地方，官僚政治的无能、“停滞”和功能紊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要是国家硬把经济再生产任务揽为己任，那么更多的“自由”领域就会遭到“监督”和“控制”；但是，不那么躲闪的言外之意是，民主国家应该遭受到怀疑的目光，以免它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们做出有害的决定。正如哈耶克宣称的那样：“正是当坚持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多数人使国家成为什么样子都属于民主权利的时候，民主就堕落为煽动行为。”①

这样一些关切是后马克思主义对民主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解释所缺乏的东西。即使仍然受到怀疑，他们关心的也还是保证民主控制是目标本身，因而正如拉克劳和莫菲所说的，以一种保证最大可能的“自决”的方式来“扩大民主革命”。要了解诺南的批评，尤其是对阿拉托和柯亨（也可以扩大到拉克劳和莫菲、赫勒等人）的批评，因而就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性来说，对市场机制的“辩护”也并非以保护“消极自由”或私人积累权利的必要性为依据。如果它当时“沿着这条路线走”，那么左翼激进主义可能有理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普遍主义目标和理想的一种威胁。然而，这决不是他们想要论证的东西。他们希望强调的是，“需要”本身只是现代“主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一种反映，在那种完全忽视“需要”的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现代工业环境中，那些经济互动模式完全失去了作用。② 换句话说，认为随着身份和主体立场的瓦解和多元化，非市场模式的经济理性会变得“更容易”辩护和建构的想法，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特殊性和多元性被当作（后）现代状况的特征，那种认为为了普遍性（被理解“类存在的人”）而应该在特殊性逐渐消解或消失的基础上把经济生活制序化（ordered）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很荒谬。更简单地说，如果“主体立场”（需要和希求）变得更加多样和不同，那么，就会使根据看得见的或预期的“社会”（即集体）需要和利益的马克思式经济计划模式变得更加难以站得住脚，并且随着那些致力于生产出“普遍主义”结果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忽视那些需要和希求，这样做的代价因此也可能变得更大。在这个意义上，求助于“市场”只不过是求助于与普遍相对立的特殊、与集体相对立的个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只有同时提出逐

①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p. 107.

② Laclau, *Reflections*, p. xii.

步消除个人在集体内的从属地位，为了计划而抛弃市场看起来才是合理的。对被这样一种建议所迷惑的任何人（大概包括那些偶然对前共产主义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有兴趣的人）来说，“市场”看起来与其说是对集体主义抱负的一种威胁，不如说是那些抱负在发达工业环境中可能得到最好推动的基础。[①] 因此，只有被使用的“普遍主义”概念被掏空了所有特殊性，市场看起来才像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威胁。这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荒谬且危险的命题。再说，后马克思主义者渴望发展并提升“普遍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对自我决定和生活机会平等的主张）；但他们同时也渴望避免以某种包罗一切的“社会需要”概念之名来使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处于次要地位的前景。如果这意味着把市场用作一种手段来“调解”普遍和特殊之间各种可能“抵触的”和“对立的”要求，那么确实就是这样。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解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市场应该不断地受公共—集体协商的影响，不过这可能会让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和恐惧。具体地说，这种控制目前采取的形式包括如下方面：监督和打破垄断；那种旨在抵制社会上无法接受的实践的“消费者行动”；帮助穷人和“被排斥者”的普遍结构或“人民银行”；激励公司接受平均主义的、非剥削的雇佣形式；强制性劳资委员会；最高工作时间的指令；最低的工资，等等。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让步和措施的胜利表明，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国家权力已经怎样或可能怎样被用作为一种沿着“普遍主义”路线抑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的手段，更宽泛地说，即一种使经济服务于社会和政治的手段。另一方面，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些措施证明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因为那些抑制和平衡国家权力范围的手段而必定守旧不堪。

当然，对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措施充当了对资本的一种修正主义贿赂，而不是一种改革“资本”的企图——无论它除了是那些构成一个特定社会整体的现存实践总和之外还是什么。这样一种立场贯穿着如下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如果一些程序和结构缺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概述出的公社统治形式，那么这些程序和结构就是对社会主义遗产的一种背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切稍微不同，尽管这样一些模式构成了拉克劳所说的地平的一部分。当拉克劳勾画出“普遍主义的抱负”的特征时，他谈到了那种地平的组成部分：那些贯穿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和价值观而又不必然决定其政策和目标的乌

① Alec Nove 在题为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London：Allen and Unwin，1989）的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托邦环节。正如赫勒所说，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狂热主义者的立场。[1] 对赫勒而言，那种构建一种绝对、整体或总体来取代具体存在的整体的欲望激起了“现代主义想像”。“后现代想像”是一种被如下欲望所激起的“想像”：那种借助仅仅抽象存在着的东西——即普世的价值——来改变具体存在着的东西的欲望。增量性质的改变增加了个人的福利和自足，提高了他们接受教育、享受住房、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意味着他们必须以一种不那么低贱和异化的方式来工作，赚得更多，在关键决策上有更多的权力，反抗剥削。尽管具有增量的性质，但这种变化对于“抽象的狂热主义者”来说几乎是一种“娱乐（甚至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娱乐）。然而，对“具体的狂热主义者”来说，这样一些措施代表着那种最终决不会被实现的“地平线”的逐渐实现，代表着那些最终决不会被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逐渐实现，代表着那些最终决不会实现的价值观的实现，代表着那种决不会被拯救的“希望”的实现。这就是进步性“不满”（Progressive dissabisfaction）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一种其“影响”是否在于让我们感到总有更多的事情去做的社会主义。荒谬的是，这恰恰是实质之所在。

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本文集中讨论了左翼激进派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对。我认为很清楚的是，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者的主张相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再现广受尊重的古典自由主义或使之合法化。而且，我认为，那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有助于以招致批评的观点来突出问题的看法也很清楚。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似乎否定了如下方面的必要性：政治的理论化，调和不同的、相冲突的利益和观点，根据不同需要、欲望和利益来组织社会生活，承认完全透明的、同质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应该被驱除而不应该被接受的“幽灵”。正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重申的那样，这并不是否定“普遍主义”的中心性，也不是否定传统上与左翼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的目标和雄心。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目的和目标是围绕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观组织起来的：自由是自我决定，而平等则是生活机会的平等。诺南认为，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破坏的目标。后马克思主义

[1]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Morals* (Oxford: Blackwell, 1990), pp. 180 - 181; see also Laclau, *Emancipation (s)*, pp. 103 - 104.

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是接受各种各样和有区别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这样一些目标和价值可能会得以推进。当然，这对某类读者来说可能是沮丧的根源，因为他们徒劳地寻找关于如下问题的详尽描述：应该如何推动普遍主义？在谁的保护下由谁推动普遍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任何蓝图，没有提出“领导”或“教育”的斗争，也不曾试图适当地制定出一系列实践原则和原理。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是“具体的”问题。在为自主权、民主和平等所进行的不同的、局部的斗争中，这些“具体的问题”同样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如果这听起来像一种狭隘的公式，那么它不想这样，也不需要被解释成这样。相反，人们可以认为它仅仅是重申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口号：“全球思考，地方行动”（Think global，act local）。这个口号是那些为了反抗全球化的弱化效应而组织起来的团体提出来的。

许多从未听说过或看过拉克劳、赫勒或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的任何东西的人都普遍地有一种伤感的情绪。由于不想把这种情绪窃为己有，上述口号在政治上仍然或多或少地概括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目前，“地方行动”是一种把责任转移给此时此地的我们的手段。它是一种反总体化的公式，把责任从自封为“我们”利益的代表的人那里转移给与其他个体一起行动的个人。它要求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买的东西、我们所抛弃的东西、我们所投票赞成的人负责。它要求我们独自思考怎样最好地去促进那些我们所涉及的斗争、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所支持的人们和运动。行动不是在明天而是在今天。“全球思考”是要不断地使我们想起普遍性。普遍性决不是“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出现在历史的流动中，但必须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地平”而不断地被重释、反思、铭记和“重新想像”。它虽然是一个我们绝不会抵达的“地平”，但可以启发那些关心“全球”的人们的行动。

作者：Simon Tormey，Senior Lecturer in Poli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K

文章原标题：Post－Marxism，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文章出处：Democracy & Nature，Vol. 7，No. 1，2001

（编译者：刘智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讲师）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美] 阿伦·亨特 著　　郤继红 译

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激进理论和激进政治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原因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发生了危机。作为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作为理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再那么吸引人，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极权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革命性力量——工人阶级——已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进行行动，因为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许多激进的问题，如核战争、生态问题、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再能为当今新社会运动中的许多新的活动提供一种综合性解释。在学院的各种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渗透到著作中，但是那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提法，那些对社会现实的全部解释还是被人怀疑。目前，在普遍的、跨学科的争论中，诸如解构，强调的是现实的碎片特性、不确定性以及一股统一变迁动力的缺乏。

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结构主义，一直在削弱激进政治。虽然在“语言学转向”上它们有着重要作用，它们强调非经济动因，强调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强调话语的权力，强调社会运动和文化趋势的修辞建构，但总体来讲，它认为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必然要被脱离了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所取代。解构意味着批判性地信奉，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体打碎成部分，以便其中的活跃部分能够重新适用于变化了的框架。但是，许多批评家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而且对这些答案所触及到的问题也置之不理。

许多学者不再谈经济基础问题、阶级问题和代理问题，不再从经济基础角度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变革行动的有特权的力量。许多激进分子抛弃了极端激进的革命观点，不再指望革命。他们抛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规律的教条断言，强调未知性，不再把那些战略作为指导现实政治的工具，认为这类具有极权含义的概念是错误的，许多活动家无法确定，特定的行动到底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还是以群体利益为基础，从而交替地陷入道德主义或不带有批评性的相对主义。

这就是拉克劳和莫菲《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

发表的理论和政治背景。先前，他们因研究葛兰西及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知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对新社会运动政治做出了呼应。为了在政治上反映出合法的社会运动的多样性，拉克劳和莫菲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反思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顶礼膜拜，而是把它看成激进民主的一部分，这种民主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着控制、不自由和不平等。他们研究葛兰西著作的内容表明，他们是少有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围绕着政治含义进行著述。关注社会理论的他们能够或者应该取代马克思主义。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仅没有让他们关注社会决定的复杂性，反而空洞化了；不仅没有缓解当代生活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过分高估了部分的作用。他们揭示出正统马克思主义不能适应主体性和人类的能动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也不触及主体性和人类的能动作用。他们建议社会主义激进化，但是他们却更多地退到自由多元主义。因此，虽然他们以强有力地批评马克思主义作为开端，但却以不充分的、退却的选择作为结束。

当然，拉克劳和莫菲还是与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不同，这类社会主义者批评马克思及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便恢复他们找到的反抗行为的源泉，这种反抗行为来源于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和还原论的压制。先前的批评家曾把工人阶级的创造行为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与他们不同的是，拉克劳和莫菲也批评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本质主义的特征。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引入了霸权概念，他们的贡献在于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团结和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假设的不足之处。他们运用霸权概念竭力进行历史重构，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不太充分的概念。他们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方和西方）、修正主义和革命的工联主义，回答了未曾预料到的资本主义的持久性问题。19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经历了经济萧条之后，随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了它的天真……就像他们更难把社会关系简化成抽象经济模式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一样”。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遭到阻击，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资本运动规律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在搭建政治结构时，这些规律不能解释偶然性的作用。这破坏了马克思假定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基本关系，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一个团结的历史主体和革命力量。把霸权概念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就回应了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谓的“自动资本主义”的不充分性，因为它假定资本主

义运动规律可以保证在政治上过渡到社会主义。

拉克劳和莫菲强调，把霸权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问题。对于那些不愿放弃用一种包罗万象的决定论作历史解读的理论家来说，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解释特殊条件的一种方法。他们广泛地运用这一术语并不奇怪，目的是要强调统治阶级通过形成一致和协调的基础来维持社会秩序，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持续不断地对社会进行统治。他们强调社会统治阶级把其他集团也纳入到历史集团中这种行为不完全由资本结构决定，甚至也不是内化在资本当中。在理解社会聚合时，霸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因为虽然在任何时候结构性因素都可能是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们却决定不了特殊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然而，葛兰西通过修改和运用霸权概念，坚持对历史进行一种包罗万象的决定论式解读。把实践上形成官僚团结这种解释附加到决定论上，就不会对经济运动规律自动论或阶级本质团结的假设构成威胁。

拉克劳和莫菲认为，阶级还原论、经济主义和一种决定论方式的假设使马克思主义核心陷入混乱之中："经济领域不再是一个受内在规律支配的自我管制的社会空间；也不存在一种解释社会动因的基本原理，这种社会动因能够用阶级论来解释；阶级地位也不是历史地确定利益集团的必然条件。"在他们的术语中，"外在"关系存在的条件是，事物、人、集团、阶级这些认同要素先于关系而存在，不能被改变。与此相对照，"内在"关系存在的条件是，关系自身至少要发生变化，如果现实中确立不了，那么这些认同要素就要进入到关系中。不过，这并不能充分抓住他们批评的要害，在还原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决定论是从经济到社会的唯一出路。经济主义、阶级还原论不仅涉及外在的关系模式，而且也涉及从经济到社会的内在关系模式以及从社会又回馈到经济上的外在关系模式。但是，它们是单向模式，而不是双向或多向的决定过程。

就像这些有洞察力的批评一样，拉克劳和莫菲持续地陷入了更为极端、更为教条的话语中，没有为可选择的社会理论方法或政治行动提供充分的基础。

第一，他们坚持认为，"不确定性是每一种社会现实的条件"。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一切意识形态和现实都不能严格地用阶级地位来解释，社会现实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认为，只有霸权政治与霸权理论是一致的。霸权理论与现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个词表明，一切意识形态或政治计划都可以为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

所利用。但是，拉克劳和莫菲也认为，不是所有社会集团都能恰当地修改意识形态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因此，他们谴责历史上以阶级为基础的观点，谴责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谴责那些极端的意识形态表述或者反映特定阶级地位的排他性观点。

第二，他们认为，“从本体论上而不是从实践意义上来讲”，不存在具有特权地位的政治主体。不用无产阶级去替代，也不应该用其他的社会集团去替代，不管这一社会集团是多么受压迫，或多么庞大。他们不仅像上述那样攻击无产阶级概念，也抨击黑格尔式的假设，即建立一种具有特权地位的团结一致的历史主体。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政治突出的缺点，更强调了这种观点在当代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已从实践意义退到本体论上，拒绝承认存在着产生有特权地位、具有实践意义主体条件的可能性。在假定需要一个具有本质主义、团结一致的主体，与强调人们参加集体政治行动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因素之间，的确存着差异。拉克劳和莫菲的立场是，强调各社会集团出于不同利益的联合，但这又使他们很难探究反霸权主义的政治观点，以及会团结不同民主运动的实践。

第三，“不存在有特权地位社会集团的观点，为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松了绑；这种观点取决于一种‘集体意愿’，这种意愿是由具有不同观点的人艰难形成的。”这种立场取代了有关反抗行动和意识产生来源的还原论提法，这种反抗行动和意识与一种自愿的理想主义相连，这种理想主义否认经济决定论的重要性，至少是把它与其他因素同等看待。

这些观点的威胁在于，它们抛弃了而不是提升了我们对经济学、阶级、决定论的理解。因为害怕强调这些内容的重要性会导致经济主义和决定论，拉克劳和莫菲就拒绝承认经济关系决定现代社会生活，拒绝承认阶级关系决定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就是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主义，以及经济主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之后，在理解社会变迁时，经济动力说还是受到了批评。一种自动的生产模式说就不必假定，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由广泛而有影响力的经济关系来推动，这种经济关系能够深入到任何社会实践中，在决定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具有弹性和向心性。经济因素不仅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那些围绕经济活动和交易而形成的社会实践也不成比例地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当然，经济关系也持续不断地被其他社会实践修改着，并且总是被改变，而不是自身在变化。我们的确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假设进行质疑的必要，但只是解构“经济”的中心地位，而不再把它看成唯一的影响因素。与经

济因素一样，社会和文化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和文化因素不仅与经济因素一样影响着社会变迁，而且也影响着经济自身的发展逻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与经济和阶级维度联系起来观察社会行动，而不再假定阶级是社会现实形成的核心，或者阶级是社会变迁的惟一动因。

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没有事实依据。他们希望与历史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保持距离，否认时间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可以再生社会实践，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是利润这个不竭的驱动力、对劳动的控制以及现金交易的扩展这些因素更牢固地影响着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

在目前讨论马克思的话语理论中，他们遇到了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超越马克思，而且因为他们很少关注实际论证上该建设些什么内容，只一味地解构马克思的观点。最近全面转向从语言学和文化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文化和文学理论家就用这样的方法解释历史和社会。他们更多地关注符号、修辞、现实形成的复杂性，以及决定人类交往的非物质因素。这虽然丰富了我们理论的概念和内容，但是无论这些方法多么具有深远意义，他们的关心多么宽泛，都可能被其他社会分析方法所取代，这种变化依赖的是富有成效的结果，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这种话语分析看成是哲学人类学。这种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基础；语言不仅区分了人类和其他物种，而且还建构了人类关系。从这种意义来说，转向话语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还原论，即使它拒绝其他还原论观点。从普遍意义来讲，这种引人注目的阐述在实际历史研究上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益处，拉克劳和莫菲对这种话语分析的捍卫只是发生在理论层面，从来没有落实到分析特定的社会背景上。

他们提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强调政治可能性与政治结果的弹性。他们认为，社会没有“最终决定因素”（last instance），没有独立于人类行为的结构，没有预先决定好的社会逻辑，没有运动规律，从外在因素来讲，组织人类行为都要先于人类行为本身。生产方式框架不可能决定所有社会；因为“社会”和“社会构成”这些术语意味着一种封闭式终结，而这是不存在的，他们拒绝把“社会”概念看成是部分过程的全部基础。对于他们自身来讲，这种观察强化了他们对历史开始和结束本质的注意，强化了他们对人类行为多样性来源的注意。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固定领域内的社会行为似乎具有流动性、多变性和快速性，从建设性观点来看，各种社会经验不断地被造或被再造，没有固定的外部决定性因素。他们关注建设性因素的重要性，削弱本质主义、决定论和整体论；但

自身的立场是既不反对存在着整体性，也不反对宏大权力、持久性和某种社会行为的再生性。的确，声称断绝与过去理论的关系有些夸大。正是关于男人和女人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的观点，恢复了他们对马克思观点的激进性批评，他们揭示出很多人类经验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对更多基础性社会结构的模仿，而是由人主动地、历史性地构成的，如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之说，这表明他们是以新的理解作为基础激进地观察事物。

在话语理论中，拉克劳和莫菲寻求建立的是一种激进的、带有不确定性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葛兰西的理论重点建立在意识形态物质性基础上，而不是精英所利用的观念和符号，这种物质性是由社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活动交叠在一起形成的。这种观点使人们想起了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提法，这种提法强调人们的社会活动自身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但是在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活动类型上，拉克劳和莫菲比威廉姆斯走得更远。他们的社会分析单元是话语领域（a discursive field），作为一种建构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接合实践”（an articulatory practice）。作为“接合实践”的结果，话语领域被制造与修改，这种范畴不可能孤立地或事先存在，只是在集体创造它们的过程中存在。它们存在于话语分析中，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话语。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承认，在建构知识和含义的过程中，非话语实践（non - discursive practices）也起着重要作用。他想阐述的是，在知识形成过程中，话语因素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普遍的承认，但是，至少是在那本书里，他不再争辩话语就是全部。事实上，比较友善的批评指出，福柯的话语界线并不清晰。同样，拉克劳和莫菲的话语也一样不清晰。拉克劳和莫菲过于推崇福柯的论述，认为没有人超越他的话语。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语言学家也转向话语，拒绝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认为，通过劳动，事物才具体化，这是人类表达和过程的基本形式，通过劳动，人类才创造了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劳动及其相互作用是不能相互削弱的，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不同，拉克劳和莫菲则归纳成劳动及其产品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话语，就像他们拒绝“在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间进行区分一样”。维特根斯坦认为，物质是运动的，并被放在特殊的相互关系中，就像 A 命令 B，通过观察维特根斯坦，拉克劳和莫菲得出结论：“客体的极端物质特性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言的话语的一个范例。”

拉克劳和莫菲认为：“与话语与非话语二分法决裂的主要后果是放弃了思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还认为，当重建扩大了的话语的客观性领域后，类似于区分主体和客体、结构和动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二元论就可

以被克服。这些二分法是存在问题的，不仅在比喻意义上，而且在被作为现实的具体化代表时。拒绝思想与现实二分法是重要的一步，这种态度认为，事物/基础/结构比观念/上层建筑/动力真实得多；它们真实性的方式不同。怎样通过把一切事物都归之于话语领域来克服二分法问题还不太清楚。试图克服这样的二分法，他们就用不确定性来替代决定论，在理论上承认偶然性和流动性，不考虑结构和稳定性。就像他们所指出的，话语理论没有为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任何入门方法；在通过连结建立存在的过程中，如果一切都无差别地永远流动着，那么怎样从更为稳定和决定性的角度探索事物就不太清楚了。例如，与此相对照，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区分就会产生固定的社会安排问题，就会对普遍流行的学院式社会现实的具体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进行评论。

从某种意义来讲，有关诸如结构和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仿佛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当政治以及分析清晰度成问题的时候，在理论上这些问题也就具有顽固性，拉克劳和莫菲与其他理论家一样，只是进行强有力的批评，而不是积极构建。例如，在对阿尔都塞的抨击上，汤普森（E. P. Thompson）就在结构和动力问题上陷入了“经验”，这部分因为他反对把政党凌驾于普通人民之上。就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汤普森的“经验”太一般，但是他自己关于各种“经验”的类型学却和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一模一样，正统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经验凌驾于其他次要的社会集团之上。虽然汤普森和安德森的争论没有什么结论，但它促使我们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研究。

与此相对照，在反对被具体化的二元论的讨论中，拉克劳和莫菲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社会实践的变化。他们也想克服二元论和决定论的缺陷，使用了抽象的语言，这种立场致使他们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他们不区分各种社会实践，企图用分散取代统一，用社会逻辑性的缺乏取代长篇大论，用难以归类的连结取代还原论，用空洞的话语领域取代阶级第一位，用不关注权力本身取代对经济权力意义的夸大。事实上，他们避而不谈，为什么有些人的活动就比其他人的活动更具有影响力，为什么有些领域的活动更有决定力。他们仿佛害怕，在理论上承认决定有不同程度或人类经验有不同方面，就会不可阻挡地再造还原论和具体化的二元论。因此，我们处在接合的领域——这种接合既不被决定，也不决定；既不起之于人，也不影响人。他们谈论接合、领域的分散，等等，但很少谈到人民、团体、组织或机构；既不涉及参与者、代理人和主体，也不涉及结构和决定。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解构说法偏好的是结构主义，反对的是人文

主义。他们转向文化语言方法，以此克服决定论的缺陷，这使他们陷入了缺乏主体的不确定性中。他们与决定论相对立，从而产生了安德森所言的“历史的随机化”。

维特根斯坦上面的例子表明，话语理论太晦涩，远远超出了二元论和决定论存在的问题。在任何给定的因素中，存在着客观限制，A 需要 B 做什么，取决于它们之间确立的物质关系；在那种意义上，对 A 与 B 间产生的社会实践，至少存在着某种非话语的决定或限制。此外，为什么 A 能够发出命令，而 B 要服从，最有可能的决定性原因不取决于现在，而是来自于过去已固定存在的权威的社会关系。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因素是由它们自身推导出的。但这只是一种看法。在话语领域内部以及话语领域之间进行接合的社会理论并没有说明，过去怎样决定现在，现在的某些话语怎样受更有影响力的话语制约，或在特定背景下思想及其生动的实践怎样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相互作用，自然的与人为的物质世界怎样相互作用。

这些理论缺陷的后果表现在不同方面。例如，它们不清楚他们所解释的原则与他们想解释的内容间的关系。虽然他们关注流动性、多样性和变化，但他们无意识地创造了极端的差异，就像下面这些重要的问题：在不诉诸决定论或功能理论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理解社会秩序及其连续性？他们提供了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激进的不确定性；变化的事实，以及有些人在某些环境下“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能力，就表明了需要非决定论理论。然而，通过大部分历史可以看出，大多数社会还是相对稳定的，例如，在大多数社会，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着现在和未来。只有在当代，社会才变得更为系统，拉克劳和莫菲恰当地指出，霸权概念阐明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证明的激进变迁的条件下，怎样维持住了具有特权形式的社会凝聚力。但是这意味着，他们转向话语理论激发了对连续而不是变化进行非还原论的非结构性解释，例如，对过去怎样决定着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必须对人们的行为怎样建构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行非决定论的解释，一种特别关注当代世界的理论会关心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稳定性都同时存在，并永远都互相缠绕在一起，即使它们相对的重要性会因时间而改变，社会实践究竟是更具有流动性还是更具有稳定性，可能都有它们自己的变动规律。只要认为任何社会实践都不会被其他因素所改变，就可能认为是决定性的或被决定性的。但是一旦承认社会实践因其他因素而改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就出现了，即，

某些社会实践是更具独立性的，由内在因素驱动，或是更具依赖性，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在这种意义上，针对连续与变化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理论上就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思路，不管是决定论还是不确定性说法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在政治上运用他们创造的理论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不能解释，从经验角度上看，什么是他们所承认的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内容。虽然他们戏剧性地提供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框架，但还是承认阶级、种族和性别是统治与冲突的持久性影响因素，承认商品化和官僚化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关重要的理性化过程。但是从理论立场上的这些退却，既没有被整合在一起，也没有被理论化，因此他们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在具有这些持久的、强大的特征的当代西方社会，当再生出不民主的社会安排时，就用这些办法来限制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他们戏剧性地提出了一种有关当代政治的非马克思主义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所依赖的假设很难与他们激进的不确定性相一致。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一种颠覆不平等和权威规则的"社会想像"，通过"等同的逻辑"，这种构想能够超越一切话语领域。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内在辩证法或某种等同，产生不了对抗活动和意识；更确切地说，超越语境等同逻辑，就是批评某种领域内的关系，用的却是产生于别的领域的标准。

这种分析存在着许多问题。作为激进的不确定主义者，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要相信任何事物（甚至就像一种"构想"一样具有弹性）都具有持久性，这种持久性可以让我们在19世纪反抗远古政权遗留下的不平等的斗争与当前的社会运动之间建立一种连续性。他们关心多变性，但奇怪的是，他们认为民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们不提倡和谐与冲突方式的多样性，在这些方式中都需要民主。他们不能真正地解释为什么民主的意识形态如此地强大，以至于把它们自身与各种话语领域相连。民主的意识形态非常具有吸引力（来自于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人民都愿意接受它）；但是，他们夸大了民主的颠覆特性——毕竟，统治集团之所以能够接受民主，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依附性的统治工具。当互相冲突的集团把他们自己陷入民主的合法性之中时，那么就存在着人们在政治上进行结盟的其他基础。更进一步讲，人们乐意运用类比的修辞表明，不管政治许诺的来源是什么，试图建立地位合法性的一个共同的方式都是通过超越语境的参照物。不幸的是，拉克劳和莫菲强调了但并没有解释民主意识形态的权力及其吸引力，没有解释通过民主过程等同逻辑在发挥作用。

作为创建者，拉克劳和莫菲对当代政治争论也是有贡献的。他们找到

了一条道路，把霸权政治与激进的、自由的民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产生于对马克思主义极端激进主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把不同的政治实践统一在固定的政治类型和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代表阶级中。与霸权概念以前的发展者不同，拉克劳和莫菲把霸权倡议与民主逻辑联系起来。拉克劳和莫菲否认特权地位的存在，因此，可以发动作为整体的革命性社会变迁。然而，他们也承认，如果把它们与一种霸权的倡议、对真实的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建议联结起来，激进民主运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反对轻易选择传统的社会主义，诸如，认同政治或一种左翼民粹主义，它们用工人阶级取代难以归类的“人民”。他们把霸权重新概念化，阐明了统一政治看法与特殊的动员起来的社会集团动力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后者需要民主和自由的繁荣；如果民主运动消极地结合在社会重组中，前者就是必需的。处理这些问题（各种民主运动互相影响，在阐述上创造一种互相共享的政治看法）就是新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批判性问题之一。

然而，拉克劳和莫菲所乞求的、结合了统一观点的民主多元主义仍然是抽象的和唯意志论的，因为它在理论上是脱节的。他们信奉的激进的不确定性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都陷入了困境。首先，他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期望或需要霸权政治。他们已经清除了社会概念，但却不清楚霸权政治的内容应该是什么。相反，他们却为民主运动反抗被包含进霸权政治的假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当霸权通过不同形式的压制被接合的时候，极权主义的统一就出现了。但是如果目标是生活彻底的民主化，那么在一个多元的、只有不确定性相互连结起来的社会领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有些领域的改革却要受到缺乏改革领域的限制。其次，他们的理论没有历史方向；他们在理论上对决定论的反应却导致随机化或唯意志论，两者都否认目前的政治选择直接受到过去的影响，甚至受到过去的限制。然而，如果在一个社会集团中各种不同因素不分享相对持久的社会处境，就很难看到怎样才能阐述霸权推断。

此外，拉克劳和莫菲相信，完全的不可知论就服务于激进的民主，群体将动员起来，像斗争的场所、重要的问题、切实可行的联盟。这种观点能够为政治被动性进行辩护，但是它不能给霸权政治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霸权政治要把各种不同的运动囊括进一个合并在一起的框架中。因为相信不可能明确说明对抗产生的先前的原因，他们就拒绝同种不同层次的分析，也拒绝分析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因而就夸大了不确定性的影响力。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区分出特殊的问题、社会代表、社会的最大动力。如果不可能的话，就很难分出这三种特殊的结构。但是，根据历史的结论，

而不是先前的公理，我们能够判断出未来的冲突。就像拉克劳和莫菲他们自己所相信的，因为围绕阶级、性别、种族而形成的统治将会重复出现，理论和政治必定要面对这些压迫形式的不同组合，作为斗争的潜在场所，即使不可能准确地知道这些组合将怎样把自己呈现出来。把各种不同问题都放在一个激进的议事日程中是不明智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在持久的统治形式方面，他们都有特殊的建构，如果那个重点与民主程序可以共存的话。

至于不确定性则显示出，他们对利益构成的看法过于政治化。他们从对经济主义的抨击滑向政治上的还原论，认为"政治实践构成了它所代表的利益"。他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通过谈判，集体的认同可重新快速地达成。的确，利益的具体化以及需要或愿望都是由政治决定的，但这是不真实的。政治利益不仅从统一的社会存在中自然产生，而且如果不涉及到其他方面人们的生活的话，也是产生不出来的。在利益上政治妥协的达成，还需要与人们的需求、关心和动机联系起来，而人们的需求、关心和动机又受到他们的经济、种族、宗教、性别和其他社会实践的影响。但是，如果夸大利益由政治决定这一点，就会使操纵政治潜在地合法化，因为如果利益只是通过政治才能存在，那么所涉及到的利益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政治相对抗？然而，我们知道，融入进一个给定的政治体中的人们，还是可以潜在地被区分的，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所坚持的立场不同，或者因为其他的政治妥协。事实上，有些社会实践相对于其他社会实践在政治上具有优越地位这点很重要，但是他们没有区分不同的政治实践。不同的政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创造着新的社会认同，重新解释群体利益。用政治取代经济，他们就拒绝了利益的客观性，用彻底的相对主义来替代。

他们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在政治上强调激进民主是有用的，但是应该拒绝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倒置以及政治行动上的不可知论。决定论会导致轻率地宣布"做什么"。但是激进的不确定论本身只能使以服从民主自发性作为伪装的不抵抗的合法化，或者是使利益的政治决定论合法化，因为如果政治利益就是不确定的，那么它们到底是从下面产生，还是从上面产生。拉克劳和莫菲既不倡导不抵抗，也不倡导自愿，因为两种立场都与以不确定性为中心的理论相连，而不确定性理论又以不同的方式与决定论相连。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通过理论把社会生活的紧张状态放在中心位置，而不是边缘位置。我们在理论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怎样理解人们的活动创造了社会逻辑，在历史上，这些社会逻辑相互作用创造出特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可以创造他们的未来。如果不排斥其他行

动的合法性，人们就能够在特定领域采取有决定性的行动；人们就能够达成一定的政治妥协，也能够与其他人一起参与，分享看法。

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自于新社会运动的需要。像其他运动一样，他们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理论与建立战略联系起来。他们所选择的社会理论太集中于批评上，以至于忽视了当代经验的核心类型，忽视了这些运动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新社会运动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挑战，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滑向不确定性，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他们的批评被接受而他们的选择被拒绝的话，拉克劳和莫菲所羡慕的激进怀疑主义对激进政治的重建就是有贡献的。

作者：Allen Hunter：Lectures in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文章原标题：Post－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文章出处：Theory and Society，Vol. 17/6，1988/89，p. 885－900

（编译者：郤继红，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

为什么葛兰西九泉之下难以安息？

——从拉克劳与莫菲那里拯救葛兰西

［英］奈杰尔·格里维斯　著　　周凡　译

本文拟批判地考察拉克劳与莫菲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葛兰西著作的误用。我提出反对意见的根据在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葛兰西本人一向着力突显的其作品的语境缺乏起码的判断。因为，他们既不考虑作者本意所在，也不考虑作者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却径直对其提出表面上普遍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并不符合已过去的现代性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认识论。如果葛兰西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他势必要经受一个适应后现代状况的过程，而从葛兰西自己对历史以及观念史的理解中却根本找不到这一适应的明证。同样，如果说葛兰西是萌生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如何按照他不知晓的、也不可能预见的状况与他的思想关联来加以解释呢？我承认，葛兰西的思想十分深刻、丰富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想：如此的历史性变换也是可能的，然而，对九泉下的葛兰西来说，在他过世那么久之后对他的思想的如此引用只有当后来的环境中可能发生的状况与特征与他自己时代一致的时候才是可以忍受的。这肯定是葛兰西确定自己的历史角色的方式，马克思也是如此——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对当时社会关系发展的一种表达。在两种情况下后马克思主义都没能坚持这一点。要么葛兰西是我们今天解开特别复杂的市民社会——它依然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的有效途径，要么我们就不要去惊扰葛兰西的英灵而是考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我们赖以生活其中的新时代，就像葛兰西用他的方式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方式可用于说明这种情境性主题。在葛兰西那里，一切可以归结为流行的观念与现存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中被认为不具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性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认可这种关联。

一、引言

在当前关于葛兰西著作的本意或潜在意义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中，葛兰西真正属于哪个时代？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我们势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葛

兰西确实不属于现代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头脑中深藏的东西无非是他身处其中的历史状况——后现代性——的表征，这种后现代性既可以以物质的形态存在，也可以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后现代主义拒斥现代性，反对神秘主义和蒙昧无知的总体启蒙革命，而作为后现代主义最近的一个左翼分支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现代时期最有力的哲学宣言，所以它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本质主义成分。后现代思想的关键之处是它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的适用性和恰当性（即它自命为真理的合法性）表示否认和怀疑。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归属于后现代的认识论就意味着将产生一种思想混合的“后马克思主义”——这种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本文要加以探讨的。在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认识论的大部分都要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因为它的内在矛盾使它经不起抨击：事实上，它一方面是“本质主义的”，而另一方面又是“话语性的”（discursive），这使它成为一种典型的“二元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却力图把激进政治的驱动力保留下来，以作为未来变革的本体论成分（即起之于内部冲突的变革）。但是，这种文化转向难道真的像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从思想上受惠于葛兰西吗?

不可否认，这种理论转向具有一定的新意，也令人颇感兴趣，但是，它完全剥离了葛兰西的历史背景——而这一背景是葛兰西思想的系泊处，我坚持认为，它对于葛兰西的认识论具有最终的本质性意义。在对葛兰西的阐释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有它自身的辩证假定，但我还是坚持这样一种论点：后马克思主义把它的主张建立在对葛兰西的历史主义的错误解读的基础上了。这只需把葛兰西的全部作品与当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投射在葛兰西作品中的某些东西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拉克劳与莫菲承认葛兰西的思想保留着“残存的经济主义”，[①] 但不知怎么地，这种话语分明蕴含着这样的意思：葛兰西一直在为“解放”自己的思想而孜孜奋斗，但非常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从“经济主义”中解脱出来。人们或许可以直接把强调点翻转过来，即是说葛兰西并没有试图把自己从“客观的现实”中解放出来，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对先验主义——这种先验主义外在于那些投身于真正现实的大多数历史行动者的经验——的过度依赖中解放出来。我首先将对这一点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69, p. 4 - 5, p. 85, p. 85.

进行论述，然后，我将转入第二个争论点：葛兰西的“残存的经济主义”，这一措辞尽管听起来有些贬意，但实际上是葛兰西一系列重要概念（诸如霸权、知识分子、历史集团）的支撑点和锚定物，所有这些概念如果离开了“残存的经济主义”，将变得松散、零乱，并且会丧失它原本的逻辑关联。

二、葛兰西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种语境性误读

葛兰西一再申言，他的目标是使人们批判性地思考从而避免变成陶醉于准宗教的“某某主义”的非批判的“某某主义者”。对宿命论教条的接纳无疑会助长大众在运思上的“缺位”，这种“缺位”使得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恐怖成为可能。葛兰西摘录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智力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①] 他认为，人们有必要在才智上保持一种悲观态度，这样才能体察到需要真正投身于这个世界；而在心灵上保持一种乐观情绪，这样我们内在的意志才能行善。对任何可能导致并强化政治上的盲目顺从的一切东西，葛兰西都义无反顾地坚决加以反对。正是在这里，葛兰西引出了他的一个看法：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的真正要旨。然而，在我看来这是葛兰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告诫，关于这一告诫却被后马克思主义者所颠倒并且脱离了它原本的语境。

这起源于葛兰西对布哈林关于不依赖于人的外部世界或外部现实的观点的批判——因为这一路线被意共领导人博迪加（Amadeo Bordiga）所采纳。这成为约束政治行动的一种理论，从政治上说，它是垂死的和非辩证的。葛兰西想要抛弃的“大包袱”就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所谓“经济事实”当作政治事实之可靠的第一因来加以膜拜的倾向。葛兰西从来不否认经济活动在决定社会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他希望解释“市民社会”在决定具体的历史结果——这种历史结果是建立在由经济提供的历史样板的基础之上的——中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宿命论。这就要开始考虑把社会理解为历史性的位置，人们正是从这种历史性的位置上得到他们自身地位的意识并寻求贯穿于社会活动的纲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向社会行动者解释现实的一种思

---

①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 (eds.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75, p. 377, p. 238, p. 5, p. 345, p. 377.

想武器，就像卢梭对1789年革命的雅各宾派成员所起到的作用那样，才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葛兰西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布哈林的经济主义之间的差异相当微妙，但也极其关键。一方面，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为一种必须加以坚持的学说，或者坦率地说是一种准宗教的信仰。这就是说，由“历史规律”所强加的秩序决定历史的结果，而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承认这些结果并与它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葛兰西则把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导向“行动”的理论渠道——在历史的变化中，没有什么力量能替代这种行动。如果所有这一切被解读为葛兰西对客观现实的否定，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把他看作要求主体权力的后现代思想的先驱。然而，我首先要力辩的是，葛兰西不仅仅希望马克思主义摆脱对经济的盲目崇拜，他实际上想要马克思主义摆脱一切盲目崇拜，因为，盲目崇拜压抑住了由实际的“具体”情势所引发的历史潜能。葛兰西试图恢复两种过度强调之间的平衡：其一是经济的科学主义；其二是反思的历史主义。就此而论，拉克劳与莫菲没能看到这种恢复的辩证必要性，他们把纯粹的政治主题扯得离了谱。他们忽视历史性赋予的观念，因为他们意欲把自己从那种旨在从历史性上对思想工作加以合理说明的概念框架中摆脱出来。

譬如，马克思已经降低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的政治崇拜的主导价值。乌托邦主义者满足于在思考生活、道德等等的诸多方式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这种做法无异于给社会主义裹上一层宗教的和先验的神秘主义外衣。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证明：社会主义是实际生活过程长期孕育的结果，实际生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内部获得解决。对于这一点，葛兰西没有提出什么补充，因为，它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必然的。然而，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表现出对实证主义的过度张扬。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中有过度的“实证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沉积”。[①] 每当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甚至全人类的常识的时候，正是它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使它显现出浓厚的学术性并显得遥不可及。按照想要的方式所进行的政治干预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者每每为历史展现出的这种确定事实而苦恼莫名，但却没有丝毫办法摆脱这种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盲目地向一边倾斜。在戒除对“经济”的依赖并提升政

①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 - 1920), ed. Q. Hoare and J. Mathews,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 34, p. 157.

治（the political）的地位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分明超出了葛兰西希望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方案。事实上，从这种意义来说，向布哈林及其信徒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出自无决定的（a determinant - free）观点。葛兰西的辩证论把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放在同等地位加以强调，他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只看到“这一面”（this - sidedness）；但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这一次要在政治领域中制造出类似的非平衡。另外，一如布哈林之情形，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也是太“这一面”了，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根除了从历史中获取引向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建立在社会所呈现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之上）的指示牌的可能性，因此，它是非辩证的。葛兰西的思想使这种向一边的倾斜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是存心而为之，它必须被看作是他的时代争夺主导权的斗争的结果，其实，这就像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黑格尔和法国的乌托邦主义者所进行的争辩一样。换言之，不应该把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强调与它的特定的语境剥离开来。当马克思主义以极大的洞察力透视经济、分析葛兰西所说的“历史集团”的国家构成因素的时候，它对社会学的或“市民的”构成因素的阐述相对来说被阻滞了、被延迟了。葛兰西只不过想恢复这些组成部分以便和他的历史集团理论形成一种对称与平衡，他并不是要把市民社会与其他生活过程孤立出来并抬高到第一因的位置上。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葛兰西反对纯粹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在决定历史时享有独占的特权。按照我对葛兰西的解读，葛兰西把政治的和文化的活动看作沟通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重要方式——这构成了“实践”（praxis）。例如，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在葛兰西论述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客观现实是人参与生活（实际上是参与日常事务）的方式；而主观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或者准确或者不准确）方式。除去“整体历史”的渐进期，葛兰西从辩证立场把这些方面看成是确定无误的东西，不过，他的人道主义的重要特征却在于他把这两方面重申为人类的创造物，因此，这两方面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可通达的。行动和意识相辅相成，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6页。

三、作为非历史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能精确地确定后现代革命何时发生或者何时“取代”现代性，这将具有很大的助益。谈论“河水”、“共同的源泉”、与“其他水源流出的支流”[①] 汇合，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历史歧义性的典型表现，当然，它是极不严密的。1968 年的巴黎事件对福柯肯定产生了激发作用，但是，诉诸于60 年代末期热烈的气氛无助于澄清模糊不清的结构与上层结构中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概念上的“后学”转换得以维持。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或许加快了这一进程，然而，它无法解释像福柯这样的关键人物的后现代性何以出现于 1970 年代，而利奥塔和波德里亚的后现代性却产生于 1980 年代（奇怪的是，这些人同为法国人）。

或许，我们应该向葛兰西那样转向“有机的”社会过程——这些社会过程与其说决定上层建筑，倒不如说是通过创造与再创造阶级斗争的领域而贯穿于上层建筑之中。这保留了政治话语中的经济环节并且为表达这一斗争留下了较大的创造性空间，因此，也把诸如后现代主义和纳粹主义这样极其不同的政治现象和文化变化的某些方面融入到霸权话语的领域。

如果说，晚近以来我们已目睹了大工业国的生产工艺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换，这话倒是确实可信的。然而，这就是可能切合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最近描绘的上层建筑碎片的所谓有机的社会过程吗？当然，如果后马克思主义真正去深思这种经济转换的话，那么，对于经济决定论，它就该做出让步而不是像它准备做的那样。因此，我们需要首先转向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它作出的修改。

拉克劳与莫菲作出了这样的阐述：“霸权的逻辑，作为偶然性和接合的逻辑，已经到了要决定霸权主体的那种身份的地步。”[②] 这消解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权威定论，因为，一度为“上层建筑”的东西却被认为是霸权建构的独特场所。这就是说，政治领域——就它包括权力和统治而言——被给予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将仅仅使我们返回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里），政治获得了一个总体地位——在此，没有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在其中以另外的方式反映出来。

---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69, p.4-5, p.85, p.85.

② 同上。

由于把市民社会置于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经济基础之中，所以葛兰西应对这种提升政治地位的活动负部分责任。市民社会为知识分子在争夺霸权的氛围中试图将某一历史集团的整个生活方式合法化或者对某一历史集团的整个生活方式提出质疑提供了竞争的舞台。葛兰西说，市民社会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人们进行社会活动、获得关于自己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等等”①。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各种自愿传播或澄清其经历的现实的各种力量的聚集地，因此，在历史集团将其市民的—经济的—法律或司法的（国家）三元组合加以合法化的霸权形成过程中，市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构成性因素。

因此，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在国家控制生产关系的地方，葛兰西插入了市民社会这个中介，以之作为一种微妙的自我控制力量。这一图式首先作为对意大利工人没能像俄国工人在 1917 年十月革命那样轻易地夺取并控制国家政权的一种解释而被葛兰西提出来。实际上，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扩展是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在理论上的一种表现，它构成了那个时代意大利与俄国之间的主要差别。对此，葛兰西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现，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堑，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当然，这些堡垒和工事的数量因国家的不同而多多少少有些差异。”②

尽管明显的强制微乎其微，但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阐发并不是拿来说明阶级统治的削弱。真实的情况则相反：阶级关系通过市民话语这一中介被感知，而这种中介的朦胧潜势使得人们对它的感知日益迟钝和麻木。如此一来，统治就不仅仅是根据被动的、消极的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念被更为有效地伪装与掩饰；问题在于，在迫使自己融入资本主义文化、寻求认同而不是抵制这种文化上，人们变得更加有能耐也更加积极了。

然而，在当代，霸权已明显进入到总体的层面，对于这种意义的霸权，葛兰西并没有探究过。如今，社会所呈现的经济形式几乎不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在社会上一般是这个样子，而在文化的顶端处甚至更为切合，像后

①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 (eds.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75, p. 377, p. 238, p. 5, p. 345, p. 377.

② 同上。

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政治学派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对于葛兰西来说无疑表征着令人沮丧的霸权统治的成熟，这种霸权状态从葛兰西知晓的竞争阶段一直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内的总体的逻辑结果。尽管没有言明，后马克思主义似乎表达了这样的结构性状况并且把它误认为是真正多元弥散的条件。

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思想运动的左派，它的失败实际上是这种文化垄断的一种征候。实质上，它从外观上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人士之间联系的根本断裂。这一阶层（工人阶级）对于外部文化因素所施加的思想控制变得更加温顺。换言之，工人阶级被“斩去了头脑”（葛兰西语），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领导，这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非有机的”（比如外部阶级）来源所提供的“常识”的灌输。以这种方式来看霸权，葛兰西将霸权的具体功能确认为履行必要的“堡垒和工事”的职能——即保卫最终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的国家。这种霸权功能在拉克劳与莫菲那里丧失殆尽，因为，他们通过所谓的“具体”避开了葛兰西所指称的“历史性的决定条件”并把它零碎地看作在个性上和实质性上是“特定的”。

在对霸权的构想中，葛兰西为他的观念图式拟订了两项决定性的关键条款，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具备的：1. 它的阶级特性和作用；2. 传递霸权的“知识分子”的经济性或团体性。对第一点提出的断言大多能根据第二点加以解释。

对葛兰西来说，市民社会外部的社会关系层面最终决定着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法人阶层之间交换“文化权力”的戏剧中扮演着剧中人的角色。在《狱中札记》的开篇处讨论知识分子的那个地方，葛兰西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下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一个指导线索：“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1] 葛兰西对他同时代的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贝奈戴托·克罗齐的一个主要批评是：知识分子决不能被当作“自在阶级”。[2] 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得最为清楚。葛兰西说，有机知识分子的活动以种种方式与社会关系的

---

① 同上。

② Antonil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 eds. &translated. D. Bootham,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464 - 467.

“整体”相一致，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些活动的体现。实际上，有机知识分子在不自觉地卷进来，把外在的和内在的定义提供给历史集团的全部社会结构。只有根据知识分子思考的社会功能，才能对知识分子进行区分；知识分子赋予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活动以外形和表述。

只要“社会阶层”的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霸权就能变成一种积极的历史力量，但是，由于受到市民中介的影响，这种联系的破坏导致“消极的”（即呆板的、无生气的）历史结果。明确承认需要“智力劳动与肌肉—神经劳动”的密切联系是葛兰西于1926年写的作为意共的纲领性方案的里昂提纲的主要论点。把“感情”与对“客观条件所偏向的和意愿的方向”[①]的认识连结起来是十分重要的。把这一点与拉克劳与莫菲宣称的“非固定性变成了社会一致性的条件”[②]作一比较，就它表达了葛兰西想要避免的状况而论，这不过揭示了与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像拉克劳与莫菲）的作用的观点之间的关系。

对工人所经历的、但并不能完全表达或理解的客观现实的提示在此被操弄成一种辩证的无限性。这就是说，思考和行动被进一步分裂成一种矛盾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机体达到了一种“瘫痪”的历史状况。[③]规范地说，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想要的状况吗？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颠倒“异化”的理论空间。即使像当代英国这样处于想像的多头政治冲突的社会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断裂式的阶级冲突相比显得很平静，也并不表明辩证性争论的任何解决。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这种状况都将延续下去，并且隐含着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就像葛兰西所说：“危机恰恰在于这样一种状况：旧的东西将要死掉，而新的东西还没产生，在这个‘交替期’里，各种各样病态的症候都显现出来。”[④]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这里的“病态”一词在今天可理解为这样的一种病理状态：在微观的层面上，存在着普遍传播的精神疾病，酒精和物质的滥用，等等；扩展到宏观的层面，则表现为在个人与对这些个人的生活施加命令的客观力量的控制之间存在

①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 - 1920), ed. Q. Hoare and J. Mathews,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368.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69, p. 4 - 5, p. 85, p. 85.

③ A.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Polity, 1999, p. 211.

④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 (eds.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75, p. 377, p. 238, p. 5, p. 345, p. 377.

着日益增大的鸿沟。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不经意间描述了葛兰西所说的在历史上被异化的“交替期”，而且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利用了这种“交替期”。对这种不受经济影响的政治的描绘在此起到了存心掩饰冲突根源的效果。这样看来，拉克劳和莫菲把冲突视为是非本体论的，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工人以这种方式被灌输也就是要工人不再把现实理论化为（或理解为）与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常识”所表现的形式相对立的外在目标。相反，如此被统治就是现实。霸权不是被接收为与工人的感情和本能相矛盾的统治形式；相反，它被宿命论式地当作“充满生机的东西”，以至于它竟一再超越了人的控制。没有办法看到超越统治的期限，因此，它变成了政治。一如葛兰西所说，它是“捉迷藏的游戏”。在《现代君主》中，葛兰西继续写道：“文化的作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语言变成了晦涩难懂的行话，换言之，政治问题被伪装成文化问题，照此，它变得不可解决。”[1] 没错，杰拉斯曾对拉克劳与莫菲使用“晦涩难懂的行话”提出了异议，他说，这表明了他们的理论“缺陷”。[2] 这第二点显然是真实的，因为抛弃了残存的经济主义（或者任何先验“本质主义”的东西）也就消除了理解他们的理论所描述的上层建筑总体的可能性。后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了十足的后现代方法论——这一方法的要义在于把与自身的历史关联统统剥离掉，由此，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把结果误认为是原因。

按葛兰西的理解，在一个冲突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不是霸权的作用，在具体状况下并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东西），霸权总是提供一个同质性的轴心。无论它采取何种方式把政治问题（葛兰西意指那些起源于政党或“作为阶级的别名”的东西）变成文化问题，正是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共享的一致性满足了统治事业的需要。

从总体上看，葛兰西对霸权的构想与拉克劳与莫菲完全不同。霸权本身并不是最后的原因；它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一种完全外在于自身的工具价值。因此，如果认为并不存在认同的根据，即是说，并不存在所谓外在于文化自身中的权力关系表达的客观的实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正在严重背离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知识分子和霸权概念的认识论基础。这并不是说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这只能留给读者去作判断），但是，它至少表

---

① 同上。

② Stuart Sim: Introduction, Post - 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7.

明了对葛兰西思想的语境性误用。

让我简短地回到上文已有涉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情景中。对葛兰西来说，霸权问题总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如果霸权关系仅仅是自我建构的，那么我想必会问：我们何时能达到历史中的这个关键点？以葛兰西的用语来说，对它起作用的“有机”因素又是什么？对于这种文化转向，如果存在可识别的结构性特征——葛兰西把它解释为有效地建构起来的处于发展层面的社会关系，那么拉克劳与莫菲不经意间也就一般地重申了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模式。

无可否认，朝着后福特制工业实践的转换导致了社会的变化以及政治过程的重新分裂。后福特制被刻画为朝小型企业、弹性工作法和“机会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等的转变。资本主义一度具有的庞大的工场管制部门以及给聚集起来反对雇主的工人提供发展其共同的反抗意识的机会的因素大致上都被破坏掉了。因此，毫不奇怪，拉克劳与莫菲对于在霸权身份形成中的阶级意识的重视即便不能被完全否定，也可以说是大大地减弱了。表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它的政治观念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基本的经济趋势，但是，反映的这种精确度实际上削弱了后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期望，随着工人实际上的分散化，阶级身份也是分散的。这也解释了工人反抗的衰微，既然工人的反抗倾向于采取多种多样的、似乎是非经济的形式，所以它也就更难以接合起来了。不过，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在经济之外不再存在工人，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中。[①] 这一点容易被忽略。达利就把这种情况理解为“生态主义、女权主义或同性恋解放运动构成了反对现存权力结构的最激的霸权斗争形式”。[②] 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无论如何，葛兰西可能认为重要的是把这些不同的身份合并到工人的斗争中来，而不是像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他们的差别当作身份形成中经济的决定作用的最后一丝痕迹消失的证据来加以颂扬。

戴利小组（Daly's group）的普通成员的阶级立场难以精确地确定，所以认为这些活动是消费性运动也是可行的。这就是说，他们对权利的要求

① A. Little: Post - Industrial Socialism: Towards a New Politcs of Welfare, Verso, 1998, p. 15.

② G. Daly: Marxism and postmodernity, in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ed. A. Gamble etc. Macmillan, 1999, p. 71.

依据消费力量（“绿色英镑”、“粉红色英镑”、妇女平等参与和消费的权利，等等，市场不容忽视这些力量）的经济杠杆原则而得到实施。詹姆逊把后现代性一般地刻画为一种消费主义现象——这些现象通过“类似于金钱”的作用而模糊社会身份。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中，向消费身份问题的转换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在其中，被夹在中间的“中间阶层”的诱惑力是：从理论上和道德上，它变成了与生产现实相分离的明显的消费平等主义。把“中产阶级”的经济身份与消费主义连结起来可以从经济身份大多免除了后福特制革命的影响这一点上得到证实——这种后福特制以另外的方式有效地分化了工人，使之碎裂分散并压制它的声音。因此，工人阶级被融入到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之中，随后，工人阶级的抗议的范围也被划定到中产阶级认为重要的事情上。

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存在着一个有深远意义的霸权副产品。葛兰西肯定是将下层吸收到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中的这一视角来看待这一进程的。人们可能这样来评估葛兰西笔下霸权的价值：与其说这种霸权是威胁资本主义文化，倒不如说它的作用是从它的内部——主要是从自由民主政治文化（有时人们错误地把葛兰西与这种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孤立范围的内部——来寻求改进和修饰。在这种意义上，拉克劳所声称的“对抗是对所有客观性的限制”[1] 也就颇具讽刺意味地变成了资本家普遍赞同的政治。换言之，霸权决不能被构想为反经济统制，因为它的分散及缺乏历史指导使之丧失了预示新国家特征的手段 。拉克劳与莫菲拒绝了任何还原论，但这种还原论的缺失却使他们不可能说清楚挑战源于何处以及它们是机会主义的还是较长期的和具体的。

这种霸权概念直接来源于对葛兰西的历史主义的抛弃。按葛兰西的观点，哲学（像后马克思主义）仅当它表达了具体的有机过程时，它才是有用的。即是说，只有当它向我们描述了对客观条件的一种足够详尽的历史性理解以至于这种理解可以对客观条件发生实际的影响和激进的改变时，它才是有用的。葛兰西写道：“一个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换言之，哲学和物质条件在历史集团内部是作为其形式和内容而构建起来的，当然这种区分只具有训导价值，因为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是不可设想的；而如果没有物质力量，

[1]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 17.

意识形态就只会是个人的幻想。”①

四、结论

以上所述表明，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在对历史及其观念的处理上，尽管多半为自己所承认，然而还是很拙劣。为了造成思想汪达尔主义的效果（这种汪达尔主义对于制造文化上的某些新玩艺儿是必要的，但是，它本身在理论上是枯竭的），他们对葛兰西的理解大打折扣，就此而论，这种理解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有效。即便认为我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工业发展趋势中的后福特制转变的上层建筑宣言这一看法本身是不正确的，我们也将有理由拒不承认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效性。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运用不可能建立在属于“后某某”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因为，如此的历史假定赖以为基础的谓项已不再存在。例如，葛兰西的工厂委员会计划建立在实际的福特制条件之下——在那时，这种福特制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工人。那么，从历史上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所谓“在后”、“居于其内而又超乎其外”的状态，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拉克劳与莫菲对身份的霸权建构中残留的经济决定论的拒斥是非历史主义的。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寻求与后福特制社会中工人实际的分散化的联系，它本来可以更有价值（至少对葛兰西来说是这样的）；它也就可以成为实际生活过程所需要的理论概括和解释。遗憾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阐明这样的联系，出于这一理由，我觉得我们将达到最后的似非而是的结论：后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发生于政治中的与经济决定论的决裂最终可以得到一种决定论的解释。因此，针对后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哲学疑问，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也就是历史学的问题。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需要做的工作是详细地解释一般的后现代革命（他们将自己与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它产生于何时，它为何产生，它如何产生，如此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超越从文化上破除偶像崇拜的视角来探讨一般的后现代性层面，并且，能赋予这种后现代运动以某种明确的历史地位和目的。可以说，就霸权概念的意义而论，葛兰西的整个体系对我来说意味着：他预先已看到了这种文化转向的可能性，但是，他恐怕不可能认为这种文化转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表达竟成为

① Antonil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 (eds. &translat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175, p. 377, p. 238, p. 5, p. 345, p. 377.

晚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总体的主导特征。

作者：Nigel M. Greaves，University College Northampon

文章原标题：Why Gramsci Rolls in his Grave：an attempt at a rescue from Laclau and Mouffe

文章出处：This paper delivered to PS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Lincoln，April，2004

（编译者：周凡，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

［美］丹尼尔·T. 麦吉 著　　吕增奎 译

一、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

对一种人民不再相信或从未相信过的理论或政治学表示认同，这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关于“新国际”的主张与其说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长期努力，不如说是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后冷战政治的矛盾之上的新后冷战政治模式。① 通过对马克思遗产的仪式性继承，《马克思的幽灵》显示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基本上不在于关于施魅或受马克思鬼魂“启发”的修辞，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德里达对这种幽灵性的遗产的声称似乎必须拒斥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历史（苏联、共产国际和一切源自它们的东西——也就是说非常多的事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概念工具。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精神”似乎是指一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历史化身“死亡”，马克思主义所剩下的一切。尽管德里达与马克思之间的文本亲近关系存在明显的单一性，但我将论证，《马克思的幽灵》是一种更一般的20世纪理论和政治模式的顶点的标志，这种模式最近与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有关。在解构的幽灵迂回返回中，《马克思的幽灵》对马克思的哀悼可以理解为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② 中的解构政治学的最早版本的典型例证。德里达呼吁世界上没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这种呼吁使那种潜藏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幽灵逻辑

①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trans. Winston Moore and Paul Cammack (New York: Verso, 1985), 以下皆作 HSS。

变得十分清楚：他们对“激进民主”的呼吁最终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政治，既不是一套真理主张，也不是一种具体的规范性“策略”，而是一种认同或“启发”的表述行为，一种成为某种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之物的企图。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开始就表明，像归属于德里达的“新国际”一样，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与一种人们不再相信的传统之间具有某种悖论性的关系。在导言中，拉克劳和莫菲告诉我们，他们的著作是一种扩大“霸权”分析的努力，因而回应和超越了在左派政治思想中的“当前的危机”，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认为历史和社会是各种可以理解的总体性，而这些总体性则是围绕着概念上可解释的规律而构建起来的”（HSS，3）。根据“概念上可解释的规律”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被误导的、“客观主义”的企图。由于反对这种企图，《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求助于“偶然性”的历史运作，这种“偶然性”表明，根本不存在历史据以能够被解释的任何规律，不存在阿尔都塞主义的决定论：经济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必然性最终决定社会。因而，历史可能是根本无法预测的，并且不同于话语知识或科学知识，而社会则可能是各种临时性的主体立场之间的偶然性斗争永无休止的倍增；在作为集体身份之本质和永久形式的经济阶级的失败之后，这些偶然性斗争不断地形成和重生、出现和消失。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历史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对该主张的理论超越似乎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拒绝。例如，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曾论证说，拉克劳和莫菲对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类和解释范畴的抛弃，包括对“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具有解释的优先性”和“谈及某个阶级的客观利益是合法的”这种观念的抛弃，“将很容易得到普通的、旧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赞同”。[①] 在某些情况下，《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言似乎支持了杰拉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术语的解释。从修辞上来看，这个术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词的同义词：“我们应当十分明确地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地带之中，我们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精心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再可能坚持它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洞见，当然也不可能坚持共产主义是一个透明的社会——对抗性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消失了——的观念。”（*HS*，p.4）然而，正是在这个非常的环节上，拉克劳和莫菲尽力坚持，他

① Geras，“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No.163，1987，p.44.

们对霸权性的主体建构过程的分析不仅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在本书中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HSS，4）

古怪地玩弄斜体字表明，在明显的同义反复中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区别。对它的合理解释是：后马克思主义是对拉克劳和莫菲说他们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的简单表达方式。他们认为：“在霸权概念的背后存在着某种隐匿之物，这种隐匿之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之间并不只是一种政治‘补充’关系。事实上，它建立了一种无法与那些范畴相容的‘社会逻辑’。”（HSS，3）这个声明暗示，拉克劳和莫菲不再坚守自己不再相信的一种传统，而是简单地从他们不再相信的马克思主义部分——例如本质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的经济决定论——中筛选出相信的部分——“霸权概念”。他们进一步争辩说，霸权斗争的思想始终无法与所有形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相调和，因此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对霸权的逻辑含义的阐明。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特征可能在于他们比马克思主义者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一次关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访谈中，拉克劳谈到：“我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某种极其不同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破碎化了，而且我认为我正在坚持它最好的碎片。”[①] 这样一些宣称表明，在一种传统之中及其之外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其明显的悖论和特殊重要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的混淆：后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范畴（它最好的碎片），而抛弃了其他在逻辑上无法相容的范畴。抛弃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奉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偶然性、对抗性斗争）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拉克劳和莫菲对霸权感兴趣的真正根源：他们致力于这样一种声称：霸权不只是一个概念。由于说自己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并没有简单地说他们

---

①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p. 201。以下皆缩写成 NR。在一次《战略》(*Strategies*) 的单独访谈中，拉克劳把霸权概念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对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求助。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由生产力的必然发展决定的“一种客观进程”，而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则是这种基本历史模式的补充。拉克劳的结论是，后马克思主义支持这个补充性的范畴对最初主要范畴的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积极的和可以挽救的东西是在它离开自己最初的客观主义的进程中所详细阐述的一组范畴，首先是霸权范畴。至于客观主义，必须被送回到它所属于的地方中：古代博物馆。”（NR, p. 181）

已经穷尽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含义，使在逻辑上始终暗含在它之中的东西显现出来；而是说，正如他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根据“在概念可以说明的规律”来理解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兴趣在于超越马克思主义对同类概念的信奉。事实上，他们声称这样做是“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姿态：“因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真正分界线是肯定或否定现实对于概念最终的不可约性（irreducibility）。”[①]于是，根据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为了“肯定”历史不能被“化约”（reduced）为概念知识，后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放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野心。

准确地说，超越话语理性需要彻底地拒绝抽象以及此类概念的普遍化力量。由于反对马克思主义通过概念的形式化来理解历史的企图，因此，拉克劳不仅断言“必须抛弃关于独立的和可定义的‘经济’实例的神话”，而且为取代这个神话的东西提供了矛盾的描述：“因而任何‘资本主义’都不存在，只存在形式相当不同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是极其多样的结构联合体的组成部分。”（NR，26）[②]但是，如果任何“资本主义”都不存在，那么拉克劳的替代物——“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可能是指什么呢？当然，问题在于承认这些不同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这就先假定了我们关于抽象对象——“资本主义”——的知识。[③]以“不同

① Laclau and Mouffe, “Post -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no. 166 (1987): 88。“Post -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以下皆作 WA。

② 用德里达的话说，“不再存在从未存在过的资本，也不存在单数的资本主义，只存在复数的资本主义”。

③ 当讨论现实的历史发展时，拉克劳和莫菲渐渐地使用那些他们宣布在理论上已破产的术语：“成熟资本主义中的政治斗争状况正日益远离19世纪的模式”（HSS，133）；“社会民主变革的可能性取决于新变革主体的倍增。这只是可能的，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有某种东西真的想增加脱位（dislocation），因而想创造多元性的新对抗”（NR，41）。后一种声明之所以引入注目，不仅仅是它求助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而且是因为它明显地回到了前—后马克思主义的（pre - post - Marxist）经济决定论。在其他的时候，拉克劳不仅宣称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决定霸权的环节，而且声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发展过程似乎夺走了我们新发现的霸权主体的力量。“历史和政治经验的‘普遍化’是不可逆转的……真正的种族中心主义并不在于断言价值观、技术和环境的科学控制等等的普遍

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取代“资本主义”，表明避免形式主义的抽象在认识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这种替代存在逻辑上的困境，但拉克劳和莫菲最终致力于那种回避概念之物的企图：“肯定一种只有取消自己的根本特征才能存在的‘基础’；肯定一种只有作为一种局部、有限的混乱才会存在的‘秩序’；肯定一种只有作为意义性面前的多余和悖论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换句话说，政治领域不是那种‘零和’博弈的空间，因为规则和玩家从来都不是完全清楚的。这种避开了概念的博弈至少有一个名称：霸权。”（*HS*，193）好像是要明确地纠正第一章题目“霸权：概念系谱学”的误导含义，拉克劳和莫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代替物；这些替代物试图宣布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霸权是某种不同于话语概念的东西：它是一种“肯定”行为，一种“悖论”，一种“游戏”（不是一种没有概念规则顺序的游戏），或者最终是一个“避开了概念”的“名称”。对拉克劳和莫菲来说，霸权再现了后尼采主义思想的主要述行性（Performative）矛盾的某种熟悉形式，后者是哈贝马斯所确认的。在后尼采主义中，“理性的他者（不管怎么称呼它都可以）……这个与话语思维不同的因素是一个没有任何进一步证明的名称，出现在哲学和科学历史的画像中”。[①]那是后马克思

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而在于坚持认为，由于一种本质的纽带，这一过程与‘西方的种族’联系在一起。”（NR，188）显然，正是在下一页上，拉克劳把后现代的“政治意识”定为这样一种知识：世界没有被“任何一种历史的宿命限制在自己的可能性中”。“只在神已经死亡的意义上”，这种知识才允许我们“把自身当作是世界的建造者”。“在我们的外部，不再存在一个逻各斯。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模糊的世界的裂缝中破解它的实质。”（NR，189）但是，技术和科学控制普遍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听起来像“资本主义”这个词，难道这个“不可逆转过程”不会构成一种“历史的宿命”或“我们之外的”决定力量吗？资本主义要么是不可逆转的，要么是可逆转的，而且拉克劳需要澄清的是他在呼喊一种未来之前所持有的立场。“在那种未来中，人类把自己看作是自身世界的建造者和改变主体，因而意识到不管是在现在还是未来，自己没有被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束缚在任何制度或生活方式上。”（NR，216）

①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Studies in Co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7), 307.

主义为什么最终不是以其他不兼容的概念为代价来保留某个马克思主义概念——霸权——问题的原因；尽管摇摆不定，但拉克劳和莫菲都把霸权当作是一个反概念（anticoncept）。[①]

但是，如果杰拉斯关于拉克劳和莫菲拒绝每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通过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莫菲想要说什么？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论中，拉克劳和莫菲明确地描绘了自己的主题。答案在这种背景下变得非常清楚了。由于已经宣布“普世话语时代的终结”，拉克劳和莫菲不得不承认：“与那些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政治结论相似的政治结论本该从不同的话语构造来被估计，例如从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或者从不同于社会主义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话语，这些结论没有一个渴望‘成为’社会真理”；总之，马克思主义只是“对这种新政治观的阐述藉以成为可能的传统之一。对我们来说，这个出发点的有效性基础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

① 因此，一旦他们把他们的计划说成是一种对“霸权概念的变革”的分析，他们就补充了那种“被认为是一种话语表层和基础性节点”的条件（HSS，3）。把霸权说成是一种“话语表面”（discursive surface），这使霸权脱离了所指（the signified）的“概念性”领域，目的是使它等同于符号的物质内容。在詹姆逊根据“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能够看见一种有用的对比。必须指出的是，詹姆逊坚持抽象知识（他宣称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传播这种知识）与再现问题之间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仅仅提供了一种抽象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认识并概念化世界；例如，关于那种全球性的世界体系，曼德尔的巨著提供了一种丰富和深奥的‘知识’。当然，曼德尔所说的这个全球性世界体系绝非不可知的事物，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可再现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N. 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53）对知识的信奉在根本上把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的“非阶级的政治实践”（关于它，詹姆逊写道：“如何才能希望阶级消失，如何在社会主义独特的特殊情景中拯救阶级，这对我来说从未清楚过。”区分开来，因为就像在《后现代主义》最后几页所宣称的：“‘认知图绘’实际上只是‘阶级意识’的代码。”（*Postmodernism*；417－418）

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过去。”（HSS，3）① 乍一看，拉克劳和莫菲的主张似乎是彻底要依据他们学习到的理论方法来为他们的理论方法辩护。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提出一种远为新颖和有趣形式的基因错误。拉克劳和莫菲并不是简单地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视角”，所以就是一种从中可以提出激进民主的“有效”视角；而是声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有效的，因为它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过去”——总之，不是因为它现在是他们的视角，而是因为它过去常常是他们的视角。

他们的辩解既不依赖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的客观性的诉求，也不依赖于这样一个断言：在他们的理论框架内，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被置入性（situatedness）促使他们相信，如同相信“非粗糙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组有趣的信念——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拉克劳和莫菲超越了那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而声称他们之所以相信他们方法的“有效性”，是因为他们过去常常相信它，因此，他们指出，他们恰恰知道他们的主张——不仅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像德里达对马克思的“精神”的召唤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后马克思主义指这样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上，他们的分析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使这种分析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所有推论性前提。事实上，拉克劳和莫菲提出了一个三流的理论替代。在这种理论替代中，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一种具有阶级利益关系的信念体系，而是一种被用来构建一个主体的方法。换句话说，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组信念，而只是一种身份形式。

---

① 不清楚的是，如何才能使拉克劳和莫菲对“普遍性话语时代的终结”的欢迎与他们对下面这一点的无数阐述相一致：“作为社会存在的普遍条件的霸权”或者作为主体性的普遍条件的霸权。有时，拉克劳后来的著作记录了这种潜在地令人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奇怪的退却，就像下面这样：“在普遍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特殊主义……之间提出一种排他性选择的倾向，对我来说似乎始终是荒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论忽略了关于‘普遍性话语时代’的终结的思想的荒谬性）。今天，正是因为我的身份是在一种被民主革命打开的地平线内构成的，而且是后者构成了它的不确定性和本质的匮乏，所以，‘一种新的普遍性’——没有社会组织的形式，既不是西方的普遍性，也不是任何其他的普遍性——能够呈现出一种模式的范式价值。”（NR，170）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只是“阐述这种新政治观藉以成为可能的传统之一”这个相关的问题，拉克劳似乎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本书构成其部分内容的后马克思主义视角因而不只是一种纯理论的选择：对于任何目标是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盛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制定左派的政治纲领的人来说，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NR，xii）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直被广泛地当作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重新想像为与当代身份政治学相容的理论框架的努力。就此而言，这种主张听起来可能并不令人吃惊。拉克劳和莫菲确信："创建那些将不得不对抗地面对彼此的同一性，现在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但他们没有能力决不把任何历史事件都看作是同一性政治的一种例证。在这种无能中，他们的上述信念是最明显的。"19 世纪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斗争"因而"被下述事实所说明：这些斗争表达了对手工业工人身份丧失的反抗"（HSS，156），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时的意大利和德国工人自治运动"被归因于"那些质疑传统工人身份形式的变革"，"尽管它们也是在捍卫一种受到威胁的工人阶级身份"（HSS，158）。既然我们充其量并不知道任何人为什么想以与文化身份或性别身份相同的方式来捍卫或肯定一种工人阶级身份——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欲望可能需要一种对经济剥夺的身份至上主义（identitarian）的信奉，因此，这样一些解释的尴尬性至少表明了在试图把阶级政治当作是身份政治的一种特例时而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但是，让人们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作为理论的拉克劳和莫菲的身份至上主义阶级理论，还不如说这样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拉克劳和莫菲的身份至上主义理论本身是捍卫"一种受到威胁的身份"的企图。后马克思主义不

---

① 在这里，我从约翰·吉约里（John Guillory）对下述问题的解释中获益匪浅：一种文化主义政治学尽管担忧地提到阶级现象，但为什么实际上从未设计出一种会从某个"阶级"身份中产生的政治学？因为虽然构思一种自我肯定的种族或性别身份十分容易，但是假设一种肯定性的下层阶级身份却几乎行不通，就像这样一种身份本质上将不得不奠基于经济剥夺的经验之中。由于承认工人阶级文化有一种值得赞美的乃至崇高的内容，所以，对下层阶级身份的"肯定"（affirmation）几乎不符合"一种废除需要"的计划（*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3）。在《后现代主义》最后一章中，詹姆逊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观点："那样的阶级从未能成为一种'质询方式'，而只能是种族、性别、族群文化等等才能成为'质询方式'，因为与这些虚构的认同不同，"阶级范畴是更物质性的"，而且"作为你在一些虚词的方面作出和认同的选择，阶级过于宽泛难以担当乌托邦的角色。除了偶尔迷失的法西斯主义之外，社会阶级范畴所提供的惟一的乌托邦满足是前者的废除"。就阶级是被辩证地构成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对工人阶级身份的肯定，而是寻求阶级结构的彻底终结。因此，吉约里的观点并不与下述事实相冲突：许多人已经要求这样地认同自身，因为这样一些要求（当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一致的时候）必须被解读为是对为经济变革实践献身的比喻性表达，而这种实践将使这样一些认同过程过时。

仅仅是一种关于身份政治的理论，而且是身份政治的一种例证；与其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是通过“新社会运动”（HSS，159）来解释主体立场的构成，不如说是按照那些集体身份的模式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由于有意或无意地抛弃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乃至一种历史解释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菲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或者——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过去”加以保存。

他们的兴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和谁应该正确地继承这个遗产这个问题。这种兴趣设定了拉克劳和莫菲与杰拉斯进行争论的条件。为了回应杰拉斯，拉克劳和莫菲总结说：决没有“把整个传统还原为少数教条性的绝对”（就像杰拉斯会认为的那样），他们的批评试图给予“马克思主义以它的理论尊严，这种尊严只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和历史性的承认”：“只有通过这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才会在我们的传统和政治文化中保留到现在”（WA，106）。把理论的局限说成是“理论的尊严”的标志，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做法。但最后一句对“传统”和“文化”的回归解释了这种看似奇怪的做法，它表明某种更类似于文化尊严的东西是休戚相关的。拉克劳想看到马克思主义仍是“活着的”。在这种欲望背后潜藏着一个类似的担忧：“后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获得了一种惟一能使它活着的东西：它与现在和自己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NR，236）

就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保证了它的理论尊严一样，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它的过去性（pastness），“才能使它活着”。这一点指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作是一种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不朽性的技术：“正是以这种方式——通过使过去成为一种透明和偶然的实在而不是成为一种绝对性的起源，一种传统才得以形成。”（WA，80）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环节恰恰不在于它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传统而使马克思主义活着。换句话说，它不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文化的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定义为拉克劳和莫菲自己的文化的过去。事实上，标出过去与他们自己的过去之间的这种区别，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这是拉克劳和莫菲把他们的计划说成是一种“系谱学”所完成的事情。拉克劳和莫菲告诉我们，这种“系谱学”源于“并不存在‘自在的’历史这种认识（WA，99）。拉克劳和莫菲对历史事实或历史“客观性”思想的赶时髦的蔑视，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客体认识论途径，而且可以被理解为那种更基本的本体论声称：“客体无论如何是存在的”。他们的这种蔑视促使他们得出总结说：“历史始终是现

在的历史”（WA，99），因为“现在组织起了过去”（WA，100）。于是，被贬低为“纯粹编年史”的历史研究必须被“历史重构”所取代（WA，99）。因此，“传统”命名了过程，而正是通过后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从字面上变成了“我们的”，变成了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使它“进入”到现在之中。

我们很难使任何现实的历史主张符合拉克劳和莫菲的理论观点。这种困难出现在下面这句话的不足之中，他们把这句话当作是历史如何始终是“现在的”历史的例证：“例如，如果今天我有‘收入分配’这个范畴，那么即使古代或中世纪没有这个范畴，我也能考察当时的收入分配。正是通过从现在的视角来怀疑过去，历史才被建构起来。”（WA，99）因此，如果我们用那些其成员得不到的范畴来研究某个社会，那么我们就建构了历史，而不是发现关于历史的事实：因为古代人不知道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并不“客观地”存在于古代。按照这种逻辑，如果研究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将无法把北美大陆同时存在着非欧人或中世纪的太阳对地球施加了引力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讲述，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范畴。自然，反面也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是在研究当时的北美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欧洲人的同时存在作出事实性的主张。这证明了那种反客观主义的历史主义立即导致的逻辑困境。无论如何，拉克劳和莫菲确信至少有一些人生活在“古代”。他们这种明显的信念表明，尽管他们有理论的担忧，但他们自身同意某些最低限度的关于历史“真实性”的真理主张。而且除了这些最低限度的主张之外，他们关于古代人没有收入范畴这个最初的命题，当然是另一个关于历史事实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那一点，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不能知道过去的其他事实呢？

然而，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特殊历史主张与自己的一般理论立场之间的冲突。这决没有减少后者的影响或重要性。拉克劳在理论上声称，“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再“受制于古典的‘真理’概念”，而且“知识的维度不可能被当作‘认识’（recognition）而能被当作建构”（*NR*，196）。在这种理论声称的语境中，后马克思主义必然变成一种制造自己的文化客体的企图，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知识对象。换句话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所关注的主要是一种建构过去和现在的特殊统一性——拉克劳和莫菲称之为“传统”——的计划。正如拉克劳简洁地概括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行为与它的系谱学没有不同之处。”（NR，236）

如果马克思主义最初要求成为科学知识，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标志着

它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完全转变，因为科学的学科仍然存在，正是通过毁掉它们自己的过去，才可以颠倒拉克劳的比喻。正如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所认为的，在“科学的计划中，创立行为与它未来的变革处在同等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各种科学可以使它们的“创立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的修正和批评。[①] 例如，就像在量子理论取代牛顿力学的过程中那样，一种科学领域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性应该被受到限制的草率归纳”。但是，福柯所定义的一门科学——不管是一门所谓的严格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之所以不尊重自己的过去，是因为它的兴趣在于自己真理主张的功能有效性而不是自己的学科谱系；尽管如此，但后马克思主义最终只尊重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此外，当过去的东西甚至那种过去性悖论性地仍然是一种对现在的建构时，它才是对那种过去的尊重。拉克劳解释说：“在这个术语最严格的意义上，这种谱系是对‘传统’的建构”。“困扰着我们的那种危险现在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经被瓦解，而且没有人信仰它——的本质主义话语的连续性”，因为“对一种传统的真正忠诚在于在过去中认识到它的短暂性和历史性，在于认识到它与现在之间的不同”（NR，193）。

那种认识不仅把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区分开来，而且把它与被福柯定义为“话语实践”的东西区分开来，例如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创立行为”“不同于它将来的变革”，因为它本身没有被虚假化：“在这些开拓者的工作中，并不存在任何‘虚假的’主张。”福柯继续说：“由于与这种区别保持一致，我们就能明白这些话语的创立者必须‘回到起源’为什么是必然的了。”但是，福柯对于科学与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拉克劳和莫菲为什么要回到他们的起源。科学的学科抛弃了它们的起源，而话语实践则回到了它们的真理之源，通过重读它们的创始文本和一直纠正它们而不断前进；然而，就像混合福柯的分析术语是一种有意的企图那样，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与这样一种起源保持联系：这种起源被它宣布为是错误的，并且没有人相信。为了“蔑视参加这样一种内部的批评”，杰拉斯继续尊重“那些不再被相信的末世论希望”。尽管拉克劳嘲弄了诸如杰拉斯这样的纯粹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性尊重”，但他立即重新肯定说：“如果有人想保存一种传统，那么这样一种参与就是

---

①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 - 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3.

决定性的。”（NR，237）只有用一种矛盾修饰法的、世俗的尊敬来取代“宗教性的尊重”，他对“一种传统的真正忠诚”才能避免“宗教性的尊重”，就像即使有文化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都想“保存一种传统”，但他们可能不尊重或者完全怀疑宗教的教义一样。

于是，后马克思主义允许人们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同人们能够主张任何由自己的认同所决定的主观立场，而他们的认同则是对某个其原理不再被人们“相信或信仰”的团体的认同。像更普通的文化身份形式一样，后马克思主义用一种与作为某人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纯感情关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容。更准确地说，拉克劳和莫菲既不信奉关于我们与过去之间关系的科学模式，也不信奉关于这种关系的话语—解释学模式，而是信奉一种与过去的纯感情—身份至上主义的联系。拉克劳明确地承认了那种感情，它暗含在想保存一种传统的欲望中，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一种传统不再是一种创造性与新问题的铭写（inscription）借以产生的文化地形”，就会产生的可能性——的替代物的说法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2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会记得马克思主义”：“集体记忆的丧失不是一件值得狂喜的事情。它始终是一种贫困和创伤性的事实。人们只有‘从’一种传统出发才会思考。当然，与传统的关系不应该是服从和重复的关系，而应该是变革和批判的关系。”（NR，179）超越马克思主义被体验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丧失”。这完全揭露了那种暗含在后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身份至上主义逻辑。20世纪的物理学家把超越牛顿体验为一种创伤性的事实了吗？或许是爱因斯坦本人怀念早期世界观的几何学简单性，但是无论他会经历什么样的创伤，我们都可以放心，关于世界是撞球（billiard ball）的“集体记忆”的丧失是一种“贫困”，这不是因为一种感觉，原因很明显，因为广义相对论已经被接受，它是一种比经典物理学模型更精确的对物理现象的描述。因为对任何理论的拒绝必须与对一种不同理论——后者之所以赢得接受，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比其他理论更好——的信奉相一致，所以，这样一种转变被体验为收获，而不是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能被迫发现今天任何人都在哀悼以太理论过时的原因。

但是，在对保存一种不再被相信的传统的追求中，后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正好被这样一种荒谬的感情关系伤害了。由于被拉克劳对损失和贫困的谈论变得更加明显，那种感情已经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集体记忆”的描绘中。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不再提供对历史和社会的充分理解的理论，那么就会很难明白如果“在20年里”没有人记得它，为什么

会是一件坏事。但是，那种情景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同样记得以太理论，大概马克思主义在20年里仍然会被记得。因此，拉克劳一定会说，没有人会记得作为自己的过去——不仅是作为一部分历史知识而且是作为一种决定他是谁的记忆——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称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实质在于唤起一种失去文化身份的痛苦；重要的恰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的丧失（请恕杰拉斯无礼，根据拉克劳和莫菲的看法，每个人似乎都同意那已经发生了），而是——被德里达恰当地称为“马克思主义记忆”的东西所定义的——集体身份的丧失，一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健忘制度”的遗忘性症状。因为那种原因，拉克劳认为超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进步或自己信念的变化，而是一种记忆的丧失，这种丧失“否定了”一种先天的身份：“因此，一种转变的行为意味着抑制以前的信念”（NR，17，31）。由于拒绝了关于理性决定或同意的启蒙理念——被哈贝马斯定义为“更好的远见的非强迫性力量”，拉克劳只能把改变某人的信念或实践的行为想像为通过对以前身份的暴力压制来创造一种新身份：

> 我认为，同意与强制之间的对立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排他性的对立……事实上，一种排除任何强制的同意可能是什么呢？一种身份被如此完美地获得和缝合，以至于它在“认同（identification）”一词的弗洛伊德主义意义上没有为任何“认同”留下空间。但是，这恰恰是那种我们对客观主义的社会关系观念的全部批判所排除的可能性。正如你们所言，仅仅是选择可能的行动路线并排除其的他行动路线，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暴力形式。……与事物相互作用的行为、构成我的身份的行为和强制的行为都是同一个过程。（NR，171）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存在时由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感情关系所定义的身份。这种思想似乎很奇怪，而且事实上的确很奇怪。但是，它基本上只是文化身份逻辑的奇异性的事例而已。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一种不再被信仰的传统的怀旧，在结构上再生产出某人的感情立场，他认同并表示“忠实于”一种文化，而不拥有它的任何信念，例如那些希望与“他们的”文化遗产“重新连接”的“被同化的”个人。关于这种逻辑，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的理论自传《虚构的犹太人》（*The Imaginary Jew*）进行了严格和令人信服的描述：“这个‘我们’

没有任何真实的起源。它不仅代表全部法国犹太人，而且代表大多数迷路的和孤独的灵魂。就像我一样，这些灵魂怀有那种重新同化到自己的源头文化之中的无力梦想。这个‘我们’包含那些自认为犹太人的个人，包含那些由于厌倦纯粹的情感作用而愿意打破那些自我产生的痛苦——他们的犹太特征曾经被封闭在这种痛苦之中——的束缚的个人，包含那些就像其他人一样努力确信自己与正常人有些不同的人。”[①] 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那种首先反对与一种文化进行连接但却与它进行重新连接的计划，即那种认为文化始终已经是自己的文化的观念，取决于某个人的想像：那种文化为其他的主体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身份，但那些其他的主体先于共同的信念或实践而存在，并且在共同的信念或实践不存在时已经潜在地存在了。“成为一个犹太人是一条奇怪的道路：一个没有内容的犹太人，一个是纯情感性的犹太人，一个被倒空所有实质的犹太人。”（IJ，110）

有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用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文化的方法。这种方法被德里达关于“继承马克思的精神”的修辞完美地掌握了，因为一种遗产正是某种不管人们做什么或相信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那是一种最真实的本原遗产。这一点表明为什么作为文化继承物的后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的文化身份形式更明显地违反直觉。某个发现自己是“爱尔兰人”的人，即使没有学习过或实践过爱尔兰人的任何习俗，也能够最终把遗产血统当作是认同爱尔兰人集体性的根据。尽管在科学上已经破产，但只有通过把文化身份分解成激进的身份，对生物学的求助才使文化身份概念具有了逻辑意义。但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中，这样一种求助并不存在；至少很难想像有人要求分离出马克思主义的基因。因此，并不像大多数流行的文化身份所声称的那样，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被理解为对激进身份的虚假肯定。因此，对于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的关心代表多元文化主义的技术突破，因为它似乎表达了文化研究的目标：一种净化了种族的文化身份。但是，相同的姿态暴露了文化身份观念的理论空白。因为作为一种纯文化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要求成为一种没有被任何存在论标准所规定的身份，也就是说拉克劳和莫菲并没有解释连接现在和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东西，并由此将其改造成我们的传统。

然而，德里达的确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而且这是为什么可以说《马克思的幽灵》标志着《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所创立的那种规划的

① Finkielkraut, *The Imaginary Jew*, trans. Kevin O'Neil, Texts and Contexts, 9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96, 以下皆所写为 IJ。

理论顶点。德里达对哈姆雷特从其亡父那里收到的指令进行了冗长的讨论，由此来思考我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因此，德里达明确地强调继承的本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它（哈姆雷特的使命）对他来说是天赋的，差不多是他与生俱来的。因此，它是在他之前出现的人（或事情）所指定的。像约伯一样，他诅咒那个见证他出生的日子：'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的继承与我们对马克思的继承之间的暗中比较，模糊了一个重大的差别，因为除非我们是马克思的亲生子孙，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哈姆雷特是其父亲的继承人这个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的继承人。但是，类比的修辞学效仅仅是要生产出那种滑动，是要我们坚持像继承哈姆雷特那样去继承马克思，因为这是我们天生具有的。在一篇表面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文章中，德里达对莎士比亚的迷恋似乎十分奇怪。但是，这种迷恋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看起来非常像一种家族的或血亲的遗产；在把影响力的发挥想像为一种生殖性的血统的时刻，人物的形象变得平淡无事："莎士比亚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瓦莱里（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德里达立即在这个不可能的命题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生成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要求注意到显而易见之物：他说莎士比亚生出了马克思（和神秘的"少数人"），实际上差不多是说他相信马克思是我们的基因之父。无论"在这些生成之间发生了"什么，它都不是 DNA。根据德里达的观点，它是某种被称为"幽灵"的东西。

幽灵把那种完成相同任务的技术命名为生物学，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成，但无需成为生物学；因此，它避免了种族遗传理论的知识尴尬。也就是说，德里达对精神和鬼魂的讨论实质上是要以一种新的机制——"让我们称它为魂在论吧!"——取代生物存在论，以解释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这种身份通常以文化的名义继续存在下去："它（自我）可能是由幽灵构成的，它变成了幽灵的主人，它使幽灵聚集在一个单一躯体的漂泊不定的共同体中。自我 = 幽灵。因此，'我存在'可能意味着'我被纠缠'：我被我所是的我自己纠缠（被我是的我自己所纠缠的我所是的我自己……等等所纠缠）。凡是存在'自我'的地方，es spukt——'它就会鬼怪般地出没'。"在这种语境中，《哈姆雷特》显然是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完美典范，因为哈姆雷特的继承不仅由他的家族谱系决定，而且由某种模仿它并且几乎和它无法区分的东西决定：他父亲的鬼魂。因而，德里达的"鬼魂效应"需要"回到肉体，但是要回到一个比以前更加抽象的肉体"，需要一种"幽灵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荒谬的结合"用"无躯体的

肉体”——文化的幽灵性肉体——取代字面化的生物产生过程的物质肉体。

这是德里达对下面这个通常被忽视的问题的回答：作为与种族身份相对立的文化身份，其统一性可能由什么构成？《马克思的幽灵》的基本洞见是一种强制的承认，即幽灵技术学之类的东西是理解那种恢复作为文化遗产的过去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当然，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用“游荡”(haunting) 的“背反现象学”(paradoxical phenomenology) 取代种族的遗产，这是产生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还是仅仅是更进一步的尴尬。德里达在区分自己和“传统学者”时指出了后一种可能性：

> 从来就没有一个传统学者真正地而且像学者那样对待过鬼魂——也不愿相信可被称为幽灵的虚幻空间的所有一切。从来就没有一个学者那样地不相信真实的和非真实的、现实的与不现实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从来没有一个学者不相信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对立，例如在客观形式中。在这种学者看来，在这种对立之外只存在思想流派、戏剧虚构、文学和思辨的假设。

关于传统学者的形象，不管是否被准确描述（例如，在根据“欧洲的精神”对传统的统一性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T. S. 艾略特同样拒绝“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之间对立”的“客观性”①。像一个幽灵一样，“欧洲的精神”提供了一种诗人与“他的”过去之间的非生物学联系），德里达反对“另一个学者，若是幸运（或者更糟）他可能知道如何向鬼魂说话”。当然，那个学者是德里达本人：“这里肯定有人发疯了，他甚至希望解开这样一种宣讲的可能性的禁锢。”② 也发疯了的读者大概会发现魂在论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渴望被那种魂在论的“理论”说服或许是不正当的，因为德里达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他不想提供关于幽灵的理论“知识”：“人们并不知道：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因为这个非物体、这种非存在的存在、这

① Eliot,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4), p. 6.

② 当然，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张力已经专注于“解开这样一种宣讲的可能性的禁锢”的希望。参见 Stephen Greenblatt 著名的开首语：“我首先想与死者交谈。”(*Shaks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New Historicism: Studies in Cultural Poe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Ⅱ)

个存在于彼处的缺席者或亡灵不再属于知识的范围，至少不再属于人们认为他可以以知识之名来认识它的范围。人们并不知道它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在此——或更确切地说，在彼处，有一个叫不上名字或几乎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存在：某个东西，介于某个东西和某个人之间，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某种东西，'这个东西'。"为了取代知识，德里达提出了"命令和誓死的忠诚"与"断言和誓言的不可化约性"。

在某种意义上，德里达正确地坚持这种忠诚"在积极信仰的意义上是非宗教的"；这样一种武断的（不可化约的）断言可以被更准确地称作是后宗教的。也就是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断言最类似的可能是文化上的天主教主义，因为与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的身份不同，天主教从未要求由种族来决定（当然，天主教的普世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是种族性的）。就像后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对一种传统——其思想不再被他们相信——的忠诚一样，因此，非信仰的、文化上的天主教徒仍然以某种方式成为天主教的，同时拒绝教会的教条和惯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天主教传统的怀旧最终看起来像宗教的信奉本身，因为它是一种证实或一种对某种不可理解之物的纯粹信仰；事实只不过是三位一体的同一性之谜已经被人们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的持续存在之谜所取代。在只能被称为纯断言的阶段上，拉克劳和莫菲把后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置入到一种在结构上同一的置换中——即一种对成为自我准宗教的、思辨的兴趣来置换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我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绝对精神——科学、阶级、政党——的连续化身，而是看作是可怜的男人和女人，在始终透明和有限的现在思考和行动；但是那种相同的限制是我们的力量：只有在上帝死了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而且把自身看作是世界的建构者。"（*NR*，189）我们把这个命题——即任何政治利益都源自"成为我们自己"或"把我们自己当作世界的建构者"的可能性——放在一边，这样一些断言的环节揭示出文化身份要求的准宗教特征。[①] 像成为后天主教徒和后天主教徒一样，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种对集体身份的信仰的飞跃，一个"新国际"。这个"新国际"无法用共同的信仰或实践乃至用生物血统来解释。

---

① 我把这当作是詹姆逊下述主张的实质："差异修辞学（拉克劳和莫菲的'新社会运动'是他的主要例证之一）更深层的基础始终能表明涉及文化本身的幻影。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这些幻影本身被宗教观念所认可和合法化，始终并且处处都是最终的'他者的思维'。"

于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使身份成为无法进行概念理解的鬼魂信仰问题以及对一种传统——它受到马克思的精神“启发”——的忠诚问题，从而回避了种族。因而，德里达把“我们后来会将之绰号为新国际的‘共产主义’”说成是那种无法思考但只能忠诚肯定的身份的建构，因为它是“无法认知的”（参见拉克劳的坚决主张：除了被视为建构之外，思想活动不可能被视为是一种真理认识）：“我们被要求（或许被命令）把我们自身转向未来，把我们自身加入到这个我们之中，在异类被转身面对这种单纯的加入（joining）的地方，没有决定性的概念或必然性，没有知识，没有或者即将发生的连接或脱节的综合连接点。”尊重这个“使我们转向未来”的要求，这同时意味着使我们转向过去的遗产，或者那些德里达指定为“作为绝对未来的过去”的东西。这种关于作为“绝对未来”的过去的思想，是对拉克劳和莫菲的过去和现在谱系学统一理论的改进，或许是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逻辑的最好描述。① 因为文化的同一性永远地把人们同过去连接起来，这是人们为什么要么能记得要么能忘记，但却不能改变自己是谁的原因。最终，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后马克思主义计划不仅立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过去改造成我们的记忆、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将其改造成我们的未来。

二、记忆政治学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拉克劳、莫菲和德里达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们三人都明显致力于把他们的理论著作

① 谈论“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逻辑”可能更加准确，因为拉克劳—莫菲和德里达的计划在下述企图上交汇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过去重新想像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记忆”或遗产。即使马克思主义在拉克劳和莫菲所共有的传记意义上不是德里达的过去，但把《马克思的幽灵》置入到后马克思主义逻辑之中的东西是，德里达也致力于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想像为一种对“马克思的准父亲形象”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过去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完全地明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用成为人们的传记性过去的一部分，不用成为人们想像的、集体的过去；事实上，德里达把解构修正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被定义为新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被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解构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恰如它从来都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样，尽管它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精神。”

理解为一种本质上是政治的实践。德里达把“魂在论”说成是一种“记忆政治学”。这种说法表明了一种令人信服的回答：“‘学会生活’的时代，一个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时代，将等于这样的时代，此开场白正在向我们展示的时代：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在维持中，在交谈中，在公司或同事中，在鬼魂的交易中……而且这种与鬼魂的共在也是，或者说不仅是，而且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德里达把他的主张——即鬼魂的宣言本身构成一种“政治”——建立在一种作为对死者之根本责任的正义的理论上：

> 如果我准备详尽地谈论鬼魂、遗传和生成——鬼魂的生成，也就是说，谈论某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其他东西，那就要借用正义之名……从那一刻起——即伦理学和政治学——无论是革命的还是非革命的——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想像的，而且仅仅根据它的原则也不再对那些不再有或在那里尚未获得生命的其他人表示尊重，不论他们是已经死了还是尚未出生——，谈论鬼魂，实际上，向鬼魂并且同鬼魂谈论鬼魂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某种责任的原则……那么在那些尚未出生或已经死去的鬼魂——他们是战争、政治或其他各种暴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主义或其他种种灾难的牺牲品，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或任何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受害者——面前，任何正义……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想像的。

《马克思的幽灵》之所以是一种政治学和理论，是因为它对死去的马克思的“责任”体现了普遍的伦理命令，即要“尊重”所有那些“当下没有生命的”东西。

倘若我们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或伤害死者，那么那种认为对死者有一种与我们对生者的责任有些相似的伦理责任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德里达恰恰信奉那种观点，就像他在自己的下述说法中所表明的那样：“那种将不得不进行指导和等级化（以建构任何一种传统）的选择性原则”是一种暴力形式，更准确说是一种弑父形式：“通过看护它的祖先而不是其他某些人，它甚至会消失……由于遗忘性（不管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在这里都不重要），由于排斥或谋杀，这种看护本身将危及新的鬼魂。通过立即在鬼魂中间进行选择，从它自己的鬼魂中选择它自己的

鬼魂，因而通过谋杀死者，它会做到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自己的间断性描写——即对我们对那些当下的生者的“无限责任”和不良居心的描写——的无法否认的伦理力量，德里达本人唤起了对“谋杀死者”思想的特殊性的注意：

> 因此必须大声疾呼一种“新国际”，尤其是在有人居然以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的名义——这种理想已经自诩最终将是人类历史的理想——无耻地宣传新福音之际。那种新福音声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永远不会受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让我们永远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

对作为一种已经实现了的理想的自由主义——德里达具体地讨论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各种辩护忽视了压倒一切的相反的经验证据，这无疑是真实的情况；很明显，倘若全球人口大规模地增长的话，西方民族的进步就不只是遭到全世界穷人数量的反驳。① 就福山的理论使我们忽视那个事实来说，它在伦理上是可疑的。但是，那种伦理判断的力量源自于德里达的如下观察：“在绝对的数字上”——这些数字在考虑到人们时肯定比百分比具有更多的伦理意义，今天的世界既比以前有更多的繁荣，也有更多的苦难。由于使我们面对那些我们能够为之想像出一种责任的个人，德里达的世界图像从而提出了一个伦理困境，因为之所以仍然有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活着。

另一方面，关于幽灵的正义观念没有满足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事实上，它反对一种基于生者的价值的伦理学。我们对生者的责任表现为一种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命令，但是幽灵没有生命，因此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来改变它的生活。因此，扼杀生命和给予生命是我们帮不帮助生者的界限。然而，就幽灵来说，我们仅有的选择是“谋杀死者”或使他们活下去。在那个意义上，德里达的死者正义观只能是对保证其不朽性的关心。生者的正义是指美好生活（无论怎样定义）的必要条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朽问题（关于它，不可能做太多，至少不是由我们来做），但死者的

---

①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正义是指死者的幽灵性生活本身的“维持”。此外，它代表的不仅是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不朽性的关心，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不朽的关心——因为幽灵并不是一个个人，也没有生命。更准确地说，它是那种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中把生者和死者接合在一起的“物”。通过把我们现在的自我与作为绝对未来的过去连接起来，并因此把我们等同于“已死者”和——更重要的——“尚未出生者”，幽灵变成一种关于不朽性的技术。这样一来，文化身份代表一种相当直接的不朽希望，这可能是那么多的人那么强烈地乃至付出他们的生命来保卫和保存自己文化的原因。

作为一种对文化身份信奉的形式，后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努力，即建立一种虚构的马克思主义集体性主体的不朽性。就保证不朽性的任务曾经是宗教机构的职责而言，“记忆政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学”，一般看起来像是下述现代主义计划的延续：补偿那些制度的公认的失败。不幸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和“新国际”似乎都不是取代那些制度的可能的候选人。这并不是说拉克劳、莫菲和德里达的著作没有产生政治的影响。应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即非后马克思主义的假设：后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确信我们最紧迫的政治关切是要保证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朽性，就此来说，后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不能专心地改善活人的状况。通过让我们注意不朽性的希望，后马克思主义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理论形式的误解政治学技术，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

作者：Daniel T. McGee

文章原标题：Post - Marxism：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文章出处：Modern Languange Quarterly 58：2，June 1997，p. 201 - 225

（编译者：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博士）

后马克思主义想像中的本质主义与经济：重新打开缝合

［美］乔纳森·迪斯金　布莱尔·桑德勒　著　　周凡　译

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拉克劳（1990）

马克思主义作为激进社会理论的支配语言所一度拥有的特权地位逐渐跨掉了。社会总体的特有概念——在“经典”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这些概念被建构为经济、政治和主体性的（黑格尔主义的）统一体，在其中经济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在左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本质主义的名义下成为严厉的理论攻击的对象。从右派这一边看，现实存在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所自称的阶级社会的最近解体（它再度被暴露在自由和民主的普照之下）似乎给了这一摇摇欲坠的理论体系以致命的一击。当前的历史际遇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就要到来了。

在左派新兴的后马克思主义之中，最强有力的、最令人信服的声音来自于拉克劳与莫菲，这一点在他们的著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SS）中得到了证实。该书的作者对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性分析和反本质主义的回应，他们认为，在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中，阶级被当作是一种本质，这种本质赋予特定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的承担者以历史上和理论上的特权性社会地位，同时，这种本质也解释了历史本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拉克劳与莫菲声称，激进民主的概念——以主体立场、权利语言、权力斗争等等的多元性为基础——引入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不相容的社会逻辑”（HSS，3）。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植根于激进民主的新的政治想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概念的中心地位的一种尝试。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一种强有力的理解，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内在性的空间，这一空间被必然规律构造出来并被一系列话语策略所缝合，这种话语策略把偶然性、脱节的“外部因素”（与一个世纪以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相联）改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叙事”（即必然性逻辑）的附属品。然而，在把内在性封闭起来的过程中，这些缝合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缝隙，它们表明，在这些地方外部因素并没有被完全排除。拉克劳与莫菲追溯了“霸权”（一个如此缝合的概念）的系谱学，它显示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内偶然性和人的主体性空间的不断增大以及经济必然性地平线的不断后移。① 尽管霸权仍然包含着阶级本质主义，即便在它精致的葛兰西主义的阐述中亦是如此，但是，拉克劳与莫菲还是对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话语策略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们作为走出本质主义的路标（依他们之见，走出本质主义也就是走出马克思主义，从而走进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对于诸如霸权和接合这种概念所具有的理论张力与功能，他们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他们割断了那些把霸权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主义联系起来的纽带，通过将霸权与激进民主话语连接起来，他们赋予霸权以新的内涵。这使得他们发挥出诸如身份、“主体立场”以及政治实践（它赋予激进民主规划以内容）等一套观念。《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作者创造出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精妙理论，在此一空间中，社会结构通过缝合和持续的政治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仅仅是部分地成功）来试图维持它们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存在，尽管这一社会结构不断地被脱节的力量、被结构压制的“外部因素”（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外部因素”没有什么功效）所颠覆。② 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社会没有什么是既定的。

这么多年以后，我们还在不知不觉地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作出回应，大量的文章对这部著作提出了足够多的问题、评论和批判（既有肯定性的也有否定性的）——这是他们著作具有重要价值的征兆。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将我们的思考集中于拉克劳和莫菲对经济概念的论述上。与

① 拉克劳与莫菲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了区分——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逐渐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HSS，19）。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更宽泛的术语，正统马克思主义只是它的一个阶段。在该文中我们简单地涉及到构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话语策略。

② 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一个注脚中（第 88 页注 1）略为详细地讨论了缝合这一困难而重要的概念。

这一著作的其他批判者不同的是，我们大体上与拉克劳和莫菲持有相同的认识论态度。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一方面是对霸权及其他政治概念的精细入微的、强有力的解构与重建，另一方面，他们却没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基本的经济范畴进行分析，这两方面的不对称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阶级”）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根源所在，并被当作不可救药的东西而加以屏弃。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清空经济空间中的本质主义的同时，拉克劳与莫菲也把经济空间的理论内容全部革除掉了，这就排除了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甚至非还原论的阶级分析）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一个空白——他们继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用未经省察的经济概念和关系（具有讽刺意味是，这些概念和关系仍保留着它们本质主义的基础）来填补这一空白。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后半部分，经济是一个空场，尽管有标志物（“economy”）和标杆（例如“commodification”）镌刻在它的表面上。正是这一领域没有它的理论地位。政治与文化是社会空间的构成因素；它们是本体论的范畴。而经济则不是这样：它们决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重构，而是被还归结为政治和文化。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只存在经济的概念（economic concepts），而没有经济这一概念（concept of the e-conomy）。①

经济，作为具有理论规定性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充分界定的概念发挥着作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却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对于这一点已有人作出了暗示。艾玛利格里欧与加莱利（Amariglio and Callari，1989，31）描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鸿沟：“一方面是价值理论（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主体性的性质和作用（反经济主义）。那些关切主体性问题的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抛弃它的‘价值理论’。”拉克劳与莫菲对主体性的强调反映在他们的“阶级”概念之中，阶级总是指“阶级身份”，它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HSS，20）。对他们来说，“阶级”是人类主体政治认同的名称，如此的阶级概念必须要抛弃。我们相信，对政治概念与经济概念的这种不对称的处理暴露出了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析存在着逻辑与观念对象之间的混淆，存在着对经济关系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与激进民主所引入的社会逻辑不相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被

① 对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领域的区分，并不意味我们按拉克劳与莫菲的方式把这些领域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只处于外部关系的联结中。

束缚于其中并被赋予既定意义的本质主义话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形式的方式有很多，走出本质主义的封闭空间的道路也不只一条，就像拉克劳与莫菲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最好碎片”被如何恢复、扩展与重组，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解构性的分析承认在霸权中同时存在着被缝合的开裂痕迹，并且认识到要走出这种被缝合的封闭性的路径，我们认为，这种解构性的分析也同样能够并且必须被用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上，用之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剥削的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以及那些表示流通的范畴（商品化）上。

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些“从经济主义中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何“错误地试图从经济学中拯救马克思主义”（Bowles and Gintis，1985，41），我们也将看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抛弃阶级分析、缺乏经济概念所导致的后果。重新确立对经济（它运用多元决定、阶级分析的概念）的理解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对这一努力的简短叙述将结束我们的讨论。对我们来说，阶级并不是意识的特定形式的名称，而是产生经济空间的清晰结构的方式。

本质主义：必然性与偶然性

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的缝合、封闭和还原作用的分析是他们借以阐发他们自己的激进民主概念的基础。这就是说，激进民主必须被理解为是重新打开经典统一性的被缝合的缝口，是展现被排除的外部因素作用的一项努力。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重要契机。[①] 我们打算追溯这一重构（封闭性）的过程，以便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丢开经济而达到激进民主的。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构描绘了一系列愈来愈复杂的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把内在空间（在其中经济运动规律按必然性逻辑运作）与外在的偶然性领域连接起来，以构造出社会空间和社会总体的统一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制造出对出乎意料的、复杂的、偶然的政治与经济事态的种种解释，它们之中很多与“经典的”历史阶段有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在经济规律、政治和身份之间有

---

① 我们在这里并不涉及拉克劳与莫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精确性”，我们相信，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形式的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还原论的理论结构是如何运作的——尽管更加辩证地解读这一传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假定的对应关系。

如此策略的第一种是考茨基的简单性，它假定理论与历史之间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也就根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空间。考茨基的著作“不是把本身表现为一种介入，以便说明历史的基本意义，而是把本身表现为摆在那里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透明的经验化系统和普遍化”（HSS，16）。在这种话语中被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因而由“纯粹的内在性空间”构成，“我们可以从工人阶级到资本家、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制造业到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过渡，但这些过渡须臾没有离开内在合理性以及封闭性范式的可理解性”。（HSS，16）政治、主体性和经济力量全是同一个东西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而处于其外的“外在因素”都是非理性的、根本无需考量的东西。

第二种策略是二元论，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20世纪初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理论危机。这一危机的特点是对社会主体的多样性、政治表达的多种形式、资本主义对新条件作出的各种回应有了新认识。它促使人们根据大量的偶然事件并通过相对自主与中介的概念对考茨基的简单性进行再思考。新的历史力量和主体被引进来，它们打破了经济必然性与意识形式和政治组织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拉克劳与莫菲对这种二元论作了精彩的描绘：这种二元论能够提出对历史事件的复杂解释，并且通过特定的推理形式（例如对现象和偶然性进行论证）来“处理那些其本身的范畴不能加以同化的各种差异”：

> 从现象来论证就是：每一件东西都把本身表现为我们可以归结为同一的差异。这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要么现象是隐藏的单纯手段，要么是本质显现的必然形式。（属于第一种的例子是：“民族主义是隐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屏障”；属于第二种的例子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必然的政治形式”。）从偶然性来论证就是：不能够把社会的范畴或部门归结为某种形式的社会的重要一致，但是，在那种情况中，它与历史发展路线相对的那种边际性可以让我们把它当作不相关的东西而扔掉。（例如，“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中间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我们就能够忽视这些，把我们的战略集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上”。）（HSS，21）

然而，话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却没能根除阶级本质主义，这种阶级本质

主义继续驱动着这样一种观念——历史与主体性这两者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

> 一如每一种从理论上来看可以决定的特殊性要向下层建筑和产生结果的阶级体系这一领域求助一样，任何其他的逻辑是沉没到属于偶然性变化的一般领域中去了，或者是要向不受一切理论决定的实体，比如意志或伦理决定求助。(HSS，48)

由此，马克思主义就能够详细地说明各种偶然性，但是，通过这一“偶然性逻辑”，却把偶然性还原为已知事实必不可少的倾向，它本身已经被构成并且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外在因素的效力被否认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即在于此。

霸权：从本质主义到多元决定的道路

然而，政治斗争和主体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还是导致了政治实践的置换：从各阶段的严格的前后相继以及各层次的总体间的对应关系向一种新的领域转变——在这一新领域中，不同的偶然性“特例”可以被理解：这是霸权的领域。一般来说，“霸权概念填补了应该有正常历史发展的一场危机所留下来的空白，由于这个原因，对一项任务或政治力量的总体进行霸权操作都属于历史偶然性的领域”（HSS，48）。譬如，拉克劳与莫菲论证说，列宁的霸权概念是作为对阶级与它的历史任务之间对应关系的置换的回应而提出来的。(比如，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的名义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却宣告社会主义的到来。）不能靠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于是，这一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因此，列宁的霸权概念指的是“在阶级联盟之内的政治领导”（HSS，55）。就像在更一般的情况之下必然性不能被偶然性改变它的概念一样，尽管阶级代理人特有的历史作用是由霸权决定的，但它们的身份还是继续由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确立。

另一方面，对葛兰西来说，代理人的身份似乎脱出了必然性的控制，因为“意识形态被说成是将这些关系建构起来的明确领域”（HSS，67）。现在，“接合”这一概念表明了政治主体的一致性是通过霸权实践本身而形成的。而拉克劳与莫菲要问的恰恰就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代理人终究是阶级代理人呢？他们评论道：

> 葛兰西的思想看起来是围绕着关于工人阶级身份（它最终使工人阶级产生一种矛盾的立场）的那种基本的含糊性打转。一方面，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中心地位有一种历史的、偶然的性质：这种性质需要这个阶级从它自己那里走出来，通过把自己与多元性的斗争和民主的需要接合起来的方式，来改变它自己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种接合的角色看起来是由经济基础赋予的——因此，这种中心地位看起来就有一种必然的性质。(HSS，70)

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代理人的阶级身份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特权”范畴，因为“工人阶级不论是被当成阶级联盟中的政治领导（列宁），还是被看作历史集团的连接中心（葛兰西），其基本一致性都是在一个不同于霸权实践运作的领域的那种范围内建构起来的”，这就是“葛兰西思想中持续存在的本质主义的内核，它为解构霸权逻辑设置了限制”。(HSS，70)

尽管阶级本质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那些缝合部位的一条中心线索，然而，拉克劳与莫菲还是在霸权这一概念中确认出新政治想像的可能性。但是，阶级概念呢？经济概念又怎么样呢？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后半部分，拉克劳与莫菲撬开了霸权空间的歧义性，在所有社会关系的非固定性的范围内阐发出了关于主体的多重立场的观念。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将阶级与政治经济作为对社会进行思考的极不成功的尝试而弃置一旁的。

营造封闭性：经济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这样一种话语空间：针对错乱混杂的偶然性的困扰，这一话语通过对偶然性、对现象、最后是对霸权概念（这一概念许诺要破坏阶级本质主义所强加的统一性，但最终却没能破坏掉）的缝合性论证来维持着它的内在结构。随着还原作用的链条被回溯到它的根源处，他们最终到达了“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HSS，75)。因为正是经济结构封闭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领域并将复杂的人类主体归结为经济主义领域中的一个点。下面颇长的引文详细说明了“为了发挥建构霸权实践的主体的作用”，经济必须要满足的“三个明确条件”：

> 首先，经济运动的规律严格说来必须是内生性的，即是说，它排除了一切来自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介入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掺入了其他因素，就不能严格地说这一建构作用专门归属于经济；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建构的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一定得从该层面的那些运动规律中产生出来（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对那些分裂、分散的立场进行重组的情况都被排除了）；其三，社会代理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必定赋予他们以历史性利益，以至于这些社会代理人在社会的其他层面的存在——通过“代表”和“接合”机制——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解释。(HSS，76)

这三个条件决定了经济被建构为一个封闭的内在空间。产生这一封闭性的关键概念是生产力：“如果历史具有意义和合理的基础，那么这应归功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HSS，77）但是，如果这一规律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必然的结论就是：介入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要素都受生产力的制约”（HSS，78）。尤其是，如果代理人将使他们身份的一致性植根于“经济层面”和经济的“运动规律”，那么人类劳动力必定被引入到必然性逻辑之内。“为了确保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诸诉一个虚构：它把劳动力构想为商品。”（HSS，78）这样，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使工人从属于生产力的决定，并且造成了经济领域中一个空间的缝合——其实，在此一领域中，人类主体的颠覆性“外在”力量本来可能介入进来。

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概念是经济主义的拱顶石，因为正是经济的概念把“主观”力量还原为“客观”力量。这种还原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受到谩骂的名称，这一名称就是阶级。在整个“霸权系谱学”中，拉克劳与莫菲批驳了“阶级本质主义”，因为他们反对所有的本质主义。但是，他们对经济主义的解构（在下文中我们要更详细地进行讨论）确实过于简单地置换了本质主义逻辑。首先，在阶级可能指涉剥削过程（剩余劳动时间的生产及侵占）的范围内，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力的拒斥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观念：榨取由工人出卖自己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力的商品地位的拒绝以及他们关于商品这一概念本身的观点，导致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价值分析的有益探索，从而没有给经济剥削的概念留下适当的位置。而且，按照他们所编造的，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拒绝切断了身份与阶级地位之间的归结性联结并由此消除了“阶级”所指涉

的空间。(HSS，84）这样一来，阶级在双重意义上——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和作为特定的剥削概念——都从他们随后的分析中消失了。

劳动力的特性

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没能在重构经济的理论空间上获得成功，为了说明我们的主要论点，让我们更仔细地检视一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缝合经济空间的方式。为什么劳动力不是商品呢？我们来想一想劳动力有哪些“特别的不同之处”：

> 劳动力与生产的其他必需要素不同，资本家必须付出比简单地购买商品多得多的东西，他还必须使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可是，这一重要方面却没有纳入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是劳动）的概念里，因为，如果说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仅仅是商品的话，那么它的使用价值显然就会从购买它的那一时刻起就自动地发挥作用。“把劳动说成是劳动力对资本来说的使用价值，就模糊了体现在能够进行社会实践的人身上的生产性投入同所有余下来的那些投入（对这些投入来说，资本的占有本身就足以获取对商品的生产性劳务的消费）”之间的非常根本的差别。(HSS，78)

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建构的经济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辩声称：“经济空间本身被构造为一个政治空间，而且在其中，就像在任何其他社会层面上一样，我们描述为具有领导权特征的那些实践完全是有效的。”（HSS，77）对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劳动力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政治实践，通过这种政治实践，作为外在领域的权力构成了经济，而且这并不是偶然的。[1]“因此，并不是纯粹资本的逻辑控制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劳动过程不仅仅是资本发挥控制的场所，它还是斗争的领域。”(HSS，79)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对如下基本观点我们完全是赞同的：经济并不

---

[1] 在经典的经济概念中缺乏构成性的权力关系导致了一个问题。参阅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78、79页）中引用鲍尔斯和金蒂斯及布雷弗曼（Braverman）的相关论述。

是内在性的封闭空间，而是由它的“外部因素”多元决定的空间，而政治与文化居于经济的核心处，就像经济居于政治与文化之内一样。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不能够或者不应被看作是商品？如果劳动力被作为商品，那么它就必然为资本逻辑所囊括？以至于那些“外部”过程的作用所施与的多元决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就变成完全不可见的了？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取决于经济空间的建构，取决于被附加在商品概念中的内涵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看主体的特性如何被认为把游离其外的“外部”的不同寻常的权力给予劳动力的。鲍尔斯和金蒂斯坚持认为，劳动力在主体身上的具体实现过程通过劳动者“对他所提供的劳务的持续控制”把权力引入了经济，它同样也需要买方行使监督权以“确保合同的实施”，“更进一步地说，针对他们劳务的买方，作为劳动力的卖方至少能够部分地调节他们的行为，因此，提供劳务的水平的提高与降低以及所需的监督的程度和成本都要引入生产的层面中”。(Bowles and Gintis，1986，77)

与其说这些是劳动力的“外在性”独具的特征，在我们看来，不如说是所有服务性商品（从心理治疗到草坪的养护和安全服务）都有一个“持续控制”及“合同实施”的问题，因为买方不可能在购买之前检查当前还不存在的商品。服务性商品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既被产生又被消费，因此，它们强调卖方与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Ruccio，Resnick and Wolff，1990)。另外，也有许多关于商品的卖方的例子，这些卖方可能以改变生产条件的方式来“调节他们的行为”。想一想影响商品价格的卡特尔或者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对商品进行虚假描述的卖主。很清楚，如此的调节行为或许提高了投入价格或者要求投入质量被仔细地监控。如果一个生产者必须改变生产程序、技术选择或者各种投入间的比例，那么这些行为方式就构成了生产的性质——比如，就像工会煽动所起的作用。[①] 后马克思主义者给劳动力所标示的这些特征（它表明了构成经济的处于外围的权力）并不能把商品与非商品区分开来。简言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为劳动力所特有的那些权力形式能够更广泛地显现于经济空间的构造之中。

① 作为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例子，可考虑一下导致 OPEC 在 1973 大抵制的复杂的、矛盾的政治与文化条件以及这一行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什么是商品？

当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劳动力“体现在能够进行社会实践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只能表示同意。我们感到成问题的并不在于他们有劳动力概念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商品概念。通过坚持商品的使用价值能够“从购买它的那一刻起就自动地发挥作用”，拉克劳与莫菲含蓄地界定了“商品”这一概念，它暗示着这样的意思：商品完全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在商品的空间之内，所有权赋予了绝对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这一观念，资本的逻辑并没有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中消除，而只是否定了一个对象：劳动力。[①] 与这一观点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坚决主张，没有哪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会从购买它的那一刻起自动地生效，占有资本决不足以确保获得对商品中蕴含的生产性劳务的消费。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权力行使及财产权的拥有的重视（这些都是消费劳动力所需的）将不会使我们看不清一般生产的“开放性”，也不致于使我们看不到：不仅存在权力这一力量，而且也存在着诸多构成性的“外部因素”。在这里，我们愿意提供一些例子，它们只是为了表明这一论点的范围和效力。

各种投入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够单单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它的使用价值，商品一旦被购买（或订立了购买合同）它的性质或意义就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也就改变了生产的性质。比如，对商品投入的消费总是需要劳动力（哪怕是最少量的劳动力），使劳动力能够从事生产的那种能力，就像它是劳动力本身的条件一样，它也同样是消费那些并不体现于人身上的投入的条件。

各种自然条件（像天气）对来自于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量或质起着多元决定的作用。如果干旱流行并且灌溉是不可能之事，那么杀虫剂很可能就没有多大用处。

商品常常需要遏制、隔离或贮藏以作为它们生产性消费的条件：劳动力也是如此，如果不通过监督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政治过程（工厂内部的

① 证明财产权构成了纯粹的、明确的消费空间是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汇点，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一些评论者总倾向于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作换汤不换药的自由主义老调。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单单为支持超乎其它的社会权利之上的不受妨碍的所有权而辩护。可参阅 S. 鲍尔斯和 H. 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第二章。

和外部的）对他进行“遏制”，那么他将停止工作或者不勤于工作或者浪费材料。比如，熔化的钢水，如不适当地遏制，它将遍地流淌，这不仅有可能毁坏生产工具、伤害劳动力，而且它本身也给毁掉了。就像洁净的房间防止灰尘混入硅片并把硅片的价值归之于半导体生产者一样，在工会中，甚至在社会中，反共人士会防止好斗的工会活动分子混入工人队伍并把工人的价值归之于资本家。

从这些简洁的实例中，我们认识到所有权以及劳动力的买方与卖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是生产性消费的唯一条件。至少在原则上，资本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因为，缺少它们中任何一个就可能对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能力造成威胁。这就是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全部条件。

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一概念或者对更为广泛的“商品”范畴重新进行理论探讨，并不是我们的意图所在，我们只不过是为了表明我们缺乏并且也需要这种再概念化。构建一个多元决定的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概念，除了需要考虑我们在此指出的商品消费的条件之外，还要充分重视它独特的生产与交换条件。例如，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着眼于生产劳动力的意图，它借以要论证的是，劳动力并不是为了出售或获利而被生产出来。作为对这一论辩的回答，我们仅仅想指出：有许多时候，当工人知道他们第二天必须工作，他们会有意识地决定早点去睡或一直醒着；或者，他们会作出大量的决定去从事各种形式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的劳动力更易于出售。这是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劳动力决不是惟一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非资本主义商品。一个多元决定的商品概念必须从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出发，这一立场宣称：并不存在一套把商品与非商品分割开来的先验标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存在的特定条件（尤其是当这些条件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时候）将多元地决定着我们对“商品”的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完全与维特根斯坦对游戏的理解一样，一如维特根斯坦所展示的，每一个游戏的独有特色都对“游戏”这一范畴的多元决定起着一定作用。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与拉克劳和莫菲所指出的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决裂，我们就不应该拒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地位，而我们必须抛弃关于资本内在逻辑的观念，并且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没有任何对象或过程（当然包括劳动力）会仅仅作为资本的内在逻辑的表达而存在。当我们重新思考商品的性质时，我们必须仍然根据内在与外在、活性的（劳动力）与惰性的（商品）之间的二分法所提出问题的方式中摆脱出来，因为，这种思考方式依然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坚持。当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历史推动力的政治过

程时，劳动力似乎与所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完全不同。但是，如果如此的政治关系仅被构想为商品消费存在的许多条件及外在因素中的一种，那么劳动力的不同寻常之处比之于其他商品就既不更多也不更少。

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概念和“商品”概念的理论探究方式大体上暴露了后马克思主义经济话语的薄弱之处：经济话语倾向于受到“要素的本质主义”的损害（HSS，103）。拉克劳与莫菲不是承认经济概念受到现实存在的话语条件的多元决定，而是把经济概念本身视为本质主义的东西。[①] 这种对经济话语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是从对经济关系的分析向基于权力和身份的话语分析转换的一个征兆。

激进民主与经济

拉克劳与莫菲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使经济空间缺少阶级过程，但是，我们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解构不仅仅是混乱和失序，它的特点在于多多少少歪曲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大量概念和关系。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拉克劳的话说，反映了“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微妙得多的关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这一问题”。[②] 不过，劳动力和阶级还是被拒绝了，他们在古典话语中所创设的本质主义的意义被认为是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因此，这些概念的多元决定作用（对于我们理解社会逻辑有很大作用）在激进民主那里缺失了。其他的一些经济概念（如商品化和帝国主义）却在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被保留下来继续使用（好像它们的意义内在于它们本身而不受它们存身于其中的话语的影响），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使得它们把本质主义的包袱随身带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处。最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维持着它们的外观，但我们发现它们其实已变成全新概念的名称了，而这些新概念的理论内容总是被含蓄地意指着，却从来没有被详加说明（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它们的意义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些话语选择。

---

① 拉克劳与莫菲批判了“存在条件”这一概念（它是由辛达思与赫斯特所阐述的），因为它专注于“‘总体’的不同组成成分之间假定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本身被构想为“被概念化地加以说明和固定”。（HSS，104）

② E. Laclau (ed.), New Reflectioh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p. 201, 223.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对激进民主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及经济叙事（这一叙事构成了新的主体表达他们新要求的情境性）的背景之下展开的。这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叙述只是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来自于古典经济主义话语的经济概念和范畴又被重新引进了新的领域之中。在引入阿格利塔（Aglietta）对福特制的描述之后，拉克劳与莫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为一整套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从属于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这一“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在同一段落的稍后又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HSS，160 - 161），反过来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本身的起落变化：“商品化、官僚化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同质化”（HSS，164）。

如此一来，资本主义被描绘成一种单一化的力量——这一力量创设出它自己的被缝合的密闭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各种主体存在并行动着。这一同质化的经济空间（仅作为陪衬）被如下的宣称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毁坏了过去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关系，通过这种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不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领域。”（HSS，161）对我们而言，此一陈述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内容上跟拉克劳和莫菲花了大功夫执意要对其进行解构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观念是如何不同的，这一点并不清楚。要么商品逻辑是资本逻辑（很显然，这是一种混同），要么就没有理由解释（凿实没有什么可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前者将意味着后者。任何这样的关系都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建构。这些历史进程和趋向并不是可预先给定的明显的经验事实，相反，需要对它们相互矛盾的维度进行阐述、澄明和讨论，而不是断言在一个同质化的经济空间中积累的统一扩展。

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不能被霸权、接合和多元决定的逻辑（它们涉及到不同的概念，就像它们涉及到不同的主体一样）简单地接管下来，并且，由于这些范畴并没有经受完整的概念化的重新阐发过程，所以它们也不能简单地被赋予一种新的逻辑。这些经济概念的意义最初是在本质主义话语之内严格地建构起来的。然而，拉克劳和莫菲已经瓦解了这些话语。“否定对这些社会关系所做的任何本质主义的探究的这一观念还必须说明每一种一致性的不稳定特征，以及说明在任何最后的真实性质中不可能把一些要素的意义固定下来。”（HSS，96）除非这些概念在另外的话语范围内被重新阐发，否则它们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经济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由它们赖以被阐发的话语多元决定的，那么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中也就存在禁止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的诫律了。拉克劳和莫菲指出，一旦“社会（the social）”的

新空间业已被建构起来，那么

> 正是在这个地方，许多经典概念（诸如“中心”、“权力”、“自主性”等等）的地位如果被重新界定的话，它们完全可以被重新引进来：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偶然性的社会逻辑，这样的一种社会逻辑在明确的场合和有关联的、总是被其他的——通常是矛盾的——逻辑限制的环境中获得它们的意义，但是，在定义一个不会反过来被颠覆的空间或结构因素的意义上，它们中没有一个绝对有效。(HSS，142)

当然，积累和商品化的逻辑能成为拉克劳与莫菲正试图建构的新的“偶然性社会逻辑”也是可能的。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情况是这样。他们清清楚楚地、仔细认真地重新建构了一个在其中代理人的身份和政治得以形成的社会空间，其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使政治概念的恢复成为可能。但是，对经济概念而言却没有一个类似的空间——除非（我们将看到这确实发生了）经济概念对于权力问题来说是失败的。

其他一些人对拉克劳与莫菲依赖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发起了攻击。例如，杰拉斯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拉克劳和莫菲反复提到他们先前已认定与他们想要建构的开放的、偶然性的霸权逻辑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基本范畴”。尽管穆泽利斯①在对杰拉斯评论的一些方面进行扩展时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辩证的”方面，但无论是他还是杰拉斯都按照自己的理解重申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充分性，并且拒斥了拉克劳和莫菲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拉克劳在回应穆泽利斯时指出“增加异质要素和概念并不足以打造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概念之间的逻辑接合必须被显示出来”时，② 我们是赞同拉克劳的。当拉克劳断言古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达到这一点时，他或许是正确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拉克劳和莫菲却没能提供系统阐述的非本质主义经济领域所必需的经济概念之间的一个恰当“逻辑连接”。因此，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分析中出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是占据着一个个抽象的点，即存在那么多的“经验指涉对象” (HSS，143)，由于缺乏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新话语清晰明确的连接（这

---

① 参见本书中N. 穆泽利斯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一文。

②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lology in Marxist Theory, Verso1979, p. 110.

些概念决没有得到连接），它们也就没有什么理论内容。在各种各样的民主话语（它们自己的话语，以及大众民主话语）的“一连串的等同”中，它们是关联物，并且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就像阿尔都塞曾经指出的：“当经验描述的明晰性取代了理论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仓促地填补了由之产生的空白。”①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被冠以“民主革命”之标题的一节中，拉克劳与莫菲写道：“我们的中心问题是认同那些为反对不平等而斗争并向从属关系提出挑战的集体行动得以出现的话语条件。”（HSS，153）加入这种集体行动的新历史主体在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没有被理论化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起作用并被这一环境所塑造。像在古典话语中一样，拉克劳与莫菲断言，在经济趋势与中介的政治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些‘新对抗’是对商品化、官僚化以及社会生活本身不断增长的同质化的种种抵制形式的表达，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们为什么通过特殊主义的增殖来表现自身并最终凝结为对自主性本身的要求。”（HSS，164）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是“特殊主义的增殖”和“分歧很大的各种断裂点”（HSS，171），以及主体立场和对抗点的增生。各种新对抗表现了对商品化的抵制，这并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宣称，而且是一种没有被解释、没有进行理论说明、也没有得到证明的宣称。这种把某些过程当作另外过程的“表达”，即以特殊的方式“表现自身”的话语，其本身就是本质主义的话语。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激进民主是一个复杂难解的概念，它建立在基本消极性的权力基础上，并作为对社会“实证性”的消解而提出。在这里，有一点值得充分强调：是“政治想像”促进了在其中各种主体得以在必然性之外建构自身的非本质主义空间联合的产生。在此颇有兴味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激进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出现的方式。对拉克劳与莫菲来说，“每一个激进民主规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HSS，178）。而且，“从在那里业已进行的对于政治不平等的批判，通过不同的社会主义话语置换成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这种置换导致了对其他从属形式的怀疑，并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HSS，156）。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构成了“从属关系”的基础——这种从属关系

① Ibid.，pp. 15 – 50.

是民主实践在一般范围内、社会主义在经济空间内力图革除的东西。这些经济范畴通过它们与从属关系的联系，通过它们对各种主体立场的作用，现在又被重新纳入到探讨之中。社会主义指涉一套批判经济不平等的话语，并且，它大概指向本身并不把“差异性的”关系引入不同主体之中的那些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被运用，它们成为经济领域中不平等的权力和平等的权力的代名词。

由此看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存在着对经济空间的三重改造。首先，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那些本身被当成是本质主义的东西的具体概念：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阶级过程。其次，通过对本身并不是理论建构产物的资本主义的叙述，他们重新引入了传统的经济概念。最后，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重新命名为基本的政治概念。这些改造，其作用不仅仅把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从它们唯一的、特权性的本体论地位中移出（每一种本质主义所应得的正当而必然的惩罚），而且使经济空间本身的理论结构崩溃了；因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连结为一个整体。对我们而言，没有被理论化的经济概念出现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下半部分，这体现了由于没能把非本质主义的再概念化扩展到政治经济范畴中所造成的主要后果，同时也指向了这些概念当前所处的政治领域：“经济空间本身构造了一个政治空间”（HSS，77）。一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概念，现在却变成别的概念名称：权力、不平等和所有权。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存在着权力、不平等和所有权，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概念与阶级剥削作为互为依存的条件在话语中是相互连接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它们取代了这样的话语：阶级被归入不平等的经济权力未加详细说明的形式中，但是，这种权力及其存在条件的状况和原因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阶级剥削肯定是权力存在的一个条件；同样肯定的是，在阶级剥削存在的诸多条件之中，权力只是其中的一个。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剩余劳动的生产与分配的特定形式的详细说明中，我们理解到，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空间中存着向被普遍化的“经济不平等”的理论倒退的倾向。

重新建构经济学

虽然拉克劳与莫菲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来构造主体立场的空间和社会空间，但这一解决确乎不是向经济的首要性这一观念的回归。所需要的只是对既不决定政治也不可被还原为政治的这种经济空间进行重新建构，不是把政治认同为主要的外部因素（它突破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妄断），

相反，我们力图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这些经济范畴承认多种多样的外部领域的多元决定作用。就像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概念中找到了使他们走出本质主义话语的道路一样，我们相信，在马克思那里，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有许多路标，它们标示着具有类似的开放或封闭的歧义性的缝合。它们中的一些恰恰就栖居于拉克劳与莫菲声称与接合和霸权的多元决定逻辑不相容的“基本范畴”之中。阿尔都塞指出，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被他贴上“多元决定”之标签的认识论）就以特定的状态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如果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不到这一认识论的痕迹，那么这应该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拉克劳与莫菲对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借取一点也不能夸大）！

例如，商品的劳动力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快地把它作为虚构、作为资本主义阶级过程的中心场所加以屏弃）本身就充满着“主观的”和“外部的”因素，而且，它完全能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范畴进行重构性解读的起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政治与文化上的外部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论“所谓原始积累”的一章中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论述，这也包含在他较早的观点中：劳动者必须“在双重的意义上是自由的”。我们简要地提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此所作的论证的另外两个著名的、重要的方面，这两个方面都表明了被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引进剥削之中的主体性的多元决定作用：劳动力的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对于前一点，马克思写道：

> 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他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①

显而易见，各种文化力量（文化发展水平，生活要求的形成——道德因素）作为诸多外部因素在劳动力价值的形成上发挥作用。诚然，马克思在表明多元决定时前后并不一贯：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像拉克劳与莫菲一样在劳动力与商品之间作了同样的区分。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出的，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他属性都被它们存在的条件多元决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94页。

相对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另一个具有张力的场所。令人惊奇的是，工人斗争的颠覆性力量（它迫使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固定工作日中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却是拉克劳与莫菲从马里奥·特龙蒂那里引用过来的。尽管对特龙蒂尊重之至，但荣誉必须归于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能（或不愿）承认话语缝合或许能被重新打开以让外部光线透射进来。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就阶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的和认识论的自我意识作了著名的说明：

>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类似于拉克劳与莫菲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发现的那种两可性与张力。个人“主观地超出”“自然过程”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了主体构成的“外部”领域的存在，正是这一外部领域使我们从经济的封闭性中脱离出来。马克思表达得十分清楚：个人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资本论》中对他们如此处理代表的只是一种话语策略。

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之中的两可性的谱系在哪里？哪些能用作通往我们所需要的重构经济空间的道路？朱莉·格雷姆在她就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所写的文章中指出，她的批判来自于一个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本身是非正统的，因此极易受到批判。这一观点把马克思著作中的经济概念看作是构建阶级与经济关系的“偶然性逻辑”和“多元决定作用”的尝试。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项目已经产生出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尝试着跟踪马克思话语中阶级所留下的痕迹，以便建构出一个经济空间的概念，在此空间中，阶级不构成其本质而只是一个进入点，这一空间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和自然的外部因素。

在较早一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阿玛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2页。

利格里欧和加莱利提出了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一种分析，这一分析把商品拜物教当作是政治经济范畴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张力点。他们论辩道，商品拜物教认同了商品交换和人的主体性相交汇的理论空间，这一理论空间由平等、所有权和合理的策划所构建。在对拉克劳与莫菲的一处回应中，阿玛利格里欧和加莱利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证明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历史维度构成了商品交换本身的空间。“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是马克思颠覆经济的话语特权的方式”（Amariglio and Callari，1989：44）。他们写道：

>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用以显示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主体性、意识形态、话语、政治如此等等的一种策略，最重要的，它也是用以显示经济关系本身如何是这些上层建筑和其他过程的联合作用的“接合的”和“多元决定”结果的一种策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对主体性的处理——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中它们被联结在一起——允许我们提出关于经济、政治和主体性的被多元决定式地构成这一类的问题，对于这一类题，拉克劳与莫菲相信它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之内被讨论。（Amariglio and Callari，1989：35）

这一争辩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既不是虚构的，也不是事实，而是被我们的话语实践多元决定的（就像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主概念所指出的那样）。十多年来，雷斯尼克和沃尔夫一直在详细地阐发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范畴的多元决定的观念，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既不坚持它们与现实的根本对应，也不把它们瓦解为政治空间。除了详尽说明阶级过程与它们的接合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关于国家的阶级性质（1987）以及同样作为阶级进程的共产主义（1988）这些具体概念。

布鲁斯·罗伯特的论文《利润是什么?》显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仔细界定为一个多元决定的场所的过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利润概念既与新古典理论同时也与新理查德主义基于过剩的方法区别开来，他写道：“任何对剩余产品的如此主张都可以被构想为对剩余劳动一层接一层的转移或再分配的结果，其中每一层都代表了居于被考察的社会情境中的阶级过程的不同维度。”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才有可能把支付款项的分配看作是义务劳动再分配过程的结果。”Bruce Robert，1988：137，151 如此的分析有助于建立一个我们借以将经济关系界定为阶级关系的概念——此一概念并不诉诸还原论的阐述方式。

早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对于商品这一概念的概念化所必需的某些特征，我们已提出了一些简要的评论。该文两位作者中的一位（Sandler）也正在详尽地开展对资本主义阶级过程与环境主义之间的联结的分析，这种分析方式着力突显价值这一概念是如何通过改变环境的文化观念而被多元决定的，也就是，它是如何随环境观念的变化而被构成的、被改变的。这一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企业回应环境压力的一种方式是把非生产性支出转变成生产性支出。①

对我们这些相信如果缺乏集体占有我们剩余劳动时间的清晰观念就将无以建构出较好的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的人（这些人坚持运用充分规定的、被那些完全“外在的因素”多元决定的经济概念），拉克劳与莫菲以及一般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提出了一个挑战。《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光彩夺目的谱系学、霸权的重构、接合以及对多元决定的阐发，这一切无不证明了需要一种策略——即创造类似的谱系学并重新建构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尤其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这一范畴用以指称生产、收入以及剩余劳动时间的分配），这种重新建构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为经济关系的理论建构（这一建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缺乏的）提供了系统的支撑。就像我们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工作的某些部分已经处在进展之中，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做。《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不仅创造了用以援助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工具，而且提出了借以判断未来任何这样的概念化的标准。然则，为了继续详尽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的特征，我

---

① 当代的环境运动（它最重的的契机就是批判反环境的文化态度和模式），通过它对生产“对环境有利的商品”的强调，事实上正在促进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同我们一样，拉克劳与莫菲竭力主张激进的环境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维度。这很可能包括象市民和工人参与资本主义企业指导委员会这样的经济民主的特征。尽管这无疑对生产有利于环境的商品起鼓励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必然地注意到资本主义剥削这一问题，此一问题已经从他们的话语范围内排除了。在卷入关于控制跨国公司的最好方式（市场激励还是国家调节?）的争论时，环境主义清楚地显示出缺乏阶级分析的经济概念的政治作用。

在早期的社会运动方面，这些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参见沃尔夫和雷斯尼克的论述（1986），他们引证了盖勒思·斯特曼·琼斯对英国宪章主义的研究，用以显示宪章主义者把财产权模式和剩余劳动的生产与分配过程分析为权力分配的作用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运动的衰落和众所周知的失败。“简单地说，在权力关系上的政治变化从财产所有权或剩余劳动的占有与分配上并不会改变许多东西”。有趣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在强调“民主话语的具有深刻意义的颠覆力量”时也提到了同一著作。

们必须抑制民主话语浪潮的明晰性和普遍性，以便为这一进行中的工作留下珍贵的空间。

作者：Jonathan Diskin and Blair Sandler

文章原标题：Essentialism and the Economy in the Post – Marxist Imaginary：Reopening the Sutures

文章出处：Rethink Marxism，Vol. 6，No. 3（Fall 1993），p28 – 48

（编译者：周凡，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后）

编译后记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股新的颇有争议的国外社会、政治思潮，自从这一理论思潮诞生以来，方方面面的不同回应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尤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自1985年面世以来，在左翼、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的领域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这本很薄的小册子（其英文版尚不足200页）似乎蕴藏着相当丰厚而密集的理论沉淀，以至于西方学者对它的“开掘”虽已历20年却全无消歇之迹象，主要以它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已有六、七部之多，而长篇专题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对于这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研究景观，美国学者乔纳森·迪斯金和布莱尔·桑德勒曾感慨地说道：“这么多年以后，我们还在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作出回应，大量的文章对这部著作提出了足够多的问题、评论和批判（既有肯定性的也有否定性的）——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著作具有重要价值的表征”。（Jonathan Diskin & Blair Sandler，p29－30）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大力引进，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它的“东渐”历程。但由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抽象化和复杂性，加之这一理论言说的西方学术理路与思想背景，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还是相当疏离隔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导致了国人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障碍与困难，这就是，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太少，缺乏充分的可资借鉴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本。为了给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上的支持，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文献中选出了一批关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争论性文章，并联系一些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请他们将其文章寄给我们，然后组织人员将之译成汉文。希望本书的编译能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域及其争论点提供切实的参考，从而为推动国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作一点微薄

的贡献。

巴尔达基诺先生（John Baldacchino）在遴选论文、联系国外学者及文章再加工授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于2006年6月中旬不远万里专程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赴中共中央编译局处理相关事宜。对于他的友好帮助、热情投入和杰出贡献，我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另外，还要向参与本文集译事的付琼博士后、黄文前博士、吕增奎博士、郤继红副研究员、李百玲博士、王平博士、李世书博士及刘智利同志表示感谢！没有他们认真而辛勤的工作，这部文集就不可能面世。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后经典文丛”主编李惠斌先生在策划、翻译、对外联系及出版方面均投入了大量精力，给予了积极而有力的支持，我与所有将受惠于此书的读者一道诚挚地铭记李惠斌先生的善举与功德。

周凡于中共中央编译局

2006年10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作者=周凡主编　李惠斌丛书主编
页数=369
SS号=11853637
DX号=
出版日期=2007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